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 苏联经济论战中的 政治潜流

——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

(英)莫舍·卢因著

倪李铨 张多一 王复加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

——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

〔英〕莫舍·卢因 著

倪孝铨 张多一 王复加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年·北京

## 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

——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

(英) 莫舍·卢因著

倪孝铨 张多一 王复加译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10 1/2印张 字数: 285(千)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统一书号: 30220·4 定价: 1.10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 内 容 简 介

英国莫舍·卢因著《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一书于1975年由伦敦普卢多有限公司出版。书中主要介绍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形成经过和当代苏联经济学界讨论经济改革的情况，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现状进行了剖析。

### 关于二十年代的争论

作者说，斯大林奉行“原始积累”理论，用剥夺农村和牺牲消费品生产的办法来维持高得惊人的积累率。斯大林提出的口号是“速度决定一切”。斯大林经济纲领的指导方针是“解放”生产力，其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对重工业投资。斯大林根本不考虑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和平衡。相反，把一切不符合自己胃口的经济主张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异端邪说”。结果，他在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用高压手段于三十年代建立起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由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官僚机构所管理的完全或几乎完全国有化的”“中央统制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在决定经济政策和制定经济计划方面实行高度集中化；对物资供应实行集中化的行政管理，即实行定量配给制度；计划内容无所不包并且是强制性的；崇拜数量指标；把市场范畴和市场机制降到次要地位，而且仅仅把它们看作是对个人消费领域和劳动领域起作用的东西；企业内部存在等级森严的行政管理体制等等。在这种经济体制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权力关系，即“把整个制度变成一种特殊的党国的政治体制”。

这种特殊模式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出现了机能越来越失调的现象并由此而导致了一连串阻碍经济发展的倾向，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于苏联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

作者指出，布哈林和斯大林虽然曾在新经济政策、农民和工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相似，但他们很快又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成了对立面。布哈林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是苏联继续实行工业化的长期背景和基础，其理论根据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总的来说不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而是会慢慢消失，因此苏维埃政权不需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它所采取的政策应当是“渐进的”和“有节制的”，而决不当用“大规模的镇压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认为，从长远来说，城市和农村中的私有经济成分要被取消，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由一个无所不包的国营经济成分来取代它，企业主阶级将会被消灭，但应当通过效率更高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和合作社企业在市场上赢得胜利的办法来实现。他反对一举压垮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小业主和小农产品生产者，认为他们所代表的经济成分是对整个工业化的一种补充。布哈林强调市场应当成为经济的决定性形式，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化和低效率，产生“垄断的腐化作用”，而市场竞争则是防止产生这些弊病的有效办法。

布哈林认为把农民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虽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对农民采取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同农民进行合作，允许农民发展，甚至允许农民中间出现某种程度的阶级分化现象，只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积极扩大就行。布哈林反对“速度决定一切”，而主张长期持续增长；强调经济要按比例发展和计划要保持平衡，反对最大限度地对重工业投资而置农业和轻工业于不顾的片面性；主张充分利用市场和范畴，把经济的计划性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作者说，由于斯大林用镇压的办法压制了布哈林这些正确主张，结果给苏联的经济和整个政治生活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 关于苏联当代经济学界的辩论

作者说，苏联当代经济学界就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进行的争论是在五十年代末苏联经济增长率突然下降、过去使用的经济战略显然妨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开始的。这场争论于六十年代进入高潮，七十年代仍在继续进行。争论的结果，有两个思想被人们广泛接受：一是市场并非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一是必须在中央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之间找出某种新的关系。自新经济政策时期以来，中央集权化第一次不被人们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信条。大多数人虽然未对计划和中央统制提出异议，但他们认为，这种过分由上而下集中计划和下面缺乏计划性的经济体制，必然产生只顾完成数量指标、忽视质量和压制革新等现象。也有一些人对计划和中央统制本身进行抨击。如著名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认为，“死板的计划指标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十分严重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损害”，它使工人以一种浪费的、甚至是犯罪的方式进行生产。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指出，“如此从上到下被束缚起来的一种体制，将对社会和技术进步起阻碍作用，它迟早要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下土崩瓦解”。

作者介绍了苏联现代经济改革派提出的一些主张。例如，涅姆钦诺夫主张计划要利用市场的作用，并为直接生产者提供必要的自主权和物质刺激。另一些数理经济学家要求进行彻底改革，认为束缚工厂手脚、压制它们自由行事的能力是现存管理体制最严重的缺陷，主张高级行政机关、各个部成为“成本核算单位”，直接为其领导下的企业盈亏负责；强调计划、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和工厂的关系以“经济杠杆”而不是直接命令为基础；提出企业应受计划指标的强有力影响，但其日常活动应为消费者、而不是为计划服务，计划只确定利润或效率等指标，不应包括产量指标。有些改革派认为，计划的作用在于“调节”而不是“管理”经济，应当重新组织社会主义市场，使大部分投入和产出(其中包括资本货物)都自由流通。

作者写道，1965年苏联在柯西金主持下进行了经济改革。但在以后几年里，反对改革的力量不断增强，认为改革派要求自主权和对中央与地方关系重下定义的做法无异于产生了一种新的势力。许多当权人担心，改革如继续进行下去，将会毁掉统治集团和整个官僚体制，因此竭力强调改革只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前提。

作者还介绍了苏联现代经济改革派对现存国家制度的批判。说有些改革派认为现行的行政管理办法直接依靠的不是人们的经济利益，而是政府的权威。他们认为，如果无视经济规律，中央集权制就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当前的政府和领导人不仅代表“全体的利益”，而且也发展了自身的利益。因此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重新确定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找出使国家不致进行过分干涉的办法。

## 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

作者写道，目前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城市化和工业化了，政治制度中原有的许多特征亦已发生变化；同斯大林时期相比较，在管理国家的方式方法上出现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和改造，但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那些准则，今天仍然存在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党的生活中。许多苏联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支配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那些制度不适应，是目前苏联到处存在紧张局面和出现并继续存在改革倾向和持不同政见倾向的原因。苏联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并承认感到为难。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新的现象，其证明是至少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还被当作反动的东西而遭禁止的若干社会科学学科现在又得到了提倡。

作者对当前苏联党内外各种政治趋势进行了分析。说目前的领导集团竭力要维持现状，推迟或阻止改革，除非改革会带来安定的、不破坏现状的经济增长。在苏联，权力集中在最上层，下面各

官僚等级和普通群众只有义务绝对服从和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苏联在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化是靠剥夺直接生产者的各种权利实现的；同样，政治生活“国有化”的现象也是靠剥夺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形成的。作者认为，今天苏联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社会的不平等和阶级关系紧张，这已成为苏联领导人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苏联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作用在下降，党员和老百姓普遍对政治抱漠然态度，“没有人主动地相信党的话”。面对这种情况，党试图加强自己的控制能力，但收获甚微。作者说，如果认为苏联领导集团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是不对的，这个制度目前“显然还处在成功的极盛时期”，只不过有了一些动荡不安的趋势，显得有点运转失灵和出现某些危险的裂痕罢了。

## 导 言

大约四十年前，苏联开始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从那时以来，它的社会和政治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使在斯大林死后的很短时间内，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尽管它还保留着一个庞大的农业经济部门，相对不发达状态还依然存在，但它的经济、社会结构，现在则已经城市化和工业化了。政治制度中原有的许多特征也起了变化，同斯大林时期相比，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有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

然而，无论社会生活发生了多少引人注目的变化，斯大林当权时建立并遗留下来的那些制度（有些建立得更早），至今还盘踞在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之中，在举足轻重的执政党内部，则更是如此。

许多关心政治的苏联公民都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苏联的社会虽然前进了，但支配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那些制度却没有相应地进行调整。这也是本书的基本出发点。从苏联经济学界开展的辩论（即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中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生前和死后，新的社会一直都在向前发展，而政治制度的变革却很缓慢。这种说法如果属实，也可以算作对苏联国情的一种判断，有了这样一个总的看法，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苏联制度内部到处存在着紧张关系，也容易解释为什么在苏联会出现并长期存在改革倾向和持不同政见的倾向。

实际上，许多苏联问题观察家都同意这种判断，也知道这些倾向，但对这些倾向的规模和深度至今还没有定论。历史学家的好处是，事情过去以后，可以很容易准确地指出某些社会中所存在的

“制度不健全”、“关系紧张”、“离经叛道”和“持不同政见”等现象。但是，要分析由一个占据一整块大陆的国家所管理的一个复杂社会中的当前事件，那困难就会大得多。分析苏联的当前事件尤其如此，因为那里的消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难得到，那里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新的，都还处于酝酿状态，对苏联领导人和负责新闻检查的官员自己来说都的确还是陌生的。

苏联上层人物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并且承认感到为难，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苏联政治生活中一个新的重要现象；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至少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还被当作“反动的东西”而遭禁止的若干种社会科学现在得到了提倡。然而，政治学并不包括在官方允许的学科之中，苏联历史也有许多方面的内容仍然受到严格的审查，而这种做法同过去继承下来的思想习惯和统治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如此，从许多方面来说，政治学和历史学这两个学科都是压制不了的。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人在苏联是有的，只是不用“政治学”这个名称罢了，其目的有的是为了反对政府，有的则是为政府效劳。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苏联在六十年代，还出现过一股研究历史问题的热潮，许多人热衷于对当时和过去的许多重要生活领域进行分析。不过在某些苏联保安人员看来，研究历史并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在一个历史不长、但冲突迭起的国家里，由于过去和现在仍然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历史就直接成了政治的一部分，这在某些当权者看来是十分可怕的。与此同时，政治也会涉及历史问题，吸引并迷住许多对本国问题进行研究的人。

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就充满了现在与不远的过去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而这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之一。苏联历史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每当我们注视苏联国内某些重要的事态转变或者那里出现的大辩论时，我们都能明显地看到这些事件所起的作用。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苏维埃俄国，文学、历史、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均出现了这种大辩论，每次大辩论都向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了解苏联的极好机会。就象轻微的地震活动那样，这些辩

论暴露了某些在此之前仍然掩盖着的“地质层”，使人们能够洞察这个社会整个制度的内情。

本书将介绍苏联国内在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上的辩论。这些辩论在五十年代末开始，六十年代进入高潮，七十年代初仍在继续进行，但势头已多少不如过去，对问题的分析也不如过去那么深刻。这些辩论是苏联理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伴随并推动了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在苏联的出现，同时证明了苏联一群特定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中间激烈的思想波动。

我们所用的材料来自于苏联经济学家们论述经济理论和讨论苏联日常经济问题的书籍和文章。但是这些辩论中凡属纯专业性的内容（例如某些关于制定价格或制定计划的方法方面的意见正确与否、实际通过的那些经济改革方案的详细内容以及这些经济改革目前的进展情况究竟如何等）则不在本书所研究的范围之内。读者会发现专业经济学家们已经充分地研究过这些问题了。本书集中探讨的是苏联经济学家们在关于经济问题的辩论中所披露出来的苏联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下面这些情况：要求改变经济体制的压力；对许多教条的冲击和这些对教条的修正；在比纯经济学范围大得多的领域里所出现的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派别，以及在一群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中间进行的这场辩论所包含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意义。批判性的政治思潮的出现与发展、观点发生分歧和变得多元化以及对过去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辩论所带来的新现象，对此，书中将有介绍。这些现象说明了苏联理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人们迄今尚未充分理解的一个更为普遍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政治见解全都努力地影响着各种人群和各个社会阶级，渗透进党的生活，参与政策制订者形成意见的过程并且构成苏联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苏联的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上述情况，这一点已由研究苏联文化和文学的学者用“地下出版物”的大量作品作为例证而充分加以证实了。实际上，苏联政治生活中铁板一块和呆滞、不活跃的现象是表



面的，其实际情况比表面上显示出来的要丰富多采得多。“地下出版物”的作品中至少有两篇——一篇是阿马利里克写的，另一篇时间稍晚些，出自罗伊·麦德维杰夫之手——提供了对目前存在于苏联党内外各种政治趋势的分析。<sup>①</sup>

此外，有关六十年代及其以后的经济辩论的书籍和文章的内容、对苏联这个经济模式过去和现在的效果的评价以及要求进行变革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所有这些在命题和措词上都是同二十年代那些辩论令人吃惊地相似甚至吻合的。随着当前这场论战的展开，人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场论战充满了暗示、引喻、对别人语录的抄袭、不提出处以及直接和间接地引用二十年代一些知名人物的观点等现象。二十年代的那些知名人物显然同这场论战毫不相干而且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其中有些人由于在三十年代被枪决而声名狼藉。不难发现在这个拼板玩具中所失去了的那几块“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尼·伊·布哈林——斯大林的最后一个重要反对派的领袖。然而，象他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影响是不会随便得到承认的，这也许是因为受到政治上的限制（今天比在赫鲁晓夫时期限制得更严），也许是因为参加辩论的那些人缺乏政治和历史知识方面的训练，他们有时并不太了解过去同现在的密切关系。

目前的改革派竟会采纳布哈林在1928至1929年间反斯大林纲领中那么多的观点作为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对过去情况的批判（甚至在语言措词上）竟会同布哈林的批评意见和预言如此吻合，这真是令人惊讶不已。而这一点正是本书开头要论述历史问题，即论述布哈林其人和在他领导下“右派分子”为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而开展的那些老的辩论的主要原因。

本书之所以特别提到布哈林所起的作用，是因为他是反对斯大林的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这一点我们将特别予以强调。当然，他

---

<sup>①</sup> A. 阿马利里克：《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纽约，1970年版）；罗·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阿姆斯特丹，1972年版）第3、第4章。法语译本，S. 若弗鲁瓦：《论社会主义民主》（巴黎，1972年版）。

并不是同反对斯大林的斗争有关联的唯一的领导人，构成他的论据和纲领的那些观点也并不都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但是他是新经济政策的最主要的代言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因为维护这个政策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正是他所起的这种作用解释了他的许多观点，也说明了三十年以后与他的观点相类似的一些观点会再次出现的原因。诚然，三十年以后的情况与当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但是这个国家现在同样处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

布哈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人物，直到被斯大林及其一派击败为止，他一直是党的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然而在西方学术界，他却没有象列宁、托洛茨基和后来的斯大林那样引起很大注意。至少有一部分理由是明显的：他比那些人年轻得多，所起的作用肯定比他们小。那些人建立过理论，做过大事，在理论、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显示了多方面的才能。布哈林虽然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一开始组成时就在这两个机构中任职，却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行政或军事职务。他主要是从事于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一种兼有做学问和搞宣传的工作，意味着他基本上是个搞政治的知识分子。党和列宁把他看作是最年轻、最能干的党的理论家。总的来说他不是个善于党内斗争的人，搞政治策略和计谋不是他的长处，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常常是很差的。但他聪明过人，书读得很多，热爱艺术，还是个蝴蝶标本的收藏家。他举止谈吐都极有教养，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虽然他那由于道德观念和艺术爱好而形成的瞻前顾后习惯过分地束缚了他身上那种严格意义上说的政治活力，但他在同苏联革命事业中那三个最大的人物——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发生冲突时却是毫不迟疑、甚至往往是不顾一切的。这个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所具有的活跃思想和他所达到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他对布尔什维克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理论提出得比列宁早，有些是在同列宁进行争论时提出来的——并且增添了许多有独创性的观点。其中有些观

点生存的时间比他长，今天还在起作用，尽管它们的创始人不为人们所承认。但是，布哈林的形象在西方是暗淡的，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可以从他帮助斯大林击溃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分子这种目光短浅的做法以及后来他自己被斯大林击败这个事实中找到，这些情况使得他以及他的同伙的那些观点显得不足取。难道俄国不是已经变成斯大林所希望的那个样子而没有变成那些被击败了的派别所希望的样子吗？看来正是这个事实作出了裁决。此外，托洛茨基有大量的机会亲自阐述自己的见解，给他写传记的那位有才学的多伊彻后来也（至少在西方文学中）为恢复他在苏联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出了力。

布哈林仍然有待于公正的评价。但是在维辛斯基——对布哈林等人进行捏造事实的审讯的检察官——背后牵线的那个统治者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所起的作用和他的为人已经引起激烈的争论。东欧存在的“自由共产主义”现象、所有东欧国家中进行的经济改革、多中心主义、苏联出现的经济困难、改革和新的思想方法，尤其在许多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新的思想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对在斯大林主持下建立起来的那个制度进行了批判而造成的。所谓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表明当时正在酝酿着对过去的幽灵重新恢复名誉，这场运动起初是悄悄进行的，后来则变成官方的正式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开始出现了苏联历史的重新研究和解释。虽然这一进程现在已被制止，但是作为本书开头的布哈林小传却是依据下述设想写成的：历史上那些党内反对派的活动所涉及的问题同当前的苏联政治舞台仍然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在那些活动中冲锋陷阵的是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所消灭的所谓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其中首先就是布哈林及其信徒。这种情况表明，“在今天，二十年代的那些观点还远远没有失灵。”<sup>①</sup>在苏联，凡是对重要人物的谴责、为其恢复名誉或给予重新评价，总是带有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这已是普

<sup>①</sup> 已经到1960年了，A.厄利奇在他所著的《苏联工业化之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0年版）一书中仍然持有这种看法，见该书前言部分第22页。

通常识。对斯大林的态度便是一个例证。布哈林极有可能是下一个被重新考虑的对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并且这位反对派领袖终于有一天重新得到官方历史的承认，那么更多的人就会重新被提起。

眼下，由于苏联国内政策中保守路线的影响，整个问题看来还被冻结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僵持状态。但是在西方，有一本传记已经问世；<sup>①</sup>在苏联——如同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有关经济问题的辩论中间接的、遮遮掩掩的或者甚至是完全无心的表态和揭露，皆表明那里正在进行着对过去历史重新评价的活动。

就某些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学者来说，他们这种重新评价的活动并不是无意识地进行的。我个人的经验和我的研究结果均表明，这些经济学家中有些人非常熟悉二十年代学术界和政治界一些主要人物的著作。要不是因为官方的新闻检查或作者的自我检查，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中，许多人的名字（例如巴扎罗夫、格罗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会立刻充满现在这些经济学家所写的文章中的。斯大林是不可避免的吗？布哈林的计划是否有过实施的机会呢？谁能怀疑对研究这些问题深感兴趣的俄国知识分子在这样一场辩论中不会经常采取同官方远为偏离的立场呢？

但是在目前，过去那些主题，包括在许多方面同布哈林的见解非常相似的一些见解竟会重新被人提起，这倒是更加引人注目的，因为对于大多数参加最近这些经济辩论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在对当前的现实生活作出反应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巧合，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发现。这种情况接下去就会导致他们（至少是其中的某些人）对老一辈作者的研究，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同那些作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但是，无论在每一个卷入这场辩论的人的思想上是否都发生了

---

<sup>①</sup> S. 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本政治传记》（纽约，1973年版）。笔者在本书最后定稿时尚未得到S. 科恩的这本书。

上述思维过程，反正题目以及论据的这种巧合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而且当然有着无法反驳的理由可以加以证明。首先，许多令人烦恼的事情、问题和理论，其根子皆可以从苏联在本世纪首创的那两种特定的权力关系中找到，这两种权力关系就是：（1）由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官僚机构所管理的完全或几乎完全国有化的经济；（2）由一个把整个制度变成一种特殊的党国的独一无二的国党所管理的政治体制。从本质上说，二十年代的辩论，尤其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争论乃是一场赞成或反对建立这种特殊模式的斗争。布哈林以及和他有相同想法的那些人宁愿把新经济政策的那一套制度看作是继续实行工业化的长期背景和基础，而斯大林周围的那群人则想摆脱新经济政策这个基础而建立——即使他们并没有立即充分认识到自己前进的方向——一种新的制度。过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一场新的辩论开始了，这场辩论仍然跟同一个模式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模式右翼分子和其他一些人在二十年代曾预料并竭力加以防止过，现在他们的继承人又以一种事后的认识注视着并想加以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两次辩论中被评论的对象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经过长期中断之后，现代的论战看起来好象又回到以前争论过的那些问题上，并且在许多方面经过一番精心设计之后，又继续同新的环境结合在一起了。很显然，在当前情况下，所争论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使一个农民国家工业化，而是如何管理好一个庞大的工业国家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同二十年代的社会环境极不相同，今天参加辩论的人所能获得的分析问题的经验和手段也比二十年代所能提供的要优越。很自然的是，当前这场辩论所涉及的问题当然会超过从前宣传新经济政策的那些人所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中，人们在辩论中实际使用的论据却是惊人地巧合的。

希望读者理解，笔者并不想把布哈林理想化或夸大他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笔者以及本书对此均不发生兴趣。本书所探索的现象

同对布哈林的为人及其思想深度的确切评价无关。本书将指出他的行动和政策中的许多弱点。但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布哈林是一位为某种舆论团体、社会潮流和党内政治派别讲话的富有才智的发言人。他在苏联的制度处于需要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批评意见和警告，并且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方案。后来（虽然环境已大不相同）当另一个重要关头到来时，从前那些失败者的主张突然又冒出来了，尽管新近参加辩论的人中，有些并不知道与他们自己所持的非常相似的一些主张曾经是上一代人进行过的一场激烈辩论的中心问题。

本书的结构是上述考虑的直接结果。第一部分《历史的记载》提供了一份简短的传记但对一些主张则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这些主张在布哈林作为最高领导集团成员所进行的政治活动的最后阶段构成了“布哈林主义的”思想的一部分，或者说解释了当时的“布哈林主义”的思想。本书只是简略地提及过去时期的情况，但对这个阶段则予以强调，这是因为新经济政策时期所争论的某些问题，一方面显示了面对正在出现的那个极权主义国家左派纲领和右派纲领之间的机缘巧合，另一方面也更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所存在的唯一的反纲领同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接下去是对我们所说的各种“模式”，即从1917年革命到斯大林统治时期结束苏联历史所经历过的那几个阶段进行比较一般性的探讨。

作为第二部分《经济与国家》的背景，第一部分的内容多少是独立和自成一体的；第二部分则是对下一个历史阶段进行探讨并且基本上集中讨论六十年代所争论的那些问题。这一部分将分析苏联当前经济论战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批判性思潮以及这些问题和思潮所包含的政治涵义。在有关经济和计划问题的辩论过程中，对新的经济蓝图和模式的探索导致了苏联思想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出现了苏联这个国家的批判性分析。

第三部分《社会与党》集中探讨党的问题，目的是对苏联改良派思想中以及国外的大量分析中所包含的某种设想的正确与否进行检

查，这种设想就是：苏联的党，即苏联政治制度的关键，正在暴露自己作为苏联制度中的掌权者的功能是处于一种极度紧张和能力不足的状态之中。这一部分将概略地叙述对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进行调查分析过程中所发现的那些问题。最后，第三部分还试图把历史上和当前关于经济问题的辩论结合在一起谈一下，因为这些辩论的含义关系到苏联的整个制度。

苏联的许多政治倾向现在还处于胚胎状态；另一些政治倾向虽然比较成熟，却仍然是秘密的、不公开的，人们无法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本书也并不是一篇探讨苏联整个制度的论文。本书仅仅是把过去和现在的、传记中和历史上的以及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一些情况汇编在一起，通过这种做法勾画出一堆错综复杂的问题的轮廓，得出初步的结论，并为进一步开展辩论和思考问题提供一些资料。

# 目 录

导 言	ix
-----	----

## 第一部分 历史的记载

第 一 章 布哈林的一生	3
第 二 章 对左和右的剖析	30
第 三 章 一位反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45
第 四 章 苏联历史上的两个模式： “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67
第 五 章 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斯大林的模式	88

## 第二部分 经济与国家

第 六 章 对“中央统制经济”的研讨	113
第 七 章 探索补救的办法	141
第 八 章 对国家进行的抨击	170
第 九 章 下一步怎么办？——变革的纲领	194

## 第三部分 社会与党

第 十 章 “平民社会”在恢复中	227
第十一章 党：“自下而上”的面面观	252
第十二章 二十年代的启示	270
第十三章 结束语	299



第一部分  
历史的记载



# 第一章

## 布哈林的一生

布哈林的经历，从参加地下活动到作为年轻的理论家和政治局委员在党的领导集团中发挥作用，最后在1938年的审讯中蒙受耻辱，当然是值得小说家或剧作家为之挥笔的。如果再写上那个幕后牵线的王子，如何欣赏自己的政敌供认他们从未犯过的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的场面，整个情节还会增添卡夫卡式的<sup>①</sup>神秘色彩。但是本章仅仅是一篇小传和从历史的角度对一个人的命运的速写，这个人的命运是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很大一部分历史的缩影。在布哈林的一生中，个人和历史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对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心所关注的事情的考察，可以作为讨论那些同个人传记无关的问题的后几章内容的导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9月27日生于莫斯科，父母都是具有高度教养的教员。<sup>②</sup>他的父亲是一个慷慨而又不切实际的人，这大概是他们的家境低于小康水平的原因。布哈林的父母鼓励自己的儿子从童年起就埋头读书。正如E.H.卡尔指出的那样，“布哈林因此比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更加明显地生来爱动脑子。”<sup>③</sup>喜欢读书和强烈的求知欲始终是他一生中的特点，但

---

①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作家，作品带有浓厚神秘气息。——译注

② 这篇传记将只强调布哈林的生平中同本书重点有关的一些侧面。除另有注明者外，材料均主要依据S.海特曼和P.克尼尔施所著《尼·伊·布哈林》一书（柏林，1959年版）。

③ E.H.卡尔编辑：《共产主义入门》（伦敦，1969年版），第18页。

在学校里他受到了革命政治的影响，年方十八岁（1906年）就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他生活道路的后面几个阶段同俄国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是非常相似的：上大学、几度被捕、流放、逃往国外。

从1911到1917年流亡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非常有创造性的时期，充满着狂热、兴奋的活动。他先是住在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那里被驱逐到瑞士；然后流放到瑞典，后来又 到挪威。再下一次驱逐使他到了美国，中途曾在英国短暂停留，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拘留中度过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布哈林都参加了国际的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从事深入的研究工作，尤其曾在维也纳在柏姆-巴维克和冯·魏塞尔的指导下研究经济学，也在瑞士研究过数理经济学。在流放期间他经历了三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见：首先在克拉科夫（波兰城市——译注）同列宁会见；然后在维也纳同斯大林会见，当时斯大林为写一本民族问题的小册子而进行的研究工作很可能得到过他的帮助；最后在纽约同托洛茨基会见，两人在那里合作了一个短时间，共同编辑评论性刊物《新世界》。然而，俄国在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公历在3月）的消息促使他急急忙忙地赶回了祖国。

布哈林同列宁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有着重大意义。<sup>①</sup>起初，列宁同这位有前途的年轻经济学家之间的关系是相当亲热的，但是这种关系很快就恶化了。由于激烈的争论，两人的关系不断受到影响，个人的感情也随之变得紧张起来，这主要是由于列宁的不妥协态度造成的，而不是对列宁充满崇敬和忠心耿耿的布哈林造成的。列宁总是这样——政治问题支配着他的个人关系，而且新来的这位年轻人同岁数比他大的权威之间所争论的那些问题也决非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过在开始的时候，布哈林在理论方面同列宁的合作是得到列宁赞同的。在瑞士，布哈林写了《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文，这篇

---

<sup>①</sup> 关于当时布哈林同列宁的争论，参见S.科恩所著《布哈林、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一文，载于《苏联研究》，1970年，第4期。

文章比列宁自己论帝国主义的那本书写得早而且影响了那本书。列宁公开承认在这一点上受到过年轻的布哈林的恩惠。同列宁一样，布哈林也接受了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的思想，但是在他自己的那篇文章中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和“国家资本主义”这样一些特殊的概念。按照布哈林的说法，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达到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国家所起的一种新的干预作用，在这个新阶段，同过去那种自由放任原则相反的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已经把经济组织起来并负责为其制订计划。他在那时和以后都曾用德国的战时经济作为例子来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并且认为德国的战时经济表明了一种将要出现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新的可怕倾向。他认为，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将具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将能够比以前任何一种国家组织都更加牢固地控制经济和群众。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正在变得“有条不紊”，这些国家经历了使得马克思的理论不得不加以修正的变革。他说，“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看来能够克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混乱并能够控制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而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这些无政府主义倾向本来是会导致内部崩溃的。布哈林当时预料，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主要将不是由于其内部矛盾的结果，而是由于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所致。

布哈林并不总是明确地得出所有这些结论的，但是这些结论都包含在他所写的文章之中。他在一篇更深刻地探讨国家所起的这种新作用的文章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这篇题为《谈谈帝国主义国家理论》<sup>①</sup>的文章在进一步分析“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试图

<sup>①</sup> 原文第一次是以书的形式在苏联发表的，载于《权力的革命》第一集（莫斯科，1925年版）。前一本书《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在俄国出版时附有列宁写的前言。这两本书在1929年以前一直被当作党内优秀理论教材。但是也应该提到布哈林在1912至1914年间写的另一本书《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莫斯科，1919年版）。在这本书中他研究了奥地利的边际主义。关于布哈林的著作目录，见海特曼和克尼尔施合著的《尼·伊·布哈林》一书和S.海特曼最近编纂的内容更完整的书《尼古拉·布哈林著作书目》（斯坦福，加利福尼亚，1969年版）。

使马克思在国家问题上所持有的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的态度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断言革命必须粉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并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经过某种过渡时期以后必须迅速消失。

列宁起初对布哈林的这种“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很生气并拒绝发表他的这篇文章。但过了几个月在他自己研究国家问题时，他采纳了布哈林关于国家问题的论点，并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在国家的前途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S. 科恩在评述这些分歧时指出，在这一点上获胜者是布哈林，尽管两者都由于自己所持有的过分的乌托邦思想而“输给了历史”。在另一个分歧点上，即在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作用问题上，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则是列宁的理解而不是罗莎·卢森堡和布哈林所提出的理论（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追随罗莎·卢森堡）。<sup>①</sup>

布哈林和列宁所争论的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双方始终没有得到和解）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内部冲突和在国界以内组织其经济的能力。由于年轻的布哈林首先写这个题目，看来历史证明了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不过这个判断并不能看作永远有效。

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前途等问题上，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列宁主义的理论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言论对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来说很重要。布哈林始终认为“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有能力克服其内部危机并看到了国家机器的可怕威力，他后来所具有的许多想法其根子皆在于此。他思想上始终相信一条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通过尽可能快地朝“公社国家”<sup>②</sup>前进来保证并扩大自由，因为“公社国家”将是“国家”消亡和“公社”成分增长的开始。他由于对现代国家的潜力抱有悲观看

---

① 科恩：《布哈林，列宁》。

② “公社国家”是恩格斯提出来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彼得堡，1918年版）中用了这个提法，见第4章第3段。

法而更加坚信这条基本原理。了解布哈林这种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以及这种对国家权力的略带敌意的态度(这种态度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包括许多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中间是常见的)对于我们理解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使人会觉得矛盾的是,这些情况也有助于解释他和他的党在苏维埃时期所采取过的某些从极左到极右这样一种明显大幅度摆动的做法。正如科恩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幽灵既是他在1918年年初采取左翼共产主义立场的一个因素,也是他在二十年代提出渐进主义政策的一个原因。”<sup>①</sup>

1917年8月布哈林从美国远道(途经西伯利亚)返回现在的俄罗斯共和国以后,立刻积极参加了党内和党的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他参与了发动十月政变的决策。在那场政变中他是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在他下一次就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问题引人注目地和激烈地反对列宁的时候,他很快就从这个组织中找到相当有力的支持。在这场争论中,第一次出现了严格意义上说的出于“苏维埃的”动机而反对列宁的情况:布哈林等人捍卫原先提出的直接的工人民主,即由工人委员会(和工会)来管理经济的主张,而反对新的国家的一种明显倾向——用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来取代工人的监督,而且这些行政管理人员都是同从前的资本所有者和专家们<sup>②</sup>勾结在一起的。由于这个原因,布哈林失去了自1917年12月就开始担任的《真理报》主编的工作,不过几个月之后当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问题变得不再那么尖锐、而年轻的政权面临新的严重问题的时候,他又重新获得了这个职务。这个政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爆发了内战,这场战争历时两年半以上,由此而产生

---

<sup>①</sup> 科恩著:《布哈林,列宁》,第445页。

<sup>②</sup> 于是在这里,布哈林同列宁提出来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个引起争论的策略思想——列宁称之为(苏维埃的)“国家资本主义”——发生了冲突。关于这个策略思想,见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所载列宁在1918年同布哈林的争论,《列宁全集》第36卷(莫斯科,1962年第5版),第283-314页。

了后来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在一场破坏性内战的压力下，为了进行生死搏斗而对人力、物力实行总动员的措施（包括粮食定量配给、集中制和大规模恐怖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措施却奇怪地同某种思想产物结合在一起，这思想产物就是，把在贫困和战时的友爱中实行的平均主义不但错误地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且还错误地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原则，尽管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仍然要保留。国家和党的生活中遇到的巨大压力足以说明当时为什么要求助于这种最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希望来动员人们的精力和维持人们的献身精神。这里并不存在任何策略手段，因为领导人对思想麻醉剂的需要并不亚于普通老百姓。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包括布哈林和列宁在内，当时都持有乌托邦式的信念，认为经济军事化和社会处于战争状态会产生出更高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列宁后来花了好些时候才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原则，转而采取比较现实主义的 policy。死抱着幻想不放，导致了近乎灾难性的局面，它给人的教训远比读几篇理论性的论文来得有效。诚然，缺乏现实主义这一点在指导战争方面并不明显，但在贯彻实行社会政策方面就很明显了。同农民的关系——这是革命的战略中心问题——不仅受到战时食品短缺的严重影响，而且还受到下面这种观点的严重影响，即认为市场现象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现象，而通过中央统制方法直接分配资源才是本质上共产主义的做法。因此在这个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本来对当时的政策进行反省才是适宜的，可是领导人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加强了“战时共产主义”那套做法而且还准备完全取消货币。由于没有及时放弃这些政策，终于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改变了方针，采取了新经济政策。<sup>①</sup>

在内战时期，除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那段插曲外，布哈林

---

<sup>①</sup> 列宁在1920年固执地坚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同他自己早先表示的谨慎的态度适成对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A. 诺夫所著《苏联经济史》一书（伦敦，1969年版），第81页。



并不比托洛茨基或列宁更左倾。从1919年3月起，他和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一起在政治局里工作。1920年底和1921年初，在著名的“工会问题争论”中他逐渐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而同列宁发生了新的冲突（这个联盟的出现究竟是由于他死抱“战时共产主义”原则的时间比列宁长还是由于托洛茨基本人的影响，这个问题只好留给传记作者去回答了）。他那个使工会军事化的主张很快就同这场冲突无关而且被人忘却了，只是到了工业化时期才被人们重新提起，不过那时是以不同的形式而且是在换了领导班子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尽管如此，不顺从的布哈林还是因此而失去了他在政治局中的职位，一直到1924年列宁去世后他才重新成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布哈林在内战时期所进行的理论活动和宣传活动就其规模和涉及的内容来说是相当令人惊异的，这尤其是因为他和其他领导人一样还不可避免地担负着其他工作。

布哈林显然是以无穷的精力在工作。为了写作，他大概是在晚上完成其他任务以后阅读文献资料包括西方最新出版的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著作的。1919年他和他当时的朋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起出版了一本通俗地解释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入门》。一年以后，他完成了后来没有写完的理论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第一卷（其中有一章是他的另一个朋友Y.皮达可夫起草的），这本书得到列宁的赞同。<sup>①</sup>1921年他的一本受大家欢迎但引起争论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问世了。

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了，这是苏联历史上一个令人惊讶的新篇章，它很快就在布哈林的一生中开辟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新时期。在1923年年底，他开始攻击托洛茨基的工业主义政策和其他一些政策，而且是相当猛烈的，直到大约三年以后他看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被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遭到流放和监禁

---

<sup>①</sup> 但是列宁为这本书的不通俗的形式感到担忧并对布哈林从A.波格丹诺夫那里借用的一些辞语提出了批评。列宁的注释见《列宁全集》第11卷（莫斯科，1931年第2版），第348-403页。

时为止。从1924年起，他开始支持新经济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过渡时期的极好的政策，虽然这个政策同他几年前曾经提出过的过渡纲领的确是大有径庭的。这时，官方路线已被看作是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共同产物，而且布哈林还被看作是这条路线的主要理论家。在当时的左翼反对派看来，他成了农民的保护人和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并且和斯大林一起成为热月党式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抬轿人。

## 右 派

布哈林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用卡尔的话来说，他不但成了“斯大林的恭顺的侍从”，<sup>①</sup>而且还站到右翼的政治立场上，支持农民利益，（根据上面同一个作者的说法）以对“采取行政手段要谨慎”的原则的至少同样虔诚的态度取代了他从前那些极端乌托邦式的信念。<sup>②</sup>后来当斯大林所谓向左转，要求迅速地、不顾一切地实行工业化的时候，据说布哈林“忠于自己所扮演的农民保护人的角色，象从前抵制托洛茨基那样抵制了斯大林”。<sup>③</sup>多伊彻在用类似的说法解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时补充说：“布哈林主义的全部内容一直在于它对农民的态度；由于这个原因（在斯大林的集体化开始以后）它变得毫无意义了……从小农消失的那一刻起，右翼反对派就没有立足之地了。”<sup>④</sup>

于是，关于布哈林所扮演的角色，这两位作者就象左翼反对派在二十年代以及他们的流亡领袖后来所表达过的那样，接受了“从左到右”这样一种两分法和解释。这种评价虽然有一定道理，却是片面的，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正确的。

---

① 卡尔编辑的《共产主义入门》一书，第24页。

② 同上，第50页。

③ 同上，第25页。

④ I. 多伊彻：《被遗弃的预言家》（伦敦，1963年版），第123页。

虽然布哈林在1925年向农民提出的“发财吧”这个口号显然改变了他在《共产主义入门》一书中所持有的立场并且激化了左翼反对派和布哈林-斯大林那派人之间就一系列广泛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但是布哈林在1926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重要而具体的修改这一事实也是值得重视的，而卡尔和多伊彻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后来布哈林和他的伙伴又根据新的“重建”阶段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这一点将在第二章中更详细地谈到）。然而，即使在进行这种调整前的那个时期，下面就要谈到的一些看法也是不无根据的，尽管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布哈林的一部分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存留的时间比它应该存留的时间要长。

作为形容布哈林所起的作用，“斯大林的恭顺侍从”这一提法是正确的，但仅仅就他帮助斯大林并被斯大林利用来消灭左翼反对派这件事而言。布哈林的这个作法当然不会为他自己赢得荣誉，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理论和政治策略方面，布哈林从来没有充当过斯大林的喉舌。就对国内政策和总政策的见解而言，他所捍卫的那些策略的理论基础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在他对实际政策所具有的实际影响这一点上，他也许一直是在欺骗自己，但即使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样一种他和斯大林所共同具有的看法上，对这一论点的阐述也是由他进行的，结论也是他得出来的。实际上，在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布哈林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后来当斯大林公开向他的主张挑战时，布哈林重申了自己的见解并根据他自己的理论和策略对斯大林进行了反击。因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明显地存在着一条布哈林路线，它所起的作用决不仅仅是反映斯大林的立场而已。

本来，左派和右派之间在工业化、富农、共产国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党的统治、工人民主和党的民主这样一些问题上所进行的争论，足以造成两个在政治上互相敌对的派别。然而，两派的行动都以一个共同的纲领为基础，这就使他们在需要并争取妥协的时候能够互相妥协。由于两派对和解的需要具有盲目性，双方都

因此而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党接受了新的纲领。布哈林比别人都更加热情充沛地支持这个新的阶段，他那认真的态度显示了某种政治上的天真劲。大家虽然对新经济政策的未来前途和可取性存在着种种疑虑或考虑，但是都心照不宣地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左派对新经济政策的前途和新经济政策中所规定的工业化的途径尽管有保留，但是就连他们也不想对农民实行强制性的集体化，他们既没有宣传没收富农的财产（甚至没有宣传立即制止富农作为一个阶级的发展），也不想取消市场和商业、小型工业中的私有成分。采取新经济政策、关心保持同农民的联盟和布哈林在俄国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前进的速度问题上所得出的与上述两点情况相联系的结论，这些显然都是列宁的遗产。布哈林关于苏联虽然将以“蜗牛的速度”前进但总还是在前进的这句名言，也许本来就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后来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但是人们应该记住：这句话是在1925年，也就是列宁向党提出劝告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说的，列宁告诫党要根据农民对国家政策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小心谨慎地和慢慢地前进。<sup>①</sup>布哈林后来宣传这个观点的时候，左派嘲笑他想把国家同“农民的狭窄性”拴在一起。但是这个词语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断言：他的这些渐进主义的亲农民的政策“并不等于农民的狭窄性”，因为花出去的每一个戈比都会再投回到工业中去的。<sup>②</sup>众所周知，那些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主要的方针政策是列宁而不是布哈林提出来的。在1921至1923年间，正是列宁重新解释了同农民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新的“亲农民”的策略，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是“文明化的合作者”的制度这样一种理论，布哈林的纲领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基

---

<sup>①</sup> 关于列宁在他最后几篇著作中所强调的要根据农民愿意跟随的程度小心谨慎地和慢慢地前进的原则，见《列宁全集》第45卷（莫斯科，1964年版），第45、137、330、370—372页，并见列宁写的《论合作制》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载于《列宁选集》（莫斯科，1966年，第4版），第330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45卷，第405页。

础之上的。

当然，谁也不知道列宁如果活着以后还会说些什么话。从历史角度来看，苏联的这场革命和苏联所实行的政策在各方面都是有很大变化并且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推动了人们去重新考虑工业化的任务（即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必要性）这一点以及他们（尤其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于加快投资速度必然会导致紧张局面和种种问题的洞察力，显然是值得人们称赞的。布哈林在1924至1926年间一个明显的弱点就在于他拿不出一个象样的指导这个阶段的工业发展的纲领。他那“通过（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商业循环来积累”的主张，只有在工业迅速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工业迅速向前发展是恢复未使用的战前的生产能力这一比较轻松的时期的产物。但是这种恢复时期当时已经接近结束，而新的“重建时期”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苏联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开端。已经恢复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对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个很好的、然而却是相当狭窄的基础，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工厂里的设备都已经陈旧而且破烂不堪了。下一个阶段要求急剧地增加投资以更新老工厂，尤其是建设新工厂并发展整个工业，使经济呈间歇性的跃进状态。A. 格申克龙在总结了几个国家的经验后指出，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开始，这就是，“工业化运动能够在—一个可以说是广阔的战线上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在许多经济领域中同时开始进行。原因之一，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互相补充和不可分割这样一种因素。”<sup>①</sup>当时俄国正在出现这种局面，正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强调指出的那样，许多因素汇拢在一起，使得大量增加资金成为必需。

鉴于苏联当时在军事上所处的危险地位，它在这个时期达到其他国家的技术水平是必要的。为此，新的工业必须以昂贵而复杂的机器装备起来，而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就必须建设相当规模的机器

---

① A. 格申克龙：《用历史的观点看待经济落后》（纽约，1965年版），第10页。

制造厂，必须吸引(尤其是农村中的)剩余人力。而且，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他们把粮食卖给日益增加的工业劳动力的积极性，就必须满足他们对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需要。<sup>①</sup>还可以补充的一点是，现代的武器装备也象其他技术一样，需要有一个比战前更为发达的工业。

象布哈林所主张的那样通过同农民进行交换来积累利润，然后再把这些利润作为资金投回到工业中去的这种渐进的做法，对于很快获得大量资金以便迅速实现工业化是不适宜的。毫无疑问，他的那些对手提出的计划比他的计划要高明，而且他那强烈地亲农民的纲领由于没有对工业化方面的问题作出明确而现实主义的回答，似乎为下面这种看法提供了根据：布哈林不过是为农民利益讲话的代言人。可是，如果把视野放宽些，多研究一些问题，所得到的结论就并非如此了。左派虽然正确地预计到加速实行工业化会(尤其在农民中间)造成紧张气氛，但是他们继续(至少暂时是如此)表示自己是忠实于新经济政策的原则的。他们对农民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列宁在“立遗嘱前”所发表的许多见解的影响，列宁曾把农民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抬轿人，是必须与之作斗争的敌人。但是当列宁从阶级角度来分析农民时，他的结论是不明确的；因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整个态度是含糊不清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他对农民有不同的看法，有时把他们看作是“主要的敌人”，有时又把他们看作是“主要的支持者”和“盟友”。当然，由于情况复杂，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下列事实：左派队伍中的有些人虽然知道“原始积累”的办法将会很费劲，却并没有明确表示在这关键时期将如何对付这个问题。他们预期到新经济政策将会继续执行下去，因此非常合乎逻辑地声明：虽然他们想对富农和私营企业主实行更严格的监督，从他们身上征收更多的税收并且在农村进一步推进集体化事业，但是消灭富农和其他私有者(企业主、商人

<sup>①</sup> 参见A.厄利奇著《苏联工业化之争》一书中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的论述(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0年版)，第32-42页。

和其他小资产所有者)或者在行政上对农民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则是根本谈不到的事。这恰好就是布哈林的立场,不过布哈林还为农民制订了与这个立场相一致的纲领,而这个纲领同左派的纲领是不同的。事实上,左派有一个工业化的纲领,但是并没有明确回答农民问题;而布哈林虽然提出了一项解决农民问题的计划,却拿不出合适的工业化蓝图。布哈林的方针是渐进主义的,他公开提出警告反对进行“第三次革命”,并且坚信他的纲领的实质是忠于列宁留下的思想的。如果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的《新经济学》一书算是左派关于积累和工业化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文献的话,他们论述农民问题的著作则没有一篇能够比得上布哈林写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工农联盟》<sup>①</sup>这篇文章。正如多伊彻所指出的那样,就国内政策而言,托洛茨基也是奉行渐进主义的而且也是一个“改良派”<sup>②</sup>。象呼吁“发财吧”这样一种布哈林主义的“可怕”罪孽,如果同托洛茨基在1925年8月发表的一本散发得很广的小册子中论述同一个主题的那些话语相比较,就并不显得那么“右”了。托洛茨基在那本小册子中强调,如果工业、合作事业和流通领域中的一些关键部门能够以一种令人满意的速度向前发展的话,那末即使私有经济成分,包括农业方面“‘强大的’即资本主义的富裕农民”在内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发展,这也决不是什么灾难。

他还指出,就国内因素而言,没有任何理由“为任何令人感到惊异的事情担忧”。<sup>③</sup>从本质上说,这恰恰就是布哈林所相信的道理,不过布哈林不但不相信富农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有什么灾难可言,而且实际上还认为这种发展是有好处的。同样,在国家保持“具有

---

① 这篇文章可以在布哈林写的《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书(俄文版)中找到, S.海特曼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纽约,1967年版)。

② 多伊彻著《被遗弃的预言家》一书第110页上提到:“在对待苏联国内问题的态度上,永久革命的创始人所持的是一种改良主义者的意识。”

③ 布哈林是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第10两期合刊第5页上提出“发财吧”这句尴尬的口号的。托洛茨基的观点见于他所写的小册子《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莫斯科,1925年版),第23页。

战略意义的关键性阵地”的问题上，布哈林的态度之强硬也并不亚于左派。他也没有放弃布尔什维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党对政治进行垄断这样一种教条。为了确切地了解党内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分歧究竟有多大，它们之间上述的一些共同点是必须提出来加以说明的。现在我们可以断言：这两派人所持的观点往往是互为补充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相同的问题的，或者因为一方提出的见解正好是另一方的论据中所缺少的东西。<sup>①</sup>

于是，两派都空前地倾向于在党内履行“进行争论”这一极为重要的职责，而在其他国家这种职责是通过两党制来履行的。事情的可悲就在于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也不能接受履行这种职责符合党的合法组织原则这一观点。相反，所有的派别都信奉这样一条原则：党应该是铁板一块。这种情况给党内的某些势力帮了忙，这些势力力图把党改造成为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使党内的任何派别都很快归于消灭。

## 重新思考

到1925年，布哈林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代表官方路线讲话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当时他不遗余力地要把新经济政策转变成一种确定无疑的事实和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演变的神圣不可略犯的思想基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无疑是过分注意细节问题而在策略上太不谨慎了。他和党内所有其他人一样，认为工业化很重要，但是在这个阶段，他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迫切性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只顾同左派作斗争，而对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据却提不出多少反驳的理由。与此同时，左派指责党助长官僚主义化、窒息党内生活和容忍“工人国家堕落”的倾向，布哈林却以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对左

---

<sup>①</sup> 莫·卢因：《俄国的农民和苏维埃政权》（伦敦，1968年版），第14页。



派的这种立场进行了反击。左派用来概括所有这类现象的俄文字眼是“Перерождение”(即堕落或蜕变)。布哈林对这种指责的反应既缺乏批判力又目光短浅,这对于一个掌权人物来说倒是很自然的。在随后几年中,他改变了对工业化问题和“蜕变与民主化”问题的看法,但是他仍然坚持另外一些主张,这些主张是他在扮演主要的理论发言人这个新角色的头几年中提出来的,后来永远地成了他思想中一个宝贵的组成部分。这些主张主要涉及:农民的作用、农民通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农民这个阶级的社会性质和党对农民的策略等等。布哈林后来说过,他所写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工农联盟》一文是他对新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纲领性阐述。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决不能对农民采取大规模的强制手段!”<sup>①</sup>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谈到在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混合式的经济形式中市场和市场范畴所起的作用。

直到1927年以前,布哈林的著作主要是一些同左派论战的文章和关于政治战略与策略的论文,而对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他除了担任《真理报》主编以及同别人共同负责编辑列宁的著作和《苏联大百科全书》以外,还撰写了数量多得惊人的文章和小册子并作了大量的讲演。1926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以后,布哈林继承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6年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布哈林曾经非常积极地为之进行宣传)的最后一个比较繁荣的年份,在那年,苏维埃政权开始实行加速工业化步伐的纲领,而在此以前的许多年主要都是用来进行恢复的。另一方面,旨在限制私有经济成分发展的控制措施和制约手段也出现了。虽然这些措施和手段当时并不算太严厉,但是它们明确无误地表明政策正在变得强硬起来,

---

<sup>①</sup> 在1936年春访问巴黎时,布哈林告诉一名前孟什维克领导人鲍·尼古拉耶夫斯基说,《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列宁实际上所写的文字,而且还表达了列宁在临终前私下告诉他的话。关于这个情节以及他这次对巴黎的整个访问,见鲍·尼古拉耶夫斯基著《权力与苏维埃权贵》一书(伦敦,1966年版),第3-25页。

而布哈林和李可夫都是参与了这些政策的制订的。A.厄利奇第一个注意到布哈林对工业与农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工业化进程重新进行思考的迹象，这种迹象到1927年变得更加明显起来。左翼的批评以及象日益严重的“商品荒”这类扰乱人心的现象，对于影响1927年年底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就集体化、工业化和经济政策方面作出的决定当然是起了作用的，这些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些温和的领导人的观点。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过之后不久发生的又一次重要的角色转变过程中，布哈林进一步发展了这几种理论（指集体化、工业化和经济政策方面的理论——译注）。经过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策划，左派不是被流放，就是被关进了监狱。紧接着，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联盟一夜间就变成了一场如何解释1927年冬和1928年春震动了全国的“粮食危机”的斗争。

1928年春末以后的几个月内，一个新的反对派——党内和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个重要的反对派，为首的是三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托姆斯基（工会主席）——组织起来了。这三个人所掀起的这场斗争是激烈的，延续了一年多，最后以失败告终。<sup>①</sup>这场斗争主要在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内部进行，当然比这范围更大的圈子（尤其在政府机关内）也被通报情况并卷入了这场斗争，但老百姓只是从用激烈、恶毒的语言写成的官方宣传报道中才得知右翼反对派的情况的。在这场论战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对本书主题来说极为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布哈林相当大胆而冒险地主动同左翼反对派进行了接触，他提醒他们注意斯大林的企图并建议同他们结成某种共同战线。他同加米涅夫会见了三次，加米涅夫把会见情况报告了反对派的其他领导人。布哈林所采取的这个主动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结果，相反倒给他增添了麻烦，因为左派蔑视地拒

---

<sup>①</sup> 关于这场斗争的情况，见R.丹尼尔斯著《革命的良心》一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0年版）。

绝了他的建议。<sup>①</sup>除了这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外，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情况。在这几个月当中，当时仍然担任《真理报》主编的布哈林(他在1929年4月失去了这个职务)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连同他在1929年1、2月间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会上出现了短兵相接的交锋)提出的那些建议和批评意见，他发展了一整套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等于是关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一个完整的反纲领，它同多数派领导人当时正在开始实行的那个纲领是针锋相对的。布哈林这个纲领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他提出了贯彻执行斯大林的路线会产生什么后果的警告。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警告是非常准确的预言。

布哈林写的这些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28年9月30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篇文章发表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立即(虽然还不是公开地)对它进行了反扑，他们驳斥这篇文章并引以为笑柄。<sup>②</sup>在翌年年初发表的另外两篇重要文章<sup>③</sup>中，布哈林向公众陈述了他所认为的列宁的遗嘱和列宁遗赠给党的纲领，当时公众对布哈林所扮演的反对派领袖这个角色和政治局内部存在两派间的激烈斗争这些事实还一无所知。布哈林的这个做法很简单，但是只有参加这场斗争的人才懂得这两篇非常忠实地而且几乎是枯燥无味地陈述列宁遗言的文章在新的形势下实际上是相当具有爆炸性的。党的领导集团正在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一条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重复列宁生前写的文章的内容即使不算直接

---

① 拒绝布哈林的建议的不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曾建议同右派达成有限的协议，但是他底下那帮虽然分散在各拘留地点、但情绪仍然强烈的人马对布哈林很愤慨，他们迫使托洛茨基放弃了他的建议。关于这一点，见多伊彻著《被缴了械的预言家》一书(伦敦，1959年版)，第448-450页。

② 斯大林说这是“一篇杂乱无章的反党文章”，托洛茨基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毫无价值”。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莫斯科，1949年版)，第324页；托洛茨基的话见E. H. 卡尔和R. 戴维斯合著《计划经济之基础》，第1卷(伦敦，1970年版)，第90、112页。

③ 《列宁和科学的任务》，载于《真理报》1929年1月20日；《列宁的政治遗嘱》，载于《真理报》1929年1月24日。

犯罪，也差不多等于是偏离正道的人所进行的一种离经叛道活动。

布哈林的另一篇文章由于其内容和寓意也值得在这里提一下，这就是刊登在1929年6月30日《真理报》上那篇头脑“简单”地评论西方人写的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著作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很奇怪，叫做《“有组织的混乱”的理论》<sup>①</sup>。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写成的，所谓“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就是用一种迂回、掩饰的方式来谈论苏联的事情。毫无疑问，“有组织的混乱”讲的是西方工业组织的趋势，但它同时也是对俄国本身的官僚主义化了的工业组织的批评。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话是后来那些年里人们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使别人能够领悟其中意思的唯一方式。使用这种暗语的最后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1938年布哈林受审讯时所讲的那些话，这些话的意思甚至在今天也很难弄得明白。

但是在1938年3月被谴责之前，布哈林还遭受了好几次意想不到的挫折。1929年年底他第一次公开认错并失去了在政治局中的职务（但同时又被选为科学院院士）。此后，他既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任何直接的作用，也不能发表有关党的理论或政治问题的任何重要的文章。对所谓“右的危险”和“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的攻击竟然势头不减地延续了好几年。但是在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得不对付他自己圈子里的那些人，并且正如某些书上记载的那样，当他准备消灭某些从前、当时或嫌疑的持批评意见的人的时候，他遇到了他们相当顽强的反对。1931年，对布哈林进行的一种更加恶毒的人身攻击停止了（对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没有进行这种人身攻击，这大概是上面达成了某种交易的结果），他开始被允许同他以前的伙伴以及已经在1929至1930年间团结到斯大林周围的左翼反对派中的许多人一起，继续做一些非政治性的、但却是重要的行政和研究工作。

---

<sup>①</sup> 这篇文章的题目有时译作《“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理论》。——译注

随着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运动的开展，布哈林作为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所长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中一个与此相类似的研究所的所长，被允许对工业组织、技术革新和制订科学计划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事实证明，布哈林在这个领域里是很有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的。1931年他在国内陈述了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并陪同一个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讨论科学政策的国际会议。西方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布哈林的观点虽然对他本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对西方还是有影响的。<sup>①</sup>

关于布哈林的后面几年的传记材料很缺乏。他的名字继续在报纸上出现，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各种非政治性的文章，1933年甚至写了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的长篇著作，不过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重要价值。<sup>②</sup>在这段时间里，布哈林虽然自己一直受着怀疑，却经常努力帮助处于困境的人们（尤其是作家）。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已经帮助过她的丈夫，1933年这位诗人被捕时他又出面进行了干预。<sup>③</sup>

攻击布哈林的文章和恶毒的谣言虽然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都是有所控制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攻击显然也受到禁止。不久又发生了另一次重要的变化：从1933年年中开始到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暗杀为止的这段时间中，领导集团为了安抚民心 and 团结全党，对政策作了重要的修改。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停止了，在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开始奉行一条新路线。

这次政策的改变几乎同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同时发生的，它向从前反对过领导集团的人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和解，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生活中来而不再继续对他们进行折磨，给了他们以新的希望。这条新路线的理论基础和论点同斯大林的理论基础和

<sup>①</sup> 见L. 格雷厄姆写的《布哈林和苏联科学计划的制订》一文，载于《俄国评论》，1964年第2期，第134-148页。

<sup>②</sup> 《马克思的学说及其理论意义》，载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杂志，1933年，第3、4、5、6期。

<sup>③</sup> N. 曼德尔斯塔姆，《没有希望的希望》（伦敦，1971年版），第22-23、250、254页。

论点是背道而驰的，其内容是：从前的阶级敌人，包括人数众多的富农在内已经不可逆转地被击败了；集体农庄制度已经确立，只需加以巩固就行了；工业化运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和党在国内已经确定无疑地赢得了历史性胜利；由于苏联已经不存在任何有影响的反对派，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已经不适用了。斯大林则相反，他坚持认为，阶级敌人的反对会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加强，只不过会采取一种完全新的、更加恶毒和伪装得更好的形式而已。

据说“基洛夫派别”同上述新方针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宗旨是要使这个新方针永远存在下去并扩大这个新方针所包含的内容。因此，虽然我们对这个“派别”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们认为它的存在似乎是非常可能的。<sup>①</sup>然而，苏联的对内政策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同时对外政策已经转到了亲西方、反德国和“人民阵线”的方向上，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方向的改变，原来那种对虚构的反对派及其代理人的病态的追捕、（尤其在农村进行的）盲目的大规模镇压、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工业增长定额而施加的无情压力以及政府的其他许多做法，都停止了。不管这些新政策的细节如何，反正在此以前一直受到野蛮攻击和迫害的为数众多的反对者不但被允许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而且还被允许重新获得受尊敬的地位和职务、甚至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席位。这些事实表明，上述政策并非只是象征性的。随着这些变化，领导集团这时已经允许布哈林在公众中享有高度声望，甚至允许他重新在中央委员会中获得一个较低的职位。他和其他一些前反对派的领导人一起，应邀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讲了话，他的关于工业和技术问题的发言当时以应有的受尊敬形式刊登了出来，刊登时所用的大字标题是发表第一流人物的讲话时所用的那种。1934年2月他担任了《消息报》总编辑职务。他

---

<sup>①</sup> 我们对基洛夫路线的了解，主要还是根据尼古拉耶夫斯基提供的情况，他是从1936年同布哈林的那些谈话中获知这些情况的。他在《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来信》一文中公布了这些情况，见《社会主义公报》，1936年12月第23、24期和1937年1月第1、2期。尼古拉耶夫斯基著《权力和苏维埃权贵》一书中复述了这些情况。

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受到大力宣传，占了《真理报》(1934年8月3日)好几个整版的篇幅，这个讲话就生活和文学问题表达了许多非正统的思想。在这长达一年的间歇时间里，许多人多么希望恐怖活动会停止下来啊！但是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使这个希望终于又成了泡影。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迫害活动开始了，从1935年年初起，一批又一批的“暗杀基洛夫的凶手”被关进了监狱并被枪决了，在一片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反对过斯大林的人重新受到指控并重新被捕入狱。

毫无疑问，布哈林的期望又一次落了空，因为他对前一次清洗仍然记忆犹新，他的良心仍然受着谴责。自从1929年他第一次公开认错和被迫承认斯大林的路线是正确的时候起，他就已经知道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知道自己是作为俘虏以便在出事的时候当作替罪羊而被留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在这个机构中他被剥夺了一切重要职务)。在丧失理智的“大运动”<sup>①</sup>的那几年，斯大林那派人虽然在党内赢得了胜利，但他们知道自己是坐在到处怨声载道而动荡不安的这样一个国家的火山之上。他们依附于斯大林(这场“大运动”的发动者)，把他看作是他们的整个派系结构的关键，但其中有些人希望等这场风暴过去之后，终有一天斯大林的个人地位会有所改变，党内生活会象他们所理解的那样正常化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斯大林要求对某些在三十年代初期反对并批评过他的人处以死刑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会进行抵制的原因。<sup>②</sup>这还可以解释这样的现象：他们虽然赞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斥之为十分令人讨厌的偏离正路者的那些决议，却不愿意把这两个人——仍然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列宁仅存的同事——开除出党，甚至不愿意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至于斯大林，只要看上去对自己有用，他也宁愿让批

① 系指苏联在1929年掀起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译注

② 最能说明这种抵制或勉强态度的例子是中央委员会拒绝对一名党的干部柳亭处以死刑。柳亭是在1932年间流传的一篇长篇手稿的作者，这篇手稿把斯大林描绘成“革命的恶魔”。见尼古拉耶夫斯基著《权力与苏维埃权贵》一书第11、28-30、71-72页。

评他的人在形式上留在这个官方的统治机构内(但在真正的统治圈子内),以便迫使他们公开赞同他们在过去曾经严厉批评过的那些政策。这是一种策略,目的在于防止那些天然地觊觎领导权的人领导一场群众性的不满意运动,因为当多数派的路线所造成的祸害变得明显起来时,这样一场运动可能会把斯大林从权力的宝座上拉下来。1929年以后,由于党内的不满情绪日益发展而产生了若干新的反对派中心时,斯大林多次运用了这个策略。每当保安警察发现新的不管是真的还是臆想的反对派,即使直接卷入新阴谋的指控无法强加在左翼或右翼反对派的前最高领导人身上,斯大林也总要对他们进行一番新的审查。他的做法很简单:把他们带到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迫使他们证明他们不但同新的离经叛道活动毫无关系,而且是谴责这些活动并忠实地信奉官方教义的。多数派的,或者说斯大林的这种做法并不奇怪,因为虽然从前的那些批评者(例如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表面上已经公开认错并宣布自己忠于党的路线,但那位审查官总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证明自己是诚心诚意的。他认为,他们也许并没有直接地同正在受审讯的人纠缠在一起,但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对那些意识到他们现在缺乏诚意的新的诋毁者来说是一个鼓舞。因此,他们要为所有反对他的叛逆者负道义上的责任。最后而且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仪式的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忠心是无可怀疑的,他们必须重申自己过去充当批评者的角色是如何如何之错误并且保证同一切新的批评者进行坚决斗争。

从前的偏离正道者包括布哈林在内不得不经常地忍受这种使人丢脸的做法。斯大林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需要,即通过上述仪式来丑化这些前领导人的形象,似乎是从来不会满足的。实际上,在这些人从肉体上被消灭之前,他的心情从来没有恢复平静过。布哈林是深知斯大林其人的,当他在1928年7月对当时仍然满腹狐疑的加米涅夫说“这个成吉思汗”将消灭任何挡他道的人的时候,他心里已经明白斯大林的目标是什么。



## 审 讯

虽然布哈林在基洛夫去世后并没有立即受到骚扰，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着死亡，并且利用 1936 年春天一次令人大惑不解的巴黎之行的机会陈述了这种想法。那次他是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一些孟什维克谈判购买马克思档案文献的事宜陪同一个党的代表团到巴黎去的。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即秘密警察）很可能已经在考虑干掉布哈林，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还允许他和他的年轻妻子到国外去，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无论是因为有人试图给他一个机会还是这本身是个圈套，反正后代人至少从他这次旅行中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谈判的人中有一人碰巧是李可夫的姻兄弟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布哈林在巴黎经常同此人见面，同他谈话也比较坦率。但是布哈林敢于做的事还不止于此。他突然完全出人意料地拜访了两个孟什维克领袖柳迪娅·丹和费多尔·丹。他告诉他们说，他是受一种不可抵制的强烈欲望的驱使而不顾任何风险地来看他们的。<sup>①</sup>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命运已定，但他不想留在国外当一名流亡者。对他来说，在祖国以外的地方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坦率地把自己对斯大林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他说：“这是个恶毒的小人……不，他不是人，而是魔鬼。”当被问及苏联的命运怎么会落到这样一个人的手中时，他回答说不知怎么地党相信斯大林。他说：“他好象是党的象征似的，一般的工人和人民都相信他。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自己很可能是负有责任的，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一步一步地爬进他的虎口，同时又十分清楚地知道他

---

<sup>①</sup> 关于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这段回忆，见《权力和苏维埃权贵》一书第 3-25 页。柳迪娅·丹写的《布哈林论斯大林》一文在他去世后发表在《新杂志》1965 年 3 月第 75 期上，第 176-186 页。

是一定会把我们吞掉的。”<sup>①</sup>

布哈林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就知道了自己将会怎样地被“吞掉”。1936年8月,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内的第一批前反对者出庭受审,他们背诵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室里长时间预审过程中被迫死记硬背下来的所有那些可怕“罪行”。布哈林的名字在审讯过程中被频频提到,在这第一批人被处决以后过了半年他就被捕了。据有些资料记载,当时在有他参加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对他的命运进行了讨论。新上任的秘密警察头子叶若夫提出了所谓布哈林“阴谋反对党”的主要指控,据说布哈林对此进行了反击,谴责诋毁他的那些人自己正在阴谋毁灭党,使党变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分支机构。据说经过秘密表决后,叶若夫和斯大林败给了占中央委员会人数三分之二的多数委员。<sup>②</sup>不管这个说法可靠性如何,反正下面的两个情况是事实:一是1936年9月《真理报》宣布,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进行刑事诉讼,布哈林和李可夫已经获释;二是过了一年左右,据说曾为布哈林辩护的那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委员自己也被干掉了(见赫鲁晓夫在1956年作的秘密报告)。一旦斯大林认为最后的障碍已清除,布哈林就被逮捕了,时间大约是在1937年2月。然而至少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布哈林拒绝在这场诬陷阴谋活动中同斯大林进行合作。后来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改变了想法,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迫使他改变想法是决不会心慈手软的。也许布哈林本人并没有受到严刑拷打,但是他们很有可能以杀害他的妻子和孩子相威胁对他进行了讹诈。无论怎样解释,反正除了A.克列斯廷斯基<sup>③</sup>这个明显的例外,最后

---

① 丹:《布哈林论斯大林》,第182页。

② 关于这些情况,见R.塔克和S.科恩合编《大清洗的审讯》一书(纽约,1965年版)的序言部分第20页。

③ R.塔克的观点影响了我自己对审讯记录的看法。请参阅R.塔克和S.科恩合编《大清洗的审讯》一书(纽约,1965年版)的序言和那次审讯的记录(尤其是布哈林最后所作的申辩),读者可以从这些材料中形成自己的看法。

只有他一个人表现得与受审讯的其他被告人迥然不同。<sup>①</sup>在这些审讯中，几十名被告人(其中包括这个国家从前政治上的一些最高领导人)都机械地重复那些硬塞在他们嘴里的瞎话，殊不知他们的判决书是事先写好的。从表面上看，布哈林也是“合作”的。他事先就表示对他判处死刑是对的，甚至要求对自己判处死刑，因为(用他的话来说)他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叛逆罪。实际上，——无论听起来多么奇怪——他是在竭尽全力破坏这场装模作样的审讯。为了实现这个意图，布哈林在同检察官维辛斯基作斗争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地表现了足够的机智和勇气。在审讯的盘问过程中，他的策略看来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他承认对他进行的在他们看来是“极为可怕”的全部指控(由于这些指控夸张得太厉害，他可能会认为它们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另一方面，他又以激烈的言辞否认自己犯有破坏、密谋、间谍和暗杀等任何一种具体的刑事罪。至于他是如何和为什么要迫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容忍他这种做法，则是一个谜。反正他在判决前提出的最后申辩中比这走得更远是事实。他虽然重复了一大堆对自己进行谴责的无稽之谈，但同时又插进了一些别的话，这些话是对审讯的质疑而且实际上彻底剥去了其虚假的外衣。首先，他陈述说这场审讯证明不了什么，说同案的这些被告人根本不是象他们被指控的那样是所谓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领导之下的“破坏中心”的成员。

他还突然(好象是无意似地)断言：“被告人的交代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被告人交待问题是一种中世纪的法学原则。”他的这番话正是在完全以被告人的交代为基础的这样一种审讯的过程中说的！接着他又加上了一句意思更加含糊不清和不容易解释的话：“但是这里我们还存在着反革命势力从内部进行破坏的问题。只要有谁不放下武

---

<sup>①</sup> 克列斯廷斯基曾经当过苏联外交官，再早一点时候曾经是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批书记之一。他突然否认对自己的指控，并且宣布他在审讯前所作的证词是假的。但是在短暂休息以后继续进行的审讯中，克列斯廷斯基又继续同法庭“合作”了。关于这一段插曲，请参阅塔克和科恩合编的《大清洗的审讯》一书第59-66页，尤其是第53页。

器，他就一定是个托洛茨基分子。”<sup>①</sup> 如果人们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布哈林不仅是在竭尽全力使这场审讯露出破绽从而破坏这场审讯，而且还在尽最大努力传递某种信息，那末人们就会同意 R. 塔克的见解。R. 塔克认为布哈林想说的是下面这个意思：虽然被告人的交代是谎话，但是反革命（布哈林对“反对派”的称呼）被击溃了，因此只有在国外的人（即托洛茨基）还能继续干点事。

显然，接受这种（还有其他一些）解释<sup>②</sup> 未免冒险了，但是在布哈林的证词、尤其在他作最后申辩时所讲的话里，明显地有许多故意含糊其辞的地方和没有讲完或前后间联系得很松散的句子和意思，因此他努力想传递某种同当局的愿望截然不同的信息这一事实是无可置疑的。他在为捍卫自己过去的历史和自己的灵魂而斗争。他所扮演的是一种特殊角色：一方面要承认自己是恶魔，另一方面又要暗示自己既没有承认什么，也不是什么恶魔，为此，他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

然而，归根到底，他的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劲，因为根本没有人去看他的这些讲话记录。那时候，甚至在国外也很少有人试图去弄清楚这一审讯史上最不可思议和最激动人心的申辩的真实含意。他曾经是苏维埃俄国一位最受欢迎的革命领导人，党的宠儿，列宁的为数不多的继承人之一（列宁用了这些最生动的话来表明布哈林是他的继承人之一），然而现在却成了一个在毁坏自己名誉的孤独、绝望和被辱骂的被告人。他一方面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另一方面仍然试图挽回自己的尊严或是什么别的东西。他使用的是他所仍然拥有的唯一武器：辩证的才智。

---

<sup>①</sup> 同上书，第 653 - 667 页并参阅第 671 页。在第 671 页上，另一名被告人为了向法庭证明自己有“彻底的悔改之意”，对法庭关于被告人必须坦白交代的要求作了积极的反应。

<sup>②</sup> G. 卡特科夫在《对布哈林的审讯》一书（纽约，1969 年版）的第 190 - 192 页上作了同样的叙述，即布哈林勇敢地抵制了维辛斯基，但是“只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而且在另一个关键问题上失败了。

一部非常强调民主的宪法<sup>①</sup>的作者，竟会同其他大批人(斯大林清除运动的受害者)一起，在现代史上一次对人权最令人作呕的进攻中被镇压，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国家的每一所学校里，学生们都在熟记这同一部宪法的内容，(这些内容表达了这位被处以极刑的“罪魁祸首”所信奉的人道主义信条)，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布哈林被处以极刑的这一天——1938年3月15日——不妨可以看作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残存的革命性被不光彩地埋葬的日子。实际上，这很可能就是这位主要被告人在对“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维埃犯罪集团”进行审讯时所努力要传播的悲观信息。

---

<sup>①</sup> 布哈林在巴黎的时候，曾拿起自己的笔骄傲地对尼古拉耶夫斯基说，他用那支笔写出了整部《苏联宪法》。只有拉迪克帮过他一点儿忙。布哈林和拉迪克都试图引进让候选人在选举中进行竞选的做法，参见尼古拉耶夫斯基著《权力与苏维埃权贵》一书第22页。

## 第二章

# 对左和右的剖析

前面的小传已经提到左派和右派这两个对立派别之间所持立场的不同，并且暗示他们之间的分歧有时并不象看上去那么尖锐。然而，在更深入地探讨布哈林的主张之前，还是有必要详细地谈谈这些分歧。

在二十年代，左、中、右三派之间的争论是错综复杂的。他们的主张有时互相冲突。例如，在经济方面，有的主张“原始积累”论，有的主张“通过市场交换积累”论；在思想意识方面，有的认为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有的认为不可能。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各派的论点不断改变，他们提出的主张不断变化，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对实际问题的就事论事的讨论往往会由于派别之间敌意的增加和其他与讨论的问题无关的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变得十分紧张；另一方面，一些表面上看来属于原则问题的思想性质的问题，大家虽然争得面红耳赤，毫不妥协，一旦转变成有关实际政策的建议时，便证明是无足轻重的。除了各自的主张不断在变化（这有时是由于论战的双方互相施加影响和压力所致）这个因素外，对这些主张的评价还由于下面这个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了：一方所提出的任何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政策的任何一项建议、制定的任何一个较大的目标、或者对当时的政权的几乎任何一条重要的批评意见，也常常是另一方所提出或制定过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固然是各派都想蛊惑人心和施展策略手腕，但他们都真心诚意地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则常常是另一个原因。他们之间的分歧也

往往在于强调的重点或者对轻重缓急次序的安排有所不同。虽然这些情况的确在事实上常常造成了政策上的严重分歧，但它们也始终为各派改变自己的论点提供了可能性，使他们要么可以用迂回的办法挫败对手，要么可以找到一种妥协或修改自己主张的途径。这些现象可以在这场经济问题大辩论中看到，至少在没有夹杂政治性煽动的情况下可以看到。例如，1926年9月在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主持下在社会主义学院进行的那场引人注目的讨论中，反对派的主要发言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米尔加和拉迪克仍然能够坦率而认真地同捍卫党的路线的人讨论所有那些有争论的苏联经济问题。

在那次讨论中，双方的语气都相当温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呼吁不要不必要地扩大彼此间的分歧，不要在已经规定好讨论实际经济问题的情况下谈论诸如“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之类的思想意识问题。在谈到经济政策这一主要领域中的这些实际问题时，左派发言人虽然摆出了重新分配资源以利于工业发展的理由，但是他们提出的投资、税收和商业政策的目标却是相当有节制和相当实事求是的。<sup>①</sup>这个事实证明：在一个比较讲道理的气氛中，双方只要不失去对理论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的控制，在政策方面就能取得和解。只要布哈林（整个政治局的政治路线亦然）在资金积累和工业增长速度问题上持过分乐观的看法，左派的观点就比官方的立场更具有洞察力，而且左派正确地预言：苏联的经济生活中正在积聚一场风暴。但是在1926年，随着“重建时期”的开始，官方路线在工业化目标、控制措施和税收措施等方面变得强硬起来了，其中有些措施是针对私有企业和富裕农民的。归根到底，左派和官方路线的分歧表现在对增加1亿卢布投资和从富裕的耐普曼分子身上多挤出3千万卢布的讨价还价上。在宣传上，多数派发言人指责左派打算取消新经济政策、压迫农民、提高价格、降低生活水平和

<sup>①</sup> 这次讨论的内容发表在《共产主义学院公报》第18期（莫斯科，1926年），第208-217、223-236页上。

其他一些罪孽。但是左派重申他们是赞成新经济政策的，说他们不想没收富农财产，也不想没收其他任何私有企业主的财产，说实际上他们欢迎这些人有某种程度的发展，只要社会主义经济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的发展能始终得到保证就行。左派的这种态度无疑是诚恳的。象皮达可夫在社会主义学院所说的那样，他们反对利用内务人民委员部来对付私有经济部门，因为这并不能解决由于基本的经济不平衡状况而造成的问题。他们强烈要求进一步增加拨款以利于工业投资，反对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降低工业品价格——政府已经宣布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它的政策<sup>①</sup>——而又不同时声明降低那些已经在大量供应的商品的价格。他们试图把更多的经济部门置于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并且对商人和富农征收更多的税收。然而，正象叙述“原始积累”理论的最“偏激的”权威著作所表明的那样，左派在提出所有这些计划的同时，也提出了在最大程度上对这些计划加以节制的条件，这就是，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来投入工业的做法必须以“经济上可能、技术上可行、整个来说合理”为限度。此外，根据他们的说法，关于“抽取”资金的决定还受着一大串条件的限制。<sup>②</sup>因此，左派和布哈林之间的争吵本来是在有可能提出实际政策问题的谈判桌上得到解决的。要是那些高深的理论问题留待进一步研究以后再来进行加以解决，那该有多好！可是……

在集体化和合作化这一类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仅仅集中在对合作化运动的未来及其前景的估计上。例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避讨论这个题目，因为他认为政府拿不出钱来资助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左派认为集体化必须跟在工业发展之

---

<sup>①</sup> 在商品短缺日益严重的时刻，这样一种政策在经济上是不稳妥的。关于西方对这种政策的批评，参见R.戴维斯著《苏联预算制度的发展》一书（伦敦，1956年版），第93-94页。

<sup>②</sup> 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新经济学》（莫斯科，1926年版）一书第238页上列举了在决定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的数额之前所必须考虑的几点情况：“农村相对来说较慢的积累速度，农民购买力相对来说较慢的增长速度，平衡地发展工业的问题，特定年份的农业收成情况，预计的出口数额，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出口价格等等。”



后而不应该跑在工业发展的前头。左派纲领中对农村应建立更多的集体农庄的强调只是后来的事，是他们在1927年发表的政纲中表达的。但是在那个政纲中，他们仅仅是呼吁将来更多地注意集体农庄而且很明确只限于利用现有的手段并且必须得到农民的同意。右派也不认为集体农庄在短时期内就能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和农业的未来将取决于私人农场，相信私人农场能够通过商业合作运动“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还有其他人)强调，通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并不是集体农庄。他说，虽然集体农庄为贫苦农民铺平了道路，但是“主要的道路是普通的合作制，即市场、购买和信贷方面的合作制，一句话，就是农业合作社。”<sup>①</sup>

在经济领域里，互相对抗的这两派人的论点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常常只是强调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这一点已为厄里奇教授和鲍布罗斯基教授这样一些研究人员所指明。他们解释说，两派的许多争论都是由于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引起的。例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强调，使经济保持生气勃勃和增长的局面很重要，而布哈林则认为重要的是保持经济平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虽然懂得从长远来说有必要保持经济平衡，但他所强调的是加速发展经济的必要性；至于布哈林，他虽然希望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经济局面，但他所感兴趣的却是对经济的发展加以制约和限制，以便不失去对经济发展进程的控制。

至于在思想意识领域里，有一个问题双方倒是真正有矛盾并且是势不两立的。在左派看来，“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偏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一种“民族社会主义”偏向。由于围绕能否“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对于苏联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这场争论在两派人活着的年代里从来没有

---

<sup>①</sup> 引自瓦加诺夫著《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年)》一书(莫斯科,1970年版),第83页。参见布哈林著《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一书(莫斯科,1926年版),第105页。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这段话今天仍然被用来揭露布哈林所犯的政治罪行之一。

平息过。不过，讨论这一争论的细节则超出了本书的主题。<sup>①</sup> 两派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论据极为复杂，要评论谁是谁非并不那么简单。双方都有一些正确看法，也都有许多错误言论和感情冲动以至装腔作势的地方。这种现象在一场如此规模的思想意识斗争中是不难预料的。然而，即使在围绕这一不可调和的理论主张所展开的争论中，人们也没弄清楚双方在政策上的分歧究竟是什么。根据他们的论敌的说法，“国际主义者”由于否认在俄国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和怀疑情绪，但是他们又的确强烈要求加快投资速度来实现这个“不可能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虽然在一个国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是完成这一任务则有待于整个世界都实现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国际主义者则指责“一国”论者是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潜在的国际主义的叛徒。这个指责的确非常正确地预见俄国后来朝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变化。但象托洛茨基常常做的那样一再重复说，如果资本主义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苏维埃俄国就根本不会有成功的机会，则未免失之轻率了。另外，把“民族主义”的标签贴在布哈林和斯大林身上的时候也不能不加区别。在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未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俄国必须单独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论点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但是不同的人对这一论点的理解并不相同，他们由此而得出的关于制订

---

<sup>①</sup> 关于较好地反映不同观点的某些争论的内容，请参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27年版）第463页和其他地方所载1926年底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在那次大会上，以斯大林和“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其他辩护者为一方，以这个理论的反对者，尤其是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他们在大会上作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发言而且很显然是占了上风）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直接的对抗。斯大林和“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其他辩护者没有别的机会来驳斥自己的反对者和赢得听众的同情。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言论见《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一文（列宁格勒，1926年版）。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次简短讲话同其他许多讲话一起收录在《列宁逝世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纽约，1957年版）的《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纲领》一章中。关于斯大林的论点，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他早先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载于《斯大林全集》，第6卷，莫斯科，1947年版，第358-401页）。

何种政策的结论也大相径庭。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争吵便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所提出的同新经济政策、农民和工业发展有关的主张曾经是相似的，但是很快他们又在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成了对立面。他们的教条和论点仍然相同，但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另一方面，坚持对立的教条倒没有妨碍争论的双方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提出实质上相类似的政策。读者将能从1928年以后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中看到这种情况。

另一个不可调和的分歧涉及到新老反对派所提出的指责：无产阶级的国家和党正在“蜕化变质”。俄语“蜕变”一词是非常贬意的，是多数派领导人极为反感的一个词。对制度的这样一种指控被看成是背叛行为，因为这种指控暗示：领导集团本身是叛逆的，它正在带头取消革命。

二十年代的左翼反对派同从前的反对派——“民主集中主义者”和“工人反对派”一样，试图找出国家和党的毛病，因为这些毛病使他们深感担忧并促使他们同多数派的路线进行斗争。他们认为国家和党已经官僚主义化了，国家机关同工人疏远了（虽然这些机关常常是由以前的工人组成的），“真正的党性”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忠诚已经不复存在了。为了说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反对派用了这样一些提法：“热月党式的复辟危险”，“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部门”，或者干脆（在他们看来仍然算是）“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等等。多年来，甚至在自己从俄国被放逐出来以后，托洛茨基一直坚持最后那种说法，因为他仍然希望社会主义的战斗精神能在工人阶级和某些党的干部身上复活。1926年的“联合反对派”向党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他们（如季诺维也夫）断言，只要国有化的工业向工人提供的是一种很低的生活水平并且不允许工人在管理企业和国家的事务方面有任何发言权，它就不能称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倒比较合适。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指责说，苏联这个国家“远远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因为各级苏维

埃这些所谓的人民统治机构正在蜕化变质成官僚机构。<sup>①</sup>多数派发言人对这些指责的反应当然是极为强烈的，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发表了一些肤浅而又蛊惑人心的讲话（他的其他讲话并不是这样的）。他怒不可遏地咒骂反对派明里或暗里提出的关于允许党内有派别和不同政纲存在的要求。当时他指责反对派正在“偷偷地变成第二个党”，“为了政治民主”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等等。<sup>②</sup>毫无疑问，他后来为自己曾提出过这些看法而感到后悔莫及。不过，他在同一篇以及其他许多篇著作中也曾承认党和国家的蜕变是可能的，承认党的民主必须“加强”。在回答存在着富农影响其他农民的危险性这一指责时，他用同样的口吻一方面否认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另一方面又承认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做法并不一定都是策略手腕。他虽然拚命地为在他看来是自己的掌权记录而辩护，但他并没有忽视反对派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争论的双方有着同样的基本观点和理想，布哈林既不能否认棘手问题的存在，也不能真正地对形成国家和党的官僚体制的趋势无动于衷。

我们虽然强调了双方的共同立场，尤其是他们之间互相妥协的趋势（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要缩小他们这场争论的广度和深度。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撇开双方意气用事的地方，弄清楚他们之间分歧的真正大小和深刻程度。事后回顾有着历史地看问题的好处。俗话说，一旦浓烟消散，火焰的真实形状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争论时的激动情绪往往造成对事实的夸张和歪曲，纠正了这些假象，人们就能比较容易地从错综复杂的争论中找出具体的观点和理论，尤其是那些对未来发展和一些基本问题有独创见解和洞察力的、在另一个阶段可能被重新提出和加以利用的观点和理论。事实上，布哈林提出了一整套显然属于他自己

<sup>①</sup> 关于季诺维也夫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参见他所写的《列宁主义》一书（莫斯科，1925年版），第101-110页和第226页。布哈林在《党和反党联盟》一书（列宁格勒，1926年版）的第44页上摘引了托洛茨基的论述，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蜕化变质”是实际存在着的危险（同上书，第34页）。

<sup>②</sup> 布哈林：《论我国革命的性质》，第60-64页。

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在他同斯大林合伙以前和合伙期间已经形成了布哈林“主义”。但这并不是说，那些观点和理论完全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布哈林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两位政治上的伙伴，在党内还有公开的和隐蔽的追随者。他们的许多建议，尤其是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表达了专家们所阐述过的观点，这些专家中有许多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布哈林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学家，当然是了解国内外专家们在经济问题上所持的观点的。他在综合各种观点和他自己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布哈林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所包含的内容不止于经济学，而且同斯大林的纲领是相抵触的。

## 一些主要的观点

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持有的某些观点在他自己于十月革命前和内战时期所写的著作中就已经论述过。他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的镇压能力的发现（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使他对国家权力和官僚政治逐渐抱有一种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不信任感，并由此而形成了他同斯大林决裂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以及在随后几年中多少是秘密的思想活动。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强调合作的原则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对农民来说，合作应该是“主要的途径”。虽然他经常提到，从长远来说城市和农村中的私营企业主要是要被赶走的，但是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化的深入过程即意味着被取消的私有经济部门必须由一个不断在发展的、无所不包的国家来取代的过程，因为这种方针同公认的社会主义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布哈林关于国家和合作社会主义的想法同列宁在一篇论合作的文章中所概述的想法是相似的，它赞同合作的组织原则，因为从长远来说，这种原则有利于国家的消亡。<sup>①</sup>如果没有这种“消

<sup>①</sup> 参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第58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1期，第27页。

亡”，社会主义无论怎样加以解释，对于社会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来说都是不会有有多大实际意义的。

很显然，就象他向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些政策上的建议所表明的那样，布哈林在思想上对这个问题是很认真、考虑得很多的。他认为，党一旦掌握政权并且抛弃“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歪曲了的社会主义”<sup>①</sup>的幻想以后，就应该立即采取“有机发展”的战略。“有机发展”是列宁的主张，但是在1924年布哈林声称这个公式是他提出来的。<sup>②</sup>这个公式使新经济政策十分明确地从党的原先的教条所规定的那种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定义（“战略性退却”、“原先立场的继续”等等）中解脱了出来，并作为一种长期战略而被接受了。布哈林强调他不想劫掠商店或者对农民采取强制手段。他说，由于农民具有根深蒂固的喜欢一家一户进行耕作的习惯，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关系有时可能会变得很紧张。农民在面临某些不受自己欢迎的政策的情况下是不会自动地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盟友的。同样地，阶级斗争可能暂时还会继续存在并且相当激烈，但是总的来说它不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而是会慢慢地消失。由于不需要象革命时期那样摧毁现存国家，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政策应当是渐进的和有节制的。<sup>③</sup>布哈林关于阶级斗争正在熄灭的看法导致了他经常重复的这样一句口号：“不需要进行第三次革命。”这句口号后来在斯大林的宣传运动中被说成是布哈林主义的核心，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方面，斯大林提出的政策看来同布哈林的主张正好针锋相对，这些政策用斯大林在1928年7月所提出的一个论点来概括就是：在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同时，“阶级斗争将会越来越加剧。”

从两人所追求的目标来看，布哈林和斯大林都是对的。布哈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由此而得出了“长入”论，这

---

① 《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5 年第 8 期，第 8 页。

② 《共产主义学院公报》1924 年第 7 期，第 58 页。

③ 《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5 年第 1 期，第 27 页。

个观点在他于1920年写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来了。<sup>①</sup>他认为，企业主阶级是要被消灭的，但这只能通过“战胜”的办法，即通过效率更高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合作社的）企业在市场上赢得胜利的办法来实现。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同新资产阶级进行合作是必要的，从他们身上捞取资金以利于社会主义积累的做法将会继续下去。但是有关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有关农民的问题就不能用“战胜”的办法，而是应该通过合作，用慢慢改造的办法来加以解决了。<sup>②</sup>他认为，虽然对农民采取某种形式的强制手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同农民进行合作，允许农民发展，甚至允许农民中间出现某种程度的阶级分化。只要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部门在积极扩大，这样做在政治上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他相信，帮助农民组织一种自愿参加的合作运动作为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会使社会逐渐得到改造。由于工业、银行、贷款和立法等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手中，农民、甚至是富农只要相信了社会主义的长处、生产率和文化上的优越性以后，就会被吸引到日益发展的工业——合作组织中来，就会接受社会主义。<sup>③</sup>

布哈林既没有过分地把农民理想化，也不是不知道农民中比较富裕的阶层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因此，他所持的是一种相对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建立在他对农民所下的阶级定义的基础之上的。布哈林对农民下的定义与列宁的定义不同，说得更确切一些，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某个时候同列宁的定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列宁关于农民阶级结构的定义并不固定，他一会儿说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家阶级”，一会儿又说农民是“每时每刻都在滋生资本主义的小

---

① 参见《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莫斯科，1920年版），第85—87页上摘引的考茨基的话。列宁写的关于布哈林这本书的笔记中对这一点未加评论。

②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1期，第27页和《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第70页。在另一篇文章中，布哈林把这种态度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即争取同农民“融洽地相处，改造和同化”农民。

③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14页和第9—10期合刊第5—6、10页。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见《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第49页。

土地持有者阶级”；一会儿称他们为“盟友”，一会儿又称他们为“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等等。列宁的定义是跟着政治形势变的，并没有一个坚定的理论原则。然而，在1926年布哈林得出结论说，“把农民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是错误的。<sup>①</sup>实际上，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列宁在提到农民时也用“前资本家阶级或阶层”这样的字眼。为了替自己的渐进政策和关于俄国应该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寻找社会根据和理论根据，布哈林开始用更积极和更明确的眼光来看待农民。这时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不仅在俄国，农民有革命的潜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援力量，而且在全世界，农民都是一个革命的因素。他展望将来有一天农村在工人领导下会成为“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力量”，这个口号预言了世界其他地方后来的形势发展。<sup>②</sup>

虽然有些人所持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带有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布哈林的想法中却没有任何自鸣得意的地方。如果象他所认为的那样，农民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反革命阶级的话，俄国国内是不存在任何能够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阶级的。另一方面，只要俄国的进一步发展是渐进式的，俄国农民的落后性就不会成为这种发展的障碍。<sup>③</sup>这个观点是布哈林对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抱乐观态度的根本原因。他相信农民会慢慢地发展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落后的部分”。<sup>④</sup>但是与此同时，他认为，没有外界帮助而建成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确切的提法，但是相当有预见性。<sup>⑤</sup>

当时，布哈林强调不同的国家将根据自己的发展情况采取不同

---

① 《真理报》1926年8月3日。

②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3-4期合刊，第8页。

③ 他知道，外部的危险可能成为这样一种障碍，但是至少在短期内，随时准备为保卫政权而战斗的农民则是最好的保证。

④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1期，第30页。

⑤ 《通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工农联盟》，第106页。



的道路和方式走向社会主义。<sup>①</sup> 由于布哈林持有“落后的社会主义”这种想法而且认为其他国家有可能做得比苏联好，人们可以设想他是不会象苏联人后来干的那样到处去鼓吹苏联这个模式的优越性的。

布哈林在把最高政治权力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和反对同任何人分享国家权力的问题上，跟其他任何布尔什维克是一样强硬的。<sup>②</sup> 但是，他这种垄断国家权力的思想又奇妙地被他那必须让农民“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下议院”的主张冲淡了。<sup>③</sup> 其他领导人是从对农民要有耐心这个角度来设想同农民建立联盟的。他们虽然毫不迟疑地表示用大规模的强制手段来对付农民是不能允许的（内战时期除外），并且乐意向农民作出重大让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让农民至少获得某些政治权力这样的话。此外，布哈林并不把给予农民权力看成是一种“让步”或单纯的策略手段。而列宁及其拥护者们所发表的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某些言论则表明，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并且是一种交易：国家给予农民一点“资本主义”，即一点在市场上出售剩余农产品的自由，换取的是农民不同布尔什维克争夺对政权的垄断。<sup>④</sup> 但是，在布哈林的不管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解释中，新经济政策和市场都已不再被看成是策略性的退却，相反，它们是整个“过渡时期”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中的很好的战略措施。他还进一步认为，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原则。在那个时候他对市场的这种看法是特别“时髦”的。他说：“我们相信，市场关系是有可能一下子和立即被摧毁的。问题是，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除了通过市场关系以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sup>⑤</sup> 他的意思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机构对私营商人和企

---

① 同上，第 105 页。

② 同上，第 13 页。

③ 《党和反党联盟》，第 53 页。农民在任何政权中都很少享有更多的权力。

④ 《列宁全集》，第 45 卷，第 120 页。

⑤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第 64 - 65 页。

业主的胜利以及农村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对富农合作社的胜利必须通过市场上公开的竞争来实现。

但是这个想法的含义还不仅于此。这个想法中还包含着一种对国家垄断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还由于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反面现象（每当国有企业被授予一种特权的垄断地位时就会出现这种反面现象）而加深了。人们常常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辩护，以为“国有”同“社会主义”是一回事。但是布哈林认为垄断机构很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化、无效率和他所说的“垄断的腐化作用”的大暴露。<sup>①</sup>在他看来，市场竞争是抵制这些倾向的一个有效手段。他从来没有明确阐述过“社会主义市场”这个概念。假如他阐述过，他一定会承认甚至在一个非常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有必要保留市场机制。但是在当时，他肯定不需要在他的文章中作这种修改，他不必为了在细节上过于认真而在政治上再次引起麻烦。他开始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派别的领袖，然后作为反对派的领袖，一直坚持要保留新经济政策及其市场。无论如何，这一点意味着布哈林的观点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过渡时期，市场机制和与市场机制相关的许多东西都要一直存在，或者说，要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当时谁也没有期待过社会主义就要在十年内实现。但是当时其他布哈林分子和诸如 L. 尤罗夫斯基这样的“资产阶级专家们”（这一点不大好解释）的确是使用过“社会主义市场”这个词的，尤罗夫斯基后来由于持这种观点和其他一些与此有关的看法还受到了起诉。<sup>②</sup>布哈林也遭到了攻击，说他受了这些资产阶级专家们的影响。

布哈林的观点经常同所谓资产阶级专家们的观点相类似，这是很清楚的。例如，莫洛托夫曾经正确地指出，布哈林的观点同巴扎罗夫的观点之间有相同之处，<sup>③</sup>虽然他们两个人究竟谁影响了谁并

---

① 《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5 年第 1 期，第 43 - 51 页；《党和反党联盟》，第 34 页。

② 关于市场机制问题，尤罗夫斯基在《财政通报》杂志 1926 年第 12 期第 17 页上以及在其他许多段落中表达了与布哈林相类似的观点。

③ 《布尔什维克》杂志 1930 年第 2 期，第 11 页。

不总是很清楚的，而这一点在这里也并不很重要。在当时，社会科学中是存在着市场机制、动态平衡和与此有关的均衡的发展等提法的，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并没有谁去真正地“发明”这些观点。布哈林是第一个——也许是当时党员理论家中唯一——坚持“社会制度”需要“动态平衡”的观点的人。他的这个见解在他于1920年写的著作中就已经有了，在这些著作中他受A.波格丹诺夫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格罗曼、巴扎罗夫和尤罗夫斯基在他们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写的著作中都分别提出过这些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仍然处于反对派地位时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也讲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经济平衡”问题。<sup>①</sup>尤其是巴扎罗夫——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具有良好的哲学头脑的人——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里在提出经济发展和计划经济的概念方面起了显著作用，他比任何一个第一流的计划制订者都更早地综合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上两个对立的派别（即“遗传论者”和“目的论者”）的观点。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对由国家来制订中央计划的信仰，但与此同时，他也争辩说市场范畴、经济核算和计划是三位一体的，说国家的行动和通过价格（它们是在私人市场上形成的）所进行的检查是互为补充的。经济平衡和均衡的发展是他的观点的主要根据，<sup>②</sup>这一点跟布哈林的情况相同。从思想上来说，布哈林的许多观点肯定是从他那里来的。在计划经济方面，他们两人属于同一个思想学派。

于是，在社会结构和在经济方面，布哈林都看到了一种形成暂时平衡的倾向，这种平衡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被打破、然后又恢复。这种观点导致了他在1924至1926年间赞同新经济政策，并

---

① 参见布哈林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第87-88、81-92（原文如此——译注）和127-129页，和他写的另一本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莫斯科，1921年版）。后一本书的第5、6、7章探讨了社会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制度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平衡的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文章载于《共产主义学院通报》，1927年第22期，第19页上。

② 关于巴扎罗夫和格罗曼，参见A.厄利奇著《苏联工业化之争》一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0年版），第3章和N.贾斯尼著《苏联二十年代的经济学家》一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2年版），第6章（关于格罗曼）和第7章（关于巴扎罗夫）。

且导致了他当时对苏联社会政治发展问题所持的立场，这种立场显然是相当“布哈林主义”的，但当时还没有背离正统。

从1927年一直到1929年，国内和党内由于新的经验和压力而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交织在一起，变成了布哈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套新的建议，但是他在这个时候的盟友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些盟友，他的对手也已经换了人。

### 第三章

## 一位反斯大林主义的 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于是，在布哈林的著作中，下述四个观点是反复出现的，其中有些观点在他于内战期间甚至革命前写的一些著作中就已经有了，这些观点影响了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持的理论。这四个观点是：（一）对国家权力和官僚行政控制的做法的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感由于在苏联社会中能够看得到的国家企业所患的“垄断性化脓症”的症状而加深了。布哈林的这种情绪有时隐藏在字里行间，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公开流露的；（二）认为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均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之中，而且这种平衡状态经常被打破，在革命过渡时期尤其不可避免，但是在正常化时期，当发展有可能按计划进行时，平衡又会恢复；（三）农民既不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也不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他们确实是无产阶级的盟友，而不是对无产阶级的一种威胁，这跟其他许多列宁主义著作中的提法不同；（四）最后一点，由于对农民潜力抱有乐观看法，因此满怀信心并且坚决地赞同新经济政策的形式和市场机制（在布哈林看来，对于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来说，也许在许多方面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新经济政策这种形式实质上是一种最合适的社会-经济形式）。

在布哈林的下一个阶段的思想中，上述这些观点仍然维持不变，从1926至1929年这些观点逐渐演变成一个新的、更全面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纲领。在工业化问题上，布哈林思

想上的变化是明显的，它表明布哈林在对待积累资金和加速工业发展这两个问题上均采取了一种更为现实的态度，从而弥补了他自己原先提出的那个站不住脚的“流通积累”论中的明显缺陷。他对“抽取(资金)”和“速度”(这是当时苏联人使用的字眼)这两个问题都有了一种新的更为清醒的认识，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许多文章、尤其是在1927年发表的那些文章中得到证实。他在1926年7月28日发表的讲话说明了他所持的这种“新见解”。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不仅应该依靠国营工业内部工人阶级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还必须把资金从非工业部门抽取到工业部门去，包括从农业经济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这一点是绝对明确的。农民也有义务帮助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然后，他列举了一些抽取资金的途径，例如“税收、工业品价格和其他收入……”(实际上，苏联在1926年已经开始更认真地进行加速工业化的努力了，布哈林的这些言论只是说明他看到了这种新的努力而已。)但是他在上面这段话的后面又加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性条件：“但是整个问题就是要回答：为了建设这个工业，究竟要从农民身上拿走多少钱？”<sup>①</sup>

在布哈林看来，一旦用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来增加积累的原则被接受以后，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说明这样做的方式、方法和限度了。他同意迅猛地发展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他一再要求国家在这个敏感和危险的领域谨慎从事和自我控制。这一点是布哈林提出的发展战略的基调，这种态度首先反映在1927年1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那个非常平衡和考虑得非常周到的工业化政策上，后来又体现在代表大会过了九个月以后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和举行期间，这些提法都是针对左派的所谓任意掠夺农民的倾向的。然而，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指责是不对的。实际上，布哈林在1928年年初(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就认识到了：热衷于同他进行正面交锋的并不是那些已经

---

<sup>①</sup> 尼·布哈林：《党和反党联盟》(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38页。

被贬黜了的托洛茨基分子，而是政治局中的一个领导集团。他知道，这种正面交锋可能是灾难性的。他和他的伙伴们正确地预见到会出现一种过分热情的“大运动”的危险，因此设法使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措词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笼统的决议，该决议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是获得“长期的高速度发展，而不是就要在明年达到最高速度……”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一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突出重工业，二是强调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不仅可以提供消费品，而且还是为进一步发展经济而积累资金的一个良好途径。此外，这个决议还鼓励发展小型工业和传统的手工业，把小型工业和传统的手工业看作是增加供应和缓和商品短缺现象的良好渠道（商品短缺现象是由于工业大发展时期资金都拿去建造工厂而造成的）。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明智地告诫人们不要投资过度，因为投资过度会不必要地分散资金，造成浪费。决议还大力强调保持市场平衡的必要性。当时，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造成的资金短缺现象和种种困难已经比过去更加理解和看得更加清楚了。这些现象和困难刺激了布哈林去想办法并且敦促领导集团采取消除危机现象和紧张状态的措施，缓和新路线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在群众和国家的关系中出现过深的裂痕。<sup>①</sup>

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篇出色的文章中，把上述那些想法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关于均衡地发展俄国工业的纲领。<sup>②</sup>在这

---

① 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载于《苏联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决定汇编》（莫斯科，1957年第7版），第454页。布哈林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次讲话中解释了这一论点，这次讲话后来以《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党和反对派》为题发表了出来。布哈林的这次讲话包括了他的“新观点”，表达了比以前激进的反富农和反耐普曼的立场，但是他所要求的仅限于对富农和耐普曼加强控制和增加他们的赋税而已。这篇讲话后来收录在《捍卫无产阶级革命》一书（莫斯科，1928年版）的第201-260页上，特别是第210-215和第225页上。关于布哈林等人鼓动那次党代表大会采取工业化政策的情况，参见A.厄利奇著《苏联工业化之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0年版），第87页，并参见同一本书第78-89页《布哈林派调整自己的观点》一节。

②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篇文章载于1928年9月30日的《真理报》。后来的许多论述都是以这篇文章为依据的，因此除了另有出处以外，就不再一一加以说明了。

篇文章中，他放弃了原先那种过分谨慎的所谓“蜗牛速度”的态度（这种态度太容易受到任何“工业主义者”的攻击），转而颇有说服力地主张实现一种平稳的高速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争取一种“最佳”速度。但是他断然拒绝了“速度决定一切”这种一味强调速度的口号以及无限制地挤出资金和片面地集中发展重工业而置其他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他认为，“在一段时间里片面地强调积累和片面地强调消费”都无助于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1928年年底的那种情况下，布哈林感到进一步加快已经取得的发展速度，从而对国民经济造成更大压力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他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混乱和自我失败，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限度，而当时苏联的经济正在接近这个限度。苏联在1928年所达到的“速度”是非常高的——工业增长率大约是百分之二十——因此当时的问题是要找出一种办法来保持已经取得的成绩。在1928年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会上的发言直到1946年才公开发表），布哈林强调自己同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和充满雄心的增长指标。但是据他说，这种做法的上限已经达到了。他在会上说：“现在如果有人建议把现有的速度再加快一倍，那这一定是疯子的政策……”<sup>①</sup>

由于这些言论，布哈林被斥责成“工业化的敌人”。但是事情很清楚，他（和李可夫）所竭力反对的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因而是虚假的“速度”，他认为这种速度将会使苏联付出巨大代价，而收到的效果将会越来越差。这是一个重要的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见解。高速度地发展工业是必要的，重工业显然应该占优先地位，从

---

<sup>①</sup> 鲍古舍夫斯基引自高尔基等人编著的《一九一八年年鉴之八》一书（莫斯科，1935年版）第473页。根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1927至1928年间苏联工业总产值应增长17.3%；官方公布的实际增长数是21.6%。根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1927至1928年间苏联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应增长13.4%；官方公布的实际增长数是16.9%。参见《1928-1929年苏联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一书（莫斯科，1929年版）第25页。尽管鲍古舍夫斯基有强烈的反布哈林的情绪，他还是从布哈林的同一篇讲话中接着摘引了下面这句话：“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停止以同样的速度去继续推进我们的工业建设。”



农民身上刮取某些资金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布哈林认为，这些措施本身并不完整，必须制订出一些实际政策来补充这些措施。上述的每一个目标需要花“多少”钱，需要作出多大努力——这些问题是发展工业的一个关键的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利用现有的一切科学手段尽可能彻底地加以解决。“速度”问题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当时，苏联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要阻止把“速度”变成一种不可控制的妖怪。布哈林的盟友李可夫同那些过分热心的同事作过许多次斗争，他非常直率地指出“我们不应该……迷信速度。”1928年11月，他在中央全会上争辩说：“要是以为整个过度时期存在着这样一种法则，就是速度应该一年一年不断地加快或者至少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上，那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只要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降低投资曲线”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告诫人们说，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鲁莽行动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说这是“纯粹的算术游戏”。他认为，不断增加对工业的预算投资不是一个明智和稳妥的政策。

李可夫担心建立在“纯粹算术”基础上的政策对国家来说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他的对手们的目标是要把基本建设的年投资额增加一倍并且使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十。这些指标是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古比雪夫宣布的。<sup>①</sup>但是在布哈林看来，提出这种指标实在是愚蠢得很。他认为，政治家和计划制订者们在处理这种复杂问题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相互关系和比例，因为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有联系的。例如，以“越多越好”的原则来对农民征收赋税，就一定会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而从长远来说，农业生产的停滞又会给经济的不断增长带来巨大困难。归根到底，为了工业本身的利益，也必须允许农业有某

---

<sup>①</sup> F.瓦加诺夫在《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年）》一书（莫斯科，1970年版）第97-98页上引用了李可夫的话。古比雪夫的话引自《在全面的社会主义时期中的萨拉托夫党组织》一书（萨拉托夫，1961年版），第155页。

些积累。<sup>①</sup>

在发展战略中，同样的“平衡”原则也适用于轻工业。在这里，支持优先指标的粗暴决定并不能代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来的任务——探索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最有利的相互关系”。布哈林继续问道：“难道为了使重工业按照人们的愿望增长，就必须把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资金都投到重工业上去吗？用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投资的做法就一定能够获得人们所期望的增长速度吗？”

他提出了两点理由证明这种态度是错误的。第一，他相信，在国民收入中，在牺牲消费利益的情况下，积累和投资所占的份额总会有个极限。当这个极限达到时，“投资过渡”就出现了；再要进一步加快投资速度，工业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会越来越慢，最终将会导致大量浪费。后来的一些学者根据经验和理论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sup>②</sup>

第二，在投资问题上有一条原则，这就是避免不必要地分散“投资战线”。1927年布哈林已经看到了这种“过分地分散战线”的倾向。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新的建筑工地不断增加，吞掉并滞留了巨额资金。由于国家没有能力同时搞这么多的项目，许多项目的竣工日期被拖延下来。他预言，这种情况是“不会带来经济的真正增长”的，因为一方面，已经开始的许多项目会不断地延期，有些甚至会完全取消（不管怎么说，由于匆忙上马，这些项目都计划得很不周到）；另一方面，许多需要资金的经济部门又会饱尝得不到资金之苦。这种政策是造成“商品荒”的原因之一，而在1928年“商品荒”已经严重到不可容忍的地步了。

---

① 比较瓦加诺夫著《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年)》一书第118页。瓦加诺夫从党务材料中摘引了布哈林的另一段话。布哈林在那段话里警告说，如果不允许农业有某种程度的发展，工业化的前途将会是令人失望的。

② 关于当前苏联某些学者对总的积累标准的“极限”的研究情况，参见A.诺特金主编的《苏联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一书(莫斯科，1970年版)的第8章(该章介绍了H.潘克拉多娃的观点)和第9章(该章介绍了V.马耶夫斯基和尤·赛里瓦诺夫的观点)。

布哈林在五年计划一开始就察觉到的投资过度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以后的几年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强烈了，而且折磨苏联的经济一直折磨了几十年。不平衡的投资政策给苏联的经济造成了一大堆困难，甚至今天的各种经济改革都还没能把这个国家从这种继承下来的困难中解脱出来。

在这样大的一番事业中，犯许多错误和作出许多不正确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在匆匆忙忙地实行工业化和制订计划的开始阶段尤其如此。但是拒绝提出正确的问题和不愿意正视错误则是致命的。同别人的忠告一样，布哈林的忠告遭到了拒绝。他知道，高级领导人在作出许多决定时是全然不考虑这些决定对整个经济会造成的后果和多方面的影响的。因此，他强烈要求加强科学在经济计划和制订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要求加强学习并掌握管理方法。他说：“我们要末靠科学的经济管理方法赢得胜利，要末一事无成。”他还说，“合格的管理”艺术（“文明管理”）是需要的，最高一级尤其需要。<sup>①</sup>

在三十年代的某段时间里，由于苏联过分强调发展经济，布哈林的关于科学管理和科学计划的观点以及关于组织工作中的科学和科学规划等方面的观点大多数被忽视并且被打入了冷宫（布哈林从重要的政治岗位上被贬黜下来后，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领域里并且提出了一些开拓性的见解）。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布哈林的这些观点又重新变得重要起来。

## 计划与市场

关于为整个国民经济制订计划这一具体的活动方面，布哈林也说了不少，这是苏联当时正在骄傲地着手进行的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对于某些问题的考虑曾经使他形成了在“速度”问题上的态度和那种将会变成“速度病”的做法的反对意见，这些同样的考虑又促

---

<sup>①</sup> 参见《列宁和科学的任务》一文，载于1929年1月20日《真理报》。俄国人所用的“文明”一词是无法翻译的。这个词的意思是适宜于有文化的人的举止或所作所为。

使他产生了对总的计划制订工作的前提的看法。他相信制订计划的优越性，但并不认为计划经济本身就一定比非计划性(或计划性不强的)经济优越，尽管苏联的宣传机器是这么宣传的。一个还处于幼年时期的计划，而且是在一个处于危机的痛苦之中的国家制订的，是不能这样自我吹嘘的。可以说，一切都取决于计划的质量及其执行情况。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里，这个强大的手段如果使用不当，就会产生潜在的危害。

因此，布哈林经常强调：根据充足的计划也有局限性，而考虑欠缺的计划则更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无能但却大权在握的计划制订者们所造成的损失和混乱，其产生的破坏作用要比资本主义无计划的自发性所产生的破坏作用更大。如果计划制订者们过于长期地无视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那末国家就可能犯下“最粗暴地违反基本经济比例”的错误。1929年1月布哈林又补充说：“在错误政策的指导下，整个(计划)过程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并不比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所付出的代价小……”<sup>①</sup>

布哈林当时正确地预言了草率和不准确的计划工作以及不考虑代价和不加控制的增长可能造成的后果。在他看来，制订计划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决不能把它变成一项任意或单凭经验进行猜测的活动。这项工作必须严肃认真地进行，必须把它“变成一种专门的应用科学”。<sup>②</sup>但他感到，在一个把大量权力积聚在官僚机构的核心、而且这个官僚机构的顶端是一些不受控制的统治者的制度里，这种想法要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他对整个计划工作中的制度方面的问题始终感到担忧。在他看来，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使计划工作本身、整个经济发展及其所包含的政治内容都受到了破坏。《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篇文章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敲了警钟。文章指出：“我们已经把权力集中得太过分了！”而且他认为，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使国家失去了许多机会和生气。这样

<sup>①</sup> 见《列宁和科学的任务》一文，载于1929年1月20日《真理报》。

<sup>②</sup> 同上。

一种政权容易沉溺于异想天开的乌托邦计划和狭窄的经验主义。因此，整个制度免不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布哈林相信自己在充满危机的1928年已经看到了这种制订计划的方式的迹象。据他说，那场危机是由于国民经济各基本部门之间一系列的比例失调现象造成的，这种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由于考虑不周的政策而大大加重了。这种制订计划的方式有一个弊病，而且经常不断地表示出来，这就是容许计划指标和资金之间存在脱节现象。这一点甚至在今天还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而且批评者使用的还是布哈林的那些语言。在布哈林看来，现行的“控制数字”竟会预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计划——在建设指标和必需的生铁产量之间将有一个百分之二十的缺口，这实在是荒谬可笑的。此外，他还嘲笑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制订建造许多房屋的计划的时候，可以不必为制造足够数量的砖制订计划。他说，一个计划“必须考虑真正的而不是虚构的大梁和铁条……”在他看来，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人们并不是用未来的砖头来建造今天的工厂。”

为了实现计划指标，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和计划内部的一致是必要的。计划工作应该“尽可能地安排好国民经济各基本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之保持平衡）……”同布哈林所强调的所谓保持国民经济平衡的观点一样，这个原则到了六十年代仍然受到计划制订者们的重视。由这个原则又产生了现代的投入—产出表，这是更好地理解经济部门内部的相互关系和制订更准确的计划的一个很有用的工具。苏联现代的一位学者认为，投入—产出表是“确定国民经济的速度和比例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sup>①</sup>三十年代初期，苏联中断了对科学的计划工作的研究；这意味着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苏联的计划工作是在没有严肃的用于确定主要指标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再说，所订的计划即使在纸上实现了内部的连贯性，在执行过

---

<sup>①</sup> 参见阿·艾费莫夫主编的《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一书（莫斯科，1967年版），第133页。艾费莫夫在这里对放弃这种“平衡”的工作表示遗憾。A. 诺夫在他所著的《苏联经济史》（伦敦，1969年版）一书的第134页上也对此表示了遗憾。

程中这种连贯性又会不复存在。因此，就象实际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想把一切都纳入计划的奢望，其结果往往会导致一种在细节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制度，这种制度很可能把人们束缚起来，而不是使人们真正地掌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布哈林预见到了这些情况，因此把自己原先那种“通过市场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同关于制订计划的观点合二而一，形成了一种关于计划工作的范围的新见解。他认为，由于各种市场力量和市场关系以及不属于经济范畴的其他自发因素的存在，理想的、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的计划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一个有效的计划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它既要以计划制订者们所制订的目标为出发点，又要尽可能周到地考虑到由于市场力量的缘故而出现的各种不可避免的变化。用布哈林的话来说就是，计划的结果应该而且也会被社会发展的“自发结果”所纠正，这种“自发结果”如果不是永远消灭不了的话，也至少在这个阶段是消灭不了的。

这种论据显然符合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情况，但它还包含着一个同新经济政策的范畴关系不大的长远问题。这就是，通过计划而进行的国家行动同自发性(不管这两个因素在将来会采取什么形式)的结合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这也就是布哈林要如此坚决地为保留新经济政策而斗争的原因。他相信，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将会继续有效，任何想跳过这个阶段的尝试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尤其在同农民的关系方面，保留新经济政策及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市场关系就成了他、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1929年2月9日举行的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和同年4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捍卫的一个文件中的主要的政治观点。在这些会议上，三人坚决主张市场联系而竭力反对多数派提出来的所谓同农民保持“生产联系”的新观点。托姆斯基嘲笑了“同农民保持联盟的这些新形式……这里除了非常(强制性)措施和定量配给证以外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而布哈林则把这条新路线斥之为“极端片面的东西”而加以反对。他强调：“市场关系这种形式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将继续成

为经济关系的决定性形式。”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有些领导人“显然过高估计了没有市场关系也能影响农民群众的可能性。”李可夫支持这个说法，指出即使是集体农庄的粮食也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取得。

新经济政策是使苏联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很合适的形式，布哈林一伙人的纲领就是要努力使这个国家避免跳到在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显然不可能达到的“经济发展的某个更高的阶段”上去。在布哈林看来，混合经济是一个长期的纲领。因此，短期的计划不应该损害这个长期的纲领。他说：“五年计划能够、而且应该在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中实现。”<sup>①</sup>

布哈林在计划问题上的观点反映了上述基本看法。他的结论是：“过高估计计划原则而低估自发性的作用是错误的。”不足为奇的是，这个结论包含着这样一种呼吁，就是要求在制订计划方面采取一种更为现实和考虑得更加周密的态度。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制订一种“混合计划”，关于这一点，巴扎罗夫表达得最为清楚。在制订这样一种计划的过程中，关于计划工作的两个互相对立的学派，即“遗传论者”和“目的论者”的观点是可以有益地互为补充的。当时，双方已经在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了：“目的论者”逐渐理解到必须在现存的、过去所形成的格局中考虑现实情况和资金短缺问题，“遗传论者”则越来越接受这样的道理——计划制订者们需要并且有权利根据某种演绎的原则和目标来制订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对于探索一种能够更好地实现布哈林所主张的动态平衡的计划工作来说，他所写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那篇文章也许已经提供了一个纲领和政治上的福音。”<sup>②</sup>

<sup>①</sup> 所有的引语均出自《中央党务档案》所载《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道》一节(莫斯科,1962年版),第803、806页。最后那句关于五年计划的引文见瓦加诺夫所著《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年)》一书第209页。

<sup>②</sup> 这是波兰经济学家 Cz. 波布罗夫斯基的看法,见他著的《在萌芽状态中的社会主义计划》(华沙,1967年版)一书第117-124页,请比较 W. 布鲁斯著《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一般问题》(华沙,1964年版),第98-101页。

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况，他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 计划的制订与国家

布哈林认为，增长模式和制订计划的方式对国家的整个制度、实际上对国家的前途有着巨大影响。这个看法是相当正确的。布哈林从研究帝国主义和战争年代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时候起，思想中就明显地对现代国家的威力感到担忧。“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由国家组织的，这个因素有强大的力量，足以（至少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国家范围内的组织手段和计划手段来帮助克服市场力量内部的无政府状态（虽然这些手段并没有减弱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和冲突）。

布哈林在1929年6月发表的《“有组织的混乱”的理论》一文中重复了上述见解，并且据说直至1930年12月尽管在经济危机使整个西方世界陷入混乱而且面临共产国际推行过激路线的情况下，他仍然在捍卫同一个立场。当时，共产国际的那条过激路线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实现新的稳定。<sup>①</sup>这条官方路线最终导致了同“社会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而不是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致命政策，其悲剧性结果（尤其在德国）是众所周知的。

十分奇怪的是，莫洛托夫并没有指责布哈林在《“有组织的混乱”的理论》一文中对苏联国内问题所作的暗示。之所以奇怪，尤其是因为布哈林并没有试图隐瞒自己的用意，即所谓西方“有组织的混乱”的言外之意指的也是苏联的情况。布哈林使用的这种“伊索寓言式的语言”是一点也不难解释的，尤其是因为人们（例如莫洛托夫）知道，布哈林曾经狠狠地批评过苏联的国民经济组织和那些在中央工作的计划制订者（那些人正在把苏联的国民经济组织引导到一条充满着破坏苏联经济生活的危险的道路上去）。布哈林的思想

---

<sup>①</sup> 《“有组织的混乱”的理论》一文载于1929年6月30日的《真理报》。关于莫洛托夫攻击布哈林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和官方对这一点的看法，参见《布尔什维克》杂志1931年第3期，第20页。



在那个极权主义国家的阴影中不断成熟，表明了他对在苏联这个具体环境下这一问题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他之所以对制订计划的可能性抱比较谨慎的态度，是因为他怕过分雄心勃勃的计划会造成压制太多的结果。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计划工作是实现变化的主要媒介（这是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共同观点），但是布哈林由于深刻地意识到一个意志坚强的政府强加于一个落后社会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复杂情况，却强调计划工作的危险性。事实上，彻底中央集权的经济统制和随之而来的“管得太多”的现象当时正在很快地成为一种现实。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布哈林希望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做那些实际上能够做得最好的事情，而不要全力以赴地去压垮俄国的“小人物”——手艺人、小商人、小工业家和小农产品生产者等。这些社会集团以及合作社的和国营的小企业和服务行业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是对工业化本身的一种补充，因为它们能够缓和由于把大量资金都投入大型项目而造成的眼前和将来的紧张局面。忽视甚至消灭这些集团和经济部门，会使国家在困难时期失去在经济上进行机动的有用手段和可能性，从而导致冲突和危机的进一步恶化。<sup>①</sup> 第一个五年和接着发生的许多事件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布哈林在告诫人们提防中央集权的经济统制的同时，还担心正在滋长着的官僚作风不但不可能变成有效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而且还会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障碍并使苏联经济付出巨大代价。因此，他在1928年9月12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它（指国家）往自己身上揽得太多，它必然会造成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的情况下就消灭“小人物”并代之以“官吏”的做法会导致产生一个臃肿、费钱和无效率的机构，而且“维持这个机构所需要的开支比起小生产的无政府状况

---

<sup>①</sup> 布哈林写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的论点就是，危机已经出现了。A.厄利奇在《苏联工业化之争》一书第84-89页上阐述了这样的看法，即布哈林的建议本来是会产松一口气的效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

所造成的非生产性开支会多得不可比拟……”<sup>①</sup>

这些观点为从社会学和政治角度严肃地分析苏联这个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实际上是为一种真正的政治社会学提供了基础，这种真正的政治社会学并不把生活中一切令人讨厌的事情的根源都荒谬地归咎于“资产阶级残余”或“小资产阶级压力”。苏联这个国家的形式及其官僚性质并不是“残余”而是苏维埃历史的产物，虽然强大的习惯势力肯定也是个重要因素。的确，管理国民经济过程中权力的集中化和整个过程所具有的“行政管理”性质是俄国社会的产物，其规模在世界上大概是没有前例可援的；然而，象国家拥有一切工业资产和把城市中大部分就业人员、农村中一部分就业人员转变成国家的雇员这样一些重要的发明创造在俄国历史上则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布哈林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思考苏联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时，并不需要重复列宁说过的话，即“官僚主义化”这个令人讨厌的现象是由于苏维埃政府重新雇用了那些过去为沙皇效劳的官员造成的，因为这种说法实在太简单化了。在布哈林看来，苏联这个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消提出这个关键因素就够了）导致了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而这个行政管理机构反过来又使其自身的、自我支持的动力运转起来。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坐在办公室里的那些人的阶级出身，因为那些一成不变的官僚作风，包括整天埋头于公文手续、事务主义和机械的工作方式等是由这个国家本身的活动方式及其固有的等级制的自我抑制倾向造成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当时提出的另一只替罪羊——当然是造成“官僚主义化”的一部分原因。所有这些在布哈林看来都是一清二楚的，但是这样一种分析由于“污蔑”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左道邪说。<sup>②</sup>

同当时党的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布哈林也是信奉“无产阶级

---

① 《列宁的政治遗嘱》，载于1929年1月24日《真理报》。

② 这里用的大部分是布哈林的原话，见之于过去的党员艾·帕舒卡尼斯发表在《苏维埃司法》杂志1934年第17期上的文章中对布哈林进行攻击的那一节（第3页）。

专政”这个理论的，不过他所关心的是确保在社会日益发展的过程中最终能削减国家权力——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党纲都一再保证要实现的目标。布哈林的态度是认真的，他从列宁的最后几篇著作中摘引出这样一句口号并且坚持这句口号，这就是在苏维埃政权里“不需要进行第三次革命”。然而，当时的情况正好相反。正象他所指出的那样，党的领导集团在1928年开始采取了一种不依靠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的方针。某些压力和强制性的因素自然是固有的而且在苏联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无论怎样“软”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使用暴力。但是他感到，党的领导集团当时提出的方针在内容、规模和范围方面都同他所想的不一樣。人们可以从莫洛托夫在1929年11月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对布哈林的攻击中了解到布哈林的观点，莫洛托夫说：“……他们(指右派)给党抹黑，指责党通过非常措施即用行政手段进行镇压的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即莫洛托夫在上面引用并竭力加以抵赖的)指责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为反对把一种“非常措施制度”当作一项长期政策来执行而共同提出来的，这种“非常措施制度”是以作为其主要方法的大规模强制性手段为基础。<sup>①</sup>

这个指责当时遭到了驳斥，正如今天仍然遭到保守派作家们的驳斥一样。到1929年年底，布哈林已经看到了“通过非常措施之门”来实行新的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含义。首先，这个政策导致了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其全部的灾难性后果都是他过去就曾预料到的。新经济政策已经结束了——他在1929年4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完全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一文中的调子大声喊道：“非常措施同新经济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新经济政策要求一切行动都符合法律，要求取消行政管理上(“哪怕是革命的”)专横做法。随着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是维辛斯基这位斯大林时期的

---

<sup>①</sup> 见莫洛托夫的文章，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2期，第17页。

新的预言家提醒布哈林回忆他自己在1926年讲过的话以及这些话所涉及的全部“机会主义”内容。维辛斯基解释说，“革命的合法性”不但同“革命的专横做法”不矛盾，而且还是包含这一内容的。<sup>①</sup>

在布哈林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不要革命，也不想再来一次内战。他认为，那种基本上属于压迫性的行政方法只能导致建立一个压迫性的制度。他之所以力争合理的增长率、灵活的制订计划的方法（包括积累“多少”和投资“多少”的问题）和他自己所提出的农民政策，其原因就在于此。在1929年2月举行的一次政治局秘密会议上，布哈林指责党的领导集团正在建立一种“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制度。<sup>②</sup>他用这种说法来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并以此来强调他之所以要呼吁人们记住并实现《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和《列宁的政治遗嘱》这两篇文章中所概述的“公社国家”的含义。“公社国家”这个概念来源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思想，在革命时期显然在反对派领导人中间盛行过。不过在苏联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样的主张还有其更为实际的政治含义。它用一种表面上相当正统的措词概括了布哈林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反纲领，这就是，减少中央集权，增加党内民主，对待问题采取更合理、更科学的态度，反对采取大规模的强制手段，减少对严格的国家行政措施的依赖，强调渐进主义和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等等。

批评布哈林的那些人不无理由地指出他是用“公社国家”这个提法来作为他争取实现民主化的反纲领，他们批评他提出“公社国家”

---

<sup>①</sup> 关于当代人为“非常措施”进行辩护的情况，参见瓦加诺夫所著《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年）》一书第126—128页。维辛斯基的这些话引自《苏维埃司法》杂志1932年第19期，第7页，他的这些话是驳斥布哈林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莫斯科，1926年版）一书中第79页上的那段话的。

<sup>②</sup> 鲁祖塔克引自《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0年版），第201页。

的目的乃是为了取代当时的苏维埃国家。<sup>①</sup>但是布哈林却从来不否认他赞成“公社国家”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目标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曾经鼓舞了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

后来，布哈林曾经仪式般地承认过几次“错误”并且暂时地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声望（不是权力），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私下地（但不是秘密地）继续在思考和梦想苏维埃俄国的命运和需要。我们缺少有关这个阶段的大部分资料，因而不得不几乎完全依靠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写的关于1936年春天他同布哈林谈话的回忆录。根据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回忆，外部事务即日益增长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威胁在布哈林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布哈林相信，苏维埃制度要真正地成为俄国和其他民族的另一种选择，使自己明显地区别于纳粹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但这种强调只有当苏维埃国家的行动发生制度性的变化时才能奏效。他似乎认为有必要允许建立第二个党，这个党主要地由知识分子所组成，他们有权根据社会主义的总的原则来批评占统治地位的党。布哈林的这个设想大概是得到了巴甫洛夫和高尔基的赞同的，1936年制定的苏联宪法所表达的希望和观点包含了他们三个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共同的想法。尼古拉耶夫斯基认为这个宪法中的大部分条文都是布哈林起草的。<sup>②</sup>

布哈林绝不反对专政，但他十分希望专政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希望最终会由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气氛来加以取代。他认为，无论是“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还是不顾一切地“迅速（实现）社会主义”都不能加快这一目标的实现，认为社会主义，如果其人道主义的内容被忽视得太久，就可能完全归于失败。毫无疑问，布哈林

① 参见雅·别尔曼著《公社国家》一文，载于《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50年第5、6两期合刊。别尔曼的这篇文章是他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问题理论家”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国家正在消亡”的论断，在四十年以前和在今天都是完全符合公认的党的教义的，但是这些论断也可以用来为真正地批评一种到处存在的国家机器的目的服务。

② 参见鲍·尼古拉耶夫斯基著《权力与苏维埃权贵》一书（伦敦，1966年版），第22页。

是指责把临时的紧急措施变成永久性的措施以及新的统治者把这些措施完全当作例行公事来执行的错误做法的。

## 右派和左派趋于一致

布哈林在同左派进行斗争和帮助斯大林镇压左派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参与了使党变质并且与此同时使自己失去地位的过程。1928年和1929年他投入了一场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新的纲领），并且恢复了自己的洞察力。然而，左派对来自斯大林的威胁仍然视而不见。在布哈林相当勇敢地拜访加米涅夫，向左派通报斯大林的计划并且提出同左派结盟的要求的前几个月，托洛茨基还把右派看作是主要危险。在他看来，右派是“非无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施加压力的传送器”。<sup>①</sup>这个说法同很快就成为布哈林的正式形象的“富农代理人”这一称号几乎别无二致。出于同样的陈腐思想，左派不顾托洛茨基的劝告，拒绝了布哈林的主动表示。托洛茨基在同年9月，当他得知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情况后，曾一度倾向于同右派达成某种有限的交易。但是，正如多伊彻所写的那样，他并没有改变关于“主要危险”的基本看法。多伊彻强调的是右派也用同样的情绪回报了左派。<sup>②</sup>实际上，自从斯大林的态度在1928年春天向左转以后，左派就一直期待着同斯大林和解，因为他们从他所奉行的路线中看到了自己的观点的胜利。托洛茨基同意支持斯大林，但是他很快就对斯大林那条新路线的性质产生了怀疑，并因

① 托洛茨基著《列宁逝世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纽约，1951年版）中《现在怎么办》一章，第289页。

② I.多伊彻著《被遗弃的预言家》（伦敦，1963年版），第448-450页。不错，右派害怕左派，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布哈林当时曾决定冒很大风险去会见加米涅夫并向左派提出了联合反对斯大林的建议。多伊彻的论点是，右派“担心斯大林会同左派搞交易，因而决定不同斯大林作斗争”。他的关于存在这种担心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他所说的右派“决定不作斗争”这一点则是错误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当时曾抵制了一年以上，只是在被击败以后才失去了勇气。

此而告诫他的追随者在提供支持的同时也要对斯大林提出尖锐的批评。他的理由是，对农民施加野蛮的行政压力根本不是他们自己那条左的方针的主要内容。<sup>①</sup>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托洛茨基才会考虑同右派结成某种有限的联盟——的确是有限的联盟，因为他同斯大林一样对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那篇文章是非常蔑视的。但是几个月以后，托洛茨基的大批人马都背弃了他，他们团结到斯大林的周围，希望从可恶的右派分子手中挽救革命；不过其中的大部分人很快又都失望了。当时，无论是左派的斗士还是他们的领袖都没有认识到，布哈林在同斯大林作斗争的过程中所阐述的纲领后来竟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纲领。他们正在与之作斗争的所谓右派的危险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听起来尽管有点自相矛盾，但是布哈林在这个时期确实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表达了可能是左派和右派的共同观点。但是，过去的争吵使双方都未能认识到这一基本的共同之处，因此他们继续进行激烈的搏斗。正是在这个时候，对于斯大林的路线来说，右翼在1928至1929年间提出的纲领提供了唯一的反纲领和另一种选择，它在党内代表着左右两翼的观点。

托洛茨基(多伊彻亦然)从未认识到或至少从未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从1928年秋天以后，他就一步一步地向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和其他文章中所阐述的路线靠拢。当时，对事物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并正确地预见了事件发展情况的是布哈林。

1930年2月，托洛茨基在评价俄国新的集体化和工业化方针的时候，强调左翼反对派从来没有要求过、也从来没有期待在五年之内就消灭阶级，相反，他们把阶级的消亡看作是在世界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的一个长期过程。而且左派也并不希望超过工业化的需要而过多地削减富农的收入。象斯大林干的那样用行政手段来加以消灭的做法从来就不是左派的意图。<sup>②</sup>

<sup>①</sup> 同上，第447页。

<sup>②</sup> 《反对派公报》，1930年第9期，第6页。《反对派公报》是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国外去以后主编的一个刊物。

指责左派怀有不良意图是没有根据的。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那条“左的路线”的越来越多的批评使托洛茨基自己和他的阵营中的其他一些批评者（例如拉科夫斯基）感到了不安，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自己现在不是从右的立场来反对斯大林了吗？<sup>①</sup>

到1930年，托洛茨基提出的国际和国内政策同布哈林的路线已经完全无法区别了。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关于共产国际对待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方面，托洛茨基以极为清醒的判断力，强烈要求修正那个致命的以极左方针为指导的所谓“第三阶段”的提法，并且要求同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尽管这是早就存在着的被官方发言人竭力诽谤的一种“布哈林主义的异端邪说”。<sup>②</sup>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托洛茨基对国内政策的批评日益带有“布哈林主义”的色彩。他断言：工业增长的“速度”太快了，集体化运动是件蠢事，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都必须加以提高，等等。不久，他提出了下述要求：制止“非富农化”的做法及其整个冒险攻势，停止强制性的集体化和重新制订整个工业化的纲领。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强调谨慎和现实主义的指标，反对绝对主义，主张吸引工人给予合作和参与建设，而不是用高压措施压制他们的主动积极性。<sup>③</sup>他严厉地批评了领导集团那种恐慌的做法，这种做法导致了取消新经济政策而不是使新经济政策更加完善。他在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把问题讲得更加清楚了。在他看来，那年政府重新允许开放集体农庄市场以及其他一些退却的迹象证明：“正确的、经济上合理的集体化本来就不

---

① 多伊彻描述了托洛茨基在批评斯大林提出的极左的“第三阶段”时的窘境（《被遗弃的预言家》一书第42页）。但是托洛茨基在对苏联其他一些政策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反建议时也处于同样的窘境。

② 莫洛托夫指责布哈林想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参见莫洛托夫1930年12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1931年第3期，第20页。他在那篇发言中讲的是一种布哈林主义的老罪孽。

③ 这些话可以在《反对派公报》中找到。参见《反对派公报》1930年第9期，第1-8页，1930年第10期，第2-7页和1931年第20期，第13-15页。



应该导致抛弃新经济政策，而应该导致逐渐地改革新经济政策的方法。”<sup>①</sup>在同一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完全赞同市场机制的原则，认为这个原则在过渡时期是不可缺少的。这大概是他自从被流放以后第一次用如此直截了当的措词来推荐市场机制的方法。他提出的应该在过渡时期采用的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制订国家计划、市场机制和苏维埃民主<sup>②</sup>（他不相信官方所谓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断言）。此外，他还否认大规模的强制手段是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驱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一种方法。他批评了“超速度”的做法，并且在要求谨慎和合理的同时建议“退却”。他还明确地要求同社会民主党合作以共同对付纳粹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完整地“重新陈述”了布哈林在1928至1929年间提出的“右派纲领”。

如果说托洛茨基采纳了“布哈林主义”的观点，那末布哈林则是借用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1929年4月，在一个谴责布哈林的秘密决议中（这个决议是许多年以后发表的，因此托洛茨基当时对此一无所知），中央委员会正式地提出：“布哈林声称我们没有党内民主，说党已经变得官僚主义化了，指责党的书记们不是选举产生的……说党内的现行统治已令人无法容忍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是赤裸裸的捏造。”

对布哈林的上述批评在今天听来很像是领导集团的一种自我控告。紧接着这个批评的是这样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布哈林就滑到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的那封臭名昭著的信中所表达的立场上去了。实际上，布哈林的意思同当时托洛茨基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就是，要在党内争取小团体的、派别的自由。”<sup>③</sup>党的这些庄严的否认言论实际上是一份自供状，正因为如此，这些言论在当时并没有发表。但是决议

---

① 见《反对派公报》，1932年第3期，第9页。

② 同上，1932年第3期，第9页。

③ 《苏联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决定汇编》（莫斯科，1957年第7版），第561

指责布哈林在这一点上滑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去了则是正确的。事实证明，斯大林以日益顽固的态度加以宣布的他的总的看法——即左、右两派基本上是一样的——要比这两派人对自己的判断来得正确。正是出于这种看法，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两派人作为一个共同的“阴谋犯罪集团”来加以消灭。

## 第四章

# 苏联历史上的两个模式： “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弄清历史上的事件对于我们这个总题目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便很有必要对苏联历史上的几个主要阶段更系统地作一番回顾，让更多的属于个人的情况稍微退到后面去，而让不属于个人的情况突出到前面来。

苏联的历史虽然比较短，却显得相当复杂，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事件都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急剧的演变过程，而且是因为苏联历史的一些基本特征形成了一系列不相同的社会政治模式。这些基本特征中，党对政权的垄断、党所宣布的重建国民经济中某些关键部门并使其社会化和国有化的目标，在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整个期间，肯定是不改变的。而另外一些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国有成分的规模，国有成分与私有成分之间或国家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市场与货币机制被采纳和容许的限度，经济刺激和非经济刺激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还有党内外的文化多样性和学识水平，乃至政治论战水平，则都是可以改变的，并因而结合成不同的类型或“模式”。

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凭他们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可能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关于一旦掌握政权以后将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的想法是多么粗浅和不成熟。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种缺陷。甚至连列宁也坦率承认了这一点。同时，他们受到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作者的启示而形成的先入之见，对他们影响至深，以致他们对实

际事务的经验越少、看法越狭隘，就越对基本教义奉为主臬，仿佛那些教义对他们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令人惊异地看到，他们经常处在事实与幻想的冲突中，处在他们所承担的意识形态义务与现实感的矛盾中，而他们终究是靠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形成其布尔什维克政策的。

苏联各个模式的改变，除了最初那个以外，都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或对下一阶段特点的认识来为它们预先指明道路。虽然如此，这些模式却惊人地表现出了它们之间有一定的重复性，即产生了一种轮回现象。

被莫里斯·多布看作“最初八个月”<sup>①</sup>的时期毕竟十分短促，因此我们不可能对这段时期列宁政府的政策所包含的理论和实际作出全面的结论。当时那套理论是很不完善的。列宁在其1917年9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对那套理论作过不太明确的表述，后来又在1918年春用那套理论来为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以对付当时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的批评。<sup>②</sup>左派那时竭力主张，立即采取大规模国有化的措施，以便在不远的将来迅速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虽然还缺少足够有力的论据，却一再以着重的语气重申他自己的看法；其实，他也承认过，没有实行大规模国有化就是“放弃”当时党的期望（后来在1921年，他又作过类似的重申）；可是，他在1918年仍分辩说，这恰好不是放弃而是回到上述1917年9月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最初想法上。列宁已经使用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来表达在苏维埃政府及其打算建立的过渡制度下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采取的战略。

使用这样一个词来称呼他们将要建立的制度，这就把许多党员搞糊涂了，而列宁却一度相当顽强地坚持使用这个词，并在后来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加以重新使用。

---

① 莫·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的苏联经济发展》（纽约，1966年修订版）。

②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与《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分别载《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4卷和第36卷。

列宁在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个月中认为，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至少是整个一代人的事情，也许还会更长久一些；最大的困难，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是这个落后国家中那些散漫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他总是经常重申这个关于“主要敌人”的论断，尽管这个论断看起来同他想与贫农结成联盟而提出来的那些并行的口号并不怎么协调，因为农民本身正是散漫势力的一部分。但是，再也找不出别的论据来使这种结盟的想法协调起来，这的确是个矛盾。按照当时的讨论，俄国唯一进步的势力是那些具有“组织成千上万人的能力”和懂得并习惯于为整个国民经济考虑而且贡献出利益的人。显然，只有资本家 and 他们的组织者才是这样的人；因此，必须停止国有化，停止损害资本家，并开始同他们合作。大资本可能是一支进步的同盟军。所以，必须停止把工厂中的“工人监督”转变为实际上的工人管理，更不能象有些人所臆想的那样，宣布工人有对企业的正式主权。

在工厂一级，“工人监督”只意味着严密的检查，而在国家一级，这种权力却由工人国家加以扩大，但是这样的安排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政府下面作出的，也只能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奚落布哈林和奥辛斯基那样过于急躁而鼓吹相反的“国家社会主义”想法的左派人士时说，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是能实现的话，必将是苏维埃俄国的一大进步。

列宁提出这一概念的动机是不难理解的。他当时并不（以后仍然不）认为社会主义有什么捷径，而国外的革命看来也还为时尚早。他希望，资本家会因此乐于同苏维埃政府合作，而一旦实现合作，就会不但有助于俄国取得进步，而且保住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方案，因为马克思规定了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实现。因此，列宁准备限制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把操纵权牢牢地保留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手中，以便一旦时机成熟，能为下一阶段作好保证。但是，他又另外觉得，更应当使自己的学说与对历史进程的控制做到双管齐下，否则资本主义之类的事物万一果真首先发展

起来(因为有资本家帮忙),那么社会主义后来就肯定会“按部就班”地落在后面了。<sup>①</sup>然而,资本家并没有合作,因而整个计划也就落空了。研究者们一般承认,大规模的国有化高潮直到1918年6月国内战争爆发时才开始,而且这一过程也并不是有意安排的。A.诺夫写道:“这个迹象虽然不太明显,却仍与那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混合经济的意图是一致的。”<sup>②</sup>

“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国家组织和经济生活的特征,仍然是个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例如,各种市场势力的作用便未经过讨论,也未引起列宁的兴趣,正如他后来承认,当时显然不曾有过取消货币和市场的意图。

但是,当内战方酣而极度困苦之际,“国家资本主义”便很快被扔到一边去了,党内大多数人转而相信,当时采取的战时经济措施可能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捷径,虽然不久前还把社会主义有捷径的想法斥为幼稚的“左派”梦想。这个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想法比“国家资本主义”的想法更加令人吃惊,但很快就从这种想法一跃而直接产生“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

这个新思想在布尔什维克过去所有的纲领中,是找不到理论上的特殊根据作为立足点的。它之所以冒出头来,是由于存在着下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同时起作用的结果,即一方面要应付战事的变化无常,一方面领导人及其追随者都同样有乱世求生(这只有寄希望于“乌托邦”才能做到)的欲望而想到一处了,再加上对共产主义有一套糊涂概念而没有认真加以思考;这笔糊涂帐是马克思故意留下来的,因为共产主义还得等到遥远的将来才能建立。

不管怎么说,“战时共产主义”对于苏维埃制度后来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它的特征就是要集中精力完成一项中心任务,即赢得内战的胜利。其采取的措施也相当成功,包括把生产与分配集

---

<sup>①</sup> 参看R.洛伦茨:《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工业政策》(科隆,1965年版)。

<sup>②</sup> A.诺夫:《苏联经济史》(伦敦,1969年版),第54页;参看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伦敦,1952年版),第2卷,第272页。

中到官僚化的中央机关(几个总管理局)和军队或军事部门手里。实际上,它只是一种不完善的配给制度,其特征是把劳动力大规模强迫动员到“劳动大军”中去,以及部队强行征收农民的产品和取缔正规的市场交易(而黑市则硕果仅存)。配合这些“行政措施”,还采取了经济的和超经济的恐怖手段。

虽然谷物经销、外贸、自然资源和副食供应早就被垄断了,但到1920年底也只有极少几个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而且大都是在那一年国有化运动最后一个高潮时期完成的。

尽管经济机制和经济刺激都遭到了破坏和废弃,但是整个制度仍然活跃了起来,这是由于在使用强制手段的同时,也提出要求表现政治热情和承担道德义务,要求培养无产阶级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体现为下列几个原则:工人与政治头目在食物定量分配上一律平等;规定了一项党的最高原则,即普通党员干部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切实取缔了国家对其雇员的货币支付,而职工的大部分收入以实物和义务供应付给。于是,连交通邮电费和一切租金等等都宣告免费了。1920年已经作好了完全废除现金交易的准备,并且制定了停止用货币征税和撤销中央银行的法令。

在这“红色”阵营中,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也由于党内和支持党的群众中盛行着平均主义情绪而不可否认地提高了士气所致。

这种平均主义情绪也多少受到了一点打击,这是因为实行了企业的一长制来代替工厂委员会制度,普遍存在着一种扩大行政权力的倾向,并且与此同时还削弱了各行业工会的地位。此外,莫斯科对各地方党的组织加强了控制,用指派代替了选举。

但是,这些偏向的产生也容易找到借口,那就是把这些办法说成是战争逼出来的,是遭到严重破坏的地方党组织要求莫斯科指派领导人而不再通过民主方式进行选举的。谁要是仍对某一种生硬的作法感到迷惑不解,还会有一副更强烈的镇静剂来治愈他,那就是

要他相信，不单是为了战时经济，还有更多的原因需要那样做。“战时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就在于：它恰恰是要用一种最合时宜的、虽然出人意料却又势在必行的、立即过渡到免费供应制的办法，来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安排就一条绝处逢生的出路。

不知道读过《国家与革命》的人该怎样来解释：一种建立在配给制上的、高度集中的官僚勒索制度竟然是“共产主义”。当然，可以用重要的、也可能是明显的心理上的紧迫感来作解释。此外，马克思的市场范畴概念也必须作为一个重要原因来加以考虑，因为它使得领导人错误地把战时的通货膨胀，看成是引起人们在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中不再使用货币和货币刺激的真正原因。苏联的作者们就在战时共产主义结束之后（其实列宁本人也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便认识到这些信念都是错误的。在1918至1920年被看作建设社会主义好办法一哄而起的配给制，正如列宁所说，终于导致了比任何富农分子、皮尔苏茨基<sup>①</sup>或其他敌人所能造成的更惨重的失败，因为它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sup>②</sup>。

内战结束不久，一位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者兼经济学家列·克里茨曼以坦率而热情的批评态度，分析了内战时期使用过的作法。在他看来，实行集中化和取消货币虽然导致社会主义的降临，但是在经济上却缺少另一种社会主义属性，即计划性<sup>③</sup>。资本主义以价

---

<sup>①</sup> 皮尔苏茨基于1918年被立为波兰国家元首后，立即使波兰卷入对苏武装干涉，1926年领导过联合干涉军向基辅的进军。——译者

<sup>②</sup>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4卷，第158-159页，并比较《论粮食自由贸易》（同上书，第39卷，第167页）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第3节（同上书，第39卷，第274页），其中把配给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精髓。这个词的意思是：分配和供应按定量授与，而食品定量则向农民索取。配给制在农民眼里成了内战时期共产主义政策最可恨的标志；难怪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党的圈子内还当作一个十足的贬义词，用来作为带强制性政策的代称。再注意“有配给制瘾”一语，意思就是“刻薄成性”，用来修饰同上政策。对“战时共产主义”的作法及其哲学理论作最精辟而简明的阐述，以及有关废除用现金征税和撤销国家银行的资料，见A.艾恒瓦尔德：《苏联经济》（莫斯科，1927年版）第216-219页。

<sup>③</sup> L.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莫斯科，1926年版），第114-121页。



格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而那个时期的无产阶级经济却要靠突击办法(突击运动)来调节，因此他把突击办法描述为：某一经济部门出现产品短缺，便促使领导上宣布该部门为突击对象，并把它提到优先地位<sup>①</sup>。在增产短缺货物的同时，又往往忽略了另一个经济部门。“因此，1920年的突击经济”当时看来是合理的，却促使“无产阶级经济生就的无政府状态具备了最完备的形式”<sup>②</sup>。所以，克里茨曼认为，非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经济即使已具备了集中化和不使用货币这两个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却由于缺少计划而有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可能。

研究三十年代苏联的学者一定会对“突击”和“非货币”办法导致无政府状态的情况非常相似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普遍情况（这将在下一章里讨论）感到惊异。

集中化和废除货币与实行计划经济，被全体布尔什维克作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带根本性原则全盘接受了下来。必须记住，这些概念与其说是从经验上的感知材料，不如说是从“辩证法”中得出来的，而且这个模式具有先天的特征，可以用来同资本主义经济作一番对比。资本主义通过价值规律的各种不同形式，由市场上各种自发势力的相互作用来调节经济，而社会主义经济却要取消货币、价格、工资、利润和其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手段。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计划都只是想到实物具有分配的功能，所以经济活动便可以不再考虑到诸如商品、价值、成本等市场范畴，而只须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如何用创造出来的产品予以满足。剥夺私有财产乃是消灭私有生产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而进行商品交换的私有生产者的消灭必将导致市场和“商品”范畴的消亡。从这样的推理，便得出了下面这样的概念(如果不是幻想的话)：国有化程度越高，市场就越狭小，社会主义就越临近，或者说社会主义成分就越大。在列宁和布哈林（后者在内战时所写的一些著作中表达了上述思想，因而受

---

① 关于突击运动，同上，第121页。

② 同上，第122页。

到列宁的赞扬)看来,只有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直接交换,才是“社会主义的”;用货币作为媒介物在买卖基础上进行的交换,就是“资本主义的”<sup>①</sup>。列宁在1918年曾考虑,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内,市场范畴和货币方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过渡时期的长短将取决于私有成分,特别是小私有者的农民能够继续存在多久;这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范畴只能从权宜之计考虑而加以容许,但最终还是注定要消失的。这个看法直到1952年还被斯大林保留在他的著作中。

然而,正当列宁猛然发现战时供应紧张已使所谓“资本主义的”结构开始分崩离析而形势不妙的时候,党的领导却陷入了美梦正在实现的幻想中。他们开始加速拆除这种结构,而代之以更直接的控制和个别管理的方法,简直象是急于执行一个偶然发现的理论似的。

现在看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这种看法正是普遍产生那种幻想的原因所在,而那种幻想之所以特别顽强地比那种经济还要保持得久,并且导致众多的苦难,其原因也在于此。至于以后各个发展阶段中的某些作法上的改变,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应当提醒的是,布哈林在其理论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中加以精辟论述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关系学说,乃是早已有之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加以透彻的阐述,后来又为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所接受<sup>②</sup>。但是,还有另一种概念可以用来解释“战时共产主义”幻想,即认为国家集权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而加以推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概念是以下述经济上的假设为前提而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即认为一旦市场消灭而代之以统一集中的计划,从而物力和作为“体力”意义上的人力都按计划集中分配和处理,那么只消采取行政措施便可以取代市场机制。可是,社会主义思想中既没有

---

①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兹仅举其中一例,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0卷,第304页,文中说道:“恢复商品经济,也就是恢复资本主义。”

② 详见W.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职能概论》(华沙,1964年版),第29-52页。

说到过也没有想到过：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就一定是国家机器强化的过程。相反，需要某些行政管理措施虽是不言自明的事，但作为强制机器而为享有最大经济权力的阶级效劳的国家，却是一定会很快减弱其权力的。

这些概念既没有搞明确，便大大助长了把正在强化的强制机器当作“共产主义”发展标志的自欺想法。正是列宁在革命前夕曾自豪地重申的这个如今正在僵化的说教，助长了那种把国有化夸大为阶级消亡的标志，而这个标志又反过来预告国家已开始消亡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见解。用这种见解表达的僵化的论点，虽是如此玄妙而又如此信口雌黄，倒可以作为一副镇静剂来麻痹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并为他们搭上一座认为可以过渡到理想中的自由世界的鹊桥。国内战争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样，甚至后来更多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应当记住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不久便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察觉到，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脱离群众，并与原来的意识形态相背离，可是他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却很少改变。后来虽然有人着手这方面的改正，可惜已为时太晚。在“社会主义化”领先的情况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从而把国家权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社会主义的发展既与国家权力的扩大等同起来，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便成了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于是任何自治的因素便被视为反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把二者混为一谈的看法终于成了迄今苏维埃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主要的公式，尽管先前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一部分错误见解后来得到了纠正，先前对待市场机制的态度后来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是，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模式时，如果认为内战期间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中的有些特征，终于在一个指导着社会和管理着经济的性质不同的制度中得到了加强；如果认为尽管给这个制度起的名称是“战时共产主义”，但这毕竟被当时的同代人认为是那么回事而正确地加以接受了，那么这样的看法都是并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个制度总的说来有如下几个特征：它首先是有一个完善的“统制经

济”，并通过范围扩大了配给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要由中央作出严格的决定与统一分配；其次是取消市场和货币刺激，而代之以强制手段与积极献身精神相结合；以及把“突击办法”或“重点处理”作为解决问题的指导原则；最后是形式上的动员，而实质上是强制与劝告相结合，配合以大规模恐怖手段的纯粹镇压。

把这样的方法运用于经济中，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全面的“行政管理制”，而把一些非经济的方面也置于靠发布详细命令和指示行事的官僚主义集中制下；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看，那就是国家机器取得了对社会和个人权利的绝对优势。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下，从苏联的一贯表现看来，这样一个军事化的国家和官僚化的经济，很有可能糊里糊涂地被奉为“共产主义”，而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偶像；同时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概念也使这样的误解成为可能，并完全被人信以为真。

虽然内战时期创立的这个模式的一些主要特征已在战争灾难中丧失殆尽，人们却很容易把酿成危机的原因仅仅归咎于战争的可怕现实，而并不归咎于制度的性质。直到局势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而不得不加以承认的时候，还有可能糊里糊涂地把这个制度的性质看成是足以带来被认定的历史范围内的一次空前胜利的因素。

## 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意想不到的否定和一百八十度的转弯<sup>①</sup>。在采纳这个政策时，自然是没有想到要来这样一个全面的大转变的。最初的一些步骤，比如停止征收农民的粮食和代之以正规的实物税，只是为了避免与农民彻底闹翻而防止过早的农民起义。可是，这最初几着棋却牵动了全局，以致引来了使布尔什维克们和全世界都大为震惊的全面大改观。

<sup>①</sup> 参看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和他的《各自为政时期》（伦敦，1945年版），第4-5页。

“战时共产主义”反对市场的作法和理论，对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步伐仍然起着强大的影响。开初列宁认为，农民只是不满意征收，而对国家工业与农民之间不通过商业、市场和中介人而直接进行有组织的、预定的物物交换一定是感到满意的<sup>①</sup>。列宁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暂时安抚农民，从而保住他所认定的那些社会主义的作法。直接交换失败以后，列宁才退而依靠市场、货币和资本家。实行实物税后才仅仅六个月，列宁便宣称苏维埃政权不仅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停用三年之后重新启用的词）的立场上，而且还退到了“由国家调节商业”的做法上<sup>②</sup>，这里他指的是私人商业，即前一制度中最讨人厌的东西。

列宁很快意识到，开头的这些措施正在把国家制度迅速引向势必实行整个体制改革的道路。要把这个大转变向迷惑不解的党员们解释清楚，是很不容易的。甚至上层领导人也弄得晕头转向了，而在努力寻求理论上的合理性来分析形势和预测后果。列宁曾试图提供这样的理论。他公然不讳地宣称，新经济政策是一次“有秩序”的退却，是从先前一贯享有充分思想威信的阵地，退到“在前进中准备的阵地”。列宁在这里使用的不再是军事上的隐喻，而是企图用来证明这种大转变是必要的，它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象他们现在那样感到难于接受的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重新回到先前据守过的阵地罢了。他使用了他在战前提出过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证明由布尔什维克政府出面与资本主义势力合作并转而采取资本主义的作法，并不是什么背叛，而是有理论根据的好策略。

寻求这种理论根据决不是出于说服群众的权宜之计，而是出于真心实意的强烈愿望，以便用来研究实际情况，并找出新的理论观点供制定政策之用。不幸的是，这个遭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否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却一再证明了是不中用的。列

---

<sup>①</sup> 关于列宁最初打算取消市场而宁肯采取“一种社会主义的换货”，以及后来承认有更往后退的必要，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4卷，第206页。

<sup>②</sup> 同上，第229和215页。

宁想要同“进步的”大资本家合作，希望他们能帮助他战胜“主要敌人”即小资产阶级。但他终于不得不重新改变他的全部策略，而对恰恰是原计划中的“主要敌人”作出了让步，并与他们结成了联盟<sup>①</sup>。国外和国内的大资本家并不急于认真参加列宁的计划，对投资于“租让企业”或与苏维埃政府搞合营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相反地，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主、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却涌现了出来，力图或者在国家的扶持下或者独立自主地做私人生意。而农村，特别是农民，为了使瘫痪的经济重新活跃起来，正需要这样做。

列宁要对党解释清楚全面的策略是有困难的，甚至对自己也很难解释清楚，为此他陷入了极度的苦恼<sup>②</sup>。有人问他，既然承认退却，那么“要退多久？”他的答复是自相矛盾的。1921年10月，他曾希望“退却会很快停业”而重新转入“进攻”；1922年3月，事实上他宣称已“退够了”。接着，他转弯抹角地解释“退够了”的含义和理由以及新阶段的特点，他说：现在是“重新聚集力量”的时候。他还在同一次讲话中争辩说，除了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别无他途可循。但在1922年11月，他却坦白承认：“为了再度重新聚集力量，我们正在进一步退却”，但又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如何重新聚集力量。”在同一次讲话中，他宣布新经济政策必将继续一个长时期，但又对他的听众保证说：“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先前的任何一个口号。”他终于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长存”的口号，而代之以“长存，但并不是永存”的说法。

---

<sup>①</sup> 最初，“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仅仅指同资本家，主要是国外的大资本家进行合作，这是1921-1922年的想法。由于这一希望未能实现，列宁便开始用这个词来包括与国内小资本和小手工业者的合作。后来不知怎么，这个词竟指对小私有成分，特别是农民，实行让步的实际作法。从这个现象看来，这个概念已失去了它的本意，而列宁事实上也在他那篇《论合作制》的文章中放弃了这个概念。见《列宁全集》（莫斯科，1964年俄文版），第45卷，第73-75页。

<sup>②</sup> 关于列宁在解释“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上的犹豫情况，见卡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73-279页，但卡尔并未特别提到对待“市场范畴”的态度问题，而后者是当时隐伏在这个难题后面的一个可能的因素。

在概念几经混乱(“我们进攻”,“我们退却”……)的犹豫中,出现了另外一些思绪,终于开始了更加明确而严肃的重新考虑。当时一个正伤脑筋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新经济政策既然仅仅是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暂时退却,那就有必要重新坚持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仍是党长期奋斗的目标,其所以执行得不好的原因应归咎于形势不好或起步过早。可是另一方面,战前的路线既无不当,那么“战时共产主义”又当何论呢?列宁说,那是执行上的错误。但是,既然说“战时共产主义”不是一次前进运动,那么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退却”,其意义何在呢,这一点列宁并未解释清楚。

布尔什维克们想找出答案,也想为新经济政策找到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重新评价。正如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列宁本人的解释是把“战时共产主义”说成十足的错误,而当时曾误认为战时的物资奇缺是导致社会主义的捷径。他赞成有一个一代人或者更长的过渡时期的想法;他越来越相信,新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可靠方法,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的国家,只要这些国家仍然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存在。<sup>①</sup>他终于认为,新经济政策能够“在很多年内逐渐过渡到大规模社会化的经济”<sup>②</sup>。

这种使理论适应新的实际的过程是可以理解的。列宁既集中其政府的主要精力来执行新经济政策,很自然地,在出现最初的成功迹象时,他便看出同农民合作的意义决不下于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必要性。这时,商业成了他的主要奋斗目标,他开始嘲笑与他共事的那些内战中的英雄们不能很快学会做生意的本领,不懂得市场机制。“学会做生意”成了最高使命和主要的杠杆,只要把它掌握在政府和国有工业手里,就能促使农村,特别是小农民,进入当时大吹大擂的、作为列宁主义战略本身或至少是其一部分目标的“逐渐转变”。

新经济政策中的这种改弦更张,如果没有对市场机制的强烈兴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3卷,第340页和第44卷,第6页。

<sup>②</sup> 同上,第44卷,第6页。

趣，是不可能进行到底的。的确，采纳市场关系和重新容许另售商与承包商是向农民妥协的结果。党内人士都认识到，这种妥协是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关于这些让步是否有越陷越深的危险，以及其规模和前景如何，当时的意见分歧就很大。有些争论会导致列宁死后党的分裂，这已是众所周知并在许多文献中提到了的<sup>①</sup>。意见冲突的各学派都试图分析新经济政策的性质，以及这个政策与社会主义建设前途的关系。在新经济政策是否能为国家工业化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和是否能适应其需要的问题上，争论最为激烈，特别带有戏剧性。

然而，就在这些大论战爆发以前，列宁趁其尚在人世时便对自己的想法作了结论说，他很久以来就对新经济政策和市场有所偏爱。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以后继续坚持这一思想路线。左派虽然并不否认他们相信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性质，但是他们，特别是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明确的阐述中，却坚决不肯接受把他们说成是以暴力消灭为宗旨的取消派的谴责。当时，斯大林作了各种不同的赞成新经济政策的声明，但到后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却用他的五年计划来取代了它。

在这一阶段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许多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新经济政策的某些特征和机制有着更长远的价值，而决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让步。事实本身便证明了，国家的行动和市场势力这两个要素在新经济政策中成功地共存了下来，而在较正统的观点看来，这二者简直是不可调和的。内战的现实似乎是支持了这一种观点，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国家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了）是不可能共存的。当新经济政策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对形势的看法依然墨守着列宁一度说过

---

<sup>①</sup> 争论的情况，见诺夫：《苏联经济史》中《大论战》一章，以及卡尔的多卷著作，特别是《在一国实现的社会主义》。另一位经济学家的权威著作是A. 厄利奇的《苏联工业化之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0年版）。



的“谁战胜谁”的观点。但是，列宁本人倒是很快就改变了他那个关于“战胜谁”，换言之即“敌人是谁”的看法。在他逝世前不久突然放弃<sup>①</sup>的原先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中，大资本家是可以指望的盟友，而小占有者，即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化身，才是主要的敌人。新经济政策使他全然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托洛茨基在其1925年8月所写的一本小册子中，也对新经济政策的长远前景抱有积极的期望，认定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与竞争”<sup>②</sup>。从狭义的经济政策来说，这意味着“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而从社会意义来说，则是国有成分与私有成分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可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中，却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了。基于同样的认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给新经济政策下定义时，完全无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而根本不提这个字眼，并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一种“混合”型的社会主义经济<sup>③</sup>。可是他也象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混合”的成分在互相竞争，而其中之一必然最终消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这一定义出发，进一步推导出关于当时苏联经济体制及其动力的结论。他认为，有两个“调节因素”或“规律”在经济中起作用，并决定其主要倾向。在私有成分中，“价值规律”是调节因素，这跟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这个规律的某些形式仍然影响着国有成分或社会主义成分，但在这里它们都只是次要的因素。国有成分则有其自己的调节因素，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而这两个在其本身范围内各有实效的调节因素又同时互相竞争，从而反映出国有成分与私有成分之间的始终不可调和性。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两个调节因素”的看法的确是颇有见识

---

① 在他的《论合作制》一文中。

② 列·托洛茨基：《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莫斯科，1925年版），第6页。

③ 他提交社会主义研究院的学术报告，载《社会主义研究院通报》，1923年10-11月号，第304页。

的。甚至在西方，今天正在显示其能量的各种市场势力所造成的局面，已迫使一些政府插手“纠正”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指导国家行动的要素如今显然不同于市场势力所固有的要素；这当然会使两个不同的调节因素出现，甚至发生冲突。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市场机制也同样坚持传统的错误看法，认为它们不仅是私有成分所固有的，而且是“从外部”强加给国有成分的。因此他断定，只要社会主义积累增长了，私有成分被消除了，“价值规律”及其市场机制便肯定会消失。

布哈林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两个调节因素”没有认真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显得有些尴尬，因为他也亲口谈到国有和私有这两种显然不同的成分，却未能否定这两种成分的内在要素是有所不同的。而他所担心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表述这两个调节因素时，把它们之间的对抗性强调得太重了。从政治上来说，这种说法会妨碍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且与布哈林本人的信念相抵触，因为他是相信国家与农民的结盟有其可靠的基础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强调不应把国家计划和农民市场看成是两个互相排斥的东西，甚至从长远看来，也应视为“互有关联”和互为补充的两个要素。社会主义必将建立“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并且社会主义的根基本身就是依傍在这种关系上的，而这后一个断言看来就更为奇特了。

使所有参加这次党内论战的人感到为难的是，把“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混为一谈，从而反过来同“私有成分”，特别是同农民等同起来了。但是尽管如此，布哈林并不加以直接更正，而为了澄清整个思想混乱，他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答案，那就是他自己的“劳动消耗规律”（或“按比例消耗劳动的规律”）<sup>①</sup>。

简而言之，他在大量引证马克思原话的基础上坚持认为，在“价值规律”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对任何社会都有效的“物质内容”，即必须

---

<sup>①</sup> 关于布哈林的这个“规律”，见他所著的《关于过渡时期规律性的问题》，载于《真理报》1926年7月21、23和26日。关于“两个调节因素”的详论，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莫斯科，1926年版），第36-39、118-124、231页。

在不同的经济领域和经济部门之间按比例地分配现有的劳动力。这样的比例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通过不同的机制来保证的，而“价值规律”便是这种机制之一。只要社会主义发展下去，“价值规律”就势必隐化为基本的、潜在的规律，而成为通过计划有意识地调节经济的基础。因此，在过渡时期不会有互不相容的要素发生冲突的情况，而只有同一个基本规律的不同机制之间的互为关联。由此看来，新经济政策将展现决不止两个而是更多的这种机制：“价值规律”将在简单的商品领域（农民）内起作用；“生产价格”则是适用于私人承包商的机制；而“劳动生产率”则是国有成分中的主导要素。但是，在这些机制后面起作用的却只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规律（而且它已在国有成分中起着作用，既要达到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又取得最佳的经济成果），这就为我们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必须这样研究和看待的体系来加以考察而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要对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两人的观点的正确性作出理论上的评价是困难的，但他们两人都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以期发现和制定出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为苏联经济的理论基础和计划制定者的指南。

不管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是怎么回事，在各种实践中它是既包括了计划也包括了市场的，尽管这二者之间有些关系紧张和互相冲突，但这可以用本来就存在原则上的对立或由于彼此不甚协调而造成的暂时困难来加以解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计划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开始就很自然地受到全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影响，这毕竟是事实，因此出现了“计划与市场”这个概念。首先，正如 A. 诺夫所断言的那样，它“不是一种统制经济”<sup>①</sup>。计划在当时只是一种指南或预测，而不是命令，虽然在二十年代末它逐渐朝着命令方式转变了。那时候国家并没有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那样，用如此高度集

---

<sup>①</sup> 诺夫：《苏联经济史》，第 100 页。

中的机构来管理经济。各工厂，或者不如说各种所谓托拉斯或辛迪加之类的中介性的行政管理单位，曾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在消费品方面较多一些，而重工业方面较少或根本没有）。同时，在操纵市场方面与私有成分和其他国营企业竞争而做到有利可图，成了国有化部门积极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准则。

托洛茨基一开始就对新经济政策衷心拥护<sup>①</sup>，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这对国有工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他于1922年写成的、后来受到列宁热情赞扬的光辉小册子中可以看出，他在当时的早期阶段就已认为，新经济政策为工业方面提供的环境，比它冠冕堂皇地为农民讲话的立场要实惠得多。显然，那样的环境确实有某些可取之处，称得上是有助于国有工业重振旗鼓的一种策略。托洛茨基解释说：“为了使每一个企业成为统一的社会主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有计划地发挥其作用，就必须允许它们有一个在市场条件下从事活动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将持续许多年。在这许多年中，每一个企业或一类企业必须适当地适应市场，并接受市场对它的控制”。他认为，“由市场加以控制”乃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因此，新经济政策的那套办法也是工业所需要的。国家行政部门对工业自上而下的监督，应该由市场管理“自下而上”地完成。“从政治上来说，它〔指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对农民让步，但它的意义决不下于它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发展国有工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sup>②</sup>

① 托洛茨基之所以能够衷心拥护新经济政策，是因为他必须照顾到自己先前的立场。事实上他是早在1920年2月就第一个主张实行类似新经济政策这样的改革的，但他的建议当时遭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拒绝。于是托洛茨基又转过来提出工会国家化的主张，可是这个主张也遭到列宁的反对，因为列宁已打算在近期内着手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来在这件事情上，这两位领导人终于意见一致了）。关于托洛茨基对农民采取新经济政策的建议，见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80页，及托洛茨基：《新方针》（莫斯科，1924年版），第57-58页。

② 托洛茨基：《苏维埃政权的新经济政策》（莫斯科，1922年版）。列宁对这本小册子的赞许，见《致列·达·托洛茨基》，载于《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4卷，第314页。

托洛茨基曾赞同另外一些布尔什维克的预测，即认为不使用货币的计划经济一定会有所发展，但是在这里却可以看出，他可能认为市场经济及其方法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内，对社会主义工业来说仍是“健康的”和“必不可少的”。托洛茨基也强调过，经济刺激对于农民和充分国有化了的国有成分来说，乃是管理经济的必要杠杆。市场机制可以很好地为这一目的服务。适当的刺激是极为重要的，而市场刺激对农民和对工厂都确实是有效的鼓励。托洛茨基还看到了允许工厂全体工人和他们的管理人员享有充分的自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调动工作上的积极性的有力刺激<sup>①</sup>。这一点也有许多作者和领导人清楚认识到了。内战时期那些生硬的官僚主义作法，包括对企业、团体和行政管理部门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的压制所招致的消极后果，已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和广泛的讨论。对国有工业的官僚主义管理办法，被贬义地称为“总管理局制度”而废除了，这件事被认为是新经济政策转变中的一个主要功绩。因此一般来说，已经承认了以行政强制手段为主的官僚主义地管理国有经济的方法是危害极大的，而新经济政策能够引以自豪之处，正是在于它取消了这种模式。

集中体现在新经济政策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合作制”。这是列宁在世时所作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近情理的一次理论上的修正。后来，它被党的宣传大大地歪曲了，但是宣传员们强调它是“列宁的合作计划”，这倒是强调对了的，而后来之所以歪曲了它的本来意思，确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其实，这个计划是不曾有过的，只是有一篇题为《论合作制》的文章<sup>②</sup>罢了，那是列宁留下的最后五篇著作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修正了他先前认为农民合作社是资产阶级制度的看法。他坚决认

---

<sup>①</sup> 托洛茨基：同上书，第119页。他在其《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莫斯科，1925年版）一书中第5页，又重申了这个论点，但是他在这里只注意到农民，并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的危险。

<sup>②</sup>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5卷，第73-75页。

为在苏联情况下，必须把这种专为农民着想的自愿合作的运动，看成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佳道路，是实质上的社会主义因素。这条道路必定很长。一开始它需要有起码识字的“文化革命”作为其先决条件，但这必将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这个新的看法对列宁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他当时也象他往常每每遇到举棋不定时那样，终于觉得对革命即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必须重新加以规定。他终于宣称，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无非就是“文明的合作者的制度”而已。

这个定义严格和精确到什么程度呢？社会主义毕竟还很遥远，但列宁总是感到，他可以用这个说法来作为动员全体公民承担某些紧迫任务的号召。当他认为电气化是目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时候，他岂不是还一直在同样利用向农民揭示合作化的过程么？（必须指出，列宁最初使用合作化一词，是指把农民组织起来销售他们的产品，事实上根本没有提到公共生产。）难道这些就是迂回战术，就是策略和原则么？

要作出回答是不容易的，但事实却始终是：新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方针启发了列宁提出这样一些信念，即可以允许有一种可能从绝对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中分离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想法，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本身迟早仍会盛行，并在苏联社会主义观点的核心中保留下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非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受到了新经济政策“模式”的一些特征的鼓励，这些特征是：一个纳入统一计划的成分与个别合作的和私有的成分能够共存，即出现了一种带有**市场范畴**的“混合经济”，它是把市场范畴看成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手段而保留下来的；在国有部分之间实行了重大的权力分散，而经济计划已不再带有强制性；社会的各种因素及其利益能相当自由地互相促进，而党与各个不同集团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也实现了合作，因而不再有意识形态上的严格束缚了；文化和有关政治的方面出现了多元主义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仍可以论战，而反对派在党内仍有立足之地；撤销了恐怖机

构，废除了曾经作为正规手段的大规模镇压办法，建立了一套稳定的、有“适当的诉讼程序”的法律制度；对正在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的改组持进化论的观点，从而在文化和社会的多元主义背景下对书报检查制度加以适当的限制。

可以简单扼要地说，新经济政策模式是一种“宽大的专政”。它的某些任务被看成是临时性的，而其余的任务则象我们所指出过的那样，在党的一定范围内较之为了安抚农民的权宜之计而指定的任务，已开始带有更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大约八年的时间内，一个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上采取了新方式（或者不如说新类型）的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并发挥其职能了，而这个制度在经过了不同教义的几度修正（对合作制重新评价，对社会主义重新下定义，对市场机制重新考虑，对农民的阶级特性重新估计）以后，已开始发展为一个相当完善的原理。这就是布哈林曾经力图保存的制度，而他也因此成了这个制度在党内的代言人。

## 第五章

# 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 斯大林的模式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运动的开始急剧地推翻了新经济政策的模式。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期间，进行了一场明确的“反资本家”的运动，以消灭个体农民的农业，毁灭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及废除私营的商业、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同这些似乎得到旧理论认可的私有部门一起，市场及其各个范畴被认为是必须予以废除，或者只保留作为形式上的、垂死的、临时的辅助手段。凡是被认为妨碍“直接”合理计划的非货币经济从而妨碍最纯粹的社会主义到来的东西，一概不能保留。

因此，计划经济应该完全代替“市场与计划经济”和混合经济。经济的高度国有化结束了公有成分和私有成分并存的局面。空前严重的僵化根除了文化方面的多元化。官僚主义统治及其无所不在的种种控制取消了社会的自治并凌驾于整个社会。最后，执政党在新经济政策期间虽仍起作用，但其作用日益减少，它作为一个能进行争论并有反对派的政治组织，现在已经丧失其政治权利并被改造成为象军队一样受等级森严的结构支配、与先前大不一样的团体，而且受到警察的控制和血腥的清洗。新经济政策时期制订了一套完备的法律，并曾认真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法制”，而在五年计划时期，这一套法制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并被一套无法无天的粗暴强制和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所代替。社会和党本身被迫接受了这种使用残酷无情压力的新方针。这种趋势终于发展成为一种政治专制——现代史



上最暴虐、最反复无常的专制之一——和国有的“统制经济”。最后，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频繁的狂热、肆无忌惮的心血来潮的发作之后，创立了新的统治方式，并发展了其办事程式。在这一过程中，新经济政策的任何痕迹似乎无可挽救地被埋葬了，与内战时期十分相似的状况明白无误地重新出现了；一长制和配给制度、非货币经济和全面配给以及其他“战时共产主义”的特征又恢复了，虽然这一点不宜过多强调。可以预言，出现了一些与先前不同的新特点。在开头特别剧烈的时期之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间，取消了普通商品的配给制，但生产资料仍然保留配给制；更早一些时候还重新开放了集体农庄市场，但是其他形式的私营商业却永远被取缔了。

应当提一下内战时期与这个时期的其他不同之点。在内战时期，拥护政权的力量是非常平均主义的，而在新的阶段，政权很快就变成了反对平均主义的，而且产生了享有很大特权的新上等人。在前一时期，最上层和第二层领导在政治体制中保有足够的独立性，使他们既能参与制订政策又有发挥主动性的余地。而在后一时期，统治变成了独裁统治，带有强烈的准宗教和民族主义的色彩。在内战期间，党员虽然一致并受纪律约束，但仍接近领导并有权持异议、申诉和施加影响；然而在五年计划时期，这种权利却丧失了。

其次，与内战时期不同，斯大林的俄国狂热地发展工业。这种发展工业的劲头包括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教育居民，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执意破坏很多的文化和科学。自然科学受到了严重破坏，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被封住嘴巴而窒息了。人民、党和领导都无权进行分析和自我分析。在狂热的活动中，所有人都盲目行动，不知自己在朝向何方，也不了解在自己的社会中正在出现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结构。

在这些条件下，特别是在形成俄国经济体系的最初几个计划期间，伴随工业发展的却是理论方面的发展惊人地不足。从先前一个

时期关于工业化和制订计划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挑选出来的一些思想多少影响了政策制订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可能启发了斯大林；最后，一些选择了极端的目的论思想\*的计划制订者和经济学家的想法可能也启发了他，而且象斯特鲁米林曾一度这样宣称：在苏联经济中也许根本不存在客观规律，而且恩格斯曾预言的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情况已经出现。斯特鲁米林坚持认为，计划本身就是规律，但计划的制订过去是而且将永远是一种艺术，它创造自己的准则，除了技术与自然的准则和规律外，不大顺从外部的约束<sup>①</sup>。同时，另一位经济学家斯·图列茨基热烈地把新兴的社会主义工业的景象描绘为采取“各个连续生产阶段大规模联合”的形式，在这一形式中，资本货物的价格只不过是具有纯粹传统含义的核算单位而已。年青而热情的计划制订者N.沃兹涅先斯基抨击了那些要把计划同自发势力结合的“机会主义者”。他坚持认为，市场无政府状态“及其调节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运动的价值规律”不久将被击败。<sup>②</sup>

图列茨基和斯特鲁米林都是著名经济学家，今天他们继续重新评价他们在1929年时的思想；但在当时他们明确赞成让政治领导集团拥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完全自由，而无须有任何引导或约束。事实正是这样的。经济学受到窒息，计划人员也如此。政治领导集团完全控制了经济过程，而且把严厉的批评、“调节手段”、“平衡国民经济”这一复杂工作、经济发展的数学模式、关于投资分配和效率的研究、积累和消费的模式、对经营管理的研讨、对科学地组织劳动力的研究以及其他许多努力都撇在一边，这些工作在三

---

\* 目的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认为任何事物均为其自身的目的或某种外在的目的所支配和决定——译注。

① 斯·斯特鲁米林：《苏联的计划问题》（莫斯科，1932年版），第14-16页，引自W.布鲁斯著《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一般问题》一书（华沙，1964年版），第142页。

② 斯·图列茨基：《计划经济》，1929年第10期，引自W.布鲁斯著《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一般问题》一书（华沙，1964年版），第142页。另外，请参见《真理报》1931年10月8日所载N.沃兹涅先斯基文章。

十年代期间就中断了，而且至少一直被抛弃到五十年代中期。但这些研究工作正是计划工作的手段，正如当代一位苏联作家说的，其中“平衡国民经济”是“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率和比例的最重要手段”，抛开国民经济的平衡，到头来只能得到“实际活动的消极结果”。<sup>①</sup>

学者们，包括一些苏联学者，把三十年代疯狂的工业化称为瞎忙。这在俄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据一位著名历史家记载，另一位鲁莽的工业化专家彼得大帝在两百年以前也是这么干的，他所遵循的箴言是：“先冲—再想”<sup>②</sup>，这个箴言也可以作为“大运动”开始阶段的座右铭。鉴于计划制订者和经济学家在整个过程中只起从属的作用，而政治领导者起着支配的作用，个人特点和癖好在苏联形成的决定性岁月中深深地影响了苏联的制度。例如，拒绝专家的劝告，以“纯粹求实的精神”制定各种体制、机构以及决定资源的分配和人的命运，这些情况表明了斯大林个人的偏好。

虽然不应过分强调个人对历史现象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如下事实，在权力结构的金字塔中，处在顶端的那些人或那个人是超乎单独的个人的；他是一个体制，一个权威的体制。虽然他是一个对他具有约束力的更大体系的一部分，但只要他的势力很强大，他的行动就能够对国家的历史产生持久的影响。斯大林就是这种人；他的权力极大，而工业化进程又扩大了这种权力。

关于计划理论，斯大林没有说过多少话，他最后的一些著作，除了依靠继续采取已经使用过的方法之外，并没有揭示任何有关建立和经营复杂工业社会的完整思想。整个过程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即兴之作，以压、推的规则为指导，甚至往往以暴虐的狂想为指导。然而，可以看一看那些指导他的决策、特别是指导他如何确定和完成目标的决策的几个简单而重要的实际规则。1921年在写给列宁的

---

① 阿·叶菲莫夫：《苏联的经济计划》（莫斯科，1967年版），第132页，第213-214页和阿·叶菲莫夫：《苏联的工业》（莫斯科，1967年版），第242-243页。

② 《V.克留切夫斯基文集》第4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166-167页。

一封信中，斯大林表明了他在处理计划工作方面颇为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后来的年月里仍然明确地指导着他。当时列宁为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调配了一些专家。斯大林对这些缺乏必不可少的“健康的求实精神”的“教授们”表示了一种典型的不信任，要求列宁给国家计划委员会指派“愿意按照‘报告完成任务’的原则办事的搞生动政治的人。”<sup>①</sup>

斯大林使用的是内战司令员的语言，他显然把在战斗中部署人员的一套办法误作为制订无比复杂得多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思想 and 活动。然而内战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二十年代后期开展的工业化运动使他和他的小集团对“报告完成任务”作风的信赖得以发作起来。当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几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把苏联和东方集团的经济制度评价为“一种战争经济”时，他只不过是记载了被正式称为“一次攻势”的最终成果而已。

当经济政策的核心是速度的时候，这种作风和做法无疑是不可避免的。“速度决定一切！”斯大林用这个引人注目的口号去动员人们的精力和想象力。但领导集团采取恐怖行动以确保人们不去研究这些速度问题，而且除了必须向前冲之外，不要从任何别的原则得出这些速度。一旦提出“多少，以及为什么这么多？”这种至关紧要的问题，就被当作叛国论处。提出类似的关于积累率问题也得到同样的后果，积累率则以牺牲消费为代价迅速增长而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这种作法是苏联工业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原始积累”的论点被狂热地、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正如我们所知，这个论点的原作者曾经谨慎地提出许多定语、限制和条件。这表明他懂得“多少？”的问题。他试图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集团的回答是极其粗暴的。这就是，分析和提出问题等于叛国。斯大林懂得计划是一套暂时的目标，不论多高都必须超过。1932年2月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斯大林本能地插话说：

---

<sup>①</sup> 引自Ju. 弗拉克斯曼：《G. M. 克列兹扎诺夫斯基》（莫斯科，1964年版），第172页。

“在我们看来，五年计划是最低限度的计划。我们要有附加的年度控制数字，这些控制数字将逐年扩大五年计划。此外，我们还要有‘第二套计划’，它将使五年计划进一步扩大。”<sup>①</sup>

因此，按照 E. 扎尔斯基的看法，斯大林的计划的核心是尽量多建工厂。这种作法甚至同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里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那些最忠诚的“目的论者”所采取的作法相矛盾。他们为计划的某些内在的统一性操心，而且还看出这些相互关联的指标在提高，但这些指标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然而，经济增长的理论受到了抵制。“斯大林公开嘲笑增长的理论，他把这个理论正式谴责为‘资产阶级的异端’。”<sup>②</sup> 加里宁在 1929 年一次未公开报道的讲话中最好地说明了这项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原理。虽然他讲的是有关建立国营农场的事，但这个原则显然适用于整个投资政策。他向听众问道：“究竟把 5 亿资金投入新的国营农场还是用来加强旧国营农场更合理呢？”他争辩说，资本主义的办法将选择后者，“从苏维埃国家的观点看来，把资金投入新国营农场更为有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解放了新的生产力。”<sup>③</sup>

“解放”生产力就这样变成了准则，而且把它看作是一种把资金最大限度地投入巨型企业的规定，而无须注意协调、互相关系、比例和长远的考虑，但是现在这些都被看成是企图削弱健康的“解放生产力”的叛国措施。

“解放生产力”过程的突出特征包括抢速度、偏重数量和“优先方法”。抢速度是经济政策制订工作的一个奇怪的长期特征，它深刻地影响整个过程和正在产生的制度。计划所要求的“紧张”是拚命干

---

①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 1932年版), 第233页。“第二套计划”被认为是来自那些同意比计划规定的指标还要多干一些的工厂。但这种“来自下面”的计划是党搞的运动。

② E. 扎尔斯基:《关于苏联经济的增长和起伏的计划, 1918-1932年》, 第一卷(巴黎, 1962年版), 第68、70页。

③ E. 图尔查尼诺娃:《斯塔夫罗波尔农业经济全面集体化的准备和进行》(杜尚别, 1963年版), 第101页, 引自档案。

的可以预计的后果。数量变成了非有不可的东西，不仅适用于物质生产而且适用于一些“不可数的”珍贵领域，如文学、艺术和教育。定额必须完成，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超额完成。

“优先方法”的意思是，把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通常是冶金、机器制造和燃料)，给它们规定高数量指标，然后在资源和资金的分配方面给它们以照顾，从而相对地忽视了其他经济部门。<sup>①</sup>

在规定指标方面的“优先方法”也产生了“突击方法”。作为摆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混乱，这些方法无疑是有用的。除了拟订必须优先对待的“突击点”的清单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克服这种混乱和拯救关键的部门了。这同“战时共产主义”的“突击方法”相似。“战时共产主义”的“突击方法”就以新的形式，变成了实行经济政策的措施之一。领导集团认为，常识和规定一组简单的优先目标的作法(如目标选择得正确的话)会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但在加里宁看来，这是失败的，因为一种为了帮助受优待的工程项目而忽视了太多“非优先”部门的发展战略，在许多方面束缚了经济发展，不仅对经济而且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另外一些不可估量的影响。

异乎寻常的是，在这个“计划经济”中，计划思想本身被牺牲了。把力量集中在少数优先的目标上、拒绝采取更先进的方法来选择这些目标、不愿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坚持超额完成指标，这些作法扰乱了计划制订者，迫使他们及其下级向经常存在的压力让步，延迟提交计划的时间，政治局用电话通知的对目标所作的任意改动也使他们惊讶不迭。对于政治局所作的这些更动，他

---

<sup>①</sup> 参看阿·诺特金编：《苏联国民经济的结构》(莫斯科，1967年版)，第55页和伊·马雷舍夫著：《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计划》(莫斯科，1966年版)，第26-27页(马雷舍夫在书中嘲笑了“优先方法”的整套思想)。还有扎尔斯基所著：《关于经济增长的计划》一书第158-169页中论述恢复内战时期的政策和“优先方法”是“紧张”和“抢速度”的补充。

们要么默认，要么只要试图有丝毫的异议，就得冒坐牢的风险。<sup>①</sup>

行政的方法和惯例显然已经开始扎根并且积累了经验，但制订计划的主要工作并没有比发展短期的、难以适应目标和需要的技术超出多少。强加给计划制订者的目标往往都不可能达到。整个过程以猛冲和跃进开始，经常因资源不足和缺乏储备而遭殃；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计划制订者和经理来说，唯一的蓝图是短期指标。制订计划所依据的主要想法——长期前景却被忽视了至少一代人的时间。<sup>②</sup>

然而，逐渐形成了一些方法来帮助管理（如果不是实际上帮助计划的话）正在发展的工厂，对于了解这个模式来说，这些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把决定权集中在行政机构的最高一级，喜欢搞“实物计划”，即用吨和公尺来衡量而不是用价值来衡量以及官僚主义问题的出现而且在扩大，这些因素都相互关联并且都在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这个制度。紧紧纠缠在微观经济之中（在按照实物核算单位制订优先目标的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排除作为重要准则的价格和成本核算的作法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于“使计划具有等级性质并使经济机构的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从属性质”也起了作用。<sup>③</sup>

---

① 斯特鲁米林（当时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之一）早在1929年就讲过那样的事。他说，他那里的计划制订者宁可“主张”较高的速度，而不愿为了较低的速度而“坐”牢。见《计划经济》（1929年）第1期，第109页。在以后的年代里，坐牢意味着最终被处死。

② 关于苏联计划是比较短期的做法，见G. 格罗斯曼：《共产主义经济理论札记》，载于波恩斯坦编：《比较经济制度》，第142页。为了更广泛的研究，可看N. 贾斯尼：《苏联的工业化》（芝加哥，1961年版）；S. 威尔利兹：《苏联集团的经济》（纽约，1966年版）；扎列斯基：《发展的计划化》。

③ 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一般问题》，第120-121页。第三章有关于管理模式的很有启发性的纲要。关于这种模式的详细描述，见R. 戴维斯：《苏联制订成熟经济的计划》，载《计划经济》第5卷，第1-2期（奥斯陆，1965年）和第6卷，第1-2期（1966年）；A. 艾尔利希：《发展战略和计划：苏联的试验》，载于《国民经济计划》（纽约，1967年版）。马雷舍夫：《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苏联的一本好材料。

上述因素也使计划具有强制性质。计划变成了国家的法律和命令，必须予以执行。然而，每项命令都有很多细目指标，这些指标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它们不起指导作用，反而起搅乱作用。靠“优先指标”制订计划的结果，使“实物单位”或“隐蔽的实物单位”<sup>①</sup>等核算和计算方法流行开来。在这个新产生的模式中，方便是一种不亚于思想信念的因素。由于“按实物制定计划”方便而且必要，便促使人们采取了“物资平衡”的办法，这对于衡量供求方面的内在统一性来说，是一种必不可少但极其笨拙的方法。<sup>②</sup>从这里还产生了苏联的经济计划和管理中另外一个强有力的作法：由行政方面把产品（主要是资本货物）分配给生产单位，即“生产资料配给制”。

物资集中分配制度变成了“非警察或非党的机构……的中央权威当局所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sup>③</sup>仅就向生产者供应这一活动来说，上述评价是正确的。尽管警察和党都没有亲自办理供应业务，而为了抵消在实行供应方面不断出现的问题，倒很需要它们这样作。

物资技术供应制度在苏联的资本货物领域里代替了市场机制，这种制度最终会比计划本身更为强大。这个制度是苏联经济实践的独创，今天还很流行，它造成了整个模式的许多特点。它通过控制物资供应有力地统治了工厂，使地方生产单位的自主权实际上被取消了。它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整个经济具有众所周知的僵硬性，束缚了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机动性。

同时，计划和物资供应的实施都很耗费时间和人力。事实上这种做法促使官僚迅速大量增加，官僚的增加本身又使得需要有更多

---

① 格罗斯曼：《一个理论的笔记》，第143页。他所说的“隐蔽的实物核算单位”意思是按不变价格计算。

② 关于“物资平衡”的描述和见解，见威利兹：《苏联集团的经济》，第145页；H.列文：《苏联工业中的集中计划供应》，载于波恩斯坦编：《比较经济制度》，其中也解释物资技术供应制度——物资分配制。关于“工业物资供应”问题，见A.伯格森：《苏联的计划经济》（纽黑文，康涅狄格，1964年版），第七章。

③ 格罗斯曼：《一个理论的笔记》，第152页。



的监督、更多的官员和更详细的指标，以便抵消基层和官员本身中也在滋长的企图回避详细指标的倾向。

1929年形势急转直下，在缺乏经验、考虑不周、缺少干部的时候开展的全面工业化运动，对于这个运动的头几年在订计划的方法、机构设置当然还有政治制度本身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给经济管理方式和许多其他制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计划的制订和物资技术供应制度本身固有的动力同制度内部的其他因素之间有力的相互作用，引起了扩大独裁统制的强大趋势。经济管理中所使用的手段演变成为普遍的制度，这一点并未能逃避西方和俄国自己的研究人员的注意。格罗斯曼说过，统制经济的政治含义“几乎必定是专制的”。<sup>①</sup>细致的行政管制是按照“实物”制订计划这一办法的必然产物。苏联的一篇材料证实：“按实物单位制订计划的前提是行政监督制度，这种制度在职能上交织成为一种等级森严的经济结构”，而“按金融指标制订计划则不一定需要这种庞大的计划体制。”<sup>②</sup>然而，事实上这位学者并不赞成“金融指标”，他似乎偏向于采用其他学者反感地称为“行政方法”的办法。<sup>③</sup>

其结果是，集中化的权力日益集中，监督体系日益扩大。例如，农业政策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由于近乎一举摧毁了旧农业制度并由管理大楼建立了新的农业制度，农业方面的任何事情都不再按照本身的势头活动了。党让自己承担了一项艰难而意料不到的任务。正如斯大林在1933年解释的，要使集体农庄制度起作用，党只能采取“投身到集体农庄的生活琐事和管理中去”的办法。<sup>④</sup>

在农村，整个经济发展进程所具有的日益增长的行政强制特征

---

① 见格罗斯曼前述著作，第14页。

② R. 兹维列夫在B. 格涅坚科编的《大经济制度的职能问题》一书中的文章，（莫斯科，1969年版），第160页。

③ 参看M. 费多连科：《最佳计划讨论文集》（莫斯科，1968年），第16页。

④ A. 盖斯特引自1933年7月15日《真理报》。

超过了任何其他地方。国家机器完全支配了经济生活。这个事实在国家组织中打下很深的烙印。当时对经济的垄断和对国家组织的垄断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促使该制度中早已强烈存在的下述倾向更加发展了：夸耀自己的作法（无论是什么样的作法），并把这些作法说成是智慧的顶峰。

由于宣传和教条化把学识和理论都挤掉了，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当时实际上不存在什么计划）普遍流行的种种作法的计划制度才能够被尊崇为教条。事实上，它只不过是明显地退回到应急和配给的作法而已。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这些作法所取得的根本成就给内战的参加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这个鼓舞人心的事有助于为苏联的计划思想辩护，这种思想又一次同强制行动、无限强调人的能动性和权力高度集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说，所有这些特征在内战时就已存在。但它们是“行政管理”，而不是“计划”。正如波布罗夫斯基说的，“可以这么说，当苏联的计划诞生时，人们就可看到一种有利于集中、有利于无限扩大计划的范围和计划的强制性的趋势。〔而这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开始闻名的管理思想和计划思想又再次被拾起来了。”<sup>①</sup>

内战的另一个遗迹是在莫斯科建立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这一趋势，这个机构差遣和拨弄着全俄国的人员和资源。人们熟悉的对“社会主义产品的直接交换”的偏爱又出现了。列宁在1919年曾经重视这个办法，后来又摒弃了，但没有明显修改有关的理论。当列宁逝世以后的领导者们最后抛弃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斯大林又回到一些熟悉的主题；他恢复了“实物”指标，并在1930年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暗示说，虽然商品流通和货币经济仍然存在，但随着有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小生产的结束，商品流通和货币经济会自动消失，而且会在几年内消失。十年以后他才比较谨慎了。

1941年初，在评论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斯大林承认存在

---

<sup>①</sup> Cz.波布罗夫斯基：《在萌芽状态中的社会主义计划》（华沙，1967年），第52-54页，第146页。

着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这一点在听到这项“新”发现的专家们当中引起了轰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人们对这些观点的关注，战争加强了人们对国家权力的信念，而不是加强他们对经济规律的信念。到了1952年斯大林又组织(对上述教科书的)辩论，他仍然认为市场范畴在一个时期内仍不可避免地玷污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是由于还不完善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所有制继续存在的缘故。一旦集体农庄变成国营农场，农庄最终将实行人们非常盼望的“直接产品交换”的制度。<sup>①</sup>

斯大林坚持这种观点，不能单纯以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来解释。当他无视恩格斯对农民的自由主义的照顾时，他一点顾忌也没有。斯大林之所以固守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感必须使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幻想的一种幻景永久存在下去。因此，他认为这一次也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虽然是另一种不同的战争。

可以肯定地说，如此极端片面性地把迅速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的工业化战略，如果政治制度没有能力迫使社会屈从于这种计划所造成的种种压力、艰苦和不合理的话，那是不可能成功的。然而，“速度狂”一旦发作，所有的机构，包括党在内，都必须变革。在工业化的紧张状态中，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紧张状态，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建国方法。这就是，国家政权废除了市场、私商和个体农民，然后宣称它正在扩大社会主义。斯大林坚持认为，市场和个体农民滋长资本主义，因此改造或者废除它们意味着扩大了自由王国。事实上，扩大的是极权国家，而它的扩大部分地是依靠大规模搞“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因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要控制“产生资

---

<sup>①</sup>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莫斯科, 1930年), 第37页, 以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莫斯科, 1952年版), 第51-52页, 第54-55页, 第67-68页。关于斯大林在1941年1月突然承认“价值规律”(和一般的经济规律), 见A.帕什科夫:《经济计划理论的普遍问题》, 载于M.费多罗连科编的《经济科学和实践的问题》(莫斯科, 1929年), 第25-26页。

本主义的人”，然而这些人恰恰就是大多数的俄国人民群众。

在控制方面取得成功对于纯粹是经济战略的苏联工业化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经济和政治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加强一样，强制和摒弃经济思想的作法也是互相加强的。经济实践所依据的思想上的周密性和理论上的成熟性越弱，对国家粗暴的强制能力的依赖就越大。因此，在苏联历史上所开展的“统制经济”包含着大规模固有的国家强制手段。看来，秘密警察和检察官更多地是妨碍而不是帮助经济。然而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他们无处不在，不光是为了防范偷窃，而且——他们这么说——是为了保证充分的经济核算。

一旦强制和监督成为有关机构的普遍做法，新兴的既得利益者就必须创造出某种适当的意识形态。如果有可能找到的话，先例是受人们欢迎的，从而“自发性”就变成了主要的敌人，如同在内战时期那样。无政府主义和市场变成了“自发性”的同义语。右翼分子被视为是自发性的政治代理人，这种自发性通过外国特务的中介导致退回资本主义。

按“实物单位”制定计划，直接分配资源，向农民直接征收产品（一种变相的实物税），这些在三十年代变成了流行的做法。而“社会主义产品交易”变成了人们认可的行政利益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产品交易”受到公务人员的赞赏，因为它似乎提供了比“间接的”技术（如市场途径）更好的办法来控制各个程序和人员。因此，对资源和人员直接地、集中地进行控制、种种规章制度和拖拉的办事程序（发票、定单、采购、总管理局等等），这些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又是俄国和历史的产物。

斯大林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清楚地说明他为何希望市场消失，希望产品交换盛行，就是因为这样做会使中央为了总的利益更好地掌握生产过程。集体农庄和商品交易是这条道路的最后障碍。<sup>①</sup>

因此，一种“战时经济”就成了重叠的官僚机构的行政上层建筑

---

① 参阅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第 67-68 页。

的基础，这些官僚机构在顶层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统一的机构，在较低的层次就成为政治和经济分开的国家官僚机构。三十年代初期的经验及临时拚凑的做法充实了从内战时期借用的做法，计划经济和国家其他职能的这些特点实际上原封不动地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sup>①</sup>甚至还要长久一些。

在斯大林时期，国家制度建立的过程具有下述奇怪的特点，即各种活动领域的组织都采取重叠的办法。在建立新的经济模式方面，党作为这个制度的主要政治代理机构，其本身也被完全改造了。正如国家一样，党变成了被一个集中的、等级森严的机构所统治的组织，在许多方面成为“统制经济”的对应组织，它贪婪地既要控制工厂，又要控制作家。有一些因素促使这个制度把市场范畴和经济生活中的其他自发表现看成是有害的东西，这些因素又加强了人们如下的看法：任何自主权都可能是产生政治反对派和异己分子的源泉。

总之，三十年代，在新经济政策废墟上出现的模式，是一种“统制经济”模式。它表现了如下的特征：（一）经济决策和经济计划的高度集中；（二）计划具有综合的性质；（三）喜欢以实物单位作为核算手段；（四）利用“物资平衡”达到计划内部的协调；（五）对物资供应进行集中管理（这种管理是作为配给制度发挥作用的）；（六）计划具有法令的特点并且非常详尽具体；（七）工厂内的行政管理等级森严；（八）市场范畴和市场机制作用被降到次要地位，主要在个人消费和劳动领域发挥作用，尽管这也是重要的；（九）国家作为经济的直接组织者发挥强制的作用、对经济和其他生活领域进行无所不在的控制并使它们国家化。

这个制度证明是强有力的，它促进了俄国经济的发展；在这个

---

<sup>①</sup> 多罗德尼茨金院士这样说过，见1963年5月15日《消息报》。引自E.扎列斯基的《苏联的计划改革，1962-1966》（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1967年版），第53页。波布罗夫斯基曾说：“可以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苏联计划制度的建立在各方面几乎已经完成”。见波布罗夫斯基著：《在萌芽状态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一书第151页。

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斯大林主义”著称的政权推动了俄国进入现代化。这个制度无疑具有内在的逻辑，否则它是无法发挥作用的。以“实物为单位”、实行物资技术的供应制度、进行“物资平衡”、制定详尽具体的计划、优先发展某些部门等，这些经济管理方法本身并非来自官僚们的一时兴致。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一切经济计划，但是在苏联，这变成人们使用的主要方法，<sup>①</sup>而且无疑也是使这个制度取得成就的原因。同样，所计划的经济过程并未达到宣传所说的程度，但它是在空前规模的基础上完全由国家来严格地管理和组织的。在其他国家里，虽然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私人的主动性和各种社会因素也在发挥作用，有时甚至发挥主要的作用。苏联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当国家化扩大到经济的各个部门时，决定权则集中在最高层，这是没有先例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融为一体，扩大独裁的控制是为了创建一种“理想化”的国有经济，这种经济的特征又被强化到了最大限度。即使控制、权力集中、强制和优先发展某些部门是必要的，这些做法也变成是包揽一切的独裁行动。

当狂热的工业活动开展起来时，这个制度很快就开始显露出它的阴暗面。伴随那些造成具有活力的因素而来的，是日益增长的功能失调的现象，它使整个扼制趋势发展起来。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国家进行的干预和控制以及那种不切实际的、过于野心勃勃的经济增长率。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使一些抵消力量的出现，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这个模式的纯洁性。

一位评论家大声疾呼地指出，在这两个重要方面，国家显然“包揽太多了”。在反对资本主义进攻的口号下，人们开展了反对小商、手工业者和承包商，特别是反对个体小农的运动，造成了“商业萧条”、黑市泛滥、大量偷窃行为和懒散官僚的出现，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反对派曾竭力要防止的苏联历史上的那种残酷暴虐的现

---

<sup>①</sup> 参阅 A. 诺维《苏联的经济》一书(第三版,伦敦,1968年)第12章,特别是第325-332页。

象。

在商业衰退和农业出现极度混乱的时候，又强制采取不可能实现的“速度”，从而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局面；对这一局面，只有采取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才能加以控制。扼杀了小生产的同时又热中于搞大工程项目，结果危机加剧了，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这在和平时期是没有发生过的），而且使整个经济发展严重变态，导致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从1929年到1932年，规定的工业增长指标分别为：21.7%、32%、45%和36%，但那几年官方宣布的实际增长数字则是：20%、21.8%、22%和15%。1933年，当人们采用比较稳健的指标16.5%时，实际上也只取得5%的增长率。应当记住，这些数字无疑是已经夸大的了。

第二次大战爆发前的那几个五年计划的整个时期的情况也同样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六十年代发表的经过修改的官方数字宣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9.2%，第二个五年计划为17.8%，第三个五年计划（未完成）为13.2%。<sup>①</sup>这就是一些评论家早已预料到的那种“逐渐拉平的曲线”。可是这些评论家却因为说对了，后来受到惩罚。那些能够实现的目标，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极为有限的。但是，任何一门经济科学或政治科学都不可能预言这些限度。经济方面的决定仅仅以政治标准为基础，根本没有考虑到成本，致使出现新的问题，迫使国家担负起它原来没有准备承担的任务。

几个有权势的领导人，由于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挫折或各种抵消力量的干扰，他们把国民经济几乎视为是简单的私营“工厂”，可以为它规定出最小的细节，或者可以期望它根据命令就能完成任务。这种做法所固有的对实际经济情况的无知，又由于无视经济学而变得更加严重。二十年的时间里，甚至连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没有，这门学科一时被从课程表上取消了。把统计机构改名为

<sup>①</sup> 这些数字引自《一九七〇年度的苏联国民经济》一书（莫斯科，1971年版），第131页。

“全国核算”机构，这也表现了对统计的蔑视。这是中央权威当局力图把日益发展的大规模经济当成简单的部落经济来管理的结果，认为在“健康的求实精神”范围内，就可以完善地管理经济。

因此，这个运动奇怪地被互相矛盾的和破坏性的对立趋势所损害。由于新工业在筹划期间施工缓慢和存在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扩大投资的利益部分丧失了。结果是：引进最新技术得到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终于被那种忽视已经发展的工业和不能引导这些工业进行更新的倾向所抵消。特别有害的是，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工业发展的反刺激，这些反刺激达到了“恐更新病”（格罗斯曼的用语）的程度。同样，在农业方面，集体化容许榨取农民之所得，结果造成农业停滞，给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绷得很紧的计划势必要逼迫经济增长，结果这种计划很快暴露出经济组织的全部弱点，这种经济组织采取高速度的发展，但资源、物资和生产力则缺乏适当的后备；而且这种计划使无政府主义的许多弊病发展起来：通货膨胀的压力、萧条、滥用资源、一个部门缺乏物资和技术供应，而别的部门的生产资料则过剩或被冻结。由于供应方面的缺点或由于指标既多又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制度所固有的其他因素，工厂的生产出现不平衡，时紧时松，这是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状况。事实上，过度集中的经济使“计划变成虚构，实际取得的只不过是初步的发展而已。”使人惊讶的是，“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管理时期，都存在着这种初步发展的进程”。<sup>①</sup>

因为，内在的统一性被破坏了，所以投资计划得不到必要的资源保证，安装大型设备缺少必要的或辅助的设施，发展的分厂之间没有协作。总之，经济中没有取得计划所预期的基本利益，即，没有符合社会需要的“健全的整体结构”。<sup>②</sup> 计划定得非常细，但荒唐的

<sup>①</sup> O.朗格：《计划的作用》，第207页。

<sup>②</sup> J.科尔奈：《论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牛津，1959年版），第181-204页。亚诺什·科尔奈是匈牙利著名的经济学家。



是，整个经济结构、它的比例和相互关系却是在自发地、分散地、没有计划地发展着。特别是，正在出现的结构不仅对经济增长缺乏固有的刺激，反而导致了浪费、低质量和墨守成规。

整个模式的明显弊端在于发展的十分不平衡和它结构本身的问题，这种结构在物资分配和其他经济领域中造成资源的惊人浪费和难以置信的不合理现象。斯大林时期，令人惊讶和莫名其妙的特征之一是，一面让大规模的居民接受教育，一面又对已受过教育的干部进行致命的毁灭，以及为了国防的原因，强制造成大量的牺牲并把最优秀的军官消灭掉。

整个过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这种“无砖的营建”所需的后备终将达到极限。即使在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里，大规模发展必需的资源（剩余劳动力、易于找到和易于采掘的原料、分布广泛的铁路网）也并不是无限的。用耗费未来的发展来加强当前的发展，这种作法是很不合理的，从长远来看，也是自取失败的，其代价太高了。在整个制度中，种种不平衡和失调显露出停滞的征兆。来自上面的鞭策太多，下面缺乏主动性，或者说无所作为，造成斯大林制度内在的虚弱。这个模式不断被下述两个因素之间的矛盾所打乱，一个因素是为了使人民按照国家的意愿行动而进行的鞭策，另一个因素是“控制和指标”制度内在的矛盾引起的反刺激，这些反刺激指引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动机、价值和要求去行动，它们往往同官方的方针大相径庭，或者是反对官方的方针。许多人继续利用存在的漏洞来保护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官方强加的计划 and 目标。

因此，生产者的利益同国家机器的利益之间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距离。

斯大林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支巨大的工业力量和没有效率的经济。

尽管这个“统制制度”拥有的种种手段是强有力的，但由于这一

制度的功能失调，结果无法按照教科书上说的纯洁性来充分发展。随着差别的发展，这种功能的失调促使这个制度变得更为“混杂”，这种混杂超过了可能允许的程度。总之，在这个主要的模式内部，还有一个难以捉摸的、但实实在在的、变形的、但又是不可摧毁的对立模式非正式地存在着并发展起来。

在理论的模式中，市场机制只是次要的，在制订计划中，货币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但是对于公民来说，以及对于公民对本国经济的看法来说，市场和货币都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首先，甚至官方的模式也容许劳动力和消费品在市场上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易、活动和要价。人民购买货物是用货币支付的。这一点在盛行“实物”管理的格局中造成了重要的缺口。另一个显然反常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计划工作人员发现他们必须为资本货物定价，虽然从理论上说，资本货物极少离开国家经济封闭的流通渠道，它们被视为是分配的产品，而不是买卖的商品，这些错误思想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很大的。由于物资—技术供应制度的缺陷和制订价格的失败，工厂相应地受到极大压力，在必需的资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被迫完成指标并自己寻找方法去完成定额。一种重要的中间人的系统（“推销员”和“供应者”）出现了，它协助工厂、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那些忧心忡忡的领导人获得必需的供应。这些供应虽已正式拨给他们，但要通过官方渠道获得它们是绝不可能的。这些领导人也搞产品交易、劳务交换，而且还使用一些不那么正统的手段去获得一些他们需要的、但未拨给他们的资源。因此，甚至资本货物市场也发展起来了并得到政府的默认。这种市场有助于使经济活跃起来，要除掉这种市场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这一系统很快变得相当重要，而且雇佣了成千上万的人，虽然这种行动的合法性存在问题。几乎没有哪家工厂或哪个农场能够不

---

<sup>①</sup> 苏联经理们的这些非正式做法，包括“推销员”在内的活动，在J.柏林纳的《苏联的工厂和经理》一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7年版）第十二章中有恰当的描述。要了解被称为后门的种种关系和循私舞弊的非正道活动，可参阅该书第二章。

需要或不使用这种中间人，否则它们就会冒计划失败、失去奖金和工作的危险。至少这些活动的意图是良好的，它们有助于使官方提出的目标得以实现。但是，正象在任何一个市场上一样，有些人比另一些人表现得更机灵些，他们用于获得商品或半成品的那些方法，同样也可用于那些未获批准的和非法的目标。事实上，受到默认的那些“灰市”的活动往往完全与非法的黑市融合在一起，同黑市中形形色色的投机倒把者融合在一起。这些投机倒把分子始终准备并且总有办法获得政府仓库中有的，但在商店中供应短缺的一切东西。各种投机倒把分子借助于工厂的经理，或从官方商店（那里经常发生盗窃或小偷小摸事件），甚至从官方为特权者设立的另一种不被承认的特殊供应网点获得需要的商品。一位观察家把这种特殊网点称为“第三种经济”。第一种经济是得到官方承认的，第二种是非法的黑市。<sup>①</sup> 在新经济政策被取消以后，上述种种现象便成了统制经济的典型表现，从那时以来，它们一直是兴旺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经济政策从来没有被完全取消。过去的许多商人、农民都消失了，但很快被许多黑市商人和国营工业中出现的、本着高度经商精神为国营工业服务的新的形形色色的中间人所取代。一位西方学者在讨论资本货物的非官方贸易时认为，除了统制经济这一“基本模式”之外，还有一种次要的、但具有影响的市场模式与前者并存。他还认为，自三十年代初以来的整个时期，这些模式都存在于苏联的工业。<sup>②</sup>

资本货物的贸易和把消费商品通过非法流通渠道卖给能买得起这些商品的人，这两件事清楚表明，市场和市场现象在苏联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此外，集体农庄庄员、国营农场工人和许多城市居民都有自留

---

① 记者K. S. 卡洛尔在《同俄国人交谈》一文中谈到他访问苏联的印象。见1971年1月1日《新政治家》杂志第8-10页。

② D. 格拉尼克：《苏联的金属加工业和经济发展》（麦迪逊，威斯康辛，1967年版），第214、227-230页。

地，这些自留地生产农产品，也产生贸易。自留地的农产品在全国农业总产值中占有巨大的份额（一些估计认为占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多）。它为城市居民提供多种食物，同时也关系到农民的生计。农户和集体农庄制度的生存有赖于这种生产。然而，自留地生产农产品和进行交易，只不过是一种得到默许的活动，因而经常受到限制和干涉。可是每当国家进行干涉和限制，就给国家的粮食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据称，这些生产和交易活动属于非苏维埃性质的、暂时的现象，到了“下一个阶段”就必然会消失的。

斯大林时期存在的各种平行的经济和平行的系统，今天仍继续存在着。它们对许多苏联公民产生很大干扰和腐蚀的影响。在许多苏联人中普遍存在“经商头脑”是众所周知的。谋取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成为群众的才智。用陈词滥调宣传的英雄人物并不是流行的榜样，“社会主义的人”还没有成为现实。报纸常常与之斗争的那些追求私利者、功利主义者和小偷小摸的人数则在激增，并且渗透到党的队伍中来。俄语把形形色色的这类人称为贪图私利者、大捞一把之徒、分赃者和窃贼，这些词为这类人物的存在提供了补充的见证。

从三十年代以来，工人群众为寻找较好的工作条件，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按照官方观点来看，这种“劳动力流动”的现象也是属于“非苏维埃”的行为。这种非常自然的流动现象被官员们斥责为“物质冲动”的表现，是一种“追求卢布外快”的行为。

这类说教不仅不利于生产，而且促使收入低、没有特权的人民各阶级产生他们的阶级意识，这不是任何控制或恐怖行动所能加以根除的。他们对这种制度中的特权和权势的看法，即使做宣传工作也是不可能予以改变的。日常生活实践使他们懂得，头头们既掌握实权，又是追求私利者。特别使宣传工作者感到讨厌的那种“我们”、“他们”的划分方法，使人民对阶级现实抱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同官方的田园诗距离很远。后者认为工人、农民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知识阶层是非对抗的、友好的阶级。当劳动者看到显要人

物不仅享有权势，而且享有特殊供应网时，上述肤浅的陈腐思想，象头头们的告诫一样，都是无足轻重的。“劳动者”（我们的兄弟，劳动人民）是处于接受命令和付出苦劳的地位，而别人则是处于发号施令和享受特权的地位，这就是他们对现实的看法，虽然这些看法并不一定会引起他们对现实的反叛。

阶级差别以及各种对立的文化（非官方的或者同官方敌对的文化）的发展和存在，使得在官方接受的模式的内外发展起来的、而且反对官方模式的那种复杂的社会格局变得更加突出。在经济和社会的活动中，这种对立的模式在僵硬刻板的结构中变成了长久存在的东西，并且是造成苏联社会的变态、反刺激和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又使各种趋势和矛盾积累起来，侵蚀和腐蚀着五年计划这种受到严格控制的制度。这个模式也就无法应付这种社会经济的现实了。1953年当盖子被揭开的时候，这个制度所需进行的大检修已被耽误很久了。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描述中包含的许多特点仍然适用于斯大林死后的时期。这方面将放在第二部分来讨论。直到1953年，随着紧急形势的出现，发生了一系列改变模式和突然的意外变迁。每一个新阶段的出现都比它的前一阶段持续时间更长些：八个月的革命、近三年的内战时期、八九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及至少二十五年的统制经济（如果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这个阶段确已结束的话）。

显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表现出多样性，而且也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特征使我们有可能把四个时期归纳成两种互相交替的经济蓝图：一种“混合经济”被一种“统制经济”所取代，再被一种“混合经济”所取代，最后又被另外一种“统制经济”所代替。在上述两类经济中，整个制度的重要特征，包括它在政治领域中的重要特征，同经济领域中的相应关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往往反映出这些关系。

对于上述两种经济模式来说，其共同的东西是市场和计划之间

存在的关系，或者在更大规模上说，是国家同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变更着的经济模式不断重复着某些基本的面貌，使苏联的这部历史剧成为由不同的剧团和不同的班底多次重复演出的两幕剧。苏联的历史是否只具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样板呢？或者说，它今天是否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即由于历史的发展，原先那种狭窄的选择面现在已扩大了，旧的难题可以忘掉呢？由于对斯大林逝世以后的制度问题的调研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解答还有待于探寻。

第二部分  
经济与国家





## 第六章

# 对“中央统制经济”的研讨

在斯大林的专制统治时期，苏维埃俄国实现了工业化，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斯大林溘然去世之时，苏联已经成了一个实力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虽然斯大林的继承人知道，这个由他遗留下来的制度存在许多弊端有待修补，但是他们仍旧宣称：俄国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此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尚未达到规定标准，农村人口还十分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苏联的经济力量大吹大擂，不免显得荒唐可笑，不少西方人士对这种吹嘘嗤之以鼻，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宣传伎俩。

然而，苏联人所以作此预言，是以其经济增长率这一凭证作为依据的；这些增长率的数字同样遭到了西方的怀疑，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情况更是如此。可是，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的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起到的主要作用，是使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引人注目地跃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假如它的经济保持以这种速度不断增长的话，单凭最简单的计算便可以看出：俄国人的自信是有根据的。五十年代里，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大约百分之七点一的速度递增，而美国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如果情况按这一趋势继续下去的话，俄国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将缩小美苏两国之间的差距，经过一段时间，俄国就能迎头赶上美国，赢得经济竞赛的胜利。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五十年代得出了上述结论，他们认为：俄国人列出这些数字所用的语言是非常坚定的。这样，他们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俄国人作出的预言——只不过他们对此所加的

限制条件不同罢了。直到五十年代末期，有关苏联经济增长的数据资料，一直证实了上述看法。

可是忽然之间，苏联的增长率下降了，这使苏联领导集团感到出乎意外，甚至连某些西方经济学家也觉得出乎预料。据一些苏联和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转折点是在1958年出现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指出：“在整个五十年代里，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各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最快的。自1958年以来，苏联的增长率从1958年以前八年中的年平均百分之七点一的水平明显下降，1958年以后的连续六年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五点三。”<sup>①</sup>

增长率的下降尽管可以看作是能够预测的，但是除此之外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同时发生的一系列现象，却使这一问题复杂化了。

首先，苏联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表明，伴随着增长率的下降，还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慢，后者不但部分地说明了前者发生的原因，而且它本身即便不算不祥的预兆，也是令人忧虑不安的因素。进一步的资料暴露的问题就更多了：反映经济执行情况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资本生产率，也呈现出下跌的趋势。借用苏联研究人员的术语来说，表1说明了“工业生产效率”下降的“动态”。

从表1的数字中，不难看出使苏联的研究人员和领导人都感到焦虑烦恼的工业生产情况的变化趋势。在上面提到的三个五年期间，资本形成始终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平，但是这种积累的努力并未带来与之相称的成果。工业产出率大大下降，因而造成该表用每百分之一的固定资产的产出率衡量的工业资本生产率呈急剧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大幅度放慢。在1951—1958年期间，和上述情况相一致的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趋势尤其令人忧虑不安。

---

<sup>①</sup> 关于预测苏联经济增长情况的变化，可参看A. 格申克龙所著《经济落后状况的历史透视》（纽约，1965年版）一书第264—269页。这里的引文出自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外交政策小组委员会为第89届国会第2次会议编纂的《苏联经济的新方向》（华盛顿特区，1966年版）一书第6页。

表 1

工业生产效率的动态  
(百分比表示年平均增长率)

年 度	固定资产	工业产量	固定资产每增加 百分之一的工业 产量增长率	每个工人的 生产率的 增长率
1951 - 1955	11.4	11.3	1.16	7.6
1956 - 1960	11.5	10.4	0.91	6.3
1961 - 1965	11.1	8.6	0.77	4.8

资料来源：A. 诺特金所编《苏联国民经济结构》(莫斯科, 1967年版), 第270、272页。

总的来说, 交通运输、建筑, 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效率都低于工业部门。把这三个部门的数字同工业效率的数据综合起来分析, 人们就会发现一种效率越来越低的趋势。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哈恰图罗夫引用最新的数字, 证实整个物质生产领域都存在着工业部门的这种趋势。哈恰图罗夫是以国民收入的实物量与国民经济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总额(用固定价格表示)之比, 作为他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的。衡量的结果表明: 1959年的比率是每有一个卢布的资产, 就会产生62戈比的国民收入; 以后, 这个比率就不断降低, 1965年一个卢布的资产能产生53.2戈比的国民收入, 而到了1968年, 就只能产生50.6戈比了。虽然哈恰图罗夫懂得, 形成这一趋势, 部分原因在于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努力所致, 但他还是认为这种趋势是有害的, 他自己搜集的美国在1957-1963年期间的资料数据, 却反映出美国的这项指标有了提高。

一项衡量投资努力的效率的有关比率, 揭开了造成上述不幸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因。在这里, 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同固定资产加上流动资产的增长相关联的, 而1964-1968年期间, 每卢布相对43戈

比的比率，比起前面引述的比率来就低得多了。<sup>①</sup>

虽然本章涉及的，主要是苏联的学术研究者可以得到的、或是在其研究著作中出现的六十年代的数据和资料，可是1968-1972年期间官方公布的数字同样值得一提。从这些数字来看，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所加快，下降的趋势可能已经得到了控制。然而资本生产率和投资生产率仍在不断下降，参与编制目前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人士预言，效率、尤其是工业效率将进一步降低，他们对可能出现的这种前景纷纷表示遗憾和哀叹。<sup>②</sup>

总的说来，苏联现在公之于众的这些数据资料说明：效率低是苏联经济发展步伐减慢的真正祸根。一些计算得出的结果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低效率使苏联经济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从1961到196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545亿卢布（按1958年价格），但同一时期的投资生产率却下降了大约百分之十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几年国民收入的增长额就不会是区区570亿卢布，而会高达2170亿卢布之多了。<sup>③</sup>

苏联的经济无疑仍然在增长着，而且照现代的标准来看，它增长的幅度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的；不过，苏联的增长速度已不再是罕见的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发展速

---

① 见A.鲁绍采夫和P.布尼奇合编的《经济改革：它的实现与问题》（莫斯科，1969年版）一书中收入的G.哈哈图罗夫的文章（该书第7章第195-197页）。关于西方对苏联经济效率的研究，可参看A.伯格森所著《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与生产率》（纽约，1968年版）一书第64-65页。该书作者通过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了苏联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得出结论认为：同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执行情况比较起来，苏联的经济执行情况还算是相当不错的。此外，如想了解苏联对这同一个问题的研究，可参看A.诺特金所编的《苏联经济发展的因素》（莫斯科，1970年版）一书所收入的雅·克瓦沙的文章，见该书第6章，第150-153页。

② 本五年计划的头两年——1971年和1972年、特别是1972年的执行结果表明，生产率和全面增长的计划指标都没有达到。资料来源请看本书第13章，第311页注1。效率指标实际上反映出情况在进一步恶化，这一点官方在《1971-1975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莫斯科，1972年版）一书中予以承认（详见该书第235页）。该五年计划的文本在解释上述现象时说，要使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有所改观，就需付出努力纠正比例失调和失去平衡的状况。

③ 见A.诺特金所编《苏联国民经济结构》（莫斯科，1967年版），第59页。

度上同苏联并驾齐驱，或者超过了苏联。起关键作用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情形也同样如此。每一个苏联公民都可以读到列宁的这样一句话：“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是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胜利的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因素。”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本来应该会带着某种自豪感来引用这句话的；可是现在，它却为人们展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前景。因为假若那种不妙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肯定会在苏联自己挑起的这场比赛中击败苏联。

这样，同动荡困难的三十年代比起来，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的形势则完全变了。就在苏联经济丧失大部分蓬勃活力之时，资本主义各国却学会了更好地驾驭自己的经济生产活动。显而易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俄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更不必说它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受的挫折了。经济增长的数字，再也无法为吹嘘“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证据了。

苏联所以陷入这样的处境，部分原因在于它在宣传中提出了一些无法兑现的口号，并且盲目压制批评意见。虽然单靠无数的官僚机构和流行的陈规陋习，再也不能管理日益发达和复杂的经济结构了，但最终能够启迪公众和领导人的历史研究和现代经济学研究，却在被禁止之列。一大堆空洞浮夸、未经检验的臆测和猜想，俨然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被强加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的头上。但这些优越的“科学化政策”不过是些自欺欺人的吹嘘，在真正的历史进程面前，起不了一丝一毫的作用；对那些致力于搞计划经济并鼓吹其“优越性”的人，历史是不讲什么客气的；它给苏联人带来的只有令人惊奇的曲折、波动和各种自发产生的后果，把他们搞得莫名其妙，无所适从。

这些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机制中自欺欺人的特征，在一段时期内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积累和投资的增加，具有讽刺意味地导致了投资所得利润的减少和经济增长率的降低。<sup>①</sup> 国民收入的

<sup>①</sup> 参看S.佩尔武申、V.文热尔和A.克瓦沙等人合编的《生产、积累与消费》（莫斯科，1965年版）一书第25-27，82页。

各种数字就反映出了这一趋势。事实上，苏联花在实物投入上的投资额，如果不象它在1970年正式宣称的那样和美国一样多的话，<sup>①</sup>那么这种投资的增长速度则要比美国快得多；但结果却是令人非常失望的。研究表明：生产活动越来越高的成本使整个生产过程的进度缓慢下来，苏联采取的经济战略变得大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急需加以改变。苏联片面地热衷于优先对重工业进行投资，并把此看作是获得成功的主要秘密，<sup>②</sup>这一点再加上劳动力的大量注入和强制性的政治压力，似乎便是造成生产过程减缓的几点因素。但是这后面隐藏着的是顽固不化的武断教条和习惯做法。重工业仍继续在消费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过分地享受得天独厚的优先照顾，为重工业服务而不是使消费业受益的产品相对来说更多了。“为生产而生产”这句话自然表达了苏联经济的理论，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收入都不能从这种理论得到什么好处。

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有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受人欢迎了。片面运用这一战略的结果，使一个心眼搞工业化的人变成了平庸的或者低能的“当家人”（这是农民对节俭持家的人的称呼）。不顾一切拼命使用人力物力资源的方针，在这种资源能够满足粗放使用的需求时可以行得通，但它对经济体制产生的影响是有害的。国家纵然能施加巨大的压力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可是使用起来却既不爱惜又不讲效率。于是，在一段时期内，经济体制未能对资源进行正确的管理，其实正确的管理本身就是使经济得到增长的一条途径。俄国的农民和不少工人把这种管理不善的现象称之为“不会当家”，因为尽管到处在大兴土木，搞工业化，但浪费和贫困的状况却依然如故。经济管理和计划经济的各种长处，如质量、生产率、革新精神以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被官方禁止使用的术语——最佳化等指标的实现，都是苏联的制度所力不能及的。有一段时间，浪费滥用资

---

① 见《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71年版）一书第82页。

② 参看佩尔武申、文热尔和克瓦沙等人合编的《生产、积累与消费》一书第72、109和177-178页。

源的风气之盛，压过了按预算安排使用资源的做法；不利于开展革新和提高效率的内部机制，变得在整个经济体制之中根深蒂固。从“大运动”的年代因袭下来的可怕的反对实行刺激和庸碌无能的情况，继续在生根发展，并终于开始阻止经济增长的车轮向前运转。效率低下的因素开始起作用了，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同时下降的不祥趋势，是不论多大的压力和种种激励告诫都无法阻挡的。

十分明显，觉醒和采取行动的時刻已经到了。原有的战略和方法变成不适当的了，需要有新的战略和新的方法。强大有力、富于革新精神的美国，继续在经济领域发展壮大；德国、日本和法国都已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加快了各自的经济增长率；中国也迈出了同样的步伐，它放弃了苏联的模式，转而采用新的方法去实现其工业化的目标。苏联必须在这个复杂的、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正视和面对上述种种现实。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要想丝毫不触动具有保守倾向的经济计划办法与管理体制及其固有的“憎恶革新”的本性，那么其结局肯定会象法国的一句格言所说的那样：“错过了历史性的时机”。

## 经济学的复兴

摆在苏联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修复由于近二三十年来压制学术空气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害。据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工业化的年月所付出的无法估量的“代价”之一，就是使经济学的发展至少落后了二十年。学术活动一直得不到开展，学术成果无法在经济部门得到应用，这种情况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科学的停滞不前。“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二十年在科学上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啊。迄今为止人类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的三分之二，不都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获得的吗……？”<sup>①</sup>

<sup>①</sup> 见V.诺沃日洛夫著《最佳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莫斯科,1967年版)一书,第25页和H.麦奎斯顿翻译的该书的英译本(纽约,怀特普莱恩斯,1970年版)。

在斯大林去世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苏联领导集团迫于形势，转而鼓励本国的经济学家开展活动。在1957-1958年间，学术活动在官方的同意批准下迈出了第一步。鼓舞人心的是，那些二十年代在学术界就已声名卓著的老一代学者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之中有些人是从劳改营和流放地回到研究所和大学教授的岗位上来的。

站在这场运动最前列的，有老派的统计学家V. S. 涅姆钦诺夫，还有另一位后来以自己的著作荣获列宁奖金的、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V. V. 诺沃日洛夫。

总的看来，经济学家们对学术活动重新开展的反应是十分热烈的。有才之士确有人在。很快就有很多聪明而有生气的年青人开始攻读经济学这门新的学科，他们废寝忘食地学习的不仅是知识本身，而且还有关于社会现实的新的语言；在那些年代里，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是无穷无尽的。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用得着的人，自己不但有上面的支持，而且还有学术的自由。

在苏联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数理经济学这门学科分支应运而生。虽然苏联数学家坎托罗维奇在1939年就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线性规划的原理，但他的著作一直无人问津。坎托罗维奇认为，假如把价格同最佳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影子价格的概念），假如使价格不仅表示平均成本，而且也表示短缺和效用，那么就可以用数学来寻找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

是诺沃日洛夫第一个看出了坎托罗维奇的数学理论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意义。在这以后，涅姆钦诺夫加入进来，对这位有才能的数学家给予了支持。过了不久，实验室、学院和研究所开始象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一个朝气蓬勃的数理经济学学派产生了。此外，卢列、瓦伊什泰恩、沃尔康斯基、别尔金以及许多其他的人，纷纷如饥似渴地对整个经济或各个经济部门的最佳计划问题进行研究。直到今天，这方面的研究仍在向前发展。<sup>①</sup>

<sup>①</sup> 有关苏联的数理经济学史，请参看M. 埃尔曼所著《今日的苏联计划》（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1年版）一书。细节请看I. 别尔曼所著的生动的《制定最佳计划的方法》



然而，光靠数学是不够的，苏联的经济理论贫乏无物，必须首先把经济理论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科学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旨在对“计算价值的方法”，或者说对确定恰当的价格（诺沃日洛夫把价格的确定问题称作真正“妨碍苏联经济的因素”），提出意见和建议。组成这个委员会的都是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代表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其中有的学派是从一允许开展论战时就形成了的。起初规定该委员会工作三个月，可是它干了一年也提不出任何建议来。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各持己见。<sup>①</sup> 先前那种毫无意义的意见“一致”的状况结束了，但是价格理论并未产生出来。偌大的一个国家，因迷信教条而自作自受——它不得不从零开始（并且依靠借用别国研究出的成果）来创立本国的经济科学；不过至少来说，意识到自己理论的贫乏而决心努力探索，这一点肯定是很有裨益的。

在计划和管理领域里，事态的发展同经济学的情况相似，也提出了一些改变传统的做法以及在该领域内进行试验的建议。E. 利别尔曼教授在他的《计划、利润、奖金》（载于1962年9月9日《真理报》）一文中，建议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改变从上面强行下达计划指标的做法，建立新的刺激鼓励制度。利别尔曼堪称在他的上面那篇文章发表三年以后掀起的经济改革的前驱人物。与此同时，各研究所和一些经济管理人员提出了无数的计划，报纸也开辟了专栏刊登各种建议和辩论的文章。

但是，不经过对旧事物的激烈斗争，新生事物是不会被人们认识的；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学术上的唇枪舌剑，可是开始时却主要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特性。对经济学及其首要任务的新

---

（莫斯科，1971年版）一书，第3-28页。还可参看G. 哈特等人所著《苏联经济计划中的数学与计算机》（纽黑文，康涅狄格，1967年版）一书和A. 佐伯曼所著《计量计划学问题》（纽黑文，康涅狄格，1967年版）一书。

① 关于科学院价格问题委员会和委员会内部出现的各种不同理论的情况，请参看V. 涅姆钦诺夫所著的《社会价值与计划价格》（莫斯科，1970年版）一书第3页和第381-403页。

的看法——现在普遍认为提高效率和实现最佳化是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人们承认和觉悟到资源的缺乏(根据定义来讲,如果资源丰富,就没有必要那样节俭了),为推广边际效用和边际分析的概念而斗争。这些看法在那些信奉过去占统治地位的、受官方支持的“政治经济学”的人士看来,都是资产阶级的异端邪说。不战胜顽固盘踞的教条的反对,不战胜隐藏在这些教条背后的势力,新的思想就没有立足之地。

这时,老一代经济学家中更有头脑的人,知道自己有着合适的政治外衣,于是纷纷向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为当前流行的做法辩护的意识形态结构开起火来。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士、学者和官员,在一些工厂经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的支持下,也同上面提到的那些经济学家们一起,对经济体制的现状以及他们不得不忍受的工作条件,发泄积蓄在心头的的不满和怨恨。

与此同时,各个研究所和经济机构,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政府中某些与经济有关的部,都认真研究起国家的经济情况,不少单位还重新开始寻求曾在二十年代构想过、但在三十年代被丢弃的一些问题的解决途径和一些手段的使用方法。主要由数理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家和计量计划学家提出的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开始涌现出来,吸引了热情洋溢的年青人。这些年青人推动了对国民经济的评价工作,他们感到:西方某些制订计划的方法,要比自己国家这个实行计划经济的鼻祖的方法更为高级,更为先进,使用起来也更加卓有成效。这一事实可能使他们快快乐乐。

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特别是在六十年代里,苏联经济学领域里的争论演变成一场真刀真枪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战斗。<sup>①</sup>在这场斗争中,许多过去被人们奉若神明的教条受到了抨击,其中一些虽然地位还很牢固、一时不易攻破,但它们已经完全不为人们所相

---

<sup>①</sup> 《经济与数学问题圆桌会议》(莫斯科,1965年版)一书,收入了有关这些激烈争论的例子,其中还附有1964年间一次会议的记录;M.费多连科编纂的《最佳计划讨论文集》(莫斯科,1968年版),也报道了发生在1966年的一次论战的情况。

信，或者是威力受到极大的削弱。所谓“第一部类优于第二部类”的论点，主张把重工业的生产资料和增长率放在比其他部门优先的地位，并以此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绝对必要的条件；然而现在，有些人认为这种论点只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具有相对的和暂时的有效性，另外有人则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没有充足根据的；总之，如今这条“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正在被当作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而受到公开的抨击。

另外几种教条或荒谬的神话也得到了类似的下场。所谓“实物计算单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而市场范畴和制订价格则具有资本主义本质和暂时性）的提法，现在已被彻底否定了。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党的批准由官方支持的整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陈词滥调，其学术上的有效性也受到了攻击，被指控为落后、教条、与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毫无关系。<sup>①</sup>很明显，这种攻击使论战愈演愈烈，激起了各式各样原教旨主义者富有警惕性的反攻。不过他们只是处于守势。改革派们敏锐地觉察到，需要研究出制订价格、管理和计划的新方针，整个经济学必须扫清很多障碍。首先，改革派要同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作斗争。举例来说，一位颇负盛名的数学家索鲍列夫，曾经耐心地对一群包括老派的、顽固坚持正统观念的人在内的听众解释说，“边际”这个术语完全不是什么不共戴天的资产阶级的邪恶之物，只不过是数学上的一个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概念。<sup>②</sup>

支持教条理论的苏联当局同样受到了致命的攻击。已故科学院院士阿尔祖马尼扬于1964年这样写道：“斯大林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错误处理，以及他在头脑中对

---

<sup>①</sup> 关于对官方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请看费多连科所编《最佳计划讨论文集》一书的导言；G. 斯基林和F. 格里菲斯合编的《苏联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新泽西，普林斯顿，1971年版）一书中所收的R. 朱迪的《经济学家》一文，含有这里所谈到的许多问题的丰富材料。

<sup>②</sup> 见《经济与数学问题圆桌会议》一书收入的S. 索鲍列夫院士的讲话，详见该书第64页。数学家在复兴苏联经济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门科学的作用所形成的不正确的概念，致使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陷于贫困，并且削弱了它对于革命事业的实际意义。”<sup>①</sup>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斯大林的看法如何，而在于他的为数众多的追随者的强大势力的存在。这些人当中有政治家，有经济学家和行政官员，他们在头脑里根深蒂固地倾向于用“直接办法”来进行计算和管理。涅姆钦诺夫对“易货贸易”进行了抨击，说它“违反了当代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劳动分工的条件，而这种社会劳动分工正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一切领域的特点。”涅姆钦诺夫认为这种物物交换的方式体现了“一种没有根据的、错误的思想”，<sup>②</sup>它怂恿人们把整个国民经济看成是由一个中心管理的“一家工厂”，从而构成了苏联经济体制一整套“行政办法”的基础。中央统计局副局长马雷舍夫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改革派，他把上述那些思想和做法当成主要的靶子，进行了嘲弄和攻击。他指出，采用这样的态度和做法，“无异于把社会主义的生产，与古老部落的某种原始经济形态或者与远古时期的农民家庭等同起来。”马雷舍夫认为，坚决支持这些做法的人对经济现实一无所知，他们不断梦寐以求的，是企图“用实物指标的形式，为整个国民经济——从整体直到最微小的细节——制订计划。”<sup>③</sup>

上述各种观点的出现，已经标志着不仅具有经济特征而且也富有政治色彩的阵营和学派的形成。一些从更为严格意义上来说的经济问题，如价值、价格、计划和关于改变模式的建议等等，如同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使经济学家和官员们当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学派以及同一学派中的各种不同流派。这些人纷纷攻击各自的手，极力想在学术界、政府和党的部门的圈子里，组成自己必不可少的

---

① 这段话出自阿尔祖马尼扬生前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见《科学院通报》第9期（莫斯科，1964年版），第4-5页。转引自朱迪所写《经济学家》一文，见《苏联政治中的利益集团》一书第223页。

② 见涅姆钦诺夫著《社会价值与计划价格》一书第249页。

③ 见I.马雷舍夫著《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计划》（莫斯科，1966年版）一书第25页。马雷舍夫是苏联中央统计局副局长，在他于1966年过早地去世之前，曾因提交计划工作方面的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

同盟。特别要指出的是，甚至连数理经济学家也分成了各种学派，各自对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持不同的观点；这些概念包括：“价值规律”和价格的“本质”；市场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的有效性；“最佳计划”的可靠性及其对国民经济“客观功能”的追求，以及与此有关的涉及到经济活动根本目的的有趣问题——这既是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同时又是社会哲学方面的问题；最后，还包括价格在计划过程中的形成与作用。

论战的结果，人们广泛地接受了以下两种思想：其一，市场范畴并不是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而是这种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其二，必须找出存在于中央计划和市场机制之间的新的关系。各个学派除了在为最笼统的意义上普遍接受上述两个论点以外，在其他所有问题上几乎都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例如，在价格和价值的问题上，就存在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然，还有许多人提出各式各样建立新的模式的办法。新经济学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确有效，着手对国民经济、国民经济的机制和趋向进行研究。当然，有关的制度同样经受了以极严厉的批评眼光进行的检查和研讨。不进行这样的调查研究，就无法找出造成经济状况出现惊人衰退的原因。

随着人们对苏联经济状况的了解，它的管理体制逐渐招致了严厉的批评。懒惰拖拉，墨守成规，既得利益，营私舞弊，死搬教条，玩忽职守，机能失调，无所作为……种种制度上的阴暗面，都由“新观点派”向苏联公众进行了揭露。苏联公众从其日常经历当中是了解这些阴暗面的存在的，不过他们过去没有机会象现在这样综观全局，或者没有机会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确凿的数字，了解到问题的范围之广和波及面之大。

这样，改革派显然要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批评和揭露旧体制的弊端。许多著作家写作的笔调里充满的不是沾沾自喜之意，而是失望和沮丧之情。

苏维埃国家最重要的政府职能——对经济实行中央计划和管理，成了不容置疑的经受最仔细研讨的主题。这一职能曾被当作一切成就的基础而受到自豪的赞扬；可是这次却被视为造成所有机能失调的现象的主要原因，不得不在抨击面前首当其冲。改革派发现，正是苏联模式的这一关键部位不合格，充满了缺陷和毛病。显然，改革派们对计划工作的所有方面——制订计划、确定指标、从下级汇集生产成果的方法，都进行了研究；而整个体制基础，包括从中央政府到最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结构、供应体制、官僚机构的外部与内部关系以及行政机关和生产者之间的普遍联系等等，也同样是人研讨的对象。

自新经济政策时期以来，中央集权的理论第一次失去了它在意识形态上所占绝对神圣的地位。人们已经在考虑它那过分极端的特性、它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和它在理论上的局限性了。“对经济实行集中化管理的可能性，总是要受到生产力达到的实际社会化水平的限制。”因此，集中化的管理方法“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加以使用”。换句话说，在较高层的机构里，作出决策时集中程度的高低，应当根据某些客观标准来决定，而决不能由某个官僚统治集团心血来潮、随便说了算。反之，应当给企业多大的自主权，则必须在对若干因素作通盘考虑以后再行定夺。这些因素包括组织的程度与现有的技术水平，生产力的集中程度，以及企业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相对客观的独立性或“单独行事”的程度。<sup>①</sup>

无论是不顾中央集权实际能对大批工厂实行控制的客观程度、从上面强行下达计划，还是在这同时忽视给予基层生产单位必不可少的自由行动的一定权力，都使得制订计划的工作陷于毫无成果的境地。大部分这样的计划“将只是空中楼阁”。改革派们把根据过去的经验得出的许多很有见地、能证实他们的论点的意见都收集在一

---

<sup>①</sup> 见S.扎拉索夫所写《论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方法》一文，刊登在《经济问题》月刊第10期(1968年)上，见该期第33、38页。

起。他们认为，中央集权的做法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特性，<sup>①</sup>换句话说，它只有符合所涉及的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或者符合整个国民经济的水平，才能真正成为必需的和有益的。

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参加论战的人，对进行计划这种主张本身，或者对计划必须据之为基础的不可缺少的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都从未表示过任何异议。不过，这些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统治集团内部和经济部门里，不应把进行决策时权力集中或分散的程度高低，托付给一个中央权力机关单凭其政治意愿去做决定。一些人著书论文，强调存在着客观的标准与限制因素，表露出他们对科学、可能还有对公众舆论在解释这些标准与因素时的作用十分关注。他们指出，这些限制因素不应被急躁鲁莽、横暴专制的掌权者置之不理，否则就会产生苏联历史上人所共知的悲惨后果。

受到众口一词的抨击的，并不是中央计划的原则，而是现行计划体制的执行情况。著作家们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有损于计划体制这一神话极力想树立的形象的一些现象。例如，通货膨胀的压力及其产生的后果无法避免，当局对此进行的控制有时情况十分糟糕，以致于造成特有的生产率下降和缺少刺激手段的情况。<sup>②</sup>苏联经济正是由于片面地以中央计划作为标准，才对其比例不平衡和机能失调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样，新观点派发现，实行计划体制根本不象人们认为的那样计划本身就能促使经济不断地稳步向前发展，实际存在的情况是经济形势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一会儿好转，一会儿下降；时而不稳，时而颠簸；结果使经济有机体摇摆不定，工厂无法给自己确定有规

---

<sup>①</sup> 见O.科兹洛娃所编《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莫斯科，1968年版）一书收入的V.卡申等人合写的文章（第88页）；维列复金和杰尼索夫的文章（第23页）；以及《经济问题》月刊上刊登的扎拉索夫的文章（第73页）。

<sup>②</sup> 诺特金在他所编的《苏联国民经济结构》一书第42页中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也会产生与其它经济形态相类似的后果。

律、有节奏的工作进度，常常是在作完成任务的总结报告的最后期限快到之时疯狂地“突击”一番，然后就可以懒洋洋地休息一段时间。<sup>①</sup>这种被轻蔑地称之为“搞运动”、“搞突击”的状况，使苏联经济学家和苏联当局都颇感头痛；造成这种抽风式的愚蠢做法的原因是不难查出的，它在于这一体制缺少自发调节和自动修正的机制，在于计划制订者确定以及十分频繁地改动他们的指标的方式，还在于供应体制存在结构上的缺陷。苏联经济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创造出大量闲置和无用的生产能力，所以会过多地生产出某些没有销路、顾客拒绝购买的剩余商品，也同样是出于这些原因。<sup>②</sup>

正如奥斯卡·拉奇为之感到遗憾的那样，处在计划体制下的苏联经济总是象市场经济一样变化莫测地进行运转；此外，它还倾向于把与实行计划不相一致的无常易变的因素强加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头上。<sup>③</sup>苏联无数的著书立说者指出，这样的计划能给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引起在同苏联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混乱和无政府的趋向。对计划制订者进行指控的另一个众矢之的，是在苏联的计划和管理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sup>④</sup>它们所以有损于计划这个概念，不仅是因为它们产生了无政府状态，而且因为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使计划变成无法完成指标的没有效果的举动——持续、全面、平衡地发展经济这一中心指标尤其

---

① 涅姆钦诺夫在《社会价值与计划价格》一书第249页中说，苏联工厂的总量当中，大约60%是在每月的最后十天里“突击”生产出来的。

② 卡申等人在《社会主义生产管理》一书第74-77页中，提供了这些卖不出去的商品的数字。从1950年到1965年，卖不出去的商品的库存积压增加了三倍半，总额达到了惊人的349.7亿卢布。1966年的八个月中，商业部门未能从生产者那里获得食品制品价值为15亿卢布（其中主要是奶油，占6.57亿卢布）。该书作者指出，群众有足够的购买商品的钱，但他们就是不买质量差的东西。与此同时，生产物资也没有市场，要不就是积聚在某些经济部门里，而其他急需的部门却得不到。1965-1967年期间，无用武之地的多余设备数量显著地增加，价值总额达到了40亿卢布大关。

③ 参看A.卡索夫所编《苏联社会展望》（伦敦，1968年版）一书收的A.卡亨的《农业》一文。见该书第273页。

④ 见本书第八章国家行为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一节。



无法完成。

产生这些令人哀叹的现象的原因，在于苏联计划体制的下列基本特点：存在一整套指令，每一条指令都俨然是生产过程的参加者需要遵守的法律；作出决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权欲熏心、企图包揽一切的中心手里；充斥着这个中心的情况汇报数量之巨，使它不能充分地消化领悟，结果就形成了它同实际脱节的情况。正是由于制订计划的人无法在计划过程中保持足够的连贯性，正是由于这些人高高在上设想出来的指导生产者的指标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相互协调一致，因此这个中心对经济的干预只能是高度武断专横的。

地方上的经理人员，只有通过利用在任何一种实行过度控制的官僚体制里所司空见惯的数不清的漏洞，通过仍然完成计划者规定的数量要求，或是象他们经常做的那样，仅仅给计划者一个业已完成数量要求的印象，才能使自己从上述那种自相矛盾的指令要求的纠缠中解脱出来。结果，高级行政机关里那些难以管束、“凭主观意志行事”的计划制订者们，就不得不同手脚被紧紧束缚起来、受到死板监督的生产者打交道。用涅姆钦诺夫的话来说，这个因此而在所有等级上都极端刻板僵化的整个体制，变成了“一个被捆住了手脚、紧紧束缚起来的体制。”<sup>①</sup>

这里还要再讲几句，以解释一下这种体制怎样和为什么要为积累保证充分的资源，以及它为什么不能高效率地使用这些资源。该体制能够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投资，但是它没有以给经济创造最大利润的方式分配资源的标准；它在使工厂服从下达的指标方面卓有成效，但是它破坏了刺激手段，于是它所得到的完成计划的报告，掩盖了大量被人忽视的内容。一个自上而下进行如此周密计划的体制，竟使得工厂陷入无计划的窘境，由于“缺乏从工厂一级

---

<sup>①</sup> 见涅姆钦诺夫所写《社会主义经济与计划生产》一文，原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64年，第5期，第76页，后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再版，书名为《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和经济管理问题》（莫斯科1965年版）。

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可能”，<sup>①</sup>而无法使自身妥善地为将来的任务作好准备工作，这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还有人强调指出，“给工厂下达几乎成千上万条命令、指示和其他立法条例，用来对工厂的每一步行动实行控制”，<sup>②</sup>这种做法造成工厂缺少在自己具有专长的领域里采取行动的自由，对工厂是不会有帮助的。工厂始终是计划体制中最薄弱、最易受到伤害的环节，而且它正如另一位苏联经济学家形容的那样，是该体制的“唯一致命的弱点”。<sup>③</sup>

在这个上级计划过于繁琐、下级计划又显欠缺的体制中，两种相互对立的情况得以发展起来：一方面，制订计划的中心总喜欢按照自己的逻辑确定和推行各项指示；另一方面，整个生产组织得不到适当的刺激去衷心拥护这些指示，去满腔热情地对指标的要求作出反应。为了完成数量指标，生产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肯定，这些指标并不总是能完成的），但是这在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故意死扣规章而减低生产的做法，即工厂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因完成刻板的计划定额而造成的危害，纷纷忽视产品质量，压制技术革新，绞尽脑汁去把资源隐藏起来。工厂经理们为了用计谋制胜上级机关，极尽其发明创造之能事，以求每完成一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计划，都能为自己捞取最大的油水；这些人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比起他们为完成计划指标所花费的气力来是毫不逊色的。于是，工厂在提高效率、生产率和利润率等经济发展项目上的工作几乎无人过问。计划的目标与体制在经济方面的实际进步脱了节。无论是工人还是经理，谁也不会对使自己企业变为一个兴旺发达的经济实体一事感到兴趣。就算工作干得好，产生了利润，这些利润也还是都要上缴国家。对于生产者来说，盈利或者经常亏损，结果都是一个样；经

---

① 见叶菲莫夫编《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莫斯科，1967年版）一书所收的叶菲莫夫和基里琴科的文章，在该书第274-275页。

② 见《社会主义生产管理》一书收入的卡申等人的文章，详见该书第93页。

③ 见И.亚科维茨所编《改革问题》（莫斯科，1968年版）一书中的文章《价格与企业》，详见该书第64页。

理们懂得，即便有了亏损，最后还是由国家出面负责弥补。有人描述过这样一种现象：在1958-1964年期间，企业所得的大部分利润都按规定上缴了，只有大约十五分之一到十九分之一留作奖金和物质刺激资金，在企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此外，国家还扣除折旧费，用来对各项事业、主要是对新建工厂进行投资，从而使原有的工厂缺少足够的资金、也没有权利去从事改建和更新。<sup>①</sup>

存在着的这一系列问题，损害了现行的模式和体现这个模式的意识形态。对计划与工厂人员的目标之间、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出现的这种持久不合的裂痕，需要进行更加深入透彻的分析，需要提出弥合补救的建议。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对形势的十分雄辩的说明，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缺陷。斯特鲁米林解释说，生产者、特别是工人，由于只能从工厂的奖励基金中分到极其微薄的一份，所以他们对自己工厂的生产活动的成果如何，表现得缺乏兴趣。“要求他们的是付出相当大的额外的精力，奖励给他们的却是区区几角钱。这样，工人们的利益被漠然视之，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国家充了公。”<sup>②</sup>

计划部门的办公室里，并不能轻而易举地发明出对处于庞大体系中进行刺激和推动的手段。在国家提出的指标同指导这里所谈社会集团的实际行为的刺激手段(或者刺激手段的欠缺)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不一致靠宣传手段来修补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在人们尚未写书论文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时候，有一点已经变得明白无误了：现行的计划和管理方式本身，导致生产者去完成那些看起来对计划有利、实际上对经济甚为有害的任务。诺沃日洛夫认为，错误的实行计划的做法、指标，特别是不恰当的衡量生产成本和生产成果的方法，“促使经济活动消耗过多的费用，追逐虚假骗人的成果，在经济核算与计划之间、企业利益与国民经济的

---

① 同上，第64-66页。还可参看书所收入的S.斯特鲁米林所写的《经济、开支和价格的形成》一文，见该书5-25页。

② 引自S.斯特鲁米林的文章，出处同上，见该书第22页。

利益之间引起了矛盾……”。<sup>①</sup>要想制止经济情况的下降趋势，要想成功地开展技术革命，就必须弥合这种分歧，以使俄国稳稳保住处于世界前列的地位。

## 两位批评家

著名的飞机设计师 O. I. 安东诺夫，在他所写的一部颇有名气的书中，讨论了存在于计划指标与促使工厂人员以不同于官方所希望于他们的方式完成任务的刺激手段以及促进因素之间起破坏作用的裂痕。<sup>②</sup>他对在 1965 年的改革以前实行的那种指标，甚至对以这类指标为自己主要产物的计划体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得出结论认为，“麻木迟钝的计划指标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十分巨大、令人无法容忍的损害”，必须立即开始动手对此进行检查和改变。<sup>③</sup>安东诺夫的这部书，文字活泼生动，内容引人入胜，为那些光看报纸、因而对这方面情况了解不够的人们提供了几十个事例，使他们看到由于体制上存在的矛盾，经理和工人不得不采取破坏计划、毁坏商品的荒唐无稽的行为。

安东诺夫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两个工人奉命快速地把砖头从卡车上卸下来。他们卸的方法是把砖头从车上往地下扔，通常总要砸碎大约百分之三十的砖。这两个人知道这样干既违背国家利益，又不符合简单的一般情理，可是衡量他们的工作和付给报酬都要根据时间指标。因此，如果他们卸砖的时候把砖小心翼翼地排放在地上，他们就会受到处罚，甚至还会无法谋生养家。他们干活儿的方式于国家有害，然而表面上看起来却于计划有利！于是，两个工人就做出了违反自己的良心和理智的举动，同时对计划制订者们满怀深深的怨恨：“你们不让我们以一个好当家人的态度对待工作，你

---

① 见诺沃日诺夫著《最佳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一书第 3 页。

② 见 O. 安东诺夫著《为大家也为自己》(莫斯科, 1965 年版)一书。

③ 同上, 第 190 页。

们要求的只是：快、快、快！那么好吧，砰、砰、砰！让你们的砖头见鬼去吧！”<sup>①</sup>这样一来，在全国到处，正派的、负责任的公民，有健全理性的人们，无不以这种挥霍浪费、近乎犯罪的方式从事着生产活动。

就国民经济的角度而论，上述事例以及其他许多事例表明，计划体制不能促使人们小心谨慎地进行工作，不能引导人们对企业进行健康的管理。安东诺夫指出了这种体制除造成无法估量的浪费之外的其他严重后果。国家关于提高经济的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确目标，偷偷摸摸地被各自独立的企业的一大堆杂七杂八的目标取而代之，这些企业表面上似乎由计划加以协调，实际上即使不算与计划背道而驰，也是在各奔东西、自行其是。该体制的另一个严重的缺陷是：在基层单位、下级机关和高级首长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互不信任的感觉。如同安东诺夫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上级机关总是认为，下级单位不会以对国家最为有利的方式进行工作；因此它们力主进一步对企业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然而互不信任的逻辑是无情的，任何人也逃脱不掉它的惩罚。高级首长也同样得不到信任，必须受到最高领导层严密的和一丝不苟的监视。这样一来，中央机关就成天为一些琐碎小事忙得焦头烂额，哪里还顾得上处理有关原则和长远政策的问题。由于每一项重要职能与权力都集中在上面，下级单位自我管理生产过程的作用就受到了妨碍或被排除了。这些单位，尤其是各个工厂，缺少灵活有效地采取行动的自主权；而另一方面，高级行政机关充斥着源源不断涌来的、使其无法驾驭的信息和情况汇报，它们欠缺的则是“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改进工作的建议”的能力。安东诺夫活灵活现地对行政机器的“军士长”作风作了这样的描绘：“次品和废品的百分比高了吗？降低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太慢了吗？提高提高！劳动力就业过度了吗？裁减裁减！产量指标没有完成？快干快干！”<sup>②</sup>

① 同上，第125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35-36页，134-135页，172-173页。

昔日那种“快干，快干！”的口号，在今天的苏联生活中仍然经常可以听到，它已经渗透到苏联的劳资关系之中了。各级头头都习惯于、并且领受了指示，从不可靠的和懒散的生产者身上逼出越来越高的产量来；可是在这同时，所谓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的陈词滥调却始终不绝于耳。安东诺夫从上面那两个卸砖工人摔碎砖头的故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在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是祖国责无旁贷的主人。墨守成规的计划以它盲目呆板的力量，使他们的作用下降为一台庞大神秘的机器上摇晃颤动的小螺丝钉，他们不知道节俭地对待国家财产，有时还不尊重虽然艰苦吃力、但却激人上进的美好的劳动。”<sup>①</sup>

在这一点上，安东诺夫可能是受了涅姆钦诺夫的启发，后者也曾对计划机构与工厂之间存在的“反常的关系”表示过关注<sup>②</sup>。声名狼藉的不相协调的指标，成了这两个人共同的写作主题；他们还都使用了同样的控制论术语，对计划体制缺少回复反馈感到遗憾。不过涅姆钦诺夫院士自然试图想对这种体制进行诊断检查并得出理论化的结论。他认为，中央经济领导集团“对大的和小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相互联系，理解得既简单又粗浅”，<sup>③</sup>看来这就是造成麻烦的一个很主要的根源。一方面，计划机制“使得计划的每一个条条块块上都各有其负责人”，但是计划作为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却没能得到足够的关心和充分的保证。

计划机制最易受到破坏的部位和最薄弱的环节，是它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问题。涅姆钦诺夫一一列举了那些没能很好联系在一起的功能和部门，其中他为之最感痛惜的，是“计划的价格体系未能同整个体制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生产和物资供应是有计划的，但价

---

① 同上，见该书第125页。

② 见涅姆钦诺夫所写《社会主义经济与计划生产》一文，详见《共产党人》杂志1964年，第5期，第7页。

③ 见涅姆钦诺夫所写《社会主义经济与计划生产》一文，详见《共产党人》杂志1964年，第5期，第53页。

格却是同这二者脱离开来的。供应体制本身充满了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经济的机能失调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具有破坏性的分散使用资源,以及随之产生的失去对使用这些资源的控制权,任其被“许多资金接受单位和无数自然资金管理机构”随意掌握。计划有着它自身机能不健全的地方。“计划的产量指标与物资供应指标之间,计划的数量指标与效率指标(可供使用性)之间,以及生产能力的利用与新技术的引进之间,存在着经常性的矛盾。生产计划、劳动资源、资金筹措和供应等等方面之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地互相结合起来。”<sup>①</sup>

有关涅姆钦诺夫的观点暂且就先介绍到这里。涅姆钦诺夫是知识界推动苏联经济学走向复兴的力量之一,他起到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为各种批评性意见的源源涌出打开了闸门,而且表现在为苏联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建议。这些建议,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进行讨论,这里有必要先把经济学家们对国家大事的批评意见补充完全。涅姆钦诺夫指出的那种计划的不同部分之间不协调的状况,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够平衡,其结果必然是使整个经济的效率十分低下。

苏联的学术研究者较小的程度上对禁区有所突破,对西方各国经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以及它们的投资战略和使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做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掌握了更好地理解本国经济结构存在的各种缺陷的标准。经济学家们对政策制订者解释说,经济的不同领域之间不恰当的相互关系和比例,还有这些部门内部的相互联系,都是过去的投资战略所造成的结果。一些反映资源使用不当和结构不佳的信号已经出现,其中包括忽视农业;在损害机器制造业的情况下强调建筑材料和采矿工业的发展;在损害石油开采的情况下发展采煤工业;以牺牲火力发电站为代价建造大型水力发电站;轻工业(吸收的资本少)相对薄弱以及对化学和电子工业的投资份额小等等。生产成本最高、生产效率较低的资本吸收部门起到了

---

① 同上,见该期杂志第6页。

过大的作用，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而那些促进革新、节省原料的现代化生产部门却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还停留在那里等待着它们时来运转的机会。

如果拿苏联的这种情况同美国进行比较，那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苏联的农业所使用的劳动力大约比美国多五倍，而其生产率（根据苏联官方估计）却比美国低五倍。森林采伐、矿物开采和建筑工业消耗的那部分人力物力，远远超过它们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另一方面，交通运输、通讯、电力、机器制造、工业维修、化工、电子、计算机、轻工业以及商业部门，在美国经济中占有的地位远远高出它们在苏联经济中的地位，苏联的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所以出现严重的下降趋势，问题主要也正出在这些部门。<sup>①</sup>

投资政策历来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事实上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因素；到了这个时候，投资政策也成了人们重

---

<sup>①</sup> 这里只是把这个问题非常简要地大致概述一下，以求引起人们对整个问题加以注意。关于西方谈及比较美国和苏联的资本构成与使用国民生产总值的方式的论述，可参看S.科恩所写的《苏联经济增长的停滞：资源的获得与使用效率的趋势》一文，该文刊登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外交政策小组委员会为第89届国会2次会议编纂的《苏联经济的新方向》（华盛顿特区，1966年版）一书中，详见该书第107和108页。关于主要涉及经济结构问题的苏联方面的研究著作，可参看诺特金所编的《苏联国民经济结构》一书第18-19页和277-280页；佩尔武申、文热尔和克瓦沙等人合编的《生产、积累与消费》一书中收入的S.海恩曼的文章《集约化工业生产与结构的完善》（详见该书第187-188页）；柯西金总理在他1965年9月宣布经济改革的讲话中（刊于1965年9月28日《真理报》上，《苏联经济的新方向》一书把这篇讲话的标题译为《论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和用经济手段刺激工业生产》，见该书第1033-1093页），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并号召经济学家们着手研究和帮助解决这个问题。S.海恩曼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4期（1969年9月出版，第72-73页）上的文章，也证实了存在着由经济结构上的弱点引起的人们的不安情绪。显而易见的是，要克服这种缺陷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海恩曼分析了农业、采掘工业和木材采伐是怎样以超过它们给国民收入创造的价值的比例，占用劳力和资本的（它们占用了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七和全部固定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一）；他指出，这些压在国家资源头上的沉重负担，“限制了发展转换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可能性”。这种结构上的弱点，还“大大提高了劳力和资本的吸收程度”，造成了资本生产率的低下。



新进行严肃认真的考虑的对象，并始终成为人们不断探索的一项重大的研究专题。被整整一代人当作经济政策主要推动力的基本建设实践，一直是在没有适当标准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使各种问题交替出现。折旧和更新问题的发生，使结构存在缺陷、效率即便不算完全没有也是十分低下的程度更加严重。工业建设的完工出现长时期的拖延，投资酝酿阶段漫长的现象的存在，这一切苏联经济中无人不知的薄弱环节，据一位有关人士认为，其今日的状况要比三十年代的时候更为恶化。“投资过度”成了表示机能失调现象的名称，其结果是在新企业的计划、建筑和投入生产，或旧企业的更新的漫长过程中，大量资源经常被长期占用、不能流通。俄国兴建一座工厂，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多用两倍到三倍的时间；这种进程的缓慢，是造成“技术进步速度放慢、资本吸收量增加、资本投资的技术结构退化、各部门之间比例发生不利变化，从而使资源亏损越来越大以至冻结”的一个关键性因素。<sup>①</sup>

上述那些做法可以使人们懂得，为什么兴建了那么多有时是相当现代化的工厂，仍很难弥补那种因已经开工的原有工厂的设备受到忽视、日益陈旧而造成的损失。折旧政策使工厂经理拿不到足够的资金去进行设备更新改造（大部分折旧收入都要上缴，以用于新建工厂的投资），从而使苏联的机器设备普遍地迅速趋于老化。<sup>②</sup>总之，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使生产者从事技术革新得不到任

---

<sup>①</sup> 参看M.费多连科所编《经济科学与实践问题》（莫斯科，1972年版）一书收入的V.克拉索夫斯基的文章《资本投资问题的展望》（见该书第202-203页）；诺特金所编《苏联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书收入的V.克拉索夫斯基的文章，见该书第3章第93页。如想了解建设周期较长这个问题的情况，也可参看B.格涅坚科所编《庞大经济体制的功能问题》（莫斯科，1969年版）一书收入的P.库兹涅佐夫的文章《物资技术供应体制中的情报与管理》，见该书第264页。库兹涅佐夫指出：“（在苏联）建成较为复杂的工业企业所花费的时间要比美国或者英国多三倍到五倍。”他对苏联的物资技术供应体制进行了指责，认为该体制充当了阻碍改进上述令人哀叹的状况的主要绊脚石。

<sup>②</sup> 叶菲莫夫在他所编的《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一书第308-309页中，详细介绍了苏联机器设备过度老化的情况。还可以看他写的《苏联工业》（莫斯科，1967年版）一书第297页。

何利益。沿用旧的办法、生产旧的产品来得平安稳妥，而搞革新却会受到惩罚。这就是形成至今仍困扰着这一体制的“憎恶革新”现象的背景。<sup>①</sup>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庞大而低能无效的“设备大修服务业”吞食掉的资源造成了可悲的沉重负担，它暴露出不同维修部门内部的结构和专业化（或者是不完善的合作）都存在缺陷。正在磨损和更换得实在太慢的设备经常需要修理，可是却没有专门从事修理的现代化设施。每个工厂都试图用自己的设备尽最大努力去修理毛病越来越多的机器，仅此一项就用去了物质生产资本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并占用了大量劳力；举例来说，工业用的全部金属切削机床，有三分之一停放在各个工厂的维修车间里。<sup>②</sup>

除此之外，“极端呆板僵硬（实行独特的定量配给）的物资供应体制”——它是“直接实物指标”的主要后盾，并被涅姆钦诺夫称作“最讨厌的东西”——被迫通过以详细有形票面单位形式出现的无穷无尽的大小基金，进行生产资料的分配；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就永无休止地要受到供应短缺的威胁，生产被延误耽搁，每月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都是在最后十天匆匆忙忙地赶出来的。由于工厂供应工作存在缺陷，全部工作时间的损失高达四分之一。<sup>③</sup>

苏联广大的读者公众，过去单凭他们个人的经历是不可能了解到这么多内情的；现在，这些令人惊愕的事实使他们恍然大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了同美国进行竞争的实际情况。虽然苏联得意洋洋地宣称，苏联在钢产量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但这丝毫也不能减少它本国人民所抱的怀疑情绪。就在当局宣称胜利的同一时刻，公众却能从1970年官方的统计手册上看到：

<sup>①</sup> 见G.格罗斯曼的文章《苏联经济中的革新与情报》，该文刊于《美国经济评论》双月刊1966年5月号第121-122页。“憎恶革新”是他的用词。

<sup>②</sup> 见克拉索夫斯基的文章《资本投资问题的展望》，详见《经济科学与实践问题》一书第206页。

<sup>③</sup> 引自埃尔曼所著《今日的苏联计划》一书第89页上引用的一位苏联人士的材料。

苏联在工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一半；农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仅仅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苏联的国民收入只不过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五（西方人士可能会说就连这一数字也是夸大的了）；而苏联的投资规模却和美国不相上下。<sup>①</sup>

1913年，苏联在上述这些方面同美国的对比中，所处的地位要不利得多；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是重要的；但是今天，由于军备竞赛和空间计划上的努力，它同美国竞争的性质就和1913年的时候大不相同了。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疯狂的武装备战和空间计划究竟耗费了苏联经济上多少资财。不过，根据能够获得的估算数字可以看出，就所动用资源的实物量而言，苏联花在防务上的本钱与美国比起来可能并不逊色，可这是以损害它那比美国虚弱得多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sup>②</sup>这一虚弱的经济把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用于投资，即两倍于美国的投资比例，而其设备的更新周期却比美国长一倍；它的工业部门的工人有百分之四十六是不熟练的或者只能勉强称作熟练的工人，这些工人在辅助性的、完全没有实行机械化的工作岗位上从事着手工劳动。如果把苏联的这些情况再同美国的标准加以比较，其结果大概会使他们大为沮丧。以效率较高的机器制造工业为例，苏联每三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从事货物装卸工作或是在国内运输部门就业；而在美国，每一个搬运工人能够负担二十五到二十六个基本生产人员的搬运需要量。<sup>③</sup>

苏联的工业缺少合格胜任的工人的情况十分严重，而技能不熟

<sup>①</sup> 见《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一书第82页。

<sup>②</sup> 有关苏联军事开支的估算问题，可参看M. 鲍列茨基的文章《苏联与美国在技术、生产率和经济效率方面的进展比较》（见《苏联经济的新方向》一书第154、231-233页）和S. 科恩的文章《苏联经济增长的停滞：资源的获得与使用效率的发展趋势》（见同书第122页）；鲁缅采夫和布尼奇合编的《经济改革：它的实现与问题》一书收入的哈哈图罗夫的文章（见该书第7章第202页），虽没有引用数字，但却较明确地叙述了苏联防务努力的巨大规模。

<sup>③</sup> 这些数字引自诺特金所编《苏联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书收入的扎明的文章（见该书第5章第125-126页），鲁缅采夫和布尼奇合编的《经济改革：它的实现与问题》一书收入的叶菲莫夫的文章（见该书第4章第131页）。

练的工人却比比皆是、出现过剩。从官方的手册和宣传材料上看，苏联的工程师也出现了过剩现象（1970年，苏联共有工程师2,486,000人，相比之下美国只有905,000人）。<sup>①</sup>

工程师队伍的庞大数字被苏联当局当作胜利来夸耀，也许这个数字只能表示：将来如果组织结构、生产率、效率和现代化问题得到妥善成功的处理，苏联的经济是有获得胜利的巨大可能性的。当然，就目前来说，它只不过表明了一种严重的落后和不足，根本不能保证正在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当年，赫鲁晓夫曾经许下诺言，要在1970年赶上美国；现在，这一诺言的实现，实际上由于当前这个截止到1975年、以达到美国1970年工农业产量为目标的五年计划而被耽搁了。<sup>②</sup>

苏联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取得了一些进步，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在目前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将获得新的进展。然而，关于赶上美国的诺言，正象在六十年代初期被批评者认为荒谬可笑一样，在七十年代初期同样象肯定会破灭的泡影一样无法兑现。

涅姆钦诺夫说过的一番话，最透彻地表达出作为我们在本章研究对象的六十年代的批评浪潮所最终形成的看法。他指责苏联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僵化的、机械呆板的体制，它的全部指令性指标参数都是预先下达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在哪个环节，整个体制都被从头到脚束缚了起来。”这已经不再是一时的症状或者轻微的疾病的问题了。整个计划和管理方式都受到病毒严重的感染和侵袭。

听吧，警钟已经敲响了：“一个从头到脚被束缚得如此厉害的经济体制，一定会阻碍社会和技术的进步，并且迟早会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之下分崩离析。”<sup>③</sup>

---

① 见《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一书第119-120页。

② 见《1971-1975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一书第337页，不过赫鲁晓夫许诺时的用语并不是特别不着边际的。他希望的是苏联在1975年在绝对意义上，而不是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达到美国1970年的水平。

③ 见涅姆钦诺夫著《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和经济管理问题》一书第53页。

## 第七章

# 探索补救的办法

苏联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机制所受到的抨击，使计划制订者们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在枝节问题上作些调整和修补，以及象人所共知的那样在组织机构方面进行频繁改组，都是于事无补的。对取代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展开讨论，应当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对这种意见，许多大权在握的官员和学者显然是不赞同的。他们希望的是保留改革派试图废弃的东西，并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工艺和改进管理的方法与质量，来使原来的体制增加活力。这些观点常常给最高级领导人造成影响。

但是，比较激进的持批评意见的改革派们已经看到：现行的体制是不能、或者说很难产生和较为努力地吸收先进技术的。他们由此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问题的解决则是工程技术人员力所不能及的。这是一种较为根本性的困难，随着分析和批判的逐步深入，这种困难的存在变得明显可见了。

事实上，某些总的看法已经为大家基本接受，成了无可争议的问题。面对劳力日益短缺、资本收益不断减少的形势，要想进一步使经济得到增长，主要只能依靠效率的改进和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新的形势使得资源“缺乏”的概念和需要把商品的“效用”当作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来考虑的观点，重新被引入到学术界里和计划制订者的思想之中，这完全是十分自然的结果。这些观念为一种新的思想方法的产生开辟了通路，而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对于走向集约化和提

高生产率的新转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另一项被人们广泛认为是提高效率的先决条件的原理，是需要对经济实行调整和改革，以便纠正它的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并且加强最具有能动作用、着重进行改革的部门和产业。

上述三点成为官方提倡的口号，不过持批评意见的人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补救经济状况的办法。他们认为，许许多多的紧张、压力、矛盾和机能失调的现象，都是因为整个体制固有的、发生在他们称之为“社会集团利益”或“社会”的利益与国家政策和国家计划之间的冲突、抵触所引起的。这个问题相当复杂，领导集团要想在保全全面子的前提下对此公开表示承认，可绝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做到的。但是，经济学家和一些领导人一致认为，加速投资以求扫清经济增长道路上的无数障碍的旧办法，只会进一步使经济弊病趋于恶化；这正是意指上述问题是实际存在着的。在劳力资源日趋不足的情况下，“牺牲消费强求积累”的方针再也行不通了。<sup>①</sup>必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求为提高生产率创造刺激手段，为此就不能仅仅在轻重缓急次序和强调重点上进行小改小革，而需要制定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一个经受彻底检查的机构是计划网络及其制订计划的方法，这显然是十分恰当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研究所的所长指出，要实现包括投资效率在内的国民经济的集约化，就不能不取消那些引起原料、金属、电力和设备长期短缺的严格计划。储备对于整个经济体制、包括过剩的生产能力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sup>②</sup>

计划的改进需要做哪些工作呢？对此，涅姆钦诺夫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在自己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讨论文章中指出：“根本性的和主要的任务，是使计划机制同经济核算制度和企业的

---

① 见 A. 伯格森著《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与生产率》(纽约, 1968年版)一书第18页。

② 见 A. 鲁缅采夫和 P. 布尼奇合编的《经济改革：它的实现与问题》(莫斯科, 1969年版)一书中收入的 A. 叶菲莫夫的文章，详见该书第4章，第132-133页。

社会基金制度密切联系起来。”<sup>①</sup>那么，如何使之密切联系起来呢？上面那段话意味着计划必须利用市场范畴，必须给直接生产单位的成员以必要的自主权和物质刺激，这委实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涅姆钦诺夫从现代控制论的角度分析了计划和中央集中管理的问题，认为它们缺乏的，是作为具有必不可少的反馈漏洞的自动调节体制的那种灵活性。其他一些控制论学者和系统分析学家也支持涅姆钦诺夫的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情况汇报泛滥成灾的危险情形，使贪婪的实行中央集权的人物陷入情报、报告的故纸堆中不能自拔，失去了富有成效地进行计划和管理的可能。这是因为管理机关的负担过重，从而丧失了辨别正确方向的能力；这些机关发现自己对于考虑和处理源源不断涌来的报告已是无能为力，只得随便作出唯意志论的、远非尽可能最正确的决定。<sup>②</sup>情报通信系统被情况汇报过度充斥以及它无法驾驭这些汇报材料的涌流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管理中心发布的指令经常落后于实际形势的发展。麻烦的问题在于，革命“把反馈关系这个新生儿连同剥削制度的污水一起给泼了出去”，但是，“用一句形象的话语来说，对自发调节和反馈关系的需要，正以同体制的复杂程度成平方的比例增长着；现在，我国的工业已经成为高度复杂的综合体系，在这种时刻，如果不引进自发调节的强大措施并随之组织起反馈漏洞，那么有效地对工业进行管理则是不可能的。”<sup>③</sup>

除了上述对计划体制提出的那些已经是相当苛刻的要求以外，数理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另一项令人生畏的要求：计划应当达到“最佳化”。在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仅仅平衡计划、使产量指标与所

---

① 见涅姆钦诺夫著《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和经济管理问题》（莫斯科，1965年版）一书第53页。

② 见B. 格涅坚科所编《庞大经济体制的功能问题》（莫斯科，1969年版）一书收入的V. 乌里扬诺夫、V. 加尔卡维和Iu. 鲍里索夫的文章《采用计算技术的化学工业组织自动化体制管理部门的几个问题》，详见该书第277页。

③ 见O. 安东诺夫著《为大家也为自己》（莫斯科，1965年版）一书第145页。

需资源相符合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的是达到更为精确无误的平衡，以便不单实现经济的任何比例，而且要通过线性规划的技术和数理经济学的其他手段，获得“一种精确计算出来的最佳比例的体系”。<sup>①</sup>

所有这些要求都被视作是使经济恢复元气的先决条件；它们表明：下至基层、上到最高权力等级的整个管理方式都需要进行改革。如果说最高等级的计划机构必须学会全新的工作方法，那么位于最基层的计划机构——生产单位本身（企业或几个企业组成的公司），也同样必须掌握该体制的新型职能。很多经济学家断言说，如果不给最高级的计划机构和最基层的计划机构以相当大的自主权，就无法使整个体制灵活自如，无法引入所希望的反馈机制。在对经济体制的弊病进行的这种治疗中，改善企业的经营条件是关键性的中心环节。下层生产者所认为的将要进行的体制改革的彻底程度，比上级机关头脑里设想的改革彻底程度要高。最高经济领导层总是希望，借助计算机和系统分析，就可以改善情况汇报泛滥成灾的状况和改进通信渠道，从而不必对下级单位的地位作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就可以照样维持其目前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这样，似乎中央及其所属机构提高控制管理能力，就会有助于企业最终改善经营生产的情况。

然而，许多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不仅对主要通过恢复中央管理能力的元气来实现经济集约化的主张持反对意见，他们还否认靠这种办法会有任何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他们赞成实行彻底的重新设计与改革，<sup>②</sup>声称现存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程度本身，就是机能失调的表现，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计划制订者们若要加强他们对基本经济

---

① 见L. 瓦阿格著《计划的完善问题》(莫斯科, 1967年版)一书第72页。

② 已故的A. 瓦伊什泰恩曾争辩道，从抽象的理论上说，通过重新实行中央集权来解决苏联的问题是可行的；但是从实际上说，这种解决办法所需的手段目前尚不具备，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具备。然而问题仍是紧迫需要解决的，因此除了权力下放以外别无他法。详见《经济与数学问题圆桌会议》(莫斯科, 1966年版)一书收入的他的发言(该书第155页)。



趋向的掌握，就必须倾其全力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本质问题之上；而那些多如牛毛的日常琐细事务，则必须在它们的发生之处——企业内部就地处理解决。为此目的，就一定要找出计划、中央领导机构和生产单位（工厂或者公司）之间所应当保有的新型关系。束缚工厂的手脚，压制它们足够自由地进行生产活动的的能力，是现行管理体制最为严重的缺陷。看来，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途径，以促使和激励成千上万个工厂、而不是成千上万个蹲在计划机构办公室里的官僚老爷，去为实现技术革新、为提高生产率和效率而奋战。在现行的实行计划指标的体制之下，所有的经济效能使工厂的工作人员陷入十分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之中。

显而易见的是，假如生产者能够获得在生产活动中采取首创主动行动的极大自由，他们就再也不是对自己的上级保持缄默的下属了。过去，企业要为亏损承担全部责任、承受全部负担，而政府各部、各总局和计划部门等行政管理机构，则不论其下达的要求多么不合情理、造成的损失多么巨大，也根本不受丝毫责备。现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让行政管理机关实行经济核算”的要求，表达了新的主张的本质。困难之处，正如一位法学学者解释的那样，在于根据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居于工厂之上的政府机构“可以从维持自身这个目的出发，自行决定它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可以确定从下属工厂征税的百分比。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当行政管理部门靠牺牲下属单位的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时，它的机构往往迅速变得日益庞大起来，它在工作的时候也往往对企业实行越来越微小琐碎的管理和监督”。<sup>①</sup>

这种看法的推理过程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经济体制要求各个工厂产生利润、尊重成本核算的标准，那么就必须在整个上层行政管理机构实行上述原则。这些机构进行的干涉往往是愚蠢荒谬的，它们制订的计划往往是不能实施的，计划本身在一年当中经常变来

<sup>①</sup> 见M.费多连科所编《最佳计划讨论文集》（莫斯科，1968年版）一书收入的R.哈尔菲纳的文章，详见该书第178页。

变去；要克服这种状况，除了使这些机构为它们自己的错误赔偿损失以及使其对计划执行情况和利润的赚取发生兴趣之外，别无其他任何办法。也就是说，高级行政管理机关，包括政府各部，要成为“实行成本核算的单位”，要为他们所掌管的部门内由于他们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亏损负直接责任。<sup>①</sup>

这一点只是整个看法当中的一个方面，它尤其得到了坚定不移的改革派马雷舍夫的极力鼓吹；它主张经济只能用经济办法来管理，而不能用目前盛行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管理。没有充满生气的基层生产单位，就不会有充满生气的经济体制。基于这种认识，人们更加侧重于对如何使企业富有效率 and 充满活力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计划”、中央经济管理机构同工厂和生产者团体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经济杠杆”、而不是直接命令和强制性指示的基础之上。要使“间接联系”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这就是说，中央一级的计划制订者将通过“经济刺激手段”开展工作，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种刺激手段将取代命令和制裁等“直接办法”——它们曾是通行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采用的主要办法，也是该体制的弱点所在。因为无论是制裁还是行政命令，都不能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充足的情报信息和必要的刺激手段。这些命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其他种类的情报，特别是价格、当地条件以及人们不同癖性的抗衡；每到这时，中央行政机关为了确保自己的指令得到实施，通常总会诉诸制裁的手段。但是，“正如许多世纪以来经济领域的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那样”，行政制裁的做法“对于刺激生产的作用，不如用经济利益或者精神利益进行刺激那么有效”。<sup>②</sup>

---

<sup>①</sup> 见《新世界》月刊第12期(1968年12月)上刊登的A. 别尔曼的文章《改革》(详见该期第203页)和M. 费多连科著《关于最佳功能体制的建立》(莫斯科, 1968年版)一书第26页。

<sup>②</sup> 见V. 诺沃日洛夫著《最佳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莫斯科, 1967年版)一书第34页。

这样看来，流行的行政计划和权力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所使用的刺激手段，从长远看本来就不如“经济杠杆”和“间接办法”那么灵验，它们无法对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的另一项重要条件——整个体制中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的产生，起到刺激和推动的作用。鲁莽急躁的实行中央集权的人物企图维持自己的控制、管理的梦想，同要求实行民主化的人士的愿望直接发生了抵触。

此外，民主化是一个新的题目，这个题目是在讨论以“经济杠杆”来代替“行政办法”的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里，它成了人们激烈辩论的一个主要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分析一下虽然经常与其他方面的含义相重叠、但自身意义范围却更为狭小的几个经济术语。在这个时候，人们对严格实行权力集中的体制发出了更进一步的指责：这种体制是按照纵向的等级命令系统，组织起从上到下各级之间的关系的，命令不断发布下去，报告不断传送上来，几乎完全排斥了各企业之间直接进行横向联系的可能。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争辩说，横向联系对于一个以最佳状态运转的经济体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呆板的机械服从”并不适合经济的需要。<sup>①</sup>必须允许企业有进行横向联系和交换情报、商品的自由，必须让它们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缺了它就不能建立起横向联系来。不过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自主权并不是绝对的，把自主权绝对化将会挤垮计划。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尽管某种程度的行政干涉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计划却不能滥用它那（现在已经名声扫地的）强制性的命令。

必须找出另一种管理经济的思想纲领中的各个特点，找出一种新的职能与权力的划分方法。用诺沃日洛夫的话来说就是：“对最重要的任务应当用双重办法——直接的和间接的办法进行管理，而对其余的一切任务都应当仅仅用间接的办法通过成本和利润定额来管

<sup>①</sup> 见 A. 卡采涅林鲍伊根、I. 拉赫曼和 Ju. 奥弗西延科合著的《最佳性与商品-货币关系》(莫斯科, 1969 年版)一书第 60 - 63 页。

理。”<sup>①</sup>

要实现这个目标，十分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途径。但是改革派所持的一致意见，似乎是中央计划应该倾其全力于长远的宏观经济学目标之上，即集中力量去搞经济的综合平衡、投资政策的主要脉络以及技术进步问题。而在微观经济学方面，则应该使用“制定参数”的方法，确保以适当的立法形式规定长期的生产条件和定额，并且还应对信贷、利率、特别是价格等经济杠杆和税收加以利用。

这样一来，企业在它的工作环境中，将受到政府及其中央计划下达的各项参数的强有力的影响，但它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将能自由地着眼于消费者而不是为计划进行工作；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为了为消费者工作这一目的，企业除了自身的计划之外，不需要有任何别的计划。

这种做法首先适用于基础雄厚的大规模生产线。到了一定的时候，企业就能摆脱整个“通过命令进行工作的计划方式”。还有人指出，琐细的计划不可避免地带有官僚主义的特征，它造成对企业日常事务的毫无必要的干预；企业真正需要的“是这样一种计划，它仅仅为国民经济提供一种骨架，一种类似透明框架一样的东西，这种框架应该给企业、工人、集体事业和地方事业留有足够的余地，以便它们自由地发挥其主动性；仍然处于中央计划之下的各主要经济部门之间，应当自由地进行这种主动行动的交流”。从根本上说，中央计划应该负责管理的是那些新产品和技术工艺上新的突破。<sup>②</sup>

这种看法看上去似乎有些走极端，可是它具有的含义肯定是深远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在寻求以“横向联系”补充

---

<sup>①</sup> 见诺沃日洛夫著《最佳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一书第41页。

<sup>②</sup> 见O.科兹洛娃编《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莫斯科,1968年版)一书第95页收入的V.卡申等人的文章。改革派当中分成不同的学派,有些上文已经引述过。大多数改革派都根本没有提出过废除现代计划经济,甚至所有现代经济当中一切行政管理措施的任何乌托邦式的要求。我们将要谈到,这些人主要是想改变新模式中强制性行政管理成分与经济自主成分之间的关系。

“纵向联系”、使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看法当中的一种。还有人试图寻求与此相对立的解决办法，即由中央包揽确定全部产量指标及生产方式的工作；虽然这方面的探求也在十分努力地继续着，但在改革派当中占优势的看法是：主张权力集中的人认为国民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企业，其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技术性的关系，这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应该把国民经济看成是规模宏大的一整套集团与企业的综合体，这些集团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技术上的性质，而且同样具有经济上的性质——事实上，经济上的性质是在这种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性质。

对“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关系的新发现进一步证实：需要恰如其分地重新确立国家计划同各种经济力量的迷宫之间的联系。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计划不能、也不应该试图超出规定经济活动的目的这一职能范围；而经济活动的目的可以包括利润指标或效率指标，但不一定包括产量指标。至于达到该目的的工作方法，最好是留给生产者自己去研究决定。有些改革派人士对计划的作用问题所持的意见与此略有不同，他们主张计划不应当去“管理和控制”经济，而只应该对经济进行“调节”。<sup>①</sup>

有些数理经济学家运用西方学者研究出来的数字演算规则系统进行推论，把国民经济的组成描述成一套按照等级次序上下排列起来的“木块”，每块木块都是有着自己的最佳性标准的相对独立的模式。下层的木块并不从上层的木块那里接受各项指标，它们接受的是一种价格（请注意，是一种价格，而不是大量各式各样的价格），正是这种价格指导下级单位制订出自己的、能给整个经济创造利润的计划。这就是说，这些下级单位各自的计划最终将同国家计划相一致，不过它们借助的是一种不同的经济调节与刺激的机制。

根据上面的设想，企业将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同时又将同上层

---

<sup>①</sup> 参看 I. 别尔曼著《制订最佳计划的方法》（莫斯科，1971年版）一书第30、33页。

那些“木块”保持紧密的联系；但是保持联系主要是通过重迭的过程进行的，即上层倾听下层关于资源方面的要求并作出反应——灵活地改变它向下指定的价格，而同时又在资源问题上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制。

这就是解开“计划与市场”之谜的途径之一。别尔曼在他所写的同一部书里，<sup>①</sup>还讲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另外一种途径，即借助于一种不同的、利用对策论而不是利用线性规划的数学方法。

以上这些和许多其他的看法和建议并不是表示改革派提出了完整的和被证明有效的解决经济难题的办法，但是这些看法和建议表明改革派们越来越一致地认为：苏联的经济要想实现资源利用的集约化，要想使经济结构有恰当的比例，要想使社会利益同地方上的利益协调一致，就必须把计划指导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有着几种不同的表达方法。诺沃日洛夫指出，人们应当争取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使计划的性质由“指挥管理”（即行政命令）转变为实际上的“经济命令”。数学手段和计算机将有助于找到把“使国民计划最佳化和使价格形成最佳化”结合起来的途径。这将赋予计划以新的力量，并且解除计划制订者的重担，使他们不用白费力气去执行“那种难以实施的任务”——“以中央集权的方式解决一大堆地方计划平衡的问题和通过行政管理办法来确保这些计划平衡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和经济核算制——它是体现“使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另一种形式——加以协调，是一项十分关键的任务，它成了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某些重要优越性”的明确条件。衡量这种协调程度的结果，将作为“评价经济管理是否完善的标准”。<sup>②</sup>

这就是这位不久前去世的教授留下的遗言。为了协调计划和市场，或者说为了把二者结合成和谐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必须首先创立一种经济理论；而如果不解决“价值规律”和价格这两个颇为棘

<sup>①</sup> 同上，见该书第33-34页。

<sup>②</sup> 见诺沃日洛夫著《最佳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一书第19、32、33和364页。

手的问题，上述经济理论的创立是没有可能的。

## 价格、市场与价值

在苏联的经济学界里，有数理经济学家，也有循规蹈矩、传统色彩较浓的经济学家；有的对国家计划更感兴趣，有的则对工厂的职能侧重研究；有的善于分析历史的趋势和走过的弯路，还有人则主要探讨当前的困难和经济方面不合理的状况。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众口一词地认为：一定要重新考虑和重新制订价格政策。制定价格的方法是在三十年代确立的，可是却一直沿用到六十年代中期。<sup>①</sup> 价格制定的过程或多或少总带有武断的味道，因为计划制订者在这方面得不到明确的理论性见解的指导。那些年代里，存在着把价格看成是次要的、日益失去其重大意义的问题的倾向；新经济政策时期行之有效的经济核算原则或称利润标准，在三十年代里被人为地削弱了，并且最终被行政管理手段取而代之。不仅仅是总产量，就连劳力投入、工资基金、物资供应和工厂经营的其他基本条件，也都成了行政管理的对象。<sup>②</sup> 价格和其他成本核算的形式失去了它们影响行政管理机关和工厂的活动的这种重要作用。同样，工厂的经理不再愿意考虑利润问题。资本也变成了一种进行分配的资源，它的使用不需要付任何价格。

虽然在“有形计划”漫长的统治年代里，价格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因素，但是它当然是不会被取消的；各种产品照旧被标出价格，制定价格时武断的办法无情地发挥着影响。计划制订者们由于没有正确的价格，不搞资本利息，不征收土地租金或其他资源的使用租金，遂失去了判断资源分配和投资政策是否卓有成效的标准。这些

---

① 见 A. 叶菲莫夫编《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莫斯科, 1967 年版)一书第 239 页。

② 见 Iu. 亚科维茨所编《改革问题》(莫斯科, 1968 年版)一书收入的 L. 勃利亚赫曼的文章《全面经济核算制》(见该书第 45 - 46 页)。这篇文章简要叙述了“核算原则”在苏联经济中的历史。还可参看该书第 66 页。

人没有资源相对缺乏的概念，不懂得、或者也不关心应当仔细地估价产品的成本。他们使中央行政管理机关承担了为七八百万种产品确定价格的巨大无比的任务，而这些价格几乎刚一公布，就已经陈旧过时了。这种做法的一个明显后果是使官僚作风蔓延滋生，因为仅仅从事这一项艰巨的工作就需要大批的人力。别的管理控制和分配的功能也有同样的结果，使毫不讲效率的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庞大，这些官僚机构侵吞了其他生产部门迫切需要的能源和资金。<sup>①</sup>

价格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畸形的现象；数不胜数的机能失调现象的产生，以及肯定会使经济体系遭受严重损失的资源利用的低效不当问题的发展，都是直接起源于对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属次要因素所持的忽视态度。<sup>②</sup>

价格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理论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中产品的性质问题。S. 斯特鲁米林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直到1930年）时期，曾一度成为计划工作中目的论学派的一个著名的代言人。这个学派对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任何客观规律这一点表示怀疑。而现在，积三十余年之经验，斯特鲁米林对那些信奉“产品直接交换”的人士以及在他们统治下流行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或者象斯特鲁米林本人解释的那样——被人们盲目听从的斯大林的观点）对“价值规律”的存在表示否认，对它所起的任何调节作用的否认就更不在话下了。根据这种观点，国营工厂的产品——特别是在国家所有制的各个单位之间流通、到不了非国家所有制的使用者

---

① 见D. 康德拉舍夫著《社会主义经济的价值与价格》（莫斯科，1963年版）一书第219—220页。作者在谈到战前和战后初期对重工业实行补贴的做法时指出：“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机构成天忙于计算应付（由企业）造成亏损的预算帐目，而忽视了重要的经济工作。”A. 诺特金编的《苏联经济发展的因素》（莫斯科，1970年版）一书收入的Ia. 克瓦沙的文章谈到，苏联经济学家和计划工作者的总人数，从1941年的879,000人增加到1968年的1,196,000人。详见该书第138页。

② 见诺特金编《苏联国民经济机构》（莫斯科，1967年版）一书第86页，涅姆钦诺夫著《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和经济管理问题》一书第29页。



手中的生产资料，根本就不是商品，而只不过是“产品”；因此，根本就不能把社会主义的生产看成是“商品生产”。<sup>①</sup>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起着为整个“行政管理式计划”、尤其是为错误地处理价格问题进行辩护的作用。但是最后，人们终于积累了足够的证据，懂得了价值范畴仍然是存在着的。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同势力仍很强大的“反对市场经济派”进行了斗争，并在事实证据面前屈服于真理，承认无论从哪个部门来说，苏联的经济过去和现在都从事着商品的生产。这意味着，总的来看，产品是进行交换的，而不仅仅是被直接调拨、占用和分配。生产者如果不出卖自己的产品作为交换，就不能占用别的生产者的产品。价格和货币都是不可缺少的经济要素，市场的存在——尽管是“社会主义的市场”，已经是再也无可否认的事实了。相反地，应该总结出这种形势逼人的现实所产生的全部不可避免的后果，应该制止那些以否认苏联经济的现实情况为依据的做法。

显然，这是一个从头到尾在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都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对马克思的学说、对经济理论以及对西方的经济理论与实践进行重新研究，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重新评价，也涉及到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前景进行分析和探讨。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任务，苏联现有的社会和经济思想水平还担当不了完成这项任务的重任。事实上，不论是西方的还是其他任何一种理论，都还不能很好地对现代复杂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实行必要的控制，因而也就不可能给苏联人在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方面提供可靠的建议。

苏联的经济学家，无疑还有政治家们，由于其看待经济所持的立场不同，所以在价值、市场和商品性质等问题上分裂成几个团体，或称几种学派。对那些自封为坚定的“反对市场经济派”的人来说，上述那些要素不过是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外来成分”，应该尽早

---

<sup>①</sup> 见 Iu. 亚科维茨所编《改革问题》一书收入的 S. 斯特鲁米林的文章，详见该书第 5 - 6 页。

予以彻底铲除。<sup>①</sup>

持另一种看法的人承认苏联经济中存在商品 - 货币关系，但是同时他们又自相矛盾，不肯同意国营生产部门的产品也是商品；这样，他们虽然承认现实，可还是加入到前面那个学派的行列里去了。

随着改革派势力的勃然兴起，形成了另外一种学派，他们的观点是：商品生产和货币 - 商品关系（贸易、货币、利润、信贷等等）系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核心；不过，他们也强调指出，在以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人所有权为基础的货币 - 商品关系与以社会主义所有权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别。<sup>②</sup>

在这最后一类相当狂热的“赞成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当中，产生了一种认为客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的理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从主要方面看，也许大部分产品都是商品，因而通过市场交换程序进行流通。然而，在有些部门里，在某些情况下，产品并不是作为交换价值、而是通过直接调拨和分配的方式进入社会流通的。这种“直接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当各种集团的人们之间的差别和相互矛盾的物质利益消失的时候，才会变成普遍存在的现象。而现实情形远非如此，所以这种“直接的社会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概念性的东西”。因此，不应当从“非此即彼、两者择一”的角度来看待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生产既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又有非商品生产的特征。至于哪种形式占主要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占主要地位，则取决于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历史阶段；在这方面，只要分析表明有的部门商品关系占主要地位，那里就应该“使企业可以自由地、不受束缚地从事经济活动，并

---

①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非市场关系，市场因素只能起一种辅助的作用。这种观点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仍然有很多拥护者。请参看 N. 查戈洛夫编《政治经济学教程》（莫斯科，1963 年版）一书第 205 - 207、289 页。

② 参看 L. 列昂捷夫的文章《深思熟虑的经济学家的看法》，该文载于《新世界》月刊 1969 年第 1 期上，见该刊第 251 - 252 页。

且拥有在与生产和销售有关的一切问题上独立作出决定的自由”。<sup>①</sup>

适合于“直接的社会”领域的关系，需要由一个统一的中心就进行适当的指导和协调问题作出决定。这样就出现了服从与命令的关系、个人(或者集团)利益同普遍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及其结果决定了上述相互矛盾的关系最后以什么方式结合为一体。<sup>②</sup>

除此之外，“货币-商品关系”(这是一些作者为代替“市场关系”一词所用的委婉的说法)为什么没有如经典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销声匿迹，反而被实践证明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项极端重要的机制呢？被认为代表了商品价格本质的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或称“劳动价值论”，又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这里面的问题有必要研究清楚。

上面两大问题的答案是全然不同的。<sup>③</sup>苏联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不光是“产品”，而且还是必须通过价格的调解进行交换的“商品”；对这件事，用以前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概念——即用列宁以他那较为乌托邦式的情调所梦想的、从本质上把经济看成是庞大的“一个工厂、一间办公室”的概念，已经解释不通了。为了能说明市场现象经久不衰的原因，就必须承认经济组织的复杂性，必须对这种复杂性作完全不同的理解。经济学著作家们指出，整个经济是由数以千计的生产单位、企业和工厂组成的，这些生产单位、企业和工厂都是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明显地相互隔绝；一些著作家认为，正是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分散、隔绝状态”，使这些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以货币-商品关系的形式出现。<sup>④</sup>这里还要附带说一句：如同许多人

---

① 关于这一学派的情况，请看 V. 什克列多夫所著《经济与法律》(莫斯科，1967 年版)一书第 61-62 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 62 页。

③ 卡采涅林鲍伊根、拉赫曼和奥弗西延科在其合著的《最佳性与商品-货币关系》一书第 88-93 页中，评述了在价值与价格问题上开展的辩论和得出的不同答案。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关系持续存在的原因，可参看该书第 94-109 页。

④ 列宁曾经把国民经济比作是“一个工厂”，见《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01 页。关于作为货币-商品关系存在的原因的“隔绝状态”的论述，请看 V. 洛帕特金著《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与价值规律》(莫斯科，1963 年版)一书第 18 页。

都会强调的那样，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央计划和集中化管理若不在很高程度上仰赖同一种市场机制，就无法履行其职能。

另外一些看法认为，市场因素的经久不衰和市场机制的必要性，是分工的结果，或者说是因为如果不允许企业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进行“横向”联系的自由，如果没有上级行政管理机关的干预甚至回避，仅仅在“纵向的管理体系”上组织起经济生活来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问题的特点在于，无论对市场现象的根源作何解释，进行这些解释大多数都是为强调给生产者以更多自主权的非常实际的必要性提供理论根据的。如果说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商品，而不单单是可以由上级机关随意调拨和分配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就应当要求“企业能有不受束缚地进行活动的自由，能有独立地解决与商品的生产与销售有关的全部问题的权力”。<sup>①</sup>

还有人也以此作为理论根据，极力主张在引进和完善“货币—商品关系”的方式上实行另一项重大改革，即取消由行政部门供应生产资料的机制（即物资—技术供应体制），用批发贸易网络取而代之。这个要求最早是 A. 别尔曼提出来的，很快得到了涅姆钦诺夫的赞同和继续鼓吹，最后在 1966 年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被接受成为官方的奋斗目标。不过它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其次，根据公认的教条的主要宗旨，商品的价格水平最后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支出”构成的一种“实体”来决定的。这种观点主张马克思的教义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促使许多正统的苏联经济学家去探索通过计算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来确定价格的方法。

然而，实践证明这样的计算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这种谬误说明，苏联的经济丧失了有效的价格理论和适当的价格制定方法。可是，战胜公认的教条是极为困难的事，它的困难不仅在于正统观念的绝对威力，而且在于创造新的经济理论以取代旧的理论的过程必然会

---

<sup>①</sup> 见什克利多夫著《经济与法律》一书第 62 页。

受到知识理论界的挑战。好在苏联著作家欢喜谈到的“生活当中的严酷现实”，有助于削弱和反抗上述那种站不住脚的、然而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信条；涌现出来的相互抗争的不同学派，各自都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看法。有的学派的代表人物，例如诺沃日洛夫，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旨在使之现代化的修正，采用了必不可少的边际分析，并把资源的效用及缺乏这一概念引入到价格理论之中。<sup>①</sup>另外一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声称，价格的背后并不存在什么实体，不能脱离开资本资产、原料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孤立地单用劳动对价格问题进行阐述。只有把劳动当作生产包含的因素之一，才能严格精确地计算价格。这种论点得到了一些数理经济学家的赞同，他们承认和高度评价市场关系，但是却不承认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价值规律”之间存在任何联系。<sup>②</sup>也有可能的是，数理经济学家当中有少数人根本就不相信市场机制，不过大多数人的确同意坎托罗维奇总结的“影子价格”的理论。坎托罗维奇认为，这种价格同劳动价值没有多大关系，但却需要对最佳计划涉及到的资源进行数学计算，这种计算是精心编制最佳计划的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③</sup>

苏联和东欧各国改革派经济学家当中持不同意见的各个学派都一致认为：不使制定价格的方法合理化，不把这些方法同计划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就无法获得最佳计划；不转而采用基本的经济办法，就无法形成令人羡慕的自发调节机制和反馈作用；企业必须为消费

---

① 见诺沃日洛夫著《最佳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一书第355-362页。诺沃日洛夫在书中还同R.坎贝尔的论点进行了争论，后者认为诺沃日洛夫的理论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还可参看R.坎贝尔的文章《马克思、坎托罗维奇和诺沃日洛夫：价值与现实》，见《斯拉夫评论》季刊第40期（1961年10月出版）第402-418页。

② 见卡采涅林鲍伊根、拉赫曼和奥弗西延科合著的《最佳性与商品-货币关系》一书第101页和第104-109页。A.诺夫在他所著的《苏联经济》（伦敦，1968年，第3版）一书第8章和第11章中，系统地论述了包括“价值规律”在内的苏联“经济规律”及在价格问题上的论战情况。

③ 《经济与数学问题圆桌会议》一书第63-106页上，刊登了L.坎托罗维奇向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解释他的价格理论的发言。他的主要著作是《对经济资源最有效的利用》（莫斯科，1959年版），该书的英译本是P.F.奈茨菲尔德翻译的（伦敦1965年出版）。

者生产，而不是为用官僚主义的手段制定的指标生产，才能获得不可缺少的自主权、首创精神和创造性的动力；企业应该关心利润，应该主要在总的参数指标上接受上级的指导，以价格作为自己发展道路上的主要路标。

简要地说，这些理论家们认为：应当把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加以改革，在这个市场上，大部分产出和投入，包括资本货物在内，都应该自由地进行流通。

## 涅姆钦诺夫的蓝图

社会主义经济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活动？围绕这一问题的设想和方案多如牛毛，本书篇幅有限，故不一一赘述。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兰格在战前提出的模式和他在战后撰写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还有南斯拉夫的做法所具有的影响，到今天仍然十分强大。寻求其他的或与之类似的解决苏联经济问题的办法的努力，还将持续一定的时间。或许我们可以说，是涅姆钦诺夫总结了大部分来自各派学者和经理人员的意见，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最全面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替代原有体制的经济活动模式。

涅姆钦诺夫所奋斗探求的是一种崭新的经济体制，他把这种体制称之为“实行成本核算的计划体制”；<sup>①</sup>诺沃日洛夫后来曾经以称许的口气评论说，涅姆钦诺夫希望借助这种体制，使“中央计划同经济管理民主化以最佳方式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涅姆钦诺夫直率地宣告说，应当以另外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其中包括本身概念已经改变了的计划，来取代现行的、“由上级规定的分配和定额制度”——苏联这个形象化的俄文术语是很难直译的，它的意思是指“一种批准—分配制度”。他引用列宁的论述说明计划原则的定义是

<sup>①</sup> 见涅姆钦诺夫著《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和经理管理问题》一书第12-17页和第39-48页。他得到了诺沃日洛夫的大力支持，具体情况可见亚科维茨所编《改革问题》一书收入的诺沃日洛夫的简短声明，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阶段》，详见该书第31-35页。

“有意识地维持均衡的比例”，并据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运用与司空见惯的年度计划中琐细的指标制度不同的、更加有效的办法，方能保证达到所希望的均衡比例；目前的计划必须重新起到“对它来说最适当的作用，即充当企业及其所属团体的经济活动的总的参考系统”；中央计划必须创立雄厚的基金，以便帮助计划制订者进行有效的干预和必要的纠偏，而这样的基金在依靠命令的体制中是得不到的；计划管理不应该依靠命令，而应该依靠立法来提供长期定额，合法地对所有的经济动因进行约束，这些经济动因包括有利于奖励基金的利润扣除比率、投资效率的部门标准以及集体农庄庄员的最低工资等等；中央计划应当尽可能少地下达指标；以银行和财政体系为基础的一个新的和更精干的情报与管理网络，也将有助于改进长远计划和当前计划；这些渠道比官僚主义的监督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银行能够更好地为国民核算和管理工作服务，并能以更有效的方式完成这些任务。

企业及其所属团体在长期定额所限定的范围之内，在经济立法的约束之下，必须自由地进行它们的经济活动，例如销售、获得资本货物、支配折旧费以及根据人们的强烈要求增加生产等等。

可供使用性的标准必须用来指导企业，它有助于把中央计划的目标同各个企业的利润所得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利益同地方的利益结合起来，所以它对于计划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同在经济杠杆和物质刺激问题上的这种新看法相一致，对经济进行有效指导和管理的主要手段应该是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合同。企业要自由地同它们挑选的原料供应单位签订合同性的、双边的或多边的协定，通过公司自己的商店或其他商业网点销售它们的产品，并且直接从供应单位或者通过政府的批发贸易获得产品。订约各方应根据现行的法律，就数量、质量、价格等方面的问题达成协议。企业了解了它们所订合同的条件和政府年度计划里列出的国家控制数字，就可以编制它们自己的产量和财政计划；没有必要使全部计划和经济活动的全面数字，都严格地同政府年度控制数字

保持一致，政府的年度控制数字将仅仅为核算和指导的目的而服务。

人们从上面这个模式，可以清楚地认出某些年青经济学家关于计划结构的设想的来源。根据国家与经济单位之间的新式关系，工厂自身的计划不需要得到国家的任何正式批准；不过，工厂仍必须从以强有力的主顾资格出现的国家那里获得对自己计划的间接批准。企业和经济机构每年将以几种备选条文，向所在地区的计划部门提交它们的计划，订立其生产纲要、产品各种可能的种类和范围、完成计划的成本及其资本基金的结构。计划和管理部门在受到自己的最佳性标准的指导并兼顾到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选择提出了最令其满意的方案的投标人。订货将由国家方面提出，签署的合同将对任何一方都具有约束力。

这样的一种模式表明：它采用了竞争的因素；它把下级生产单位实行高程度的计划，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要素；它采用了成熟的市场机制，国家和企业都凭借这种机制在协定和定额的法律约束下开展活动；如果它们认为条件对自己来说不合适，双方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或那个协议表示弃权。涅姆钦诺夫于1964年与世长辞，他未能来得及详尽阐述他的计划的细节，也未能来得及对由此产生的许多疑问和质询作出回答。不过，他所探求的变革的总方向是清楚明确的。不难看出，奥塔·希克<sup>①</sup>的经济改革思想的形成，在极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涅姆钦诺夫的启迪。也许，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来说，涅姆钦诺夫即便不是唯一的使他们备受启发和鼓舞的主要人物，也是有数的几位这样的主要人物之一。

---

<sup>①</sup> 奥塔·希克，经济学家，1919年生于捷克比尔森城，曾是“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之一。在杜布切克当政时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职务，主管经济工作。苏联侵捷后，他流亡西方。自1969年起在瑞士圣加伦大学任教。据希克称，他离开故乡是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形成、加深和完善改革思想。——译注



## “社会利益”

苏联的经济界和学术界围绕着上述那种或与之类似的方案和蓝图，展开了研究和论战；各种新的疑问和问题不断被提了出来。人们普遍对现行的经济学说进行重新考虑，并把一整套过去根本不允许提出的问题提交给公众去详细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各种意见、看法无疑非常活跃、激动人心。有提出修正的，有要求彻底变革的，有否定以前的教条的，有以坦率的态度对目前做法表示怀疑的，还有无拘无束地对西方情况进行了解调查的；这一切的一切，简直构成了苏联经济思想的一次复兴，甚至是一场革命。它们所代表的，是同以前看待经济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的方法的大决裂。

经济学家们重又想起了一个被人们遗忘了的角色——消费者；他们开始极力主张重新规定生产活动的目的，回想起生产基本上应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而生产本身则不应被视作目的。一般地说，这些经济学家强烈要求生产和经济活动为消费者服务，适应消费者的定货要求。根据旧的标准来看，这种做法意味着使生产屈服于“消费情绪”，因而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但是，经济学家们反驳说：“消费者的订货和要求并不是心血来潮的怪想，也不是风行一时的事物，而是取得进步的必需条件。需要本身的本质决定了它们是讲究经济效益的，因此它们通过经济杠杆对生产的影响，比用任何行政标准都更为有效……”<sup>①</sup>

人们对消费需求的注意，导致了“社会需要”这个更广义的概念和“利益”这个以前从未使用过的概念的出现。正统的意识形态框框强加给人们的观念是，苏联存在着一个或多或少和谐、或者说日益和谐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据认为是由工人和农民“两大友好阶级”和一个“同盟者阶层”——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党在这个社会

<sup>①</sup> 见 O.科兹洛娃编《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莫斯科, 1968年版)一书收入的 V.卡申的文章, 详见该书第94页。

结构中能轻而易举地看出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这种论调是用来为党的政策及其大权独揽的做法辩解的意识形态纲领的中心思想的一部分，也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特有的主要假设的一部分。

现在，对此持批评意见的人指责说，忽视消费和消费者就等于忽视社会需要；苏联的经济体制不理解基本的社会现实，又不能依靠社会利益开展活动，于是便选择了看起来似乎更容易一些的、诉诸行政压力的办法。但是由于该体制挤垮了各个社会集团和个人的利益，由于它把这些集团和个人当作一架机器上简单的齿轮轮牙来对待，所以就迫使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关心照顾他们自己，结果给经济和道德观念造成了破坏性的损失。<sup>①</sup>

围绕市场机制和苏联企业的“商品”生产能力问题展开的论战已经表明，苏联有可能发生这样的转变，即发现和领悟“利益”这个概念，不仅把它当作改革纲领的理论基础，而且把它作为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先决条件。“市场经济派”当中较为保守的人士在这种异端学说面前忙收住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其他的人却逾越了这条界线，声称“在社会主义所有权关系的结构内部，存在着组成社会分工的各种不同联系所特有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利益”。<sup>②</sup>对此，态度较为教条主义的代言人则带有预见性地回击说：“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与私人企业的利益相类似的特殊利益。”<sup>③</sup>

这场意见冲突，实际上涉及到对社会化所有权或国家所有权的作用和地位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党自己掌握的从事社会研究的学派所维护的观点是，国家所有制是新型社会制度的中流砥柱，是形成新的阶级团结和社会统一的力量基本源泉。然而，经济领域内的

---

<sup>①</sup> 可参看别尔曼的文章《改革》，见《新世界》月刊1968年12月号，第109、202页。别尔曼在文章里反对把劳动者仅仅看成是经济机器上的齿轮轮牙。

<sup>②</sup> 见 V. 巴季列夫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莫斯科，1963年版）一书第215页。

<sup>③</sup> 见洛帕特金著《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与价值规律》一书第26-27页。

论战却揭示出，强大所有者的存在丝毫不排除集团利益的出现，也丝毫不排除所有者（即国家）的利益同生产者的利益之间出现深刻的不一致。国家作为所有者而存在，意识形态和国有化本身的原则又竭力把工厂的成员说成是真正的主人，可是二者之间并没有自然而然就相互一致的地方。

对由于研究经济（和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保守派势力是不会随随便便就容忍的。新的看法认为，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一旦感觉到自己是工厂实际的主人，就会在劳动和管理工作中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推动。群众如此积极地参与作出决策的过程，将会保证他们的工厂和办事机构的工作获得成功。但是工厂的成员从来不肯接受他们是“所有者”的观点；相反，他们总是看到国家这个所有者在小心戒备而又专横暴虐地行使着其所有制赋予它的权利。这就成了产生疏远现象的根源，它所引起的与刺激因素的效果适得其反的作用，是无论多少宣传和任何党的监督也无法扭转、无法抑制的。

苏联经济体制产生疏远现象的一种方式，是在生产者当中培养起麻木不仁的情绪；斯特鲁米林认为这种情绪的形成，是由于工人和管理机构失去了“直接参与分享他们自己用劳动创造的利润”的权利。<sup>①</sup>群众中蕴藏的革命热情，既来自他们怀有的某些长远的历史性抱负，也同样来源于他们对满足日常需要所抱的希望。这条基本真理被官方在制定教条和决定做法时置若罔闻。不过，长时期地无视群众的日常利益而又不受惩罚是不可能的。必须把参加生产过程、从事经济斗争的人们的物质利益，溶合到思想观念之中去；这一点如果需要证明的话，是不难从列宁的语录中找到根据的。持批评意见的人士明确地断言说，不考虑或者损害生产者的经济利益的计划，是应当不予执行的。他们引证马克思的话，提醒那些无论把持了多高职位的、过分热忱的行政官员们说，一种想法“脱离了实际的利

---

<sup>①</sup> 见亚科维茨编《改革问题》一书收入的斯特鲁米林的文章，详见该书第22页。

益，则将陷入深刻的危机……”。<sup>①</sup>

这样，经济学的复兴就造成了对与之在性质上有密切联系的社会学学科的需要。经济学家懂得，他们研究的领域的确同其他学科有着相一致的地方。经济学著作中出现的“社会利益”的概念，就是体现这种一致性的一个例证，该概念理所当然地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此外，事实上，社会学也的确几乎是与经济学同时产生的，所不同的是社会学这门新学科和传统型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着非常危险的竞争；比起经济学的来，它受到的党的监察人的监督要严密得多。<sup>②</sup>尽管如此，社会学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控制，仍然和经济学一样从事着同样的与陈旧教条对抗的斗争，只不过它对抗的方式更为隐晦和令人难以捉摸。

最后，在学术界的圈子里，产生了要求官方承认社会研究方面的另一门学科——政治学的压力；可是经过一番兴奋、骚动和辩论之后，官方拒绝了为这门新学科发放“许可证”。然而，官方纵可以逃避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现实，但它并不能阻止人们在意识形态的“黑市”或者“半黑市”上对种种概念展开讨论，而地下出版物就是这方面最出名的事例之一。

## 改革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应

1965年底，经济改革终于开始了。它那一整套十分复杂的措施还远远没有定型；它的整体思想，就象一个合法所生的嫡子的命运一样，首先由改革派经济学家公布于世，接着在改革发动之后的年

---

① 见科兹洛娃所编《论社会主义生产管理》一书第116页（引用的系马克思的话）。

② 社会学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承认并开始存在的（布哈林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的副标题，即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科书》），但其后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而打入冷宫。有关苏联社会学的情况，可参看乙·卡茨的文章《苏联的社会学》，载于《共产主义问题》双月刊1971年5-6月号，第22-40页；A·西米连柯编的《苏联社会学》（伦敦，1967年版）一书；D·莱恩的文章《苏联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学》，载《英国社会学杂志》季刊第21期（1970年），第43-51页。

代里成为人们不断争论的话题。政治家、经理人员和学者居然能组成联盟去从事这一错综复杂的冒险事业，也真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闻了。柯西金总理可能堪称整个这场运动的主要政治后盾，他于1965年9月发动了经济改革；改革的实际步骤极端谨慎小心，这种情形自然不会出人意外。尽管如此，当时宣布的改革措施，的确是以使用改革派经济学家和经理人员希望的“经济办法与经济杠杆”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最热情的鼓动者之一A.别尔曼，为九月措施大加欢呼，称其为和苏联过去历史上的两次转折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一次转折；他所指的那两次转折是，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宣布和1929-1930年斯大林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制的实行。<sup>①</sup>

这场得到官方赞同的改革运动，完全承认货币-商品关系的重要性，并且着手修改价格制定方法的理论和实践。利润指标的重要意义也得到了承认，它同销售额一起，取代了以前的总产量指标和一大堆许多已被丢弃不用的琐细指标，变成了制订计划的一项重要标准。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相互之间发展直接关系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与此同时，公司（各种联合企业）也成立了起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削弱了以前拥有无限力量的政府各部的特权。顺便提一句，政府的这些部是根据改革纲要重新恢复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代替赫鲁晓夫通过其失败的试验搞起来的、实行权力下放的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体制。

除此之外，经济改革为了提倡对基本经济资源采取更合理的态度，还开始实行较为实际的价格制定方法，对资本追收费用，并把

---

<sup>①</sup> 有关官方对经济改革的纲要，可看柯西金的演讲《论改善工业管理》（载于1965年9月28日《真理报》上）和A.别尔曼在《全会召开后的感想》一文中所作的评论。这两篇东西都已译成英文，载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外交政策小组委员会为第89届国会第2次会议编纂的《苏联经济的新方向》（华盛顿特区，1966年版）一书第1067-1093页。还可参看E.札列斯基著《1962-1966年苏联的计划改革》（北卡罗来纳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1967年版）；M.埃尔曼著《苏联的经济改革》（伦敦，1969年版）；A.巴林基等人合著《六十年代苏联的计划与市场》（新不伦瑞克，新泽西，1967年版）等书。在《苏联研究》季刊的合订本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改革的不同方面的文章。

利润当作资本资产率来进行计算。同时，企业也得到了权力，可以提取其利润中更大的份额为它们的某些投资提供资金，或是建立各种不同的奖励基金，把这些款项作为奖金，分配给那些表现出色的工人和经理人员。

在其后几年里，改革运动由于它强调市场机制、强调刺激手段和强调间接杠杆而遇到了麻烦。虽然改革是在谨慎小心地推行着，但反对改革的势力却一直不断加强。各种思想的源源涌出以及开始被人们贯彻采纳，似乎等于打开了一道危险的防洪闸门；较为保守的势力认为：应该在为时未晚的时候赶紧把这道闸门关上。

保守势力觉得，新的思想、甚至那些表面上不带有政治色彩的新思想，以其对“经济杠杆”和由此对间接管理（而不是习惯上的、经过考验的直接管理）的主张，吹捧了一种较为灵活的经济体制，似乎起到了能毁掉千里长堤的裂缝的作用。对大大分散特权、对自主权和支配整个体制的权力以及重新规定中央政权与地方的关系这一系列进一步的要求，预示着影响、特权和势力将要重新划分，预示着新的制度、与以前不同的领导、新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关系上新的趋势将会竞相出现。许多处在权力高位上的人明智地感觉到：继续沿着改革的道路走下去，将无异于自取灭亡，至少对统治集团的核心部分和对整个官僚阶层来说是自取灭亡。他们拿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作为证据，发表反对市场办法、反对权力分散和反对新的模式的言论。布拉格之春成了说明不适当的进行改革的热情能把党的统治和控制破坏到何等地步的范例。

正象人们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反对经济改革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凶狠恶毒了。反对派势力从政治经济学教授的队伍里产生出来，这些人过去所以升迁发迹，全靠信奉与经济现实完全脱节的教条，他们经常大批特批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他们能从每一种新出现的思想当中觉察出“离经叛道”、“修正主义”和其他“道德上的罪恶”的气味来。

但是，起着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是另外一些在党的领导机

关和政府各部供职的、支持那些教授的人物；改革派把这些人称之为“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拥护者”，或者更加轻蔑地称作“原始的中央集权派”。这种人愿意接受增进协调和效率的变革，但是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在变革的同时必须能加强中央集权机构的控制权。

还有另外一种划分争斗营垒的方法：是“拥护用经济办法进行管理”还是“主张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这个术语是本书作者使用的，持这种主张的人又分成几个不同的学派）进行划分。“主张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的人反对“用经济办法进行管理”，认为这会“削弱国家在经济管理上所起的作用，削弱经济发展中的计划原则，从而导致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产生抵触”。<sup>①</sup>一些“中央经济统制派”还争辩说，改革派是想创立一种由工程师、技术专家、经济界头面人物在削弱党的领导的情况下自己取得支配地位的体制。

自1965年以来，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懒惰散漫、墨守成规和其他习惯势力，一直对破坏改革的种种努力起着为虎添翼的作用。凭借维持司空见惯的旧管理办法发展起来的既得利益，最后还有在高级行政机关和工厂经理队伍当中存在的愚昧无知现象和缺少合适干部的状况，都给改革的推行增添了许多额外的障碍。

可以想见，保守主义和惰性当然会对任何体制的重大变革起阻碍作用。而在苏联的情况下，还有另一种因素在起阻碍作用，这就是占垄断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一味沉浸在为政府的、特别是为党的现行政策或做法进行辩护和歌功颂德，结果往往助长了保守派的力量。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它的党建立的，所以它在形成的过程中，就自然成了在意识形态上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由此而产生的压制首创精神的做法和非常不适宜开展讨论的气氛，有利于那些企图维持现状的势力，使整个体制丧失了自由表达意见、交流情报信息和开展批评的可能。党作为特定的政治—行政垄断者的作用，过去是、现在仍是最根本的问题。党简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管，连工厂的

---

<sup>①</sup> 见 A. 别尔曼的文章《改革》，载《新世界》月刊1968年12月号，详见该期第188页。

车间也不放过，当地的、地区的和基层组织的书记都在对周围进行监视，国家机关的管理部门、秘密警察和检察部门就更不必说了。对这样的体制结构来说，就连考虑一下取消被其奉若神明的管理办法，也成了威胁性的行为。在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处处实行“直接管理”的人看来，改革派经济学家似乎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危险人物，至少也是潜在的危险人物。

根据这种背景，人们不难理解：苏联对杜布切克和奥塔·希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所进行的镇压，既是针对“不负责任的”捷克人的，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国内持批评意见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奥塔·希克提出的那些批评和建设性方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涅钦诺夫的建议。<sup>①</sup>

保守势力组成的新的联盟似乎在布拉格事件之前就已经占了上风，捷克的“修正主义分子”遭到镇压以后，该联盟的势力又大大加强，并转向以呼吁和施加压力等较为传统的手段，要求进一步严格纪律、加强责任感和振奋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同时，面对着无数急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它指望依靠科学技术、电子计算机化的管理和情报交流的改进，在不触动、不危及现状的前提下，使行政管理部门现代化，并且改善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

上述这些情况，就是最近这次于1973年3月、也就是对本书正在作出版前最后一次修订的时刻掀起的改革浪潮的明显起因。<sup>②</sup>这样的改革本身虽然并不是不明智的，但是它只涉及管理和行政范围内的问题，只是单纯地追求提高效率，对“间接杠杆”、“民主化”

---

① 这方面的情况，可比较F.费日多在他著的《斯大林死后的人民民主的历史》(巴黎,1965年版)一书第425页中谈到的看法。

② 这一次的改革，不过是模仿二十年代的“托拉斯”和现代美国公司，把苏联企业改组成强大的“联合企业”或者公司。每一个这样的联合企业或公司都拥有若干个遍布全国各地的企业，并将具有多种职能和获得迄今为止只有部级机构才能得到的特殊权力。与此同时，在改革的初始阶段给予企业的(而且体现在“企业的地位”中的)特权，将由拥有许多工厂的公司的管理部门获得。有关这方面改组的详细情况，请看《经济报》周报第14期(1973年4月)，第3-4页上刊登的官方公告。



等等几乎缄口不提。这一次，改革的行动大权完全掌握在“明智的和负责的”人士手中，这些人当然懂得：其他国家的大工业公司，都是按照等级组织起来的、卓富效率和以不断革新为目标的生产者；他们没有理由认为，在严格的管理和技术这方面与外国大公司有一些相似之处，就会给任何现行的政治制度造成危害。相反，沿着这样的路子大大提高生产，只会有利于改善统治者本身的和他们执掌大权的方式所留给人们的印象。

不管改革目前的命运究竟如何，也不管七十年代初期笼罩着俄国国内状况的气氛是怎样地不容乐观，六十年代出现的那场激动人心的沸腾，毕竟以其进行批评的热情以及在经济思想领域内创造性的突破，翻开了苏联学术成就史上新的一章；并且从许多方面来说，它也的确代表了苏联经济生活中不可逆转的潮流。通过这场论战展现在苏联广大读者公众面前的，是以全新的方式对经济模式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的描述，是关于西方现实情况和竞争制度的比较经济的大量资料情报以及特别是这方面的较为真实可信的报道——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苏联知识界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那些对自己国家的问题感到兴趣的公民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上述那些问题的性质，促使他们乐于去对支配着自己国家政体的机制作更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 第八章

# 对国家进行的抨击

正如上一章内容所表明的那样，经济领域内的论战和一些改革以其最终产生的政治反响，使保守派势力感到胆战心惊。西方有许多人士也同样认为，苏联实行市场机制和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势必会将其影响蔓延到政治领域，并将造成一连串的事件，直至把政治多元化引入它的体制之中。至少来说，国家行政官僚机构将会被削弱，权力结构将会改变形式。<sup>①</sup>

在特定形势下，当然可以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推理。不过，问题在于类似这样的“逻辑”并非只此一种。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机制可以在独裁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实行而不对这种体制产生危害；在民主制度变质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常常以完全中性的形式出现，而且，民主制度也并不是获得很高的生产率和实现技术革新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但是，现实往往如此：改革派运动可能带来的成果之一，也许就是使政治制度大大改变；经济论战和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各派营垒本身的结构组成，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很多经济学家对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办法，甚至对用不那么粗暴的行政办法去作为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厌恶。他们认为，自己是同拥护用这种办法管理经济的营垒进行论战的一方。改革派希望通过解除计划制订者难以应付的职能，使其工作更加卓有成效；希望通过让下

---

<sup>①</sup> 参看 A. 肖恩菲尔德发表在《今日世界》月刊第 3 期（1970 年 3 月号）上的文章，详见该期第 96—97 页。

级行政机关、基层单位及其成员获得更大的权力，使整个体制权力下放甚至达到民主化，以便使经济恢复元气。他们甚至鼓吹让工人获得企业管理事务方面的发言权，而不管南斯拉夫提出的这类要求曾经产生过什么样的反响。

为了反对上面那些要求和纲领，“主张权力集中的派别”集合起来了。他们企图精简行政管理机器，运用电子技术，以达到强化中央统制的目的；他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更有效地掌握情报资料的交流，更有力地对生产者进行控制。对这些人来说，“民主化”不仅是无足轻重之举，而且是需要避免的结局。

由此看来，在开始的时候，出现的各个营垒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因为它们明确提出要把改革引向大大改变制度体系、使其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道路。

这场改革从“经济学”方面蔓延，波及到“政治”方面，这种情况在思想和理论领域内的体现，比最终在一连串未来发生的事件上的体现，显得更为直接，更为明确，也显得更加不可避免。事实上，研究人员们对经济体制进行的抨击和要求给企业更大自主权的举动，必然使他们卷入到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更大问题中去。他们指出，不发展市场机制，就谈不到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他们当中有些人通过分析“社会利益”，还对国家的社会所有制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与实质进行了重新估价。

这些思想逐渐得到了发展，逐渐从较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领域延伸到范围更广的社会—政治领域，并在这种延伸的过程中引起了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性问题。

首先，当参加论战的人对经济组织的弊端、生产率方面的窘境和刺激因素的缺乏等内容进行研究讨论时，一个不可避免地经常萦绕在他们脑际的重要问题就是：过去使用的管理办法，为什么居然变得麻木僵硬、形成了“一个比例失调的体制”而得不到适时的修补和改进？

对此作出解释实在是一件冒风险的事。经济学家在突破这一危

险的禁区之前，先对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谨慎小心地作了间接的暗示。许多人认为，计划制订者们历来高居于生产者之上，高居于“整个经济”之上并且变得与经济完全脱离。计划制订者除了受自己顶头上司的监督之外，从来不受任何人的监督；他们对自己作出的不合理的、引起比例失调的错误决定，从来不负任何物质上或其他方面的责任，可是这些错误决定给生产者和给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们独自对生产活动的标准、方法、手段和别人不得不付的价格等问题作出决定。涅姆钦诺夫、文热尔以及其他一大批持批评意见的人士坚持认为：现在是时候了，该让那些计划制订者们为他们制订错误的计划承担责任了；如果必要的话，也该让他们掏出自己腰包里的现金来为其错误赔偿损失了。

在苏联的具体情况下，“计划制订者”这个专门名词的意义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如果“天真简单地”加以理解，它指的是各个计划部门。不过这些部门都有头头。“计划制订者”可以很容易地成为“政府”、甚至成为“国家”的委婉的代名词。指责计划制订者及其武断专横的决定，就不能避而不谈体制的中央领导——国家政府的责任。国家政府才是真正的“计划制订者”，它实际上不受任何约束和任何监督，不在法律上或者政治上承担任何责任。有些以经济语言发表的声明，谈到计划制订者高居于生产者之上，不对任何人承担责任和义务，并且把自己具有破坏性后果的决定强加给工厂管理人员；这种声明之所以在任何时候都十分危险地与那些关于苏联国家的性质及其统治者的地位的批评性政治言论异曲同工，原因正在于它涉及到上面说过的国家政府的责任问题。

事实上，不突破这个禁区，不跨越这道界限，经济就没有出路。有些人得出结论，至少是对1965年改革之前的事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经济计划执行迟缓不力的状况，既有其社会-经济组织方面的深刻原因，也有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深刻原因；苏联的经济管理制度表现出自我封闭的迹象，妨碍了它发挥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生活作出充分恰当的反应的能力。年高资深的经济学家们指责

说，苏联的现行经济体制不具备“改变”和改组计划与管理体制、使之适应新的条件的能力。<sup>①</sup>直言不讳的安东诺夫以他那锋利尖刻的比喻，嘲弄了党用来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传统办法。这种万应灵丹就是找到“合适的人选”去解雇偷懒的工人并给所有的人下达命令。可是实际上，经理人员和党员纵然可以被解雇，各种弊病却依旧存在，甚至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取而代之。“斩下龙的一个头，它又生出两个新的头来。社会又一次举剑挥去，又一个龙头滚落下来；然而龙又长出新的、面目狰狞的头，吐出舌头嘲笑我们，吞食国家的物质财富。”<sup>②</sup>

对于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思想培养出的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会得出什么样的标准公式是不言而喻的。上述现象的积聚表明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矛盾，结论必然是应该使阻碍经济发展的不适当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否则就会产生危机。（这是重复关于苏联的经济体制无法变动其制度的指责的另一种说法。）不幸的是，如同现在人们所说的那样，在苏联发展初始阶段的一个时期内，人们对这条典范真理的重要性是“估计不足”的。<sup>③</sup>

正式说来，上述现象是指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事。但是引起现代经济学家的注意与忧虑的，却是后来在六十年代发生的种种现象；他们继续套用同一个公式，并且找出其他的公式来告诫领导人说：党和政府对那条基本原理的要重性“估计不足”的情况仍在延续。

---

① 见 S. 佩尔武申、V. 文热尔和 A. 克瓦沙等人合编的《生产、积累与消费》（莫斯科，1965 年版）一书第 17 页和第 242 页；该书英译本由 S. P. 佩尔瓦申译出（纽约，怀特普莱恩斯，1967 年版）。

② 见 O. 安东诺夫著《为大家也为自己》（莫斯科，1965 年版）一书第 12 页。

③ 见 O. 科兹洛娃所编《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莫斯科，1968 年版）一书收入的 V. 卡申的文章。莫斯科市委书记叶戈里切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也讲过同样的话，见《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66 年版）一书第 125 页。事实上，这些人一直是一字不差地对党的书记言听计从，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比党的书记得出的结论具有深远得多的意义。

经济领域里的论战，拯救了苏联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新的概念——“社会利益”及其矛盾的概念。在给予企业自主权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使得在工厂成员各自利益这个更大的问题上的各派意见产生了尖锐对立。举例来说，我们前面引过的一位著作家扎拉索夫，就懂得并且承认企业的“相互隔绝状态”是形成市场范畴的一个因素这个概念；可是接下去他却为了明哲保身从这一认识的立场缩了回去，高唱起“主张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派”的教条来，认为企业特有的、各自的利益是根本不存在的；企业领导人是由国家任命的，他必须按照国家的命令工作，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作为国家的下属人员，难道他不因此而要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吗？另一种与之形式不同、本质一样的观点认为，企业属于全社会所有。社会“创造了企业，也可以自由地消灭企业，更不用说从它那里预先占取资源这点区区小事了”。<sup>①</sup>

这种势力仍很强大的、得到官方支持的教条，受到了新观点的毫不含糊和全面系统的挑战。持新观点的人们认为，真正的生产者工厂而不是“国家”，企业有着自身的利益，不仅各个企业的利益不一致、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而且有的时候这些利益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就是在工厂内部，行政部门同工人之间也可能存在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sup>②</sup>

背离现实的、否认各种利益的不同与差异的学说，使得领导层对下面这事实视而不见，即正是存在着各种社会利益的不同和冲突，“不允许人们仅仅通过直接统制计划来进行经济活动”。合理的出路在于用物质刺激手段补充这样的计划，使各个工厂、工厂的各个部门以及每个工人的无数单独的、具体的利益有可能得到满足。<sup>③</sup>

---

① 见 V. 洛帕特金著《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与价值规律》（莫斯科，1963 年版）一书，第 26、27 页。

② 参看科兹洛娃编《社会主义生产管理》一书收入的 L. 洛基诺夫的文章，见该书第 114 - 115 页。

③ 同上，见该书第 115 页。

官方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现实的详细状况作深入研究，而是提出一些一般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公式，津津乐道地使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权团结了人民，保证了真正的利益一致和同志式的合作”这类晦涩含混、夸大其词的空话。然而，如果这样的说法的确属实的话，苏联社会中所有那些不胜枚举的争斗和有时十分尖锐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经济学家们一方面对尖锐的利益冲突避而不谈，另一方面却又错把意愿和希望当作现实。问题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觉悟不到、由于主观上的原因或者“对任务缺乏足够理解”，而是由于更深刻的客观因素所致。虽然社会所有权在实际上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利益一致而且消除了私人所有制固有的各种矛盾，但是它的实现“根本没有消除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所形成的种种矛盾”。<sup>①</sup>这一段还是安东诺夫的见解。

这一类的批评意见向许多被奉若神明的教条提出了挑战。这实际上等于告诉党说，它的经济理论不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它那无视社会利益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也同样成问题的。这样一来，在苏联条件下的“利益”这个新题目，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和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具有爆炸性的专门术语。只要这条简单的概念在实际运用时被人误解、被人笼而统之地加以对待，制订的计划就不可能达到相互一致和富有成效，社会主义的真正概念就会受到严重损害。这一点并不是一个苏联作家时时刻刻都能坦率直言的，不过他可以用暗指的办法来进行说明。经济学家别尔曼认为，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人民的利益被“吨数和立方米”取而代之了。他主张应当一直把“劳动人民的利益”作为中心，可是实际情形显然并非如此。他还指出，使劳动人民的利益得到满足，“应该成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整个经济政策的基点；以这些利益进行感召并通过这些利益进行工作，应该构成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机制的基础。”<sup>②</sup>

<sup>①</sup> 见安东诺夫著《为大家也为自己》一书第16-19页。

<sup>②</sup> 见A.别尔曼的文章《改革》，载于《新世界》月刊1968年12月号，详见该期第190页。

## 政治理论的新萌芽

不管对经济体制进行研究的人探讨哪一方面的问题，不管他们探讨的对象是计划、物资供应体制的迷宫和价格，还是工厂的地位和物质刺激的手段，是微观经济学的现象和造成的压力，还是宏观经济学的比例失调，他们每个人最终都遇到了行政机关的权力这个问题。假如一个行政机关为了自身的维持，可以任意决定从下属生产者那里提取多少价值，那么这个机关的编制势必越来越臃肿，它实行管理、控制的胃口也会越来越大。哈尔菲娜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曾经补充说，这种现象产生和滋长了武断专横的风气；管理过度集中，基层单位的首创精神就会受到束缚，整个生产过程就会发生病态的变形。正如马雷舍夫在他所写的一部书中谈到的那样，如果把计划说成是无所不能的东西，那么人们的经济关系就会被看成只具有次等的重要性，或者只具有一种从属的性质，这就成了“带有强烈偏见”的态度。<sup>①</sup>它将导致高级行政机关宣称自己掌握着“整体利益”的准则，宣称这一准则在道德上和在其他方面是占优越地位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平平安安地无视社会关系以及各种集团、利益、观点和冲突组成的复杂网络；一句话，就可以置整个“文明世界”于不顾了。苏联的农民、集体农庄和整个农业的状况说明了这种传统做法究竟会产生何种结果；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例子表明，在苏联，人们的首创精神受到束缚，群众利益惨遭践踏，官僚主义横行无阻，市场范畴被曲解和滥用，毫无根据的教条不断从上级机关强加下来。现在人们认为，上述各种情形有着共同的特性，即一方面“政治”脱离了“经济”，另一方面“政治”又脱离了“利益”；人们用各种不同的术语，对由此而产生的主要现象进行描述，这些术语包括“毫无道理的、超出经济范畴以外的行政压力”、“官僚主义对

---

<sup>①</sup> 见 I.马雷舍夫著《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计划》(莫斯科, 1966 年版)一书第 25 页。



现实的歪曲”、“经济上的唯意志论”，最后干脆是“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

就这样，各式各样的分析研究都抓住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强大机构独断专行这条共同的线索，只有强有力的权力机构才能够在整个一段历史时期内武断专横、为所欲为。国家，或者说管理国家机器的制度这一堪称整个政权的关键的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所有抨击的众矢之的，而且人们似乎觉得它即便不是产生大多数问题、也是产生很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苏联的情况下，除了国家制度本身，哪有什么别的机构能够进行“无理的、超出经济范畴之外的高压统治”，能够把没有现实基础的概念强加于人，能够肆无忌惮地无视社会利益呢？

马雷舍夫提出，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要谴责和鞭挞这种“超出经济范畴之外的行政压力”；<sup>①</sup>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认为这些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国家的权力结构问题这一观点也同样是成立的。经济思想和对补救办法的探索要想有真正的意义，就必须不仅对“经济”、而且也对“国家”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致力于发展成熟完整的政治理论。

不管这样做会遇到多少困难，苏联的经济思想还是鼓起勇气踏上了这条道路，开始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巨大权力、它滥用权力的现象以及产生这种独断专行和滥用权力现象的根源进行辩论和探究。

经济学作家们对上述现象造成的危害已经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他们着手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的政治性问题进行认真的考虑。一位著作家起初颇有些心有余悸，他用笼统的话语承认，“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容易产生行政官员滥用他所得到的权力的危险。”<sup>②</sup>他没有对有助于滋生这些现象的条件作出说明。但是其他一些人却根据自己从经济现实中得来的教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用行政

---

<sup>①</sup> 同上，见该书第57页。

<sup>②</sup> 见S. 扎拉索夫的文章《论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方法》，详见《经济问题》月刊1968年第10期，第37页。

办法进行管理，直接依靠的不是人们的经济利益，而是执掌大权的政府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唯意志论才有可能象蝶蛹中的蝴蝶那样潜藏下来，待机繁殖。”<sup>①</sup> 权力集中化也同样是这种情况，权力集中本身并没有错，甚至还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无视经济规律，这种权力集中化就会变成“束缚经济发展的桎梏”。<sup>②</sup>

这种说法所暗含的意思是，需要对国家实行控制，以求制服它的主观主义和具有破坏性的独断专行的倾向。改革派们是能够提出一些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借用恩格斯的权威论述，来强调对国家进行严格监督和加深对国家的本质的理解，是多么紧迫的事情。国家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个人们熟知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可是单凭这条原则并不能使苏联摆脱它那进退两难的窘境。必须对一个比国家与它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更大的问题，即对从更笼统的角度来说的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恩格斯曾提出过下述论点：根据他的解释，国家在经济领域内采取的行动，也许会产生三种可能的结果；其一，适应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行动是有益的；其二，与经济发展的总趋向或者经济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所有重要国家的历史业已证明的那样，国家注定要遭受不幸；可能还会有第三种介乎前两者之间的结果，即国家的行动在某个方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在其他方面又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进程。恩格斯指出：“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sup>③</sup>

---

① 见科兹洛娃编《社会主义生产管理》一书收入的卡申等人的文章，见该书第81页。

② 同上，见该书中收入的维列夏金和杰尼索夫的文章，详见该书第23页。

③ 同上，见该书第72页上卡申等人引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莫斯科，1965年第2版）第417页上的话。这段话是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从伦敦写给C.施米特的一封信上说的。

据本书作者所知，这段语录在被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们查到和引用之前，从来未在苏联的任何文献作品中出现过。恩格斯的权威和他在這段语录里或其他地方谈论的内容，可能会使某些人士感到窘迫为难；使这位奠基人的声音归于沉默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人们崇拜他的形象，而不是让人们学习研究他的著作。一旦有人对他的著作进行认真严肃的学习，这些著作里的思想就会迸发出雷霆万钧般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研究社会制度变革的有力武器，它不仅激励人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也激励人们投身于推动这种变革的斗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研究上的立场，可能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俄国。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为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目的服务的工具；但同时，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定要服从或是使自己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需要和变化，否则就会引起破坏性的后果。这种概念似乎清楚明白地显示出苏维埃国家发现自己所处的那种境遇的情况。因此，某些经济学家对上面所引的那段恩格斯的话推崇备至、爱不释手。然而，恩格斯的那一观点却使极力想保持现状的人感到格外不合口味，因为正是这种人把持的国家被揭露出犯了两条罪过——没有能力使自己的制度适应这种“基础”的需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制造了阻止经济发展的障碍。恩格斯认为，这是两条对国家来说有着致命威胁的罪过。

## 什克列多夫的论著

前面谈到的改革派研究的一些同政治范畴有关的思想多少有点儿显得零乱分散，这些思想基本上涉及的是其他方面的内容，只是偶尔才鼓起勇气触及具有较大爆炸性的政治理论范围内的问题。过去，在苏联文献史上，从来没有人试图提出过全面的理论纲领，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V. P. 什克列多夫所著的《经济与法律》一书出版才告结束。《经济与法律》是一部简短而又非常精炼、内容充实的

理论研究著作，是高度抽象化研究的结晶；它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一部论述经济、政治、社会和法律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理论著作；它把到目前为止无数经济学家零乱分散的评论、思想和认识，重新组织成一个紧凑连贯的整体，从更高的高度上进行推理和论证，并找出了形成各种现象和趋向的更深刻的原因。虽然什克列多夫得出的公式显得枯燥单调，而且似乎同当前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是他的这部书，仍不失为对处在经济改革的阵痛中的苏联体制面临的基本问题所作出的简洁概括。特瓦尔多夫斯基被开除出《新世界》月刊编辑部以前，该刊发表的题目也叫《经济与法律》的对这部书的热情洋溢的书评，就特别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书评作者说，读者无疑将会“从(书里)抽象的概念中，看出对实际生活里存在着的现象的反映”。<sup>①</sup>

什克列多夫的这部著作以政治理论为其主要论题。作者把他论述的主题归纳为“客观生产关系与主观意志下人们的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sup>②</sup>他还明确表示，这一特殊问题的解决，看起来是理论上的事，然而却是十分紧迫的，因为苏联经济生活的必要任务之一就是，“彻底克服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唯意志论”。实际上，什克列多夫对苏维埃国家、对以斯大林主义而闻名于东方和西方的整个体制中的一系列特性，都逐一进行了分析。不过他避而不用“斯大林主义”这个词，他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第一，如果他使用这个词，就会给出版自己的书增添麻烦；第二，苏联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是不能仅仅用某一个人物的行为来进行解释的。于是，该书就既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也没有出现“个人崇拜”的字眼；然而，人们却可以透过字里行间看出一种有趣的暗示。

作者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

---

<sup>①</sup> 见 V. 格奥尔基叶夫的文章《经济与法律》，详见《新世界》月刊 1968 年 10 月号，第 278 页。

<sup>②</sup> 见 V. 什克列多夫著《经济与法律》(莫斯科，1967 年版)一书第 21 ~ 25 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莫斯科，1960 年版)，第 315 页。

“政治”总的来说是“经济”的表现形式这个一般性前提。列宁甚至还说过，“政治不过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什克列多夫针对这种公式化的表述，补充了一些重要的限制条件。他认为应该对列宁的这种提法加以改动，变为政治并不完全与经济等同一致，因为政治还依赖于许多另外的因素。<sup>①</sup>举例来说，国家必须照顾和满足的，不仅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有国家专职行政官员、特别是另一个特殊集团——国家领导人的利益。<sup>②</sup>

在对苏维埃国家进行研究的浩瀚文献当中，是这部书第一次提到国家领导人集团的存在，也是这部书第一次承认该集团可能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这样一事实。对于推动政治社会学的发展来说，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到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见地！

什克列多夫还列举了其他影响到政治决策的因素：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以及领袖人物的影响和个人品质。他的结论是：国家在同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上，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或称相对自由，是产生经济领域内单凭主观意志行事的现象的一个根源；当然，这样的行动并不一定天生就带有武断专横的色彩。但是，当为了维护某个个人或某个集团（行政机关）的物质利益，可以不顾现实的形势和隶属于这些集团的经济单位的生产情况时，武断专横和脱离经济现实的现象就又多了一个更容易滋生的条件。这就是说，“武断专横、单凭主观意志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就更大”。<sup>③</sup>这种情况非但不会激发行政机关采取客观上对生产必不可少的行动，而且甚至会促使它反其道而行之，以致给经济的发展造成损失。

实行计划经济，使独断专行的做法进一步扩大。从主观上讲，领导人怀有的动机可能是最好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实行计划经济，使他们比在别的经济体制下更容易忽略对现

---

① 同上，见该书第 94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见该书第 14 页。

实际情况的考虑)，因此不仅经济会遭受损失，而且到头来这些领导人也将发现：他们所采取的自由行动实际上并不象自己感觉的那样自由。

什克列多夫以下述方式阐明了这个有点儿使人感到困惑不解的论点：在生产关系领域内，严格地说，独断专行实际上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可是在产品的调拨和分配领域里，情形就不同了。单凭主观意志的行动在这一领域内比在直接生产的领域内具有大得多的自由活动的余地。<sup>①</sup>

什克列多夫指出，用来表示一个领导人独断专行的范围与程度的公式，同适用于整个国家情况的公式相类似。也就是说，领导人所能享有的行动自由，取决于他们所统治的国家拥有的行动自由。领袖人物个人的品德特性并不一定就是产生大规模武断专横行为的原因，造成独断专行的因素是这些人物生活和进行活动的环境与条件。<sup>②</sup>因此，什克列多夫倾向于集中力量，对使国家得以如此脱离经济和社会现实、得以为其领导人提供漫无边际地异想天开或肆意表达憎恨厌恶的可能性的那些条件，深入地进行研究。在这方面，作者的观点同马克思不谋而合。马克思认为，不能把个人的品德看成是创造这个人本身之所以形成的那种条件；马克思在谈到路易·波拿巴的时候反驳了维克多·雨果的观点，说雨果“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指路易·波拿巴——译注）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接着，马克思对自己在研究路易·波拿巴其人时运用的方法作了解释。这种方法就是说明实际的阶级斗争是怎样造成下列条件的：它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英雄的角色”。<sup>③</sup>

---

① 同上，见该书第12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14-15页。

③ 同上，见该书第15页。什克列多夫援引的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

难道什克列多夫引用这段马克思的语录，意在暗示他对斯大林的真实看法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位作者无疑倾向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方法去解释苏联的历史。人们不禁想知道，一旦苏维埃国家不再对什么可以研究、什么不可以研究作出硬性规定，那么描述斯大林的苏联的《雾月十八日》会是一篇什么样的专著。人们也许会猜想，如果什克列多夫写出了这样的专著，他大概会说明国家和单凭主观意志行事的具体的领袖人物，最终将如何会在若干方面、特别是在与经济有关的方面，受到非常具体的限制。什克列多夫实际上探索研究的制约因素，包括现有的技术水平、劳动分工、流行的经济价值观念以及由历史发展形成的需求体系。生产关系并不单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还是一种物质关系，所以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干劲，最后会“发现自己处在无穷无尽的合乎规律的必然性之中”。<sup>①</sup>对于每个人来说，越是尽早地理解这一点就越好。

从什克列多夫对所有权关系和法律作用的论述当中，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到他关于国家及其活动性质的概念。这一概念帮助他发现了使国家得以随意自由行动的又一条原因，并据此修改了苏联意识形态中一项“神圣的”重要原则。什克列多夫那非同一般的、把经济决定论思想和对国家拥有自主权程度的现实的认识结合在一起的特色启发了他，使他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许多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什克列多夫认为，法律是国家根据其意志采取的有意识行动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在国民经济领域内的表现形式。法律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工具，对于确定所有权关系或者改变这种关系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所有权是人对物所拥有的权力，它基本上是一种意志上的关系。这种观点认为，不应该把所有权关系同生产关系混为一谈，从而向被人们公认的教条提出了重大挑战。抢劫或者剥

---

<sup>①</sup> 同上，见该书第17页。

夺所有权的行爲，尤其是象在革命时期那种猖獗横行的抢劫和剥夺所有权，有可能改变所有权(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主体，并可能由此而影响到生产进程的继续。这将使人们产生“某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所有权高于生产，对生产起决定的作用”。<sup>①</sup>但是再生产进程一经开始，这个错误观念就会不攻自破。生产关系将自行其是，并将最终对所有权关系产生影响。后者具有法律性质，拥有极大的独立性和持久力。它也可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经历任何变化，而在此期间经济却可能向前跨越几个阶段，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什克列多夫断言，实际起作用的生产力的真正社会形式不是所有权关系，而是生产关系。

就所有权关系而言，国家所有权是社会主义所有权独特的、或者说最高级的形式，它成了苏联意识形态的一条准则，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一块奠基石。在什克列多夫看来，那些持正统立场的人令人可悲地一味“混淆经济关系与法律关系”；“这种混淆两类关系的现象”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在苏联成了十分普遍的现象。<sup>②</sup>被他直截了当地斥之为“蒲鲁东主义”<sup>③</sup>的正统立场认为，不论是用手工工具生产还是用自动线生产，社会主义所有权都始终一成不变。根据这种立场，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内部真正的关系不再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发展的东西。经济概念也变成依附于唯意志论的法律上的概念，并具有这样的含义：只有当所有权的法律形式产生变化，整个经济范畴才能有所发展。可是如果这些应该发生的变化实际上未能发生，“那么整个经济范畴就将变得僵化和停滞不前”。<sup>④</sup>使经济范畴不去反映物质的和具有历史能动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而去反映法律上的这种关系，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的背叛。什克列多夫呼吁，为了“最终克服政治经济学领域中

① 同上，见该书第25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3页。

③ 同上，见该书第160-163页。

④ 同上，见该书第188页。



的法律观念”，为了正确地研究经济关系，而回到马克思的立场和观点上来。他认为必须粉碎那些错误的观念，因为“客观地看，那些观念是经济上唯意志论的做法在理论上的翻版”。<sup>①</sup>

上述批评性意见，为以新的现实主义观点看待工业国有化在苏联历史上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开辟了道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什克列多夫同样贡献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识。

他认为，法律这个超出经济范畴之外的因素，在国家强制行为的支持下，对经济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法律是作为超出经济范畴之外的强制性因素在起作用的。它影响人们的意志和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由意志而产生的关系；它可能改变和调节所有权关系，但是法律、或者一般地说所有的强制手段，都“既不能建立和改变生产关系，也不能调节生产关系”。<sup>②</sup>法律不能拯救变得陈旧过时的生产关系，也无法摧毁同技术变革相适应的发展中的新的生产关系。<sup>③</sup>它不能使现有的资本货物的数量或者积累资产的数量得到增加。法律强制手段本身并不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行为，不管动用什么样的力量，也无法靠高压来创造新的生产关系。<sup>④</sup>国家通过一些途径，尤其是通过帮助摧毁陈旧过时的生产方式，可以协助和促进新的生产关系向前发展；但是如果国家非常缺乏理智而又非常强大，它就能在事实上完成“任何破坏性的工作”，还可能为经济发展制造障碍并且摧毁现有的物质财富、生产资料 and 消费商品。<sup>⑤</sup>所以，国家的强制手段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成大规模的破坏生产力的行为，这种情况在国家使用超出法律范畴之外的办法（这些办法违犯了国家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完全不合法的）时特别容易发生；而以合法的形式实行的强制手段，至少具有建立某种形式的秩序和使经

---

① 同上。

② 同上，见该书第 48 页。

③ 同上，见该书第 49 页。

④ 同上，见该书第 46 页。

⑤ 同上，见该书第 45 - 46 页。

济活动可以继续下去这一优越之处。

什克列多夫在指出生产关系——“真正”的经济生活不同于官方所有权法律所包含的内容以后，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在苏联的条件下，究竟谁是所有权的真正拥有者？从形式上讲，国家是唯一的拥有者，它通过直接与企业保持联系的机构把所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什克列多夫认为，所谓国家是唯一的所有权拥有者的公式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苏维埃国家不仅行使着政权，而且还直接管理国民经济，这就使问题更为复杂了。国家履行一个拥有者的某些职能，但是却凌驾于生产者和所有权拥有者之上。如果国家是唯一的一个拥有者的话，那么它对所有权关系的调节就将成为自我调节的问题了。<sup>①</sup>

什克列多夫并不否认，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理所当然地应该行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总体”商品的所有权，不过所有权并不等同于生产。生产是由企业来进行的，因此，不管法律如何规定，企业是所有物的真正占有人，没有它们，国家无论要调拨、占用什么商品都无从谈起。客观的研究结果表明了企业在经济上的相互隔绝的特性；所以，这种特性同样决定了企业作为所有者也是各自独立、相互隔绝的。

什克列多夫解释说，整个经济之中并存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一种是相互严重依赖、高度集中、技术水平又很先进的单位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样的单位已经足够成熟，便于直接统一管理，服从中央的控制和上级机关的直接安排。不过这并不代表经济结构的全貌。很多生产单位在经济上是分散、独立的，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货币—商品关系。什克列多夫推论说，只要存在这种情况，资源和产品就应该成为独立分散的生产单位的所有物。由于直接—天然型和市场型这两种关系并存于整个经济当中，所以两种所有权关系也应该同时并存。

---

<sup>①</sup> 同上，见该书第99—100页。

什克列多夫在他的书中以此为根据，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所有权的法律概念就是指一个抽象、人格化的社会的独占所有权的人士。他觉得，这些人无法解释，国家所有制部门内部的商品关系的存在，怎么能同否认企业对其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相一致起来。<sup>①</sup>持上述观点的人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似乎一直是受到某种幻想出来的意志所支配的各种不同物品的堆积。可是事实上，国家作为所有者，其意志根本就不能“脱离单独的和具体的实物”而存在。<sup>②</sup>

## 所有制、计划与法律

关于国家所有权和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流行概念，是苏联一种独出心裁的新理论。随着这种概念受到批判，三种与官方概念不同的、彼此性质也各不相同的学派分支也就应运而生了：一种对历史事件和过去进退两难的困境，特别是对苏维埃国有化及其在国家体制发展中的作用阐述自己的观点；另一种对经济计划的制订提出新的思想；最后一种对有关社会主义的定义问题表述新的、全面的看法。

有这样一种论调：“所有权只有达到由整个国家至少对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进行调拨和安排的程度，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sup>③</sup>什克列多夫非常清楚，当自己同这一观点展开唇枪舌剑的交锋时，实际上是对官方教条的核心发动了进攻。克隆罗德教授是支持上面所引的观点的，在他看来，使企业获得调拨安排的权力，将意味着失去社会主义的性质，因为那样做的话就会违背另一条社会主义原则，即所有参与经济进程的单位在经济上一律平等。这个以他为代表的仍在苏联官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学派认为，企业是不

---

① 同上，见该书第178-179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107页。

③ 同上，见该书第186页。

应该拥有所有权的。该学派的基本思想是：企业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区别于整个国家利益的特殊利益。

对此，持批评意见的人士指出，人们目前正在争论、思考经济困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困难正是由上面那种思想造成的；而这里，以什克列多夫为首的新观点派，针对那种思想提出了另外一种见解。什克列多夫再次从“利益”这个大家熟悉的概念出发（不过这次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谈的），坚持认为：独特的所有权具有多面性，其原因仅仅在于基本的社会现实并不是某种抽象的千篇一律的事务；由于社会是一个整体，其中各个部门、尤其是产品与生产资料的调拨和安排部门，都必然会出现各自的特殊利益，所以所有权可以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非常自然的是，这些各自的特殊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不一致的；如果它们受到压制或是漠视，生产进程就会因为生产者很难实施他们对客观事物意志上的支配而受损害，社会矛盾也将变得更加尖锐、更加激化。<sup>①</sup>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结果，就必须修改以前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国家仍然应当享有作为总的所有者的权利，不过必须剥夺国家对这种所有权的垄断。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权利“不应该侵吞具体的、特殊的所有者的权利”，国家的权利不能完全脱离企业的权利而单独存在。<sup>②</sup>

什克列多夫在阐明了上述思想之后，紧接着又进一步提出：苏联的思想界错误地把私有的、个人的所有权看成是次等的衍生物，而事实上社会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衍生物。所有权是由于个人在社会主义企业中从事工作而产生的，因此，“抛开个人的所有权，把社会主义所有权说成只包括社会所有权”是错误的。<sup>③</sup>

苏联发生的历史事件使它的社会主义成了唯一的国家所有制和占压倒优势的国家垄断的制度，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苏联“国家社会

---

① 同上，见该书第102-103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158页。

③ 同上，见该书第118-119页。

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术语不是什克列多夫发明的，但它显然是什克列多夫抨击的目标和研究的对象。对经济活动的主要来源和其他许多部门实行全面和不成熟的国有化，似乎一直是造成麻烦的根源。对这个问题，什克列多夫根据他关于唯意志强制行为的范围和限度的理论作了解释。他认为，国家采取的行动，包括国有化这样的法律措施，可以推动或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却无法超越任何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固有的物质极限。<sup>①</sup>俄国的国有化是在其经济尚未准备好面对这一措施的时刻进行的；所以，作为国家财产的资本货物的再生产过程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从前面的陈述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什克列多夫关于造成困难的根源的表述，即形式上和法律上的社会化并没有被辅之以生产过程自身的足够程度的社会化。<sup>②</sup>相反，这两种社会化产生了抵触。人们可以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可以消灭资本家阶级，但是无法剥夺和消灭市场因素，这些因素所依赖的不是法律上的惯用语句，而是经济本身的状况。

国家并不是完全没有某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可能性。这个垄断所有者能够、也确实设法做到了在关键部门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资源；它组织教育事业，发展科学技术。但是只要经济仍继续处在不大成熟的状况之中（系根据工厂的彼此隔绝、工厂专业化程度的不完善、集中程度不高和设备简陋等因素来作此判断的），它就会被作为所有者的国家的管理功能与市场经济规律之间的基本矛盾破坏得支离破碎。这个矛盾基本上是通过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出来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和其后几十年间普遍存在的那种情形下，让企业对其生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已经受到市场力量的支配和控制，并且的确有可能使整个政权土崩瓦解。同时，企业在有效地行使商品生产者的职能方面所遇到的障碍，也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因此，苏联只有采取一定程度的、超出经济范畴之外的高压强制手段，才能使再生产过程和整个经济生活

---

① 同上，见该书第124—125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125页。

继续进行下去。<sup>①</sup> 结果，集中管理同成本核算制产生了冲突；<sup>②</sup> 只有凭借更高程度的一体化、专业化和更高水平的技术方能实现的、真正的工业社会化受到了阻碍，企业相互隔绝的现象得以永远存在下去。另一方面，集中管理及其中央计划由于效率低下而受到损害，并且表现出缺乏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控制能力。

计划堪称为苏联经济体制的骄傲，根据官方的理论，它是建立在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这个法律事实的基础之上的，该法律事实依据的公认准则是：国家所有制不但提供了进行计划的可能性，而且还使得计划成为强制命令性的和包罗万象的。新的理论性主张试图阐明几十年来给经济和计划造成损失的各种矛盾和紧张压力，断言官方的论点言过其实，指出由于法律意义上对生产资料和社会化的社会化与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化并不一致，所以计划包揽的范围显得过大。<sup>③</sup> 这一点，是作者对经济力量集中化和对中央计划范围二者的限度进行解释以及对“形式上的”与完全卓有成效的计划进行区分时提出的关键性看法。从苏联的情况来看，它的所有权驱使国家对经济领域整个范围内的活动进行控制和计划，但是这些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徒有虚名的外壳。作为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主要根据的财产垄断本身，并不能保证对生产、交换和分配进行有效控制和集中管理的方向。<sup>④</sup> 只有充分理解和承认受国家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支配的客观限制因素，才有可能真正对经济生活进行控制，也

---

① 同上，见该书第 131 页。

② 从 V. 诺沃日洛夫所著《最佳计划中的成本 - 收益分析问题》（莫斯科，1967 年版）一书第 29 - 30 页和第 32 - 33 页上，也可看到同样的思想。在三十年代，“计划”与“市场”是相互冲突的，作为权力集中和行政办法的化身的“计划”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在经济重建的紧张时期和在国际环境不利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这说明三十年代之所以实行某些政策是有一定的正当理由的，更多地搞权力集中和较少地发挥市场机制显然也是有必要的——不过，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它并没有说明人们有正当理由越过上面所讲的那个限度，采取任何其他的步骤。

③ 见什克列多夫著《经济与法律》一书第 64 页。

④ 同上，见该书第 65 页。

说是说，真正获得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反之，如果一种计划试图在由许许多多设备简陋、专业化程度很低的企业组成的经济实体中把手伸得过长，什么都管，那么这种计划就只能是强制性的和死板、琐碎的，它将迫使企业不按照计划行事。当成千上万个工厂都如法炮制的时候，计划与被计划者之间、计划与市场之间以及一般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将使得煞费苦心计划出来的发展事业成为一纸空文。<sup>①</sup> 变形形式上的计划为名副其实的计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此，法律上的惯用语句和机构的频繁组建与改组是帮不了多大忙的。克服比例失调的现象，第一要靠增强储备能力和增加生产，第二要靠很好地同相互分隔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的需要协调一致的计划。<sup>②</sup>

计划必须是灵活的，必须能对经济生活的发展作出迅速反应，并使自身适应这种发展。否则，计划“就将变成一种目的本身，变成盲目崇拜的对象”。<sup>③</sup>

计划管理要想做到名副其实，就一定得对变化着的情况进行考虑和作出反应，因此，计划的标准应该灵活变通地适应生活的要求。

但是，把“计划”和“法律”混为一谈的现存国家概念，使建立上述那种计划体制成为不可能的事。计划标准应当灵活变通，以便适合于不断变化中的行动，而法定的计划标准却与之相反，对同样类型的人物、关系和情况采取共同的、始终不变的措施，这样它就不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死板僵化、毫不灵活。法律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sup>④</sup> 因此，给计划披上法律的外衣，使计划指标获得法律准则的地位——一句话，宣称“计划就是法律”，“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sup>⑤</sup>。

---

① 同上，见该书第 69 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 73 页。

③ 同上，见该书第 75 页。

④ 同上，见该书第 84—86 页。

⑤ 同上，见该书第 82、86 页。

把“法律”和“计划”等同并列，是苏联关于国家所有权的严格概念的产物。国家以此为借口，夺取了充当经济管理人和计划制订者的权力。但是严格地说，这两种职能并不属于政治范畴（它们不是一种国家形态）；国家所有权不能决定集中管理的本质，而只能决定它的方式。<sup>①</sup>所以，是法律上的惯用语句，使得计划管理具有了行政性法律管理的形式。<sup>②</sup>

什克列多夫认识到，这种情形正是产生无数错误做法的根基。紧迫的任务是使经济生活免受“合法的”和“非法的”干预，免受源源不断的行政法令、无以计数的指令、决议以及各式各样的规定、指示的影响。<sup>③</sup>必须保护经济，使之“免受所有不论来自何方的武断专横行为的危害”。<sup>④</sup>由于那些大量规定所获得的法律地位，计划体制成了产生不负责任的行动的源泉，计划制订者和国家管理人员自己则不受任何法律规章的约束。计划管理这项如此重要的活动，竟然脱离了真正法律规定的约束范围。<sup>⑤</sup>类似制订计划这样的经济活动，必须置于明确的法律基础之上，而不能象过去那样，本身就具有法律准则的性质。<sup>⑥</sup>经济生活当中的法律性是保证经济活动健康开展的一个条件。<sup>⑦</sup>

什克列多夫发出了大胆勇敢的呼声。他明确指出，必须铲除国家对经济的不适当的干预，必须制止国家武断专横的做法。他那一针见血的总结性论述，使全体改革派作过的各种暗示、含有言外之

① 同上，见该书第 80 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 81 页。

③ 同上，见该书第 88 页。

④ 同上，见该书第 90-91 页。

⑤ 同上，见该书第 86 页。

⑥ 不过，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N. 巴伊巴科夫却不肯接受这种观点。他曾经大声疾呼地指出：“计划就是法律，任何人都不得违犯这一法律。”（见 1970 年 3 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第 5 期第 34 页）这种看法同 1969 年 12 月中央全会以后加强了控制的情况完全一致。那次全会呼吁加强纪律和加紧控制，并且为 1971 年 3 月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降低经济改革的调门作出了预示。

⑦ 见什克列多夫著《经济与法律》一书第 91 页。



意的话语和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统统以公开化了的真意展现在公众面前；这些改革派都一致暗示说，经济管理的改革将意味着重新解释国家所起的作用。改革经济体制必然要改革国家制度。为此目的，就要对国家的职能、国家的过失和局限性、它对于经济的作用以及同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事实上，必须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本身进行研究。

这样，批评一经开展起来，它就导致人们进一步展开辩论。同样，批评性的见解也一定得提出补救的办法和替代的选择方案，不然的话它就成了徒劳无益的举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除了涅姆钦诺夫的经济蓝图之外，现存的思想还产生过任何与之不同的、具有政治性的模式吗？换句话说，从这场论战当中产生过任何要求实行政治变革的纲领吗？

## 第九章

# 下一步怎么办？——变革的纲领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们介绍了为改革扫清道路、准备条件的工作是如何开始的，也介绍了多得不计其数的对苏联体制的功能和信条至关重要的清规戒律、迷信偶像以及被奉为神圣不可指责的做法，是怎样遭到揭露和被要求丢进历史的垃圾堆的。各种概念和做法一旦受到抨击，是不是就真的改弦易辙了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远非如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在本书正在撰写的时刻，俄国的钟摆又在转向另一个方向，虽然这次摆动的幅度比以往和缓一些，但它毕竟又在摆向强调加强控制那一面，并且引起了一系列保守的不利反应。然而，突破口已经打开，而且突破的势头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至少在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集团的精神生活中是这样。现行制订计划的办法的所有缺陷和局限性被揭露无遗；支撑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支柱——国家对所有权的垄断，已经被证明是混淆了法律和经济这两种不同概念的产物，这种垄断从理论上说即便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无论怎么说它都是产生各种弊病的根源。新潮流派宣称，上述所谓对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概念，过去一直对变得陈旧过时的体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本身、它那自认为一贯正确的看法以及它无限度地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垄断权，统统成了人们严重怀疑的对象；国家声称自己是社会利益的半自动的和唯一的代表者，可是看起来它既能够代表社会利益，又能够蓄意践踏这些利益；既能够扩大社会利益，又能够破坏这些利益。尽管政治学本身是不允许发

展的，但是有征候表示它的确作为一门学科在苏联出现了。由于苏联制度的性质所决定，“政治”在这个国家里是处处可见的。所以，即使有些经济学作家本来丝毫不打算介入政治，“政治”却仍然渗透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理所当然地在国内产生了令人感到兴趣的后果。审查制度只能对付那些官方出版的书刊；它无法对形势加以审查，也无法阻止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

不过，究竟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毫不奇怪，现有的只是改革纲领和供选择的模式的一些要素，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各种著作、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著作之中。关于经济模式的功能问题虽然已有不少建议，可是在苏联要提出可以称之为“政治纲领”的草案来就更为困难了。尽管如此，这种改变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纲领的微小片断还是产生出来了，虽然它们多数都是零碎和不完全的，都是以和缓的建议形式出现的，但对它们的威力却不可忽视。

最富有理智的人们认为，研究政治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是一项紧迫的工作；鉴于现行的党的意识形态纲领，对研究上述问题的迫切感简直等于一种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前面已经说过，行政机关和国家的独断专行，是经济学家撰写的著作中反复不断谈论的话题。诚然，提出问题并不意味着解决问题，但它的确表明了想解决问题的要求。指出国家可能会胡作非为、可能变得与社会相隔离或者造成“无止境”的损失，这本身就已标志着至少要求实行某种体制改革开端。指出行政机关和领导人不仅代表了“普遍的利益”，同时又在发展着他们个人的利益，这意味着人民有权力对这些利益进行调查，有权对行政机关和领导人实行社会监督。研究体制问题的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以及关心政治的公众肩负的急迫任务，就是对国家实行约束，重新规定国家在经济领域应起的作用，寻找出使它不再进行过分干预的途径。取代或者改组现在显然无法胜任工作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使生产者和社会力量发挥更大的主动精神，这些正是应当奋求的大目标。显而易见，要实现这些目标，就

必须重新规定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前者进行限制和改组，削弱它那特殊和巨大的权力，用新的办法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进行这种权力的再分配。生产者和社会集团热望得到较大的自主权，渴求在他们的工作中能获得足够的独立性，这对要享有维护特定利益，拥有确定什么是“普遍利益”的发言权的要求来说，是一个有力的补充。这些就是大部分改革派思想的总的倾向。

为消除滥用职权的现象和限制现有机构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力，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具有实用价值的建议。对企业的自主权和企业权力的基本要求，目的正是在于控制中央经济行政管理机关的权力；采用市场办法和市场标准的目的也在于此，没有它们，企业的自主权只是一纸空文。“对行政机关实行成本核算制”的思想，力图纠正国家经济部门凌驾于生产者之上、往往不去为经济工作服务而是自行其是的情况。改革派提出的口号是：不许高级行政机关统治和支配经济体制，而是让它与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行政机关应当停止充当那种抓住总是与生产者利益相抵触的标准不放的政治机构的角色（生产者自身的集团利益与许多其它利益相互抵触），这样就可以弥合行政机关同生产者之间的严重裂痕。行政机关对消费者也必须象从属于它们的工厂那样，按照利润和核算的同样原则进行工作。它们一旦作出了错误的、造成经济损失的决定，就应该拿不到薪水，拿不成奖金和补偿费，并且向工厂交纳罚款。这种做法也应当同样适用于政府各部、各个总局和计划部门。如果说以往无数次的改革均以惨败而告终，那么原因就在于这些改革没有正确地理解：首要的问题是要找出办法，使行政机关和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并且教会它们使用“经济办法”进行工作。<sup>①</sup>

有人（在谈到农业问题时）直截了当地指出，那种计划制订者发布使经济遭到破坏的命令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后再由生产者来收拾

---

<sup>①</sup> 可参看 A. 别尔曼的文章《改革》，见《新世界》月刊第 12 期（1968 年 12 月），第 303 页。许多其它著作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它们要求“通过卢布”施加压力，来反对官僚机构不负责任和对实际问题漠不关心的作风。

残局的情形必须结束，计划制订者应当为自己的估计错误和缺点失误承担责任。<sup>①</sup> 还有人以同样的、甚至更为激进强硬的语调，呼吁把行政机关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他们认为：“国家机关应该听从生产者的安排和调遣（而不是象过去那种恰恰相反的做法）”。<sup>②</sup> 他们要求地区行政机关为集体农庄服务，而不是向集体农庄下达命令。其他一些人，尤其是很多工厂经理和最高级的经济学家，则要求所有行政机关、起码是部级和部级以下的机关，都要以这种服务精神进行工作。他们是否要求更高级的行政机关也要对自己的工作承担责任呢？总之，中央的计划制订者和中央计划都处于要求进行修改和变革的强大压力下。这里，转向“用经济办法管理”同样意味着整个经济活动的性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涅姆钦诺夫率先提出、许多人继而附合的所有建议，目的都在于对整个计划—供应体制进行全面的检查和修补。

上述要求对整个经济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根据这些要求去改造计划—供应体制，只能意味着国家机器的一大部分——产生政府控制、文牍主义、浪费和低效率的办事程序、独断专行、琐碎监督以及欺上瞒下行为的根源——将会趋于消亡。人们可以把废弃这个作为现存国家重要成分的专横机器的要求，看成是使对国家的看法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的一种探索。

其次，对以前占统治地位的鼓吹“生产优先”于消费和计划同样优先于社会需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进行批判，标志着情况朝着相反方向的急剧转变：消费即使不占优先地位，也将享有平等的权利；“社会需要”优先于“生产”这一点得到了肯定；生产者取得了对官僚机构的支配地位。工厂的工作人员、经理人员和工人所处的低下地位，突出表明了他们要完全服从国家机构的意志。一方面，计划制

---

① 见佩尔武申、文热尔和克瓦沙合编的《生产、积累与消费》（莫斯科，1965年版）一书收入的文热尔的文章，详见该书第273—274页。

② 见G.利西奇金的文章《大胆的决定》，载于《新世界》月刊1968年第9期，详见该期第155页。

订者和监督人员向下级单位源源不断地发号施令。另一方面，整个生产部门实际上被剥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手段，根本没有十分明确地规定出来的和得到积极行使的权利。

所以，除了要把这些拥有强大统治力量的专横机构置于具有惊人约束作用的经济核算体制之内以外，人们还要求建立明确的法律规定，要求在发现计划制订者或经理人员以其各自的身分表现出过度的行政管理热情时，法律检察部门自动进行干预。<sup>①</sup>

可以看出，同样的问题和关于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样要求，被人们用含义比严格的经济上的意义更为深远的措词表达了出来。在有关经济问题的上下文中使用的“生产者”这个词，用在社会学方面则表示“阶级”和“社会集团”，这是十分自然的。诸如“社会利益”和“集团利益”这样的学者中间常常用到的关键性新术语，为那些拥护现存国家意识形态的人所深恶痛绝。

在这些问题上同官方的论调明确地分道扬镳，不仅会对社会科学产生深刻的使之解放的作用，而且也能给政治生活造成深远的影响。要求确保企业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在遇到上级侵占自己利益时能挺身反抗的呼声，可能会传播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里去。它将成为社会集团夺取开展活动和发挥主动精神的权利的第一步，成为迫使国家维护这些权利而不是侵犯这些权利的第一步。本书作者相信，对类似“国家应当通过集团利益进行活动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多么地互不相同和相互矛盾，不这样做的话它就只有诉诸粗暴生硬的力量去进行活动”<sup>②</sup>这样的观点作这种解释，是完全正当和理所

---

<sup>①</sup> 见E.利别尔曼和Z.日特尼茨基的文章《经济领导的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该文载于《计划经济》月刊1968年第1期，详见该期第24页。文章说：“很多国家机构本质上是反对自己的行政权力受到法律限制的。它们认为自己主要的任务是建立严格的劳动纪律，因此，照它们看来，任何限制其权力的做法在目前都是不恰当的。”对此，该文章的作者反驳说，人们同样应当要求行政管理机构也服从纪律，因为这些机构的职责就是尊重企业的权利和利益，这一点必须由法律加以保证，并通过法律得到贯彻实施。

<sup>②</sup> 东欧各国普遍存在着与什克列多夫和其他一些苏联著作家表达过的见解相同的看法，即认为社会是“复杂的，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存在着互相冲突的各种集团利益。

当然的。一些作家在关于国家的理论中重新发现了“公民社会”这个术语，并且在其著作中几次暗示说国家有可能侵吞“公民社会”，<sup>①</sup>这一点同样是意味深长的，它体现出同样一种要求，即要社会反抗国家的压力，重申自己的权利，要求获得或者说重新获得它在强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失去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当时国家以其即使在俄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恐怖、清洗、严厉控制和攫取权力，而从社会手中夺去的。

## 农民的平等权利(文热尔语)

某些集团为了使农民在苏联经济体制中占有新的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为一个旨在维护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而设想出来的、几乎完全成熟的纲领提供了给人以启迪的范例。这场斗争涉及到的并不是象科学家或经理人员那样的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权贵集团，而是一个整体的社会阶级，它在经济体制中即便不算最受歧视、最受怀疑的阶级，也是迄今为止地位最低、影响力最小的阶级。这一点使这场斗争更加引起人们的兴趣。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一些生动活泼、坦率直言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这些作品描述农村生活的凄凉悲苦，描述农民是如何深受愚笨无能、反复无常而又往往追求私利的官僚机构之害的；那些由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做法造成的盛衰荣枯的变化，自然就更不用说是这类作品常常论及的主题了。<sup>②</sup>一个包括小说家、记者和学者在内的号称“农民派”的流派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他们得到党的最高级机关里某些人物的支持，从经济上

---

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看 H. 斯基林和 F. 格里菲斯合编的《苏联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新泽西，普林斯顿，1971年版)一书，第12-16页和第17-18页。

① 见 V. 科佩奇科夫著《苏联的国家机制》(莫斯科，1968年版)一书第39-40页。

② 扎利金、亚申、阿勃拉莫夫、斯塔德纽克、多罗什和奥维奇金等小说家对苏维埃政权下的农民和农民生活感兴趣，所以可以把他们归为“农民派”作家一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玛特廖娜的家》也推动了这一潮流的发展。

的得失以及从社会公正这个更大方面的理由出发，要求结束农民处于低下地位的状况。与此同时，一批六十年代初期曾经孜孜不倦地从事过有关苏联农民和集体化进程的研究的历史学家，对集体化政策的很多特点，尤其是它“违背列宁关于自愿选择(加入还是不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则”的行为进行了抨击，对斯大林的政策及其无异于在整个一段历史时期内无情地剥削农民的“不公平地降低收购价格”<sup>①</sup>一事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也纷纷予以抨击。虽然别的专家也以其他方式进行批评，但是这些历史学家的论著对三十年代政策的批评在苏联文献作品中是最为猛烈、最为公开和毫不掩饰的。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纵然结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但它并不能阻止这种思想通过另一条大不相同的途径传播到公众之中。有一部十分精彩的记叙列宁最后几年执掌政务的传记提到，列宁十分忙碌地把农民讲给自己听的有关他们在这个苏维埃国家里的境遇记录下来(这份东西后来曾在政治局的范围内传阅)。那些农民抱怨说：“农业可不能靠挥舞大棒来管理……靠棍棒是行不通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传记是以令人惊讶的肯定语句和纲要式的提法来谈论苏联社会中的农民问题的。传记作者引用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据称列宁的看法与卢那察尔斯基是一致的)，认为农民是“俄国革命最可珍贵的组成部分”，<sup>②</sup>这对于苏联政治作品的读者来说是一种全新和不同寻常的提法。它可以成为一句座右铭，激励那些迫切要求农民享有平等权利、要求整个苏联政体实现民主化的人们。

把这些思想表达得最清楚、最令人信服的代言人，是经济学家

---

<sup>①</sup> 见M.维尔仑、N.伊弗尼茨基和Iu.波利亚科夫合写的文章《苏联集体化历史的几个问题》，详见《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3期第25页，还可参看该刊1963年第9期第116页上刊登的M.维尔仑的文章《战争时期集体农庄农民的物质状况》，此外，还可参看V.达尼洛夫编的《各加盟共和国集体化简史》(莫斯科，1963年版)一书和Iu.莫什科夫著《全盘集体化时期的谷物问题》(莫斯科，1966年版)一书。

<sup>②</sup> 见E.德拉勃基娜著《冬天的转变》，载于《新世界》月刊1968年第10期，第30页，72页。人们可以推测作者引用这些观点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其实际的含义，至于事实上列宁是否把农民看成是“最可珍贵的组成部分”，大家可以展开讨论。



V.G.文热尔。他由于鼓吹把生产资料交还给集体农庄，鼓吹取消把基本生产资料集于一手的国营的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而被斯大林在其所写的最后一部书里攻击过。文热尔在他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和两本书<sup>①</sup>中，阐明了一整套具有思想性和政治性的论点，这些论点在精神实质方面与其他改革派人物的观点是完全相同的。

在谈及农业的状况和农民的状况的时候，官方的态度是愿意接受对以往政策的某些批评的——这些政策造成的严重破坏性结果实在太明显了，可称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国家愿意做大量的工作来改善这种状况。国家甚至还提出了“加强集体农庄的民主”的口号，可是这种良好的意愿几乎总是无法摆脱下面紧跟而来的反驳：“集体农庄的民主的发展不能脱离开政府的领导。集体农庄不能自发地、放任自流地发展……”<sup>②</sup>然而，被如此视为珍宝的国家领导作用，难道不正是造成多得难以计数的弊病的根源吗？

这就是因写书替集体农庄说话而陷入困境的文热尔所持看法的要点。在苏联居然能找到不得不为集体农庄的利益而斗争的勇士，这似乎使人感到惊奇。苏联农业一团糟的情况和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偏爱，使得集体农庄备受忽略和蔑视。从官方的眼光来看，作为国营企业的国营农场可算是优越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集体农庄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使之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仿效的典范。与此同时，集体农庄被看成是一种低劣的形式，甚至是产生“异化”倾向的一个根源，这不仅是因为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依恋于他们私有的小块土地，而且因为集体农庄不归国家所有，而是属于被称之为仍在苏联体制中苟延的市场现象的最后堡垒和主要动力的合作化集体所有制。

文热尔认为，尽管官方偏爱国营农场，但集体农庄却是一种有

---

<sup>①</sup> 见《生产、积累与消费》一书收入的文章《集体经济的特点与发展问题》；《集体生产与价值规律》（莫斯科，1965年版）第255-303页和文热尔著《当代集体农业制度》（莫斯科，1966年版）一书。

<sup>②</sup> 见V.特希克瓦泽编的《苏联社会的政治组织》（莫斯科，1967年版）一书第277页。

生命力的组织，必须把它的弱点完全归咎于阻碍它发展的“外部联系”。<sup>①</sup> 罪魁祸首是国家，是国家没有经过周密考虑而作出的决定和制订的政策。文热尔解释道，集体农庄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它既是一个商品生产者，又是一个合作组织。但是，这两个特点都被人们曲解了，本来可以使集体农庄兴盛繁荣的原则本身也遭到了被嘲笑和被轻视的命运。来自上级的诸如播种什么、怎样播种以及在哪里播种之类的琐细指令，束缚了集体农庄的手脚，使其（象其他所有生产单位一样）无法发挥生产者的作用；而且，集体农庄还被迫负担不正确的决定造成的损失。可是，既然谁都不愿偿付集体农庄欠下的债务，那么，谁就都无权对只有集体农庄才最懂得如何处理好的事务进行干涉。计划制订者们给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害十分严重，要过许多年之后才能恢复过来。不管怎么说，从上面把计划指标强加给集体农庄是不公正的（对此问题文热尔的立场十分明确）。<sup>②</sup> 由于集体农庄是为市场服务的商品生产者，它与顾客（包括国家）的关系就必须受等价交换原则的支配。这样，集体农庄“在交易中”、首先在同国家的交易中“享有平等权利”，就成了代表文热尔看法的特点的一句口号。

文热尔根据这个涉及到过去和将来的政策的见解，毫不犹豫地得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他认为，过去的政策是建立在由国家强行下达、冷酷无情地执行的征购定额的基础之上，它夺走了集体农庄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精华部分，而付给集体农庄的价格，在至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甚至连负担生产的成本都不够。<sup>③</sup> 文热尔明确地谴责了这种政策。他指出，所有那些强行下达的定额，实际上“从

---

① 见文热尔等人合编的《生产、积累与消费》一书第 257 页。

② 出处同上，见该书第 273 页。

③ 参看文热尔著《当代集体农业制度》一书第 241 页和 V. 洛帕特金著《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与价值规律》（莫斯科，1963 年版）一书第 235-240 页。洛帕特金在该书中指出，1953 年国家付给生产者的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只够负担生产成本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

经济意义上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因而，象前一段时期那种按照行政命令确定、而不是以对购销双方都有好处的合同为基础的强制性的产品交付与销售，过去不符合、现在仍然不符合集体农庄生产的合作化的特点（着重点是作者加的）”。<sup>①</sup>

文热尔觉得，以往中央计划的整个办法和官僚机构的一统天下，使得“计划制订者从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对其作出响应的一方同计划又毫无关系”，这种情形使他感到十分愤慨。他大声疾呼道：“这是对集体农庄权利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侵犯，这样做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sup>②</sup> 物质损失的沉重压力使集体农庄濒于破产，“可是农庄自己却不能安排处理各种事务，这些工作全被五花八门的政府机关和委员会包揽无遗”。<sup>③</sup>

很显然，文热尔描述的这幅情景，无法使人感到被称为“集体农庄民主”的根本条件的“国家领导作用”是有利的和必需的。这种领导作用应当赋予的自主权和自由，是农业兴旺发达的先决条件。文热尔坚持认为集体农庄具有非常典型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倒并不是因为它是在国有化了的土地上耕耘播种，也不是因为它服从国家中央计划下达的指令；它所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形式，系由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业已证明，实行土地国有化根本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只不过是俄国独特的历史条件的产物。集体农庄的集体所有制理所当然地是一种合法的、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它决不比任何国家所有制的生产组织形式低矮三分。

这样，改革派就推翻了又一座备受宠爱的偶像——所谓国营农

---

① 见文热尔等人合编的《生产、积累与消费》一书第275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274页。

③ 见文热尔著《当代集体农业制度》一书第274页。公平地说，近年来苏联农业情况有了很大改观，这是由于投资增加了，付给生产者的农产品价格提高了，以及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有了保证。不过集体农庄自主权方面的情形则变化不大，生产率、效率、对革新实行奖励刺激等方面的情形也没有显著改变。

场才有优越性的理论。文热尔等人声称，尽管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相比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尽管其亏损由国家填补，其拥有的技术设备比集体农庄能够支配的多一倍，但是实践仍然证明：集体农庄才是更为可靠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sup>①</sup>所以，虽然国家对国营农场另眼相看，向其提供更多更好的设备，可是就生产成果来说，却是备受歧视的集体农庄略胜一筹。

在文热尔看来，集体农庄才具有优越性；这一点从他关于国营农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组织形式的论点上，就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他认为，国营农场和土地国有化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二者都是激动人心的苏联历史中种种情况和非常时期的产物。使集体农庄而不是国营农场成为将来发展的楷模的，还有另一条、也是更重要的一条原因。集体农庄的内部组织比起官僚机构管理下的国营企业来，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由于它具有合作化的特性，所以，它已经预示着一种拥有社会主义组织将会接受和发展的民主原则的社会自治的典型。国营农场如果要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最好是向集体农庄学习这项原则。<sup>②</sup>

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向官方宣传散布的“神圣”教条进行的挑战是何等惊人。这些挑战提出的主张，是以涉及到社会制度方面基本原则的迥然不同的观念为根据的。五十年代末期，一些理论家们在地位显赫的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就已经公开提出了有效地承认和加强集体农庄农民权利的措施。文热尔同样试图找出国家与集体农庄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形式，以求使之符合于迄今被无视的集体农

---

<sup>①</sup> 见文热尔著《当代集体农业制度》一书第41页和第264-266页；G.利西奇金的文章《人、合作社与社会》，详见《新世界》月刊1969年第5期，第169-173页。F.穆恩和O.特鲁比钦合著的《苏联农村社会学研究经验》（莫斯科，1968年版）一书第84、第53-54页上也有同样的内容。A.埃麦利亚诺夫所编的《农业工业化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莫斯科，1971年版）一书第33、40和57页上引用的数字，表明国营农场拥有更多的机械和略多一些的职业劳动力（其工资也更高），但是集体农庄大多数主要作物的产量和缴纳的税额都高过国营农场。

<sup>②</sup> 见文热尔著《当代集体农业制度》一书第41页。

庄组织的实质——它的合作化的特性。文热尔指责说，正是这一原则被斯大林完全曲解了。必须不仅允许集体农庄内部有生气勃勃的民主，而且也要允许当地在自愿基础上的各集体农庄之间的合作组织，逐步联合成全国规模的各集体农庄之间的代表制。这些组织应当是有自主权和非政府性的，其领导应当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这样才能创造出确实代表农民利益同国家打交道的机构，才能象人们推测的那样在农民与国家进行交易时维护农民的利益。他认为，这样的组织蕴藏着极大的经济力量：它能够建立工厂、管理工厂，能够处理为自己成员安排的供应事宜，还能够同顾客和政府机构洽谈购销问题。国家将同这种独立自主的，相当强大的组织打交道。这种关系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从农民自身的行列中挑选代言人，使农民有真正的代表权，另一方面则是帮助农村创立新型的机构。文热尔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打开局面，使农村、“而不是行政管理机关”，拥有一种根据团体原则进行活动的合作化制度。<sup>①</sup>

显然，1961年党的官方纲领的词句，巧妙地掩盖着上述思想的精神实质；而七十年代初期的统治集团联盟，对这些思想却很明显地不大愿意接受。文热尔的观点完全不象纲领中的措辞那样含混模糊、泛泛而论。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强制执行团体原则，办法是实际建立起一种组织，使之不仅能让农民获得“利益集团”的地位，而且让农民拥有作为“压力集团”进行合法活动的手段。这样，就可以出现一个与国营部门并肩存在、代表整个一个阶级的自治组织，它在社会-政治体制中既享有平等权利，又有完全得到承认的地位；它还将成为对国家进行检查和牵制的重要力量，并且在事实上结束

---

<sup>①</sup> 见文热尔等人合编《生产，积累与消费》一书第298、303页。早在五十年代，一位名叫文尼钦科的作家就已经阐述过这样的思想，据称他的方案曾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文热尔只是在后来的几部书中才谈出这些思想。身为政治局委员的D.波利扬斯基也曾提出过类似的想法，不过人们弄不清的是，文尼钦科和波利扬斯基是否也象文热尔那样给这些思想赋予了明确的含义，列出了为之辩护的理由。有关他们二人的观点，可参看S.普洛斯著《苏联的冲突与政策的制订》（新泽西，普林斯顿，1965年版）一书第158页和174-175页。

国家对农民的绝对统治。据文热尔认为，更有意义的一点是，合作化的原则要优越于国营部门通行的原则；集体农庄合作社将会囊括国营农场。就象国营工厂中的情况一样，国营农场盛行的官僚等级制度将不得不让位给社会民主的新型制度。所有制将演变为第三种类型，它将不同于国营部门的所有制，而显然更接近于改革派希望在集体农庄合作部门兴盛发达的那种所有制。文热尔觉得，所有制将渗透着合作制度和合作原则的精神。<sup>①</sup>据他设想，这一点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在此之前，各种不同的所有权将与各种不同形式的内部组织同时并存，即国家所有权、不同社会团体（如各集体农庄的联盟）的所有权和各式各样的混合形式、合作关系同时并存。这一切的总的趋向是加强民主原则和团体原则。

由此可见，表面上几乎一样的方案对于老派温和的宣传人员来说至多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而对文热尔来说则意味着具有某种更重大的意义，双方显然都从同样内容的简短文字中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文热尔断言：“不使整个社会生活逐步实现不需要有国家机器的自治原则，共产主义的关系要得到发展是难以想象的。”<sup>②</sup>人们可以这样推测，他不相信国家会被一举消灭，他甚至不会相信有朝一日国家会彻底消亡。他鼓吹的不是取消行政机关，也不是把管理国家的责任“随便交给哪一个厨师”；他的主张是要有强有力的经济组织，特别是农民要有这样的经济组织。他要求这种机构实行民主，坚决反对任何进一步扩大国家权力的行为。这或许意味着国家应该立即给各社会集团和阶级以真正的自主权，而不是等着党的纲领作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许诺，即国家将消亡和建成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文热尔在阐明自己的论点时，追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他晚年发表的若干见解，列宁在上述著作中称社会主义是“一种文明化的合作者的制度”，这对当时的列宁来说的确是全新的

---

① 见文热尔著《当代集体农业制度》一书第162-163页。

② 见文热尔等人合编《生产、积累与消费》一书第302页。

思想；文热尔指出斯大林对此就未能理解。<sup>①</sup>

## 所有制、民主与社会主义

其实，现在问题再也不在斯大林身上了，问题来自关于苏联目前与将来的本质的概念。这些概念一部分是从官方文件中摘来的、确保平安无事的公式，但另一部分则是彻底修改了有关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公认学说而提出来的大胆新见解。文热尔的观点同什克列多夫发表的看法十分相近。他们二人都是根据管理社会的“合作化—民主原则”，根据在苏联条件下构成民主自治权利的基础和为这种权利提供理论证明的“社会所有制”的思想，重新对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文热尔关于集体农庄合作联盟的设想，旨在使新型的政治—制度方面迈出新的一步，他的设想与社会现实中“利益”的概念融为一体。他对社会主义的合作性本质的想法也是如此，他以这种想法加入了向苏联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抨击的人的行列，对国家所有制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与此类似的是，什克列多夫拒绝接受为维护国家对社会所有方面的监督而虚构出来的“抽象人格化社会的垄断”的神话，从而对文热尔提出的社会主义纲领给予了支持。什克列多夫在对正统观念进行攻击的时候，批驳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即“所有人必然是垄断者……他可以亲自调拨一切，占用一切，处置一切。”<sup>②</sup>新的观点认为，国家对所有权和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再加上事实上到处伸手、贪得无厌的国家官僚机构，把一个盛衰无常的、复杂的和混合而成的社会搞得支离破碎。所以，改革派们表明，只有在社会集团担负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只有在它们享有民主地管理事务的权利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生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结构。

对什克列多夫关于国家所有制的思想，可以作如下的解释：在

<sup>①</sup> 见文热尔著《当代集体农业制度》一书第142—143页。

<sup>②</sup> 见什克列多夫著《经济与法律》(莫斯科，1967年版)一书第186页。

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所有制的概念在意识形态方面起着阻碍作用；改革进程要想顺利发展，就必须铲除这一障碍。那种必须承认生产者和其他集团是生产力的共同所有人、必须结束国家对所有制的垄断的主张，其含义也正在这里。这种论证含有一项完整的民主化纲领。国有化一定要让位给社会化；生产资料所代表的巨大力量源泉一定要由合作化的民主组织来自由掌握。

其实，上面这段话是本书作者个人所作的解释；现在还是让我们用什克列多夫的原话来表达他关于国家所有制的思想吧。什克列多夫在批驳所谓国家垄断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唯一基础的论调时指出：“使广大劳动群众参与对处置权（包括为集团或个人的利益对剩余产品的私自挪用）的垄断，并不会消除所有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恰恰相反，他们的参与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一个标志”。<sup>①</sup>

对于苏联的情况来说，这一番阐述所含有的新奇之处是不言而喻的。它是批判官方鼓吹的社会主义、总结整个东欧改革纲领的一种意识形态新概念。

谁来进行所有这些变革呢？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哪些社会力量可以依靠？谁能说服党或是迫使党走上革新的道路？党会心悦诚服地走上这条道路吗？对这些涉及到政治行动的直接建议的问题，各种著作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倾向于使在社会力量摆脱超级管理者控制的建议，以及要求不仅把知识界的主动精神、而且把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的主动精神都调动起来的呼吁，的确表明了朝向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向。

这些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建议，同时也构成了使经济恢复元气的纲领。经济管理实行民主化和使生产者摆脱官僚主义的桎梏，是诺沃日洛夫的坚决要求。他要使国家计划变得强大有效，但他解释说，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物，难以通过一个中心进行管理，也不能由“命令式计划”一类的中央计划下达琐碎的任务。法令和其

---

<sup>①</sup> 同上，见该书第187页。



他行政压力成了推行计划时的主要手段，不过这种“推行”的方法对经济活动来说是一种劣等的刺激因素。采取这种方法的结果，劳动生产率只会比用经济和道德方面的刺激手段所能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更低。要想使计划变成一种真正的经济上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适当地把计划同经济核算制结合起来。这种明确反对中央集权的精神，贯穿于经济改革派的中心思想之中。只要计划没有与经济核算制相结合，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强制性的、但却是毫无成效的“行政办法”的统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如今，诺沃日洛夫在他的著作中断言上述先决条件是使计划名副其实和使经济兴旺发达的唯一途径。“管理工作的民主化……对于开展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是必要的。群众越是广泛地以创造性精神参加经济与文化发展事业，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

找出隐藏在复杂难解的数学符号中的这种民主宣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数学与民主是苏联知识界和政治批评性思想中的一个有趣的新联盟。诺沃日洛夫不仅把他提出的先决条件当作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而且还把它当作一种“文化方面”的要求；群众如此广泛地参与经济和文化活动“是最重要的历史性法则之一”。<sup>①</sup>在这一点上，诺沃日洛夫的看法同文热尔等人是一致的。他们都从“计划与市场”的角度出发，把经济改革视为实现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前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这种前景就是“把计划机构和核算机构变成社会自治的机构”。<sup>②</sup>

就目前而论，苏联的种种事件并没有在朝着上述前景的方向发展。经济改革遇到的重重困难已经使很多人清楚地看到，一场由官僚机构设想和实行的、没有群众参加和进行合作的改革，很容易因官僚势力的破坏而受到阻碍。A. 别尔曼堪称推动经济改革运动的

---

① 见诺沃日洛夫著《最佳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莫斯科，1967年版)一书第39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32页。

知识界杰出人士之一，他在1969年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sup>①</sup>对他所认为的那种过分狭隘的态度进行了批评，因为这种态度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管理问题上，而忽略了别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可是，那些被忽略的涉及社会制度基本特点的方面，恰恰是些最重要的方面。现在流行的看法是，依靠占支配地位的行政—技术措施，是不可能改进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的，问题的解决主要也不在于动用物质刺激手段。这种刺激手段无论多么重要，一旦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不再有效了；这时，开始显露其作用并且必须予以满足的，则是人的更深刻、更高尚的行为。别尔曼坚持认为，就连农村也已出现了种种迹象，表明农民不希望再有任何局外人对复杂问题的现成解决办法和刻板的答案强加在他们头上。农民希望的是能过上较为舒适惬意的生活和能为自己的利益盘算筹划。

别尔曼预言，这个问题虽然目前在农村和在其他地方还不是迫在眉睫的，但是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光靠更多的技术、更好的职业训练和更高的收入，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然需要某种表面上看似似乎“与之无关的条件”——工人参加管理。别尔曼认为，无论以经验为根据还是以理论教条为根据，这一点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列举了大量材料证明，已有的改革未能形成象人们所希望的那种新的风尚，未能激起群众足够的创造性精神，它遇到的往往是人们的怀疑、反对和漠不关心。工人们往往根本不知道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改革同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除了体力劳动者以外，其它行业似乎也都存在这种情况；不过，这一点别尔曼在他的文章里只作了含蓄的说明。他论述的要点表现在他同诺沃日洛夫相同的看法上，即没有群众创造性的热情，是不可能取得巨大进展的。只有发动“集体事业”中广大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参与处理生产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才有可能迎来一个真正的新高潮。别尔曼深信，最终决定

---

<sup>①</sup> 见《新世界》月刊1969年12月号刊载的A. 别尔曼的文章《最高尚的任务》，详见该期第177—182页。

一个社会结构的命运的，是动员群众进行参与的能力；了解这一点是颇为有趣的。别尔曼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做不到上述关于动员群众那一点的，同时他也并不隐讳这样的事实：苏联体制也没有下很大气力来促进那项原则的实现。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之处，是对某些基本原则的破坏。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并不只是意味着提高生活水平，也并不只是意味着群众的参与。正如别尔曼强调的那样，社会主义意味的是“把劳动群众自己进行管理的方式付诸实行”；别尔曼还把列宁著作中的论述加以引申，得出了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富有理论原则性的总结：“社会主义就是劳动人民通过国家管理自己的社会”。

苏联著作家不能直截了当地宣称上述准则尚未被人们所认识，别尔曼只有较为谨慎地选择这样的措辞：“我国的经济之所以屡遭损失，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条列宁主义的教导吗？”<sup>①</sup>

许多改革派阐明的经济生活民主化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宣传口号了。改革派说话是算数的。别尔曼告诫人们，不要对使用计算机、改进情报网络和精简行政层次这类“灵丹妙药”寄托太大的希望。机器不能代替人的作用，也不能取代群众创造力这一别尔曼认为的苏联体制主要问题的作用。民主化应该缓慢地进行，但民主化的进程应该刻不容缓地开始。不幸的是，这一进程至今仍未开

---

<sup>①</sup> 同上，见该书第176页。苏联的工厂里有工人的“生产会议”和各种自发的工人委员会，不过这些会议和委员会在实际上并不起多大的作用。至少有一项社会学研究报告证实了这种看法，该研究报告引用了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些企业的这种自发的工人办公处——技术办公处进行调查的结果。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委员会和团体都是一些毫无生气的机构，既没有真正的特权，也不具有任何影响。政府部门和党对它们很少感到兴趣，许多参加这些委员会的人很干脆地说，他们不理解这些团体的宗旨是什么。另外一些人说，“没有办法使行政机关对这些自发的工人团体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的考虑，它们连工人生产大会的建议都不屑一顾。”请参看M.鲁特凯维奇所编的《苏联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化过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67年版）一书中收入的G.瓦西列夫的文章《有关自发的社会组织工作完善性的若干问题》，详见该书第204-207页。

始。与此相反，正如别尔曼指出的那样，“党在寻求的对待经济工作的新的方针”，又一次“正在被新的计划指标和刺激手段所取代”。

别尔曼确信，由于经济改革无法使社会体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发生足够巨大的变化，所以它未能提供医治苏联经济失调的有效疗法。事实上，现存制度的运转情况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对恢复经济执行状况的元气起着阻碍的作用。别尔曼寻求的是具有更深刻意义的变革，他重新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真正概念，并向重大的意识形态假说提出了挑战。从直接提出政治要求的意义来讲，别尔曼此举应当导致政治制度民主化的纲领的诞生。然而身为经济学家的人除了经济民主之外，再也不能公开要求更多的东西了。公开要求某种形式的政治民主的著作不但得不到发表，其作者到头来还会受到严厉的惩处。不是吗，“一个社会主义盟国”正是由于试图走这一步而遭到了入侵。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份含有使苏联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详细纲领的文件，呈送到了党的领导集团的面前。这份文件既不是在苏联正式发表的，也不是出自经济学家的手笔，但它却对经济问题进行了说明，并以此作为分析推论的出发点。

这份文件是在1970年年初，由A. D. 萨哈罗夫、V. F. 图尔钦和R. A. 麦德维杰夫三位学者提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sup>①</sup>它与经济论战时期涌现出来的新作品的思想密切相关，所不同的是，它明确地提出了以往经济学家的著作从未正式提出过的政治要求。这份文件的功绩，就在于它的作者敢于以较前直率得多和不受约束的气概，大胆地根据论战当中常常只能以暗示、笼统的概述或者谨小慎微地触及一部分问题的形式出现的各种不同观点，推导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把问题一丝不苟地阐述清楚，直言不讳地分析各种现象，提出各项要求。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从事国家问题研究的经

---

<sup>①</sup> 法国《世界报》1970年4月11日和12-13日两期刊载了这三位学者签署的文件的显然可靠的全文的译文。英国《考察》季刊1970年夏季号第160-170页刊载了该文件的英文译文。

济学家曾经提出过的观点，在萨哈罗夫等人的文件里成了一个中心论点。这个论点就是：经济改革不是解答问题的完整答案，政治制度不进行深刻的改革，经济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该文件认为，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景是暗淡的。苏联已经无法继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这一差距又重新开始拉大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苏联的体制不能成功地驾驭现代技术革命，至少不能以象美国那样的速度成功地开展现代技术革命。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经济和社会业已出现的许多表明停滞的迹象，将使苏联“沦为一个只能在局部地区称雄的二等强国”。

造成这种不幸局面的罪过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恰恰相反：正是苏联生活当中种种反社会主义现象的积重难返，应对阻碍苏联政治体制向前发展承担责任。无数等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学领域内等待解决的问题，不但需要广泛应用科学，需要得到科学的合作，而且还需要行政管理的办法发生深刻的变革。然而，斯大林时期公共生活中出现的传统做法和反民主的准则，至今还没有从苏联的体制中被彻底铲除掉，它们使必要的改革遭受到挫折。离开了公开辩论和广泛宣传，离开了发挥创造性和传播情报信息的自由，科学和现代管理就得不到发展。可是正是这一系列要求受到了苏联当局的压制，提出这些要求的人们即使没有遭到当局的迫害，也受到了当局的怀疑。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庸人、追逐名利的野心家、严守纪律的人物和唯命是听的正统派，却在公共生活的各个阶层中备受鼓励和赞扬。萨哈罗夫等三人根据这种情况，把别尔曼用较为谨慎的措辞，什克列多夫则从较为抽象的理论性角度、尽量避免直接从政治性角度提出的要求和进行的分析，加以引申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得出结论说：“国家面临的问题，单靠一个或者几个执掌权力、无所不知的人是解决不了的。需要的是，经济体制中各级的千百万人，以创造性的精神参与解决问题。需要广泛交流情报信息和思想。现代经济和例如古代东方那样的经济之间的差别，也正体现在这里”；如果没有行政机关的改革，没有互通情报的自由和竞

争的精神，特别是“如果没有实行广泛的民主化，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得到正常和健康的发展”。

就这样，文件的三位作者以每一个识文断字的人都能理解的、犀利的政治语言指出，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是由非经济因素造成的。这些困难渊源于政治体制本身。“不消除这一障碍，任何措施都注定是无济于事的。”诺沃日洛夫和别尔曼的论点最后都以这种直接政治性的措辞表达了出来。

目前的政策所做的与实际需要的适得其反：它否认自由交换情报、自由辩论和群众发挥创造性的必要性；它抱着空洞和强制性的教条，扼杀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最后一点，它还对作家、对政治上持批评意见的人，甚至还对诚心诚意建议局部改良的人士进行迫害——这一切十分危险地加深了国家与知识界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和误解。萨哈罗夫等作者声称，国家与知识界之间已经出现了完全的决裂，而这种决裂在知识界的作用正在扩大的时期“无异于自杀的行为”。

起草那份纲领的作者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弥补这种裂痕，只有弥补好裂痕，才谈得上完成许多其他方面的任务。这些人提出在未来五年里首先实行他们的改革纲领，其余的事以后再做，原因也正在这里。作为爱国者和“负责任”的公民，他们并没有直接向民众发出呼吁，迫切要求进行这些变革。他们写下这份备忘录主要是为给政治局看的，是为了向政治局委员们发出呼吁，希望他们以俄国那种自上而下的典型方式掀起民主化的运动。

然而，他们想从正是造成目前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和采取强制性措施的领导人那里指望些什么呢？人们可以推测，萨哈罗夫等人事先可能掌握了充分的情报，确信某几位有影响的领导人对他们的论点抱同情态度。他们也可能判定：必须以提出纲领和展开论战的行动迈出第一步；如果的确象其所断言的那样，很多知识界人士与学生、经理人员和某些行政管理官员都赞成他们的观点，那么从长远来看，这份备忘录就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人

们也可以假设，纲领的作者十分惧怕国内的许多势力有可能对各种不受控制、不受监督的民主化进程加以利用，以肥私利。萨哈罗夫等三人指出，这样的危险可能来自个人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也可能来自某种被他们称之为“法西斯式、蛊惑民心的政客”的势力。纲领在另一处地方还提到，除了来自右的方面的危险以外，还存在着来自极左方面的某些若明若暗的危险。可能纲领的作者为了避免所有危险前景的产生，真诚地盼望党能采纳他们的纲领，并且逐步自上而下地把纲领的内容付诸实行。事实上，他们似乎对党发出了警告：如果不实行改革，苏联社会中那些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就会抬头；因为不搞改革的话，这些势力将会对党与知识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互不信任以及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加以利用，并且对苏联社会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民族主义倾向加以利用。这样一来，国家就会面临“滑向右的和左的斜路上去”的危险，不过作者没有明确描述来自左的方面的危险，他们更为担心的是出现右的倾向。在苏联，势力仍很强大的“斯大林主义的余毒”，使人们更加感到上述危险确实是存在着的，这不仅因为这种余毒会推迟经济问题的解决，而且因为它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和道德观产生着长期有害的影响，使“蕴藏在各行各业代表当中的创造力普遍退化”。

自由交流情报和开展辩论，恢复富有创造力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活，是使国家摆脱暗淡前景的不可缺少的补救办法。意识形态生活的解冻是萨哈罗夫等人递交的备忘录里特别强调的一项要求。应当对意识形态进行公开辩论和开展竞争性的研究。实行民主化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由于民主化能带给人们大量的情报信息，由于民主化本身固有的竞争的气氛，它将铲除今天在意识形态领域起着很大作用的仪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和官员们那种官僚主义的伪善习气，把它那必不可少的创造力和推动力赋予我国的意识形态生活——赋予社会科学、艺术和宣传”。

由此来看，纲领的作者是否就是指望勃列日涅夫铲除上述那些消极现象，是属次要的问题。他们以十分尖锐、直言不讳地指责党

的政策的语言，对形势的严重性进行了描述。他们的批评甚至涉及到苏联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涉及到苏联过分扩张和野心太大等等问题，而关于最高领导层活动的这一领域比起其他领域来，一直更是不允许人们批评的严格禁区。

这份文件在结尾部分，提出了一项包括十五点的变革纲领。其中，民主化是中心的一点，根据这一中心原则，纲领直接提出了下列建议：要有获得情报信息的自由，包括把政府的事务公布于众；同外国自由交往，包括旅游、报刊书籍和电台广播的自由交换；实行新的新闻法，特别要废除检查制度，允许公民团体有出版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改善公众对监狱和精神病院的监督；维护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公布审判政治犯的正式文本；废除在护照上注明民族属性和为在大城市取得居住权必须去警察局登记以求核准的规定；改革教育制度，给予教师进行思考和试验的自由，也要求使干部们在其他活动领域得到这种自由；加强包括最高苏维埃在内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作用；苏维埃代表会议和党的机关的选举，应实行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

## 暗含着的对党的批评

不论在改革派进行的抨击里，还是在他们提出的关于新做法的建议中，党的作用这一最为敏感和最富有爆炸性的问题几乎始终未被提及，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惊奇；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党在苏联体制中所占的关键地位，党的作用就成了一切改革派思想家关注的首要问题。对经济执行情况的种种批评——不管其矛头指向的是“计划制订者”和“行政管理办法”，还是指向国家的独断专行，实质上其锋芒所向的是“党”。批评者认为，党作为自称的权力机构及其主要动力和各个生活领域中至高无上的决策人，应当成为被抨击的众矢之的，尽管它并不喜欢陷入这种境地，并且在尽一切可能企图使批评者把攻击的目标转向其他方面。



但是，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的努力，使重新考虑和修改党在体制中的作用，成为一件很有必要的事。什克列多夫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提出了一些建议。他的中心论点是，“经济”与“政治”这两个（互相依存的）领域各自要有相对的独立性。<sup>①</sup>他断言说，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经济与国家之间，<sup>②</sup>有可能发生抵触和冲突；事实上，在苏联的全部历史上，这种抵触和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不过，产生这种冲突的原因及其基本原理，却随着苏联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在非常时刻，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革命的初始阶段，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时候，“政治”同“经济”相比就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地要占首要地位。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必须生存下去的形势，产生了一些在经济上不完善、但在政治上却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什克列多夫援引了两个说明这类措施的例子，一个是在农民当中平均分配土地，另一个是把毫无经济理由的国有化运动扩展到中小型企业。<sup>③</sup>同时，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也说明了国家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何导致了造成经济损失和在政治上站不住脚的决定的产生。由于国家行为的破坏性方面总是在不停地显现出来，所以什克列多夫感到，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占首要地位的著名论断必须予以修改。这一论断是在革命成功初期，政权尚处于不稳状态的那些艰难困苦、风风雨雨的年代里提出来的；而现在，用什克列多夫的话来说，“把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占首要地位的结论绝对化，把它变成一个适用于所有时间、所

---

① 见什克列多夫著《经济与法律》一书第14页。该书以《论结合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对生产关系进行研究的原则》为小标题，强调了“生产关系”和其“表现形式”之间的联系，同时还强调了该形式一旦建立起来以后所拥有的独立性。恩格斯致C.施米特信中的思想可能是影响和产生什克列多夫上述观点的主要源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490-496页。

② 见什克列多夫著《经济与法律》一书第93页。

③ 同上，见该书第93-94页。

有地点的普遍真理”，那就是错误的了。<sup>①</sup>

包括什克列多夫在内的所有改革派都知道，一个新的阶段业已开始，在这个阶段里，社会制度和苏维埃国家不再面临外来危险（边界比俄国历史上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和平安全）；国内也不再有任何急切想推翻苏维埃制度和加强旧秩序的阶级敌人；因此，没有理由推迟对体制重新研究和着手改革这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没有理由迟迟拖延，不把经济和社会因素所需要的、舍之则体制将运转不灵的自主权给予它们。在国内不存在对政权抱敌视态度的阶级又不存在来自国外的严重的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政治的本质内容是在变化着的，或者说应该是在变化着的。正如什克列多夫指出的那样，政治的内容现在应当是协调和结合各个集团和社会阶级的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并且为经济的进步创造条件。<sup>②</sup>然而为了创立这种新型的政治，人们就要求党根据出现的新原则改变其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新世界》杂志上为什克列多夫的著作写了热情洋溢的书评的笔者，把什克列多夫的观点归纳成这样一个思想：必须把三个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区分清楚，这三个领域是：经济管理与计划、法律与政治（或称国家法律）和党的政治领域。<sup>③</sup>

从整个体制实际运转的情况来看，要进行上面提到的那种区分，就必须有非常不同的机制，必须在这三大领域的各个机构当中重新规定各自的职能和特权。必须主要由生产者通过它们相应的机构，来开展经济活动和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协调。有人含蓄地要求国家终止直接管理经济这项特定的、非政治性的活动。“经济归生产者管理，而不应归政治官员管理”的口号，就是这种观点的概括。虽然人们要求国家不要直接管理经济，但是国家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它要确保经济部门活动的法律义务、规律性与合法性。这样看

---

① 同上，见该书第94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95页。

③ 见V.格奥尔基叶夫的文章《经济与法律》，详见《新世界》月刊1968年10月号，第278页。

来，国家在经济中还是要起作用的，不过它的作用仅仅体现在主要通过法律“来对经济工作进行政治上的领导”。<sup>①</sup> 国家应该制定一般性的规定和一般性的纲领，而把计划的实施交给拥有专门知识的经济部门去完成。

第三个领域，即“党的政治”领域，必须致力于使国家和经济组织之间协调一致，有共同的目的，同时也要调解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改革派并没有作出解释，至少是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可是从关于党不应做哪些事的反面提法中，人们可以找出一些答案。为什克列多夫的著作撰写书评的笔者指出，党将停止“用行政和严密组织”的办法管理经济生活的做法。（萨哈罗夫补充说，党必须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许多其他领域内也停止这种做法，他的看法无疑得到很多知识界人士的赞同。）一方面，改革派显然希望消除国家对日常经济生活所进行的经常性的、微小的和笨拙的干预，他们请党结束对经济领域和对国家机器日常活动的干涉。考虑到党仍然是一个十分独特的超级政府、控制网络和决策人（它为自己保留了它所希望决定的政策）这一情况，又鉴于党的这些做法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弊端，改革派于是提出了旨在使这一机构的性质发生深刻变化的建议。在改革派当中，什克列多夫承认，党应该起指导和广泛统一的作用，但他又补充说，党应当“按照立法准则”，使用“它的章程上所规定的工作方法”。<sup>②</sup>

另一方面，改革派除了呼吁对“行政和严密组织”的做法进行限制以外，还婉转地以暗示的方法提出了另外两项重要的要求。第一是提醒党记起它在1919年许下的、后来从未重复过和兑现过的允诺，即党一定要以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准则为基础开展工作。然而，考虑到党是一种凌驾于宪法规定之上的因素，它不受任何这类限制的约束，所以什克列多夫关于党“按照立法准则”行事的要求，不折不扣地等于要求党成为一个以苏联宪法为行动准绳的政治机构。对

① 见什克列多夫著《经济与法律》一书第96页。

② 同上，见该书第97页。

这一要求的确切含义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可以理解成它认为党的权力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给予的，真正的权力属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因而必须把这种权力归还给苏维埃代表大会。

第二项要求指出，党作为一种先锋队，要根据其章程中宣布的原则行事。党的章程宣称，党是一种政治性的先锋队，它通过说服教育等等手段进行工作。根据章程的条文，党不应该扮演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的特殊国家行政机关那种角色。什克列多夫等人要求党回到其章程的基础之上，并试图以宪法原则对党进行约束；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暗示出自己的主张：党必须停止干预经济，必须结束它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统治，必须集中精力去制订进行调解、协调和政治领导的一般性政治原则。

人人都会猜测：在实践中究竟应当如何实行上述主张呢？单凭纯理论性的思考，无论如何也无法预知未来党的活动方式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人们可以想象出许许多多的建议和模式。也许，有些改革派对此有着明确的想法，但感到不能自由地表达出来；而其他许多改革派对此却还是茫茫然一无所知。不管怎么说，在政治生活当中，机构的形态很少是根据计划产生出来的；它们是在政治斗争中通过人们的经验总结而锤炼出来的。但是要求从本质上进行改变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而且看起来，改革派及其代言人并不是白日做梦的空想家。他们分析实际存在的问题，虽然推导出的结论和提出的补救办法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对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作了正确而又客观的描述。

这些人提出的看法，涉及到尽管没有得到官方承认，但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形和状态。新型社会结构的出现更是一种现实情况，它产生了新的力量、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压力。如果经济困难持续存在下去，就会造成形势的紧张，而这种紧张状态转过来又会促使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形成其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将不仅经常同党所鼓吹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且它们的影响还将渗透到党的机关组织内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假如上述分

析是正确的话，那么这里所引述的就可能远远不止是少数几个孤立的个人的意见了。甚至连一些这样的论点，如关于意识形态僵化死板造成的毒害、党的指导作用的薄弱、党的不恰当的行政管理办法和职能以及现行过时的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控制等等，都已经流传很广了，很多阶层的人士认为这些论点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对此，我们将不再下任何明确的断言，但是倘若上述情况属实的话，本章所叙述的争取进步的纲要，就的确代表了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趋势；该纲要的思想在知识界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同时也在对某些行政官员、经理人员和党的官员阶层产生着深入人心的影响。因此，可能萨哈罗夫等人在要求意识形态论战、情报交流和政治思想的自由方面并不是在孤军奋战。R. 麦德维杰夫后来所写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一书，提出了一整套纲领，这些纲领涉及的范围之广，使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三个人起草的《共同宣言》望尘莫及。<sup>①</sup>

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是需要勇气的。他们要冒极大的风险，不过他们发表的非官方宣言，常常只是一丝不苟地详述那些公开发表的书上大都已经谈过的内容。很可能有胆量的作者知道，党的统治阶层中的某些集团是理解他们的，一旦局势许可，这些大权在握的人是会支持他们的。

本书摘引了不少作者的著作，其中还包括未发表的著作。显而易见，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人所表达的，主要是日益庞大的苏联知识界的利益，或者是知识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利益；社会的其他部分，例如工人阶级，并不是他们经常专门论述的对象；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工人阶级即便不是一个在政治上保守的阶级，也要算是一个无论怎么说都对民主不感兴趣的、毫无生气的阶级。上述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民主的做法和交流情报与进行创造的自由，除了对俄国的事态有所裨益而外，首先是为知识界的利益服务的，它使知识界某些部分享有的已经很重要的作用、威望和特权变得神

---

<sup>①</sup> 见俄文本《论社会主义民主》(阿姆斯特丹, 1972年版)和S.杰弗里翻译的法文本《论社会主义民主》(巴黎, 1972年版)。

圣不可侵犯；所以，他们提出的纲领并未对社会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而是把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政治制度的缺陷，其目的首先在于对政体进行认真严肃的检查。<sup>①</sup>然而，无论纲领的作者怎样保持沉默，一旦他们提出的某些改革得以实现，就等于朝着进一步纯洁苏联的政治生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许多暂时隐而不现和秘密存在的社会的或其他方面的倾向，就将公开显现出来并且进入政治舞台。除非发生一场其结局无法预测的社会大动荡，否则，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上述结果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目前来说，知识界的代言人与现领导之间的对话无异于一场聋子和聋子的对话。苏联领导人清楚地懂得，科学对于解决无数危及其政权的问题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他们正是把科学技术，而不是把政治的甚至经济的改革以及鼓吹改革的不可捉摸、莽莽撞撞而又乳臭未干的人士的作用，看成是能着手成春的灵丹妙药。因此，苏联领导就用这种方式，企图拉拢知识界中的一些重要集团，对这些人提出勃列日涅夫形容的所谓“工人阶级与科学的联盟”这样一条在苏联政治生活中颇为新颖的口号。萨哈罗夫也向党建议组成一个同样的联盟；但是有鉴于现领导情愿在政治决策的若干领域内，向他们提供社会特权、物质奖励、某些方面的自由以及有限的影响力，所以萨哈罗夫等人起草的那份文件就试图证明：靠杰出人物组成的范围狭小的圈子进行统治的补救解决办法，对于俄国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进程是无济于事的。他们要求苏联的体制实现完全成熟的民主化，要求较大的政治集团、首先是知识分子阶层获得真正的权力，要求每个公民都享有政治上的权利。

---

<sup>①</sup> 为了公平起见，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在苏联的制度下，很难公开对社会进行批评，很难象文热尔维护农民的利益那样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说话。“工人阶级”、“国家的统治者”，这是苏联政权最得意的神话般的理论。除了党，还有谁有权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呢？领导集团是不会容忍在他们自己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任何调解人的；不过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已经开始一篇一篇地致力于用较为真实的形象，告诉人们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告诉人们工人阶级对其社会地位是怎样认识和有何感想的。

政治体制、尤其是执政的党，是社会现象形成的，同时又不断受到社会现象的影响。对社会现象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可能会为我们理解苏联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各种不同趋势的本质和根源，提供更准确、更详尽的背景情况。我们将在本书的下一部分里，尝试着对面对着一个新社会的苏联党的若干情况，作一概略的描述。





第三部分  
社会与党



## 第十章

# “平民社会”在恢复中

在回顾和总结我们所研究的最近四十年来经济论战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各种反映这个主题之前，让我们在本章和下一章中稍微离开这个主题，来探讨一下某些可为我们了解当前论战及其前景提供重要背景材料的领域吧。这样，我们就能更多地清理出一些论战中由于苏联学者冲不破政治禁区而无法理清的线索。完成这一工作有两项任务要做，即不仅要把在苏联国内学术讨论中无法涉及的历史背景介绍出来，并且还要提供一些关于苏联党内显然存在的各种倾向的论据，而这些倾向往往是研究苏联政治制度中的党的机关时最易忽略，且为苏联学者所不敢公开争论的。

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大致探讨那些西方著作中尚未充分加以研究的方面。

以战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业化年代作为出发点，来归纳出形成苏联政治制度的各种主要因素是十分恰当的，因为那些年代对形成党和国家的体制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由党所决定而必须严格执行的各项经济任务，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那些强调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法必然导致整个制度的深刻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们，可以在苏联历史上为他们的这类论点找到充分的例证。只要采取了一项强制性加速实现工业化的政策，整个体制就得重新改组，以适应中心任务并有助于中央控制整个进程。体制改革和各种经济活动都是自上而下强迫推行的。此即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也正是供我们认识苏维埃政体特征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旦发动起来，便要把来自中央的强大压力硬加到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头上，不管人们的抵触情绪有多大。本来指望，利用这种办法可以使国家尽快成熟起来，没想到这种长官意志却越来越根深蒂固了。显然，“无产阶级专政”，即那种由中央强制推行各种计划、指标、指令和各种奖惩、管制、约束等办法的整个体制，并不是一种暂时的手段，而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为了使中央有权把它所希望的管理方针和定额强加于全国和所有的行政单位，便对体制结构进行了重新改组。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经济计划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出现在整个政治制度中。这个制度既以这种方式形成起来，它就具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独裁机构的类型，它的职能则是通过一对在上层结合得很好的特殊的等级制的官僚体系来行使的，这对官僚体系就是国家机器和监督它的另一个等级系统——党。在这两套管理机构中，权力和特权的行使都采取一个共同的模式，即权力都集中在它们的最上层，而下面各级官僚机构和党的各级干群，则只有义务绝对服从和“雷厉风行地”完成上级详细规定的任务。在经济领域里，国有化是以向国家作贡献为借口而剥夺直接生产者的各种权利来实现的；同样，在政治领域里，政治生活“国有化”的现象，也是以服从上级领导的名义剥夺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来造成的。

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行政决策权全部集中在上层手里，这成了一个严重的事实，而在苏联工业革命期间它就已经最终定形了。苏联领导人一贯坚持其对工业革命目标的看法，并且坚信他们有能力继续指导和改造其社会，因而产生一种紧迫感，要竭力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一切重要领域的垄断权，并对所有这些领域加强严密的控制。这样一来，国家机器和党组织就必须发展成为足以发挥这种控制作用的工具。因此，党和国家机器，特别是党，都顾不上别的事情，而只好充当对社会和行政管理机关实行控制的机器，只好自不待言地要把自身的大部分能力集中使用于这一职责。

所以，党与社会之间最根本性的关系，无非是控制者与受控制

者的关系罢了。领导的概念终于被歪曲了。领导本是引路的，自然有人追随他；如果无人追随，他也断然不会去强迫人家服从他的领导。一个独裁的党，只要它能教会人民参与领导，并为人们创造参与的条件，包括领导班子的形成由越来越多的人表决，那么它也是领导有方的。否则，领导就变成了一种权力结构，而首先醉心于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其权威。

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苏联党内。党在全国强迫推行其经济计划和政治纲领，要全国接受一种世界观甚至审美观，不让公民有争议的权利；而没有争议的权利，便失去了群众参与的意义。于是党本身只好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操纵网，并千方百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个制度由于其本身的特征而产生的后果是十分深远的，它让纪律性扼杀了自觉性，当权者主宰一切而群众则唯唯喏喏，对上司和权贵们的忠忱胜过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至于“苏维埃民主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以及“群众参与领导”之类的谎言和神话，只是徒托空言而已；精神文明由于片面发展而显得异常空虚。<sup>①</sup>

工业化年代中党和整个苏维埃制度的形成过程就是这样。可是与此同时，工业化却带来了国内面貌巨大的改变。它发展了强大而多样化的经济，促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在二十五年狂热的工业建设和政权建设中，政治统帅着一切。经过几十年以后，先前为了把一个农业国硬要变成工业国而仓卒间草草建立起来的那个体制，现在已面临着迥然不同的现实：经济已无法再用原始的方法来管理，日趋复杂而多生事端的社会也不能再用粗暴的纪律手段来加以压服了。

使党的任务容易完成的一个因素是国家在现存制度下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历史成就；党的许多价值观念和不少新的制度已为公众所接受，并且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过去的一切成就，无论它有多大的说服力，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体制的成功，更不能用它来

---

<sup>①</sup> 引自S.奥索夫斯基：《社会条件和社会计划的成果》，载于《选集》第5卷（华沙，1968年版），第293页。

掩盖如此漫长时期内在新形势下所暴露出的体制的缺陷。新的经济与社会开始迫使党进行改革。三十年代那种“政治”统帅一切及其任意提出倡议和搞突击的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十分轻易地提出一些简单的中心任务，并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加以完成，这种情况已成了过去的事。当初使党得以建立的历史形势，以及给党增添了光荣并为党形成其内部组织的整个制度，也都今非昔比了。经济状况已成了产生各种急待解决的难题的温床，而各种社会力量，其中有些是俄国历史上崭新的力量，也开始提出各自对权利的要求。摆在党面前的是：如何才能制定出多种多样的策略来达到多种多样的目标；如何才能重新组织好力量来适应新的现实；怎样找到新的办法来加强党的控制或取得对党领导的承认，以及如何动员那些当年一呼百应而现在仍然必需依靠但又各行其事的社会集团来支持党——这样一些难以解决的新的任务和新的课题。为了不致失去党的控制，改革便迫于现实而慢慢开始了；改革虽然有助于控制的确立，但在很多方面当其面临着改革时，却是毫无准备的。

在过去，党所面对着的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制度；为了对这个制度进行彻底改造，曾经采用了一系列冷酷无情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使党本身也在完成这次根本变革的过程中定型化了，而上述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是相当大的。党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组织，一种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它有高度集中的权力，便以广泛动员以及实行严密的管理与控制，它与当年列宁手下的党完全不同了。至于党的领导，以及领导与党员之间的关系，也与列宁时代大不相同。

这个新型的组织显然有能力激发出其成员的阶级信任感，并能按照它自己的价值观念来改造他们。特别是那些进入了左右全党的上层党机关的人，他们把新的信任感和新的利益感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充分加以发挥，从而获得了大大不同于那些年轻的革命者在一个革命政党内有可能得到的重视，于是他们就结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统治集团。职位、特权和职权，以及行使和享有这些权利的

方式，必然构成一些互相关联的因素，大大有助于把这些权利同政治地位等同起来，而有了政治地位，也就等于有了一般的社会利益。其实，党是在施展一些煞费苦心的伎俩，来巩固其权力和优势地位，并在这方面得到了那些分享到特权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大力帮助。当然，这是一种既得利益，它比其他利益更牢靠得多；其他利益虽然能够体现许多一般的利益，但往往也会受到那种首先保护自身利益的劣根性的冲击。一个专业性的统治机构既然以这样一种姿态出现，它就必然会脱离群众而故步自封，而党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之间出现的鸿沟，必然使这个相当虚弱因而更加保守、更加采取自卫立场的党，面临着一系列越来越紧张的挑战和压力。

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在前面几章中已作了大量的探讨，它是由于生产效率不高、技术改革不力、生产者对生产漠不关心而只顾自己，以及过时的计划和管理方法——这一切都成了严重阻碍经济运转的绊脚石。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各个不同的阶层便迫切感到需要重新考虑当初建立该经济制度时所遵循的那些主要原则。于是，各种改革方案和改革派的思想都认为，必须重新调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变国家对经济以及国家对生产者的态度。

新的社会结构同时为其制度本身带来了两个需要加以改变或适应的困境。自从六十年代初，这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就占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仍在方兴未艾中。农业人口依然是个重要的部分，但其比例已从1926年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一九，下降到今天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不包括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根据1926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只有全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七四是靠非农业为生的。今天，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受雇于农业的人口，大约占自立谋生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

当时，产业工人大约为五百万人，职员为三百八十八万人，而只有十三万七千人属于自由职业者。今天，产业工人阶级乃是苏联社会唯一最大的阶级，大约有六千二百万人在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

中，而单以工业计算就超过了两千万人。这在苏联历史上是又一个巨大的变化和新的因素，尽管它的政治意义目前还没有任何人认识清楚。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情况是迅速成长起来的非体力劳动的白领阶层，他们在苏联统计学上叫做“知识分子”，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非体力劳动的性质。他们算是社会集团呢还是准集团，目前还难以弄清，因为其中还有相当大量的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所谓智囊团人物，后者在国家机关内外都有。同较早的十三万七千自由职业者的数字相比，如今已有一千六百万人在从事科学、卫生、教育和艺术工作，而且这一部分人数的增长比工人阶级快得多。后者从1940年到1970年只增长了一点七倍，而前者却增长了二点三倍。在这同一时期内，学术工作者的人数增加了七点九倍，其中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达到了九十万的惊人数字，而1913年这两种人员只有一万二千人。

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我们再举两个数字：目前工程师有二百五十万人，技术人员有四百五十万人，而1931年这两类人数总共才十九万人；大学生人数目前为四百五十万人，而沙俄时代只有十二万七千人。<sup>①</sup>

就这样，俄国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便从一个基本上是庄稼汉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文明的工农业结构的国家。

由于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它的这些新的阶级和对国家起着重大战略作用的大量社会集团，于是也就产生了要求各种优惠待遇、特权地位和势力，以及参与领导权的种种压力。

于是，这样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教养的新的社会，既然能够创造、而且事实上也在经常创造着各种集体价值，并且尽量设

---

<sup>①</sup> 所列数字引自《统计评论》，1928年第5期，第88-90页和《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70年版）第522-523页以及该书中《劳动》一节全部；又见G.奥西波夫编《苏联的工业和劳工》一书中根据1959年人口普查发表的有关社会结构和职业构成的数据（伦敦，1966年版），第27-28和40页。



法坚持和捍卫着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它便继续不断地向党提出各种无异于权利法案的要求，包括承认其利益并有权保护这些利益，有自主活动的自由；总而言之，要国家完全另眼看待它。

新的社会现实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的社会差别。社会的不平等和阶级关系的紧张，终于成了日益严重的、令人头痛的问题。只要国家的动员能力在新的更加涣散的经济状态下日益减弱，因而要煞住社会紧张和阶级对抗已不那么容易时，阶级间和集团间的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紧张状态就会进一步暴露出来，给苏联政治生活打上深深的印记，特别是在一旦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新的苏联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领导上认识到了新社会的复杂性及其内部固有的社会紧张状态的结果，因为不去认识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对它进行管理。但是，他们的社会学必须首先对苏联社会不平等的事实或多或少地加以坦率的承认，并且努力作出分析。社会学家们在研究各个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和青年一代时，已经作出了比宣传部门所承认的现实更为精确的描述。可是他们在解释各种混乱现象时，却不够大胆而多少有些固步自封，甚至竭力加以粉饰。他们首先提出意识形态问题：“所有制的社会化岂不意味着消灭了不平等的根源吗？”一些社会学家断定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可说已是公共所有，因此从生产资料总的情况看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sup>①</sup>然而，生产资料的使用和管理也并非不是不重要的，它正好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所以发生这种

---

① 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社会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请参看 M. 路特凯维奇编《苏联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67年版）；下列各书特别值得参考：G. 莫克罗诺索夫：《论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内部差别的识别标准》，俄文版，第5-13页；V. 拉吉昂诺夫：《论阶级内部分化的根源》，俄文版，第14-20页；F. 菲利浦夫：《作为形成社会同一性之因素的社会变迁》，俄文版，第93-101页。又，Iu. 阿鲁图年：《农村统计学研究的经验》（莫斯科，1968年版）第39-40页和 V. 什克列多夫：《经济与法律》（莫斯科，1967年版）第63页称：“既然只有一定的社会阶层才能在其特殊活动范围内从事管理工作，那么这个阶层的特殊物质利益也就得到了保障。”总之，在官僚政治中行政阶梯的不同等级上，有着不同的利益，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生

情况，是由于不同集团的劳动人民实际上一直在使用和熟练掌握不等量的生产资料，而这种现象则产生于他们在劳动分工中因其技术熟练程度和受教育程度不同而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那种理论上的所有权并不能决定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社会地位，只有他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他对国家财富的支配，才能决定其社会地位。

另外一些社会学家甚至开始探索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发号施令者与唯命是从者之间特殊的相互地位。尽管在措辞上总是遮遮掩掩，但不平等问题本身却吸引着他们去探讨权力的问题。

还有一些人研究并发现了：大多数年轻的苏联人和整个苏联工人阶级所得到的知识传授和职业培训水平是相当低的；绝大多数苏联工人从事着原始的体力劳动，他们只能用少量的机器或他们的双手干活。不到百分之十五的工人，由于他们的资历较深而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人数众多的低级职员则过着近似赤贫的生活。<sup>①</sup>这就必不可免地要出现异化，因为在任何一种制度下，只要人们的劳动不是为了得到愉快或出于公民的义务感，而仅仅为了谋生，异化就不可避免。如果在精神上和学业上都受过高熟练工种培训的年轻人只能在低技术工种当一名普通工人，那么异化现象就会更加严重，只要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增长速度，上述大材小用的现象就会发生。这也是苏联当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sup>②</sup>，一个大隐患，一个经济潜力的大漏洞。

一些作者针对着这些事实和真象，驳斥了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定

---

产关系的体现者的人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实际上的社会差别和经济差别，更不用说工人和农民之间存在着阶级差别了。”

国家所有制消灭不了这种不平等，也消灭不了那些利益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国家所有制是存在着各种矛盾的所有制形式，其中之一就是行政权力的集中与实际上存在着的企业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矛盾。”

① 关于劳动力及其职业和教育水平，参看 A. 诺特金编《苏联国民经济结构》第 5-8 章（莫斯科，1967 年版）和 V. 扎明的文章，载于 A. 诺特金编《苏联经济发展的因素》（莫斯科，1970 年版）第 5 章，第 125-126 页。

② 扎明文章，同上，第 116-117 页。

能从对自己工作岗位的主人翁感得到鼓舞力量的奇谈。<sup>①</sup>事实上，官方批评普遍游手好闲、无故旷工和一心追求高工资而要求调换工作的一大套说教，也恰好同它的意识形态的神话自相矛盾。

这些事实有着潜在的爆炸力，使党不得不采取复杂多样的社会策略，甚至不惜进一步把党的巩固委诸于一位擅长于权术者的手中，以图保全其自身而宁肯背离其老一辈奠基人的理想。这就迫切需要在权力上层和被亏待与异己的基层之间，即在领导集团及其特权追随者和劳动群众之间，找到一条社会的缓冲带。而正在增长中的知识分子，恰好起着这种缓冲带的作用。他们之中有些集团已经因为甘愿效劳而分得了大笔报酬。这些集团构成上层权贵的一部分，他们特别热中于保存现行制度，或者充其量只作点微不足道的合理化试验，使情况稍微好些罢了。

可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都非常强大的上层，既面临着大量无权的群众和介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增长中的知识分子，就有可能再度发生各种力量的重新结合，而这一点是苏联领导集团清楚意识到了的。正是这种命运攸关的结合，使沙皇的帝国遭到了覆灭。只要广大群众处于贫困状态而提出更多的要求，只要知识分子集团虽然在社会上享有特权却缺少各种政治权利，那么重新出现一种激进的、有知识分子站到工人一边并赞成由工人来领导的政治，这从理论上来说应当是可能的。从党或者从党的某些领导人所经常使用的各种对策中，可以证明他们已深刻认识到这种危险性。他们利用人们的国家观念和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倾向，来挑动他们反对吹毛求疵的知识分子，把后者说成是“寄生虫”，既养尊处优而又

---

<sup>①</sup> 1968年1月6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位集体农庄主席N.索特尼科夫写的一篇文章，抱怨农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就是“没有充分发扬主人翁感。”A.叶麦利扬诺夫编的《农业工业化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引用了他的话（莫斯科，1971年版）第138页。该书编者确认，这是一种普遍的顾虑，因为现行的组织方式和计酬办法使农民对自己的工作不感兴趣，对土地漠不关心。安东诺夫对城市工人也作了类似的论断（见上述A.诺特金编《苏联经济发展的因素》，第5章，第148-150页）。这方面的更多资料可参看Z.卡茨：《苏联的社会学》，载于《共产主义问题》，1971年5-6月号，第34页。

心怀不满、牢骚满腹——这就是大量充斥于例如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叶皮谢夫和索洛缅采夫发言中的一个话题。

党也控制了马克思主义。控制是通过有选择地、使其民族化和用无益的琐谈使其僵化来实现的。这一作法极为巧妙。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分析阶级的真象，分析各种表面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阶级力量 and 各类政权结构中的社会现实，以及正在暴露出来的、由于工业的组织性和政治上的无依无靠性而产生的人的异化。苏维埃制度未必能够安然无恙地在这样一些范畴内经得起人们提出的批评。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要推行一种政治制度，需要采取一个显然应采取的步骤，那就是必须求助于社会科学。这是一个紧迫的步骤，因为社会科学早已被禁锢起来，而人们对党所面临的现实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已变得相当严重，至少在更时髦的、受过教育的苏联领导人中是这样。作为计算机和管理科学之基础的控制论和系统分析法，以及数理经济学和社会学，以异军突起之势到处发展起来，在年轻一代中备受欢迎。

虽然所有这些科学领域有可能被任何一个寻求灵丹妙药的政府从“技术上”加以运用，可是在苏联的现实情况下，它们都有在政治上引起混乱的可能。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原始范畴显然不是这个制度所能容忍的，那么这个制度对控制论的那些范畴也决不会有什么好感。正如涅姆钦诺夫、格卢什科夫、特拉佩兹尼科夫和萨哈罗夫这类专家曾经告诉领导那样，苏联政治制度的弱点以及整套组织机构和党的工作方法的缺陷，就象一台计算机中诸如系统的“智能”、“反馈”和“自动转向”，特别是“信息”及其“传递线路”，都正处在失灵的状态中。当然，这类专家的政治结论和他们提出的改革办法的性质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出于解放社会力量和调动积极性的需要，有的则准备向领导建议一些较好的控制方法，以便帮助领导摆脱困境，还有另一些人企图制订出一套巧妙的折衷方案。

新的社会学可能是一柄双面开刃的利剑。研究和揭露社会的真象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导致混乱的做法。但这只是最小的代价而

已，如果政权想要有条不紊地完成其改善现状、增强活力与合法性的任务的话，那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事实上，新的苏联社会学是有能力和兴趣来帮助现行制度达到切实有效的内部平衡和克服社会矛盾的；据某些分析家看来，其所起的作用与美国的机能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的确，与机能主义相近的那些概念已开始渗透到苏联社会学中，正象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曾经同西方的结构机能主义的概念相结合一样。<sup>①</sup>

不幸的是，或者应该说是幸而，社会科学即使受到来自上面的控制，仍然经常有突破官方和非官方卫道士与御用学者所强加给它的条条框框的趋势。能够影响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的作用、方向和效用的，已不仅是那些卫道势力了，而且还有社会的一般状况、它的紧张特点，以及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

在苏联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而产生的许多后果中，社会科学在那里以新的面貌出现并具有潜在的批判力，这本身正如经济学界的论战所充分表明的那样，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随之而来的一个更为深远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各门社会科学所使用的语言，已经同官方仍然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毫无共同之处。

事实上，对新学风的承认往往是经过与保守分子的激烈斗争才勉强争取到的，而新语言的胜利则充分体现了正统意识形态的败坏和没落。同时，不仅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敲响了许多旧教条的丧钟，而且社会的变异、分化、分层和复杂化本身也为不可能镇压下去的价值观念、信仰和意识形态备就了繁殖的肥沃土壤。每当社会利益悬殊而出现冲突的时候，每当社会制度暴露出其驾驭多元主义社会多方面现实的能力有所减弱的时候，这些利益就会以直截了当或转弯抹角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们就会对官方意识或价值观念采取抗拒、挑战或简单地漠视的态度，而提出或接受与之相反的一套。

<sup>①</sup> 这是A. 戈德纳在其《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和经院社会学在苏联出现的摘记》一文中的论题，载于《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伦敦，1971年版），第447-477页。

细心的观察家不难从苏联公众中找出品种齐全的不同信仰，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更不用说各种伦理观和哲学信念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官方说法为有些人所附和，但那往往只是挂在口头上或用于庄严场合，而经常是些隔靴搔痒、不切时弊的废话。

因此不难有把握地推断出，在官方所宣称的政治一致性下面，俄国社会存在着隐蔽的政治真象，甚至在现阶段也暗中反映出一大堆五光十色的政治主张。要是允许这些人表达出自己的见解，那么情况就会更加清楚；而每一个人，包括统治者们，就会看清他们那个社会的真实政治情况。这些倾向既然已经以潜在的方式，或者更经常地以流露出半意识状态的方式存在着，而很少在公开言论中表现出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到处都可以觉察到；可见党控制如此复杂的政治现状的能力是很差的了。

实际上，各种各样政治“异己”观念渗透到党本身内的能力也许是非常强大的。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假定，但终有一天它会由于对党的深入研究，或者由于党内的分歧公开暴露出来，而得到大量的证实。与领导上和宣传网大肆贩卖的严格正统观念大异其趣的整个政治暗流，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党内；只要认真观察一下普通党员的作用，就能更加明白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何在。党往往不能坚持自己的官方立场，甚至在大量接受非官方的作法的同时，还迁就公众的情绪，容忍那些并不总是最进步、表现得已经根深蒂固的信念，这个事实可以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日益增长而有时遭到恶毒攻击的民族主义的作用来加以说明。<sup>①</sup>

---

<sup>①</sup> F. 费日多在其《斯大林死后的人民民主的历史》一书（巴黎，1969年版）中对这一过程写道：“在东欧各执政党内渗透着的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1973年3月份的《斯拉夫评论》（第32期，第1-44页）的“讨论”栏中的论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说明俄国国内民族情绪的觉醒，以及它如何带有不同的色彩和倾向，如何从学术界和业余爱好者对俄国历史和文化的合法兴趣，转变为对神秘的“民族精神”的探索，终于成为恶劣的沙文主义的表现。这次交换意见的参加者J. 哈尼、T. 伯德和G. 克兰也记载了

如果这种一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许多官方的语言和说教都不仅不能取信于人，而且不足以捍卫党，使之免受外来的影响；但是要人们适应和接受那些仍然不肯屈服于浅显意识形态攻击的老一套说教，却不得不慢慢来，因为要搞出一套口径一致而易于接受的宣传，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一个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党必然超然于革命之外，它愈是转向于维持现状，转向于宁肯稳定而不愿改革（这种现象是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设法积累了财富而不愿再冒丢失财富的危险就自然会发生的<sup>①</sup>），它就愈会丧失掉它的充沛的思想能力，愈加不肯进行实地的检验而听信一些有势力的集团。事实上，这种蜕化现象往往与大肆叫嚷的宣传和忠于老一套教理问答的宣誓一道发生，而这类宣讲和誓言只能更加证明旧信念的消亡，而不足以说明它仍有任何真正的热烈愿望。

这种思想活力的丧失正好说明，为什么有些共产党已被它周围的社会环境所吞没，为什么他们先前曾为之战斗过的意识形态，现在只满足于仅仅保存一个躯壳。

党灌输其价值观念的能力一旦受到损害，党的作用也就削弱了。于是有些党便着手通过新的途径来寻求精力和才干，而有些党还不曾这样做。铁托、卡达尔、杜布切克、齐奥塞斯库和哥穆尔卡就是一些不同例子，表明从政策上的激进行动和旨在建立一个新党而砸烂老党，到走上下坡路而逐渐失去影响力这一系列情况。

## 党内的变化

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要迫使党进行内部的变革。随着

---

有关今日苏联一直进行着的对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不同解释的共产党员之间激烈的争论甚至尖锐的冲突情况。党的立场之所以暧昧不清，无疑是因为实际上在党内存在着同样暧昧的倾向，并且互相争执不下，因而不允许党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采取一种鲜明的立场。

① R. 塔克在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一书（伦敦，1969年版）中对执政的共产党中的这一倾向作了详细的分析。

斯大林的逝世，党内和国家机构内部开始了一个根本性变革的过程。

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集团领导代替了个人统治。苏共中央委员会以一项决定认可了1964年的改革，当时曾禁止任何一个领导人一身兼任政府总理和党总书记的双重职务。

“集体领导”的现象并不是由于领导人角逐权力而谋求短暂均势的权宜之计。相反，它体现了关系到政权模式的更为深刻的结构改革。苏联领导人今天所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以及党机关内部的新的力量平衡，都要求他们采取这一新的领导方法，正如他们先前不得不肯定许多政治上的新作风那样。上层权力结构的扩大是继下列一些新作风之后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如党采取更加成熟的勤奋管理方法，使用各类专门人才和经过初步研究再作出决定，以及取消对统治集团内部的下级部属动辄行使显然不恰当的高压惩处办法。上层权力的开放首先意味着，让各个机构的一些强大集团能够更实际地参与领导或影响决策，并且创造条件使这些集团有职有权而安于它们的地位。领导机构中各个较高的等级目前已争取到它们所需要的合法条件，来进行它们的政治活动和业务活动，包括职位上的保障。这些集团起着牵制领导的作用，不让领导变化无常或一下子转为独裁，否则任何一个有效率的官僚机构也不能发挥其职能。因此，领导在共同利益的促使下，改进了许多决策过程，并在行使权力上订了若干条例。提高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至少在中央领导层已深深卷入一场斗争时）和它充当调停人或最高仲裁者的能力，反映出它负有一项新的任务，就是要维护高级官员自身的安定。

同时，上层各级则成了政治竞技的场所。这里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一些旨在追求地位或决策权的联盟。自斯大林以后，上层各级的竞争已不再带有危险性，也不意味着还要担更多不可逆料的、不寻常的政治风险，充其量打乱了提升和降职的计划，却不会有人从特权圈子里被赶出来，并且往往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而且可以断定，党政官僚机构中层各级的地位和作用也提高



了，他们甚至在参予制定政策方面也得到一些机会。显然，这还没有得到公开承认并形成制度，但我们宁肯认为，不愿承认的原因是怕中下层各级有了更大的能量，一旦自上而下的决定不中他们的意时就会捣乱破坏。所以，在决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些中层人士的意见，以便确保他们能够支持“路线”的贯彻执行。

目前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西方研究者的极大注意，而且已为某些东欧人的材料所坦然承认，那就是各个集团、个人、专家和独立于党政机关与官僚阶层之外的非官方人士的政治影响更容易被接受了，虽然其影响只是通过施加压力和取得发言权来实现的。<sup>①</sup>由于实际上存在着这种压力集团，苏联的政策幅度比先前独裁时期更大得多了；更多的社会力量有了更多的机会通过更多的渠道来加强其压力的影响，因而政治过程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办事手续的合理化、生活在许多方面正常进行，以及诉讼程序中各种审判形式提高了效果，这些反映出这个制度本身由于遇到了众多的复杂问题和外界社会的各种压力，以及教育质量的改进和大部分居民对现制度基本特征的广泛认可，而出现了合理化和现代化的趋势。大规模的恐怖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仍暴露了保安部门的胡作非为。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也由于党对保安机关能够更好地加以控制，以及存在着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使领导上不得不作出某种程度的反应，因而也有了一定的限制，并且采取了若干诉讼形式。

这些变化都是整个社会体制在社会日益分化和平民与权贵都有了新的教养的情况下，实行了深刻的结构改革的必然结果。党的社会成分和干部的素质也跟上来了。只是现在，党才不仅在影响上而且在人数上，都以非体力劳动者阶级占了显著的优势。他们在全国人口中虽然只占三分之一左右的少数，却大致构成了党员人数的一

---

<sup>①</sup> 有关苏联各压力集团及其在苏联政治中所起的新作用的西方最新集体著作，请看 G.斯基林和 F.格里菲斯合编的《苏联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71年版）。

半。<sup>①</sup>党甚至也不再打算让工人阶级在党的队伍中占绝大多数；它正式宣布了它是一个全民国家中的全民党，仿佛现在全民都已信守“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似的。党也十分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偏爱和依靠日益增长中的专门家阶级。而相应地，它在作风上也更加容易打交道了；较之先前来说，它更加是一个委托行类型的组织，在作出某些决策之前也从“具体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考虑，并使用各种计算机来进行更多的信息和情报的识别。

这种作风上的新特征既反映了比较深刻的结构改革，也意味着党内的精神面貌和它在社会上的实际作用已有所改变。由于党所确定的方针是要把现有的这些模式普遍建立和保持下去，并把它们带到“下一个共产主义阶段”去，因而它在国内政策上便采取了一种新的立场，即考虑到党已失去了先前的原动力，尽管它保存下来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它也只好采取一种保守的姿态。可是它的野心却更加转向外部世界，企图借助于老百姓的爱国情绪，在国境以外相当容易地取得外事上的成功和壮丽前景。而对内的雄心壮志则减弱了，只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处理和改进其机关日常事务上，但求安全有效的措施而不愿冒任何风险。要期望现领导有大胆的新展望和重大的新突破，已是不可能的了。1971年春举行的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就是这一事态的最好证明。这次大会进行得很顺利，仪式隆重而烦琐，领导人作了冗长的“事务性”发言，会上没有新的打算和展望，只对资金和任务的再分配提了一些建议，这仅仅是些例行公事罢了。

党主要执行一些日常任务，使许多观察家感到很奇怪，这岂不是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了么，岂不是使自己落后于社会的需要，不去掌握事态的发展而任其自流，自己却在变革声中随波逐流不去

---

<sup>①</sup> T.里格比在他的《1917至1967年苏联的共产党员》一书（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68年版）中，对苏共历来的社会成分的变化作了详细的探讨。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提供的党内社会成分的官方数字〔见《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66年版）第96页〕表明，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八，集体农民占百分之十六点二，公职人员等占百分之四十六。

加以引导么。只要对现行政策作一番考察，就可以证实这样一种印象，即有时候党与其说是在执行一些新方针，倒不如说是在设法阻挠各种各样的革新。

所有这些结构和体制的改变都向西方和某些苏联的观察家表明，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已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大变化；这场变化已超离了一个发展阶段而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却难以用冷战或斯大林主义之类的说法来对这一过渡作适当的解释；同时，政治生活的各种新形式仍在继续出现，而且比过去二十年来所发展起来的形式还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同样明显地看到，党已在经历着一个改造过程，这一过程用 M.芬索德的话来说，是“从活跃型到适应型”的转变；按 S.亨廷顿的说法，则是从一种强加的等级制结构到“一种已得到承认的等级制结构”的转变；也正如 V.阿斯帕图利安所坚持的看法，是从利益的一致到利益的聚结过程；或者根据 G.斯基林的意见，则认为其基本结构并未改变，只不过以“一种早期的多元主义”出现罢了，而这种多元主义也就是 M.杜维格在谈到“一种实质上的多元主义”时所预料到的多党制中的一种可能出现的现象。G.斯基林认为，苏联的政治当前正为“一个不满于现状的集团”所左右；按 C.约翰逊的说法，党已经成了“一个政治的竞技场”；而 J.霍夫的说法也很精辟，他认为党的机构已经从一台精心制作的同声表决机器，变成了一台由“用途广泛而多故障的各种部件”组成的联合机。<sup>①</sup>

---

<sup>①</sup> 关于 G.斯基林的观点，见他所著《苏联政治中的各集团》一文，载于 G.斯基林和 F.格里菲斯合编：《苏联政治中的利益集团》，第 44 页；V.阿斯帕图利安的看法由 G.斯基林引用于同上书《绪论》中，见同上书第 16 页；J.霍夫的说法见他所著《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一文，载于同上书第 49 页；C.约翰逊的说法见他所著《对比下的各共产主义国家》一文，载于他所编《共产主义制度的变化》（斯坦福，加利福尼亚，1970 年版），第 26 页；S.亨廷顿的说法见他所著《社会的和制度的原动力》，载于他与 C.摩尔合编的《现代社会中的集权政治》一书（纽约，1970 年版）第 40-44 页；M.杜维格语见他所著《各国政党》一书（伦敦，1955 年版），第 279 页；M.芬索德的话引自《苏联共产党的转变》一文，载于 D.特雷德戈尔德编《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西雅图，1967 年版），第 68 页。

由此看来，大量的变化已经揭示出了一种独裁模式在转变为另一种模式，因而也相应地揭示出了党已经经历了变革的过程，并在继续发展为另一种类型的组织。但是这整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很不明确。目前还存在着某种交替阶段，或者说一种过渡的混合形式；同时，党作出各种可行的答案来回答它所面临的挑战的能力，在许多方面也已显得很不够了。

## 现行的政策是要重新达到团结一致

对党的现行政策及其内部组织作一番检视，有助于获得更清楚的认识和作出更正确的诊断。

研究苏联领导集团对某些挑战和难题的反应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而且我们也掌握了从入侵布拉格到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我们将对它进行探讨）这段期间的足够的材料。其实，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保守势力的抬头和反扑就已经很明显了，而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时则臻于顶点。尤其是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各种改革的尝试显然受到抵制和限制，在一切问题上都要竭力维持现状。

这一时期官方言论中关于苏联国内及其阵营内部关系的一些经常谈到的题目，表明了一切率由旧章的正统路线的回潮，或者至少在其措辞用语上是如此，甚至使人觉得有些说法似乎是从故纸堆中搜寻出来的。前一时期曾经多少加以容许的许多新的开端，以及对有关东欧集团和国内施政纲领和前景的一些新设想，现在不是销声匿迹了便是被否定了。<sup>①</sup>

在与世界共产主义的关系方面，先前赫鲁晓夫关于“通往共产

---

<sup>①</sup> 读者会在1970年第9期《党的生活》中找到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向国内提出的所有这类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面的论点；关于中央委员会为这次纪念活动所作的事前准备工作并以之作为党的宣传工作基本论点的大量细节，请参看同上期1970年第1期。那些论点在以后四年中仍是有效的方针。

主义的不同道路”的论点，现在也被否定了，只是还没有正式宣布与之公开决裂罢了。建设社会主义要遵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总规律”的说法受到大力强调。这对“不同道路”论来说，显然是个针锋相对的论点，而“不同道路”论目前已几乎从苏联的宣传中完全消失，并被承认只居第二位的“当地条件”论所取代。

用不着奇怪，这种论调的改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意图，就是要越来越顽固地坚持自己是正确的，仿佛莫斯科是唯一能够设计出全球适用的公式的地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能有变种！这类口号成了恢复正统后火药味甚浓的叫嚣，其中充满着莫斯科一贯正确的情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到处都同样适用的完整理论<sup>①</sup>——这就是苏联的宣传力图对那些过于喜欢标新立异的人给予当头棒喝而事先提出的教训。这一切等于一场对抗多中心主义的拔河比赛，也等于恢复斯大林的苏联模式至上论和莫斯科为首论。俄国在竭力重新加强对其阵营各国的控制和谋求步调一致时，硬要这些国家把加入“军事联盟”视为其“神圣的职责”，而断言采取其他任何路线就等于背叛。<sup>②</sup>

一贯正确的苏联（如果不是带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情趣的话）毫不隐讳地向公众解释（在《真理报》上发表）党用以制定其对外政策的各项标准。指导党的“首先是我国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sup>③</sup>说得更坦率些，制定政策的标准就是要把俄国的利益放在首位，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则是次要的。如此明显而“自然”流露的现实主义态度及其故意装得认真的样子，看来是对一个重大的问题还不甚了了，即“我国的利益”是否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变种提供充分的根据。

为了“军事联盟”而对其阵营各国施加压力，这虽是作为一种反

---

① 《党的生活》，1970年第1期，第4页。这是为党的干部出版的双月刊。

② 同上刊，1970年第9期，第32页。

③ 《真理报》，1970年1月13日。

对“帝国主义威胁”的手段而提出来的，但要真正对付这种威胁却无济于事。俄国的对外关系是采取了共处的方针，并在与美国和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方面进入了正常的竞赛方式，因此它的本意既不是想要冒险，也不是防备来自西方的麻烦。苏联对其阵营各国施加压力是打算重新加强它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而“军事联盟”似乎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办法。尽管如此，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它仍然确实是倾向和平的，把注意力放在国内。党的活动曾被清楚地表述为：“通过我国的经济活动，现在我们正在国际关系方面起着主要的影响。”<sup>①</sup> 这既是对国内事务集权化的一种要求，也是对那些害怕自主精神太多和害怕对外冒险的人，以及那些不满意于在对外援助上浪费资金的人的一种安慰。

从这方面看来，“世界共产主义”就得采取自卫，哪怕莫斯科仍然坚持说，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是唯一合法的解释。

中国问题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一显著的矛盾。苏联宣传的许多主题也同他们的政策一样，本来显然是打算灌输给它的阵营各国的，却也反映出了一些内部情况和各种忧虑。在一些通俗的和理论性的报刊中，意识形态方面的保守派在最近一个时期，曾经把有关党的垄断和党的团结一致性的论点吹嘘为独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的、通用的教义。是否坚持这些原则被视为区别忠实信徒和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标准；只要主张“略微收敛”党的传统作用，就被斥为叛逆和反革命。

一些苏联专家甚至以老成持重的方式展开了如下争论：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是否就用不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了；一党制也许并不是列宁主义早先的原则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作法果真妨碍了我们与他们的合作而使党不得不单独统治嘛；还有，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日趋一致真能消除多党制的基础嘛。多党制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在某些人民民主国家内得到容许，但那里却

---

<sup>①</sup> 《党的生活》，1970年第10期，第8页。

找不到反对派，而且是不可能让反对派存在的。<sup>①</sup>

于是，重申了作为“最高守则”的党的统一性和“日益增长的”团结一致性，以及“工人阶级”的统治和所谓苏维埃制度是现存的“民主的最高形式”。

值得玩味的是许多正统的旧论点中这最后一个论点，即苏维埃民主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在“最民主”的斯大林宪法中不知为什么不曾提到）。而现在之所以肯定地声明，是为了对国内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和国外尖锐的批评作出反应，特别是为了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因为那这就是一次反对共产党内部统治中的官僚主义和惩办主义乃至等级制和特权制的运动。

于是，苏联报刊便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带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之类的概念加以嘲笑和污蔑，并把它们统统加上引号，仿佛它们都是些肮脏字眼似的；同样，也连篇累牍地指责了象“出版自由”、“政治对立自由”、“艺术创造自由”这样的要求，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反无产阶级和反社会主义的口号。

含贬义的引号在国内的使用量，无疑地超过了用之于国外号称改革派的用量，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是不看《共产党人》和《党的生活》刊登的大量文章的。而在苏联国内却有很多人认为，党的组织原则和制订政府各种政策的原则都已经过了时，不能适应现阶段国内的发展。有些人很不理解，甚至竟敢写信质问《真理报》，为什么在一个打破了敌人封锁、消灭了敌对阶级并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国家里，党仍然必须象部队那样，或者象戒备森严的官僚等级集团那样行事呢。<sup>②</sup> 在苏联国内，要求各种自

---

<sup>①</sup> 参看M.列别捷夫关于党的理论文章《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党》，载于《苏维埃国家与政权》，1970年第2期，第9页及以下各页；又A.斯列波夫和I.尤金：《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党》，载于《共产党人》，1969年第14期，第49-51页。

<sup>②</sup> 1970年2月11日的《真理报》在其《党的生活》一栏中，以可理解的不赞同口气举例提到一位党员身分的苏联工程师的一封信，怀疑在新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坚持现行的关于党内日常管理中“铁的纪律”这一提法。

由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了；<sup>①</sup> 为了对付这些呼声，再一次发动了甚嚣尘上的狂热宣传，说什么只存在着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一个合法的党才能表达它。显然，这个党必须是纪律严明的，它的方针政策是由上层制定的，不允许一般党员参与重要决定。其实，党为自身要求占有的控制范围之大，除非领导上有真正超人的本领，同时党本身有超历史的品质才足以应付。既然“苏联共产党制定政治路线，领导人民群众，指导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直接和间接地通过各级行政机关和苏维埃来“团结、协调和领导各级管理部门”<sup>②</sup>，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民主又怎么开展呢？人民的主权又怎么能够容忍有这样一个根本不容许任何反对派的统治机构存在呢？

尽管如此，加紧官方的控制却未能增强党的自信心，否则党就不需要自我安慰，而喋喋不休地重复什么“我国的工人已从无数事例中认识到，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从未追求过其他任何利益”了。<sup>③</sup>

看来群众并没有接受这样的说教；而且头号保守主义者、前列宁格勒党委书记托尔斯季科夫，在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还在呼吁“进一步加强对党的话的信任”，并差不多公开地表示自己相信党一定能够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sup>④</sup>

党毕竟保持住了自己的控制，而群众也未曾出现任何反叛的倾向。但是，没有人主动地“相信党的话”。群众的怀疑主义、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一心为己，以及知识分子不同集团中日益增多的批

---

① “人权运动”在苏联曾经非法地存在过一个时期，虽然在写本书时已被警察的高压手段所削弱，但至今仍继续存在着。有关整个持不同政见和人权运动方面的资料，可参看A.布伦伯格，《今日苏联的抗议与持不同政见运动》（纽约，1970年版）；P.雷德韦编《未遭查禁的俄罗斯：苏联的抗议与持不同政见运动》（纽约，1972年版）。

② 《党的生活》，1970年第1期，第13页。

③ 《共产党人》，1969年第14期，第6页。

④ 见《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69年版）第141页。前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托尔斯季科夫是保守派中主张强硬路线者。他当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



评，都可作为对形势的较好评价。党曾试图重新巩固其地位，并对其整个阵营加强控制，但也只能局部地控制住内部阵线而已。为了对付苏联青年的“缺乏价值观念”和防止党的思想遭到进一步侵蚀，党的最上层官员只好求助于新的约束，并要求对青年进行更广泛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建议是一些苏联要员在和平时期的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现在才在经常反复强调下得以部分地付诸实行。来自前列宁主义党的一些领导人显然也缺少向青年人示范的价值观念。最典型也最可悲的是，这样一种回到号召党的团结一致和纪律性的作法，不仅成了镇压多中心主义的主要策略，而且成了平息各种经济问题的手段。贯穿整个现行路线的，就是这样一条逻辑，就是这样一种策略。

作为治理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的良药而提出来的这个“强硬”的新路线，戏剧性地出现于1969年12月，即在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全会之后。这次会议把经济改革的一些重要方面全毁掉了（如果不是会议的初衷的话），而代之以重新提出纪律方面的要求，以便加强党的干涉与控制，以及重新依赖党的宣传鼓动政策来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和亏损。

这还不是全部策略的内容；重点还放在科学技术与改善管理方法上，这可以从1973年的改组找到充分证明。显然，权威专家治国的方向是确定下来了。中央为了增强其控制能力，也求助于更好的情报渠道、更多的计算机和增加对科学家的物质刺激等等。而分权制、企业自主、新的刺激方式、用新办法重新鼓动支持者和积极分子——这些经济改革者惯用的措施，目前却未受到重视。

同样地，领导已不再寻求与各个较大的社会集团结成各种“联盟”，转而依靠“工人阶级与科学”相结合了。因为求助于前者，则结盟的社会集团势必要求一些领导上不愿作出的让步和不愿交出的权利。

党要求更多地插手经济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可通过下列事例看出。农业本是苏联政府近年来取得显著成就的部门之一，但这与

其说是党组织作了更多干预的结果，毋宁说是政府给予更多投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改善农民生活所收到的成效。可是，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而这些方面还遇到了不少困难。1970年7月，在一次专为农业问题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曾指示各级党组织说：集体农庄既因农产品价格提高而积累了大量资金，便应当要求各地党组织“把这些资金的使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否则可以预料，这些资金必然不能如预期的那样，投放到适当的用途上去，而收到尽可能高的效益。<sup>①</sup>

为什么集体农庄及其管理人员就不善于“经济”地利用资金？为什么非得地方党委书记干预才能使这一体制工作得更好？从这些问题还可以推及一系列问题，比如领导上希望把引进技术的工作做得更好更快些，这就得责成各个党组织进一步加强管理；要提高工业和政府部门的效率，必须引进新的自动化情报处理技术和管理技术，而这也是党份内的事；管理人员缺乏业务能力，需要重新培训，这件事也要党亲手来抓。

日常的说教告诉工业管理人员，计划指标就是最高的法律；也告诉集体农庄，国家的征购任务就是至高无上的指令。甚至一个时期以来，尽管另外一些陈腐的、完全不能使人心悦诚服的、甚至早已破了产的说教，又奇迹般地纷纷出笼了，而苏联报刊上却破天荒地充斥着有关经济继续不振、继续出现漏洞和损失的详情和揭发材料，同时存在着象安东诺夫所举出的工人砸碎砖头<sup>②</sup>那样的种种迹象。

果真如此，新的正统路线便是不足以解决苏联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了。无论宣传“日益加强的党性”也好，提出团结一致的要求也好，甚至再度使用党的动员说服办法也好，都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对症良方。如果党所依靠的就是这种办法，那么它又怎能

---

① 《党的生活》，1969年第15期，第6页。

② 这并非笑谈。砸碎砖头的事仍在发生，见《真理报》，1970年3月19日。

够适合于充当引进自动化管理系统、培训管理人员、监督集体农庄投资的代理人呢？而且，一个政治性的党完全直接而琐细地陷进这样一些事务性活动中，又有什么意义呢？

## 第十一章

# 党：“自下而上”的面面观

### 普通党员的作用在下降

党组织对其下属各级的一次测验表明，党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控制正在减弱。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普通党员的作用在下降，以致这方面出现了危机的征兆。党的下级机关由于对各自的基本职责以及它们不同于其他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很不明确，因而似乎也更容易罹致“党性危机”。结果是，它们的工作能力总不足以应付各种问题。

普通党员和各工厂、各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的基层党支部，显然，成了领导感到头痛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要求一个普通老百姓党员无非是“循规蹈矩”，即工作热情，在同事中起模范作用，遵守纪律，并以身作则带动别人。虽然也要求他们见到缺点错误时能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但对他们开展批评和发挥创造性作用往往却设置了难以打破的清规戒律。充其量只允许他们对一些鸡毛蒜皮的现象提出批评，因为党所要求的批评只限于揭露计划执行中的缺点，而不能针对计划本身，其目的在于把这样的批评仅仅指向政治工作以外的人员。同时，党还划出了许多禁区，不允许进行更有效和更广泛的批评。党教导说，批评应当是“事务性的”；换句话说，批评就是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提出这种建议不应当触及各项原则和基本权力结构，否则批评就有被谴责为“恶毒攻击”的危险。批评者要避免轻易下判断，特别是不要去冒对过去和现在的党的路线

作独自评价的危险，否则他不仅会很容易受到“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苏联社会历史”的指责，而且会落个“诽谤一切”的罪名。这类不名誉的帽子是专为每一个可能提出严厉批评的人准备的，戴起来很方便。

有些党员终于提出一些小规模改良的建议，或者攻击一些难以容忍的低能的官僚，但要攻击得不太过火才行。可是，一些工厂的行政权力却是相当大的。这不仅是因为有“一长制”原则给予很好的庇护，而且还由于工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起不了什么作用，何况事实上工厂管理人员虽然与工人们一样，都是同一个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却同时是他们的老板。必须在苏联的行政管理部门中创造一个迥然不同的环境，才能使工人敢于公开批评他们的老板，因为他们的提级、提工资，甚至他们的饭碗有时都要靠后者的慈悲才有保证。各个党组织内“压制批评”的现象不仅在基层组织、而且在较大的单位里都是屡见不鲜的，并且在苏联的文献中有很好的记载，只是他们没有认真加以分析研究罢了。而不敢研究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各个行政管理机构都享有特权和实权，又得到地方的和较高级别的党机关的支持；党内的普通党员却没有丝毫权力，他们除了只能抱怨而外，只好期待上面主持公道。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无权自己作主。

在党支部里，党员们讨论如何克尽自己的职责，但往往由于党对支部的要求自相矛盾而感到处在沉重的压力下。从名义上来说，党支部有义务“监督行政管理机构”，动员党员和群众完成各种计划。但是很显然，他们却未能进行“监督”，因为事实上同时还要求他们支持受他们“监督”的行政管理机构，加强它们的威信，帮助它们促使工人完成计划。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使命。至于企业和机关的负责人，则不仅是行政领导，而且是党委会成员。党支部书记只是低水平的专家，业务上的威信不高，对企业的状况也摸不透，他的实际作用是帮助行政管理机构完成计划，而完成计划与否则关系到企业的、也包括他自己的奖金与福利。在大多数情况下，书记只是

起辅助的作用，协助企业管理人员设法弄到更多的资金和接受更轻的任务。有的书记多多少少能打通上级党机关的关节，有助于必要时把不太得力的行政负责人撵下台去。总之，他们与行政管理当局是一鼻孔出气的。许多不可否认的事实都证明：虽然每一个工厂里都有党支部，却防范不了工厂管理人员对上级主管机关隐瞒资金的安排，也制止不了各种半合法或非法的活动；书记明明知道这些活动，但只要他妨碍这些有助于容易完成计划和换得更多奖励的行为，他就会不得人心。

连支部书记都不可能对行政管理部门实行监督，那末普通党员有“监督”行政领导的权力岂不只是一句空话。党员必须勤勤恳恳，监视每一个人的言行，执行命令和政策，却对命令和政策没有发言权。党支部的活动尽管有时患有“热性病”，但多半沉陷在日常琐事之中。政策既是较高各级决定的，地方党自然就权限不明，权力不大，只能等因奉此地走走过场；这就使地方党很难决定究竟必须做什么和怎样做。

一份白俄罗斯党中央的文件指出，各支部没有做到所要求它们的那样，搞好监督行政管理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它们有意放松了对青年和团员以及工会的教育和领导；要不然，他们就忘记了专家、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而任其自流。另外，还严厉地批评了支部所属部门工作没有起色，纪律松懈，办事缓慢，支委会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不是掀起一阵纪律措施的浪潮，一下子警告和处分很多人，就是滑到“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立场上去。<sup>①</sup>

摇摆于过分干涉和“疏于管制”之间，成了党的工作作风中的常见现象。党的各个下级组织受到来自上级的强大压力，要它们去执行一些意图不明或力不能及的任务，而它们却缺少执行这些任务的权力。至于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却得到和享有履行其职责的权

---

<sup>①</sup> 《党的生活》，1970年4月第7期，第41页。但是，反映这类现象的材料是很多的。

力。工人们在这些行政管理人员的督监下，千方百计想减轻一些自己所受到的沉重压力，而党支部就在这二者之间起着缓冲作用。归根到底，党支部的职能就是设法管好工人和帮助行政领导。<sup>①</sup> 这样一种作用对普通党员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要求党支部必须经常关心的属于技术性和业务性的活动，已经有另外的组织机构来更好地处理，而用纪律来约束别人和自己当然就不再是党员们所主要操心的事了。有另外的代理人来做这项工作。

莫斯科州苏维埃是首都所在地区内的重要地方政府机关，这个机关的党支部的议程足以说明象它那样的支部所具有的形式上的职能。由于中央委员会最近指责了广大党员缺乏或丧失了对待缺点错误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性，因而举行了多次支部会议，要在目前更有效地处理这类问题，比方说，处理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工厂产量低的问题；或者州苏维埃官员们工作作风中的缺点，特别是他们对群众的不满情绪熟视无睹的问题（附带说一下，这已是成千上万个支部开了成千上万次会议都未很好解决的老课题了）。

州执行委员会党员们有一项典型的议程，题目叫《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机关的党员对于上级机关和本执行委员会各项决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的工作》。这一议程本身便揭示出了党员在一般官僚机构中的从属作用。另一项议程题为《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机关的党员在设法提高地方工业产品质量中的作用》——也许这个组织的党员们对这个题目已经听厌烦了，并且讨论得发腻了。

党支部还要关心一些其他问题，其中包括“莫斯科州苏维埃执

---

<sup>①</sup> 我们从苏联报刊上还看到，许多工厂的行政管理人员喜欢以粗暴、蛮横、大声喝斥的方式来对待下级部属。这种所谓“领导生硬”的作风仍极普遍。尽管这种作风也许已在经历着一个显著“软化”的过程，但党并没有正式加以证实。这就充分证明本书中的一个论点：党支部未必能够做到所要求的那样，真正约束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使这种“作风”和对工人的粗暴态度不致于在一个长时期内保存下来。这是因为党支部控制不了行政管理人员，而只能跟着他们打转；这对党中央领导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说行政管理人员的原始人般的粗鲁作风已在苏联逐渐消失的话，这是由于提高了工人的教育水平和管理人员变得越来越世故的结果，而决不是由于党支部进行“督监”的缘故。

行委员会所属各工业企业经济改革的若干成果和党组织的各种问题”。

不仅仅这些议题本身具有典型性，对这些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个）为什么提到议程上所作的解释也很典型：一份文件说，问题是“有些党员对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虽然作了检查，但很不认真”。<sup>①</sup>——所谓“有些党员”，在苏联修辞技巧上是用来代替“很多党员”的一种委婉说法。

因此，党的报刊一直都在抱怨两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其一是，开这样多的会而作出来的各项决定只徒具形式，根本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那些决定不是套话连篇就是谈些枝枝叶叶的技术性问题，与支部无关。可是上级党机关却从来没有承认，曾经要求支部去做任何一件办不到的事情，因此支部即使不能做到，也不应受责备。

其二是，党过组织生活或开支部会议，都出现冷场和兴趣不高的现象。领导上虽然察觉到了，却至今习以为常。除了党的专职机关的党员而外，一般党员很少能影响政策，所以支部就成了工人和技术人员闲谈和聊天的场所，党的专职机关以外的党员都是这么行事的。普通党员不许对企业的经济或其他任何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恰当的训练，而且也由于领导上并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不敢得罪他们的上司，因为他们从观察和亲身体会中得知，这样做会给自己讨不少麻烦。

因此，党内的普通党员在言行上就同他们的大多数阶级兄弟（工人和一般职员）没有多大差别，这是已由苏联国内生活的总趋势所证实了的。在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活动中，普通党员的表现简直很难与一般群众区别开来。如果说苏联的国内生活已使一般群众变得自私自利，不择手段要“搞到一点东西”，贪杯好酒，或者经不起“西方影响”，那么党员和权贵也未必对这样一些毛病有免疫力。报刊上一再揭发的那些喜欢偷偷摸摸、占公家便宜以损公肥私的“盗

---

<sup>①</sup> 《党的生活》，1970年第2期，第93页。



窃者”、“倒卖者”或“挪用公款者”，在党内也不乏其人，有的甚至是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人，虽然由于缺少可靠的统计资料而无法知道这种现象出现在党内是否与出现在一般老百姓中一样多。

党已经找不到任何助力来对付普通党员对政治的漠然情绪。党的面貌不作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流行在党内的开会冷场和厌倦情绪就不可能克服掉。党曾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来加强党的“吸引力”，但始终未能摆脱一般组织的幼稚性，即沉溺在自己形式主义的日常事务中，而认识不到这种情况的荒谬性。例如，有一个部所属的党支部，打算通过讨论“理论性”题目的办法来活跃其组织生活，以为这样定会比该部通常进行的讨论“更深入一些”。于是，有一次开会时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题目：谈谈“列宁论共产主义建设中开展竞赛的重要性”。这个题目首先遭到共产党员们的反对，因为他们先前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但据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sup>①</sup>我们对此感到不胜怀疑。

## 下级机关工作人员

探讨一下区级、市级和州级一些较大的党组织及其所属机关存在的若干问题，便可十分明显地看出，党的各级专职机关都处于优越的地位，而各级党委会中由选举产生的、不计报酬而义务工作的委员们却没有势力。就连人数众多的所谓出类拔萃的积极分子，甚至区委和州委委员，无论在他们自己眼里，还是在他们工作中经常接触到的人们看来，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有这样一位积极分子在一份党的刊物上公开宣称，没有人把他们放在眼里，只有在编制内的、完全脱产的党干部才显得神气十足。<sup>②</sup>由此可以认定，党组织内已形成这样一种普遍的倾向，即权力的分配如此不平等，以致只有真正握有实权者才“受到重视”，其余党员群众和积极分子之类则

<sup>①</sup> 《党的生活》，1970年第3期，第75-76页。

<sup>②</sup> G.巴符洛夫语，见《共产党人》，1969年第17期。

总是低一等的。

无疑地，党机关本身既有权力也十分活跃，但其内部的事态发展却使得真正有意义的决策权力只集中在几个关键部门手里，而留给这部机器的其余部分的无非是盲从执行任务罢了。这样就降低了党机关本身很大部分、特别是地方各级在思想和行动上应起的作用。在基层党支部的活动中常常感到职责划分不明确和缺乏自主权的问题，也是较高各级所遇到的问题。基层党支部的各种决定、甚至区委和州党委的各种做法，都不免流于形式主义，而没有多大实效。中央党报不断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学到“真正列宁主义的作风”和提高工作质量。可是各级党的官员们在解决问题时，多半是舍本逐末只抓细节，在会上说些空话，或者采取一些所谓“打气”的办法，即把有关人员找到书记办公室来进行个别谈话，或者开一次特别会议，用命令、警告、威胁或鼓励的言辞给他们“加油”。许多大小会议的决定往往带有严重警告性，但仍不过是非常一般化的空洞决议，其中只提到“要求消灭”缺点，“迅速改正”错误，“广泛开展”一些活动；即使在含蓄地向当事人“指出某些缺点”时，也不说出他们究竟有哪些缺点。这些决议实际上只是把党中央用过的辞句原原本本地重复一遍，就责成各级官员去“发动群众”，“加强控制”，“进一步严格要求”。

如果这些决定都兑了现，那么苏联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仅仅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会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国家。大量的实际情况却充分说明，这些三令五申的官样文章除了死抱住那些陈规陋矩而外，并不能产生党领导预期的效果。

下面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党插手解决生产问题的情况。有一个区的农业状况不佳，该区党委会为此发愁而决定提高牛奶产量。但事与愿违。上级党委负责人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子，指责说造成这种结果是由于党内一个极为普遍的毛病，即总是很少“检查决定的执行情况”。于是他对该怎么办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显示出了这位机关工作人员的组织才干。这位高级官员说，该区委会

应当向另一个区委会学习，后者发现了某个集体农庄奶产量下降，便召集一些专家和其他先进农场的几位挤奶女工前来开会，并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去到那个产量下降的集体农庄。在那里开过几次会并进行了现场考察之后，找到了产量下降的原因乃在于当地的挤奶女工不懂得如何使用挤奶机器。<sup>①</sup>

难道集体农庄主席和党支部书记，以及该区委会的农业机器服务站都不曾发现问题，找出这个原因么？这一点尚无从知道。但是，这件事却说明当时是需要那位区委书记进行大力干预的。为了解决这个区的问题，只好建议这位书记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不少党机关是效率不高、力量薄弱和组织不完善的。因此党中央经常干涉下级组织，告诫它们要把本身的工作搞好，并且宣称它自己的组织是堪称模范的，应当以它为表率。只要能公认党中央的组织是优秀的，也就无异于宣告整个党由于接纳了受过大学教育的专家而变得更有效率了。但是，“组织问题”决不仅仅是编制或教育水平的问题，虽然这两个因素也相当重要。职责的划清，工作条件的具备，任务的布置适当和意图明确，这些都是开展活动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一位搞组织工作的党的高级干部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党的工作的文章，其中谈到上述条件问题，并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他主张那些现在派赴各地检查工作方法的党务督导员应收集情报，帮助地方党组织改进工作；他们是各级党机关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社会学家们对几个党组织所作的调查表明，党的这些重任在身的官员却总是把他们百分之七十的工作时间花在他们办公室的桌案上，填写各种报表和草拟许多报告与备忘录，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时间用于视察和了解情况。《真理报》一篇文章报道说，某州委的一位党务督导员访问了一家工厂，对厂党委书记讲了话，作了几项有关生产方法的决定。一年以后，另一位党务督导员由于该

---

<sup>①</sup> 康·福米钦科，见《真理报》，1970年3月23日，当时他是车里雅宾斯克州党委组织与党务工作部部长。

厂缺少档案而不了解前任的视察和情况介绍，却发现与过去相同的缺点，于是又决定了一套新的措施，让该厂党委书记执行。后任无从知道前任在一年前发现了些什么和决定了些什么。而一年的光阴就这样虚掷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这件事本来可以说明，一个能力较强而身居显要的批评者与一个低能的下级对比起来是多么泾渭分明。但不幸的是，这位批评者提出的建议，未免引起人们对他的才干的怀疑。为了避免这种显然无聊的后果，他建议在受访的地方和派出党务督导员的党的机关，各设置一个记事簿以供查考。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苏联竟找不出另外的办法来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在处理一个大工业区的州党委会内所发现的问题。<sup>①</sup>

党的机关办事效率不高和工作方式不好，已为其他机关的工作人员所尽知，并一直成为笑柄。上面所说的那位消息灵通人士已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在提出他那个设置记事簿的“革命的”建议时，攻击了“关于党的机关不应束缚自己和管得太多……的意见”。

党的活动的性质问题，以及党的真正作用和工作方法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与不领薪的积极分子有关，而且牵涉到领薪的专职人员），经常被提出来争论，并在党机关的某些部门内引起了不安。党外人士对党及其党员的批评，使党内产生了各种怀疑和某些思想波动的迹象。如果这类问题不是牵涉得很广而且引起普遍不安的话，那就不至于使一名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感到有必要把这种问题交付一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在他看来，麻烦就在于有些党的干部“丧失了党性”。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某些干部觉得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同那些在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专家相比。他说：“必须永远认识到，党的工作不是业余活动，而是专职工作，而且是一种高深的艺术。可惜近来有些人竟忘记了这一点。”<sup>②</sup>

---

<sup>①</sup> 同上。

<sup>②</sup> 瓦·姆日阿瓦纳泽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185-186页。

中央和地方各级的领导职务，无疑都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政治职务，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和专门技能。但是，这只有少数领导干部才能做到。同时，许多行政职务严格说来就是官僚主义的监督工作；而这种工作对许多党的官员来说，即使他担负高级行政职务，他享有的威信也不及受他监督或领导的专家来得高。这样的专家终于开始感觉到，他们的党员同事们实际上是不如他们。姆日阿瓦纳泽曾试图说服那些怀疑自己工作重要性的党的干部们，党的工作方法不同于苏维埃和经济机构（直接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团体）所使用的工作方法。他说：“成为某些经济部门里的专家，这对党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经济管理工作中贯彻党性，毕竟意味着加强群众中的政治和组织工作。”<sup>①</sup>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仅仅传达各项政策，而并不参与决策和制定政策吗？是仅仅监督下级，特别是“群众”和普通党员，而不去监督那些有职有权的人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下级党组织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这些工作对能干的、有创造力和雄心壮志的人又有什么吸引力呢？

上面对党内的一些倾向作了一番观察，其中有些倾向已经产生影响，另外一些倾向尚在形成中，但归根结底会显露出来。它们都是由于社会环境紧张和党的内部结构与自我欣赏而产生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权力的分配和整个体制的官僚主义性质；在这个体制中，党员只不过是党的关键部门的附属工具。这就导致普通党员作用的下降，同时也引起人们对党的工作的性质以及迄今要人们相信的整个党组织的作用产生了疑问和不信任。在苏联公众中树立起来的党员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已不那么高了；党员的身分也许仍为一部分想得到党的工作或有爱国动机的人所羡慕，但甚至对党内的大多数普通党员来说，他们的党籍似乎已不是他们个人一生中的一件十

---

① 同上。

分重大的事情了。

既然是组织上急于要提高苏联经济的效率，加速实现技术革命，帮助培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提出要注意新管理技术的及时引进，集体农庄的合理开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把科学发明更快地运用到国民经济中去，那么党的书记们显然就只好写出连篇累牍的文章，报告他们已在克尽上述职责，组织了各种会议、座谈和讨论，让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在召集和通知管理人员研究这些问题之前，事先了解计算机能做些什么。

可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党果真是适合于为成功地和意义重大地完成这些职能而操劳的机构吗？除非党的机关在某一阶段能变成象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它才会把培训管理人员和引进自动化管理系统之类的事务交给政府机关去办。但是不管怎样，又让千百万普通党员在这方面做些什么呢？姆日阿瓦纳泽给党的职能所下的定义，并不包括直接插手经济问题，而现领导却要求全党抓这个问题，以便有助于在力争高效率和高生产率的战役中取得胜利。但是，党真要是插手的话，却是对这样的事毫无准备的。党在确定其在现代条件下经济领域内所应起的作用时所遇到的重重困难，正好说明问题的根子就在于，目前和今后党到底是什么性质，以及它能做和必须做些什么。

## 重新认识神秘王国

我们对苏维埃制度和党所起作用的变化，对现在通行的、也许还要继续一个时期的各种政策，以及再度出现在党组织内部的各种待抉择的问题，都分别作了程度不同的概述，可以从中看出苏联人在处理各种新问题时，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一种作法是顽固而偏激地回到过去的口号上去，当然这些口号已贯穿了现行的路线；另一种作法虽然过于小心谨慎，却着重实际，就象上次党代表大会那样，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性建议，而这两种作法都说明一个情

况，即竭力要维持现状，推迟或阻止改革，除非改革会带来安定的、不破坏现状的经济增长。

某些政治学家认为，只有把改革看作“增长”的手段，才能制定出现实主义之行之有效的政策。但是这种忠告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有时可能迫于形势，需要作些重大的改革，取得大幅度的“增长”。各种制度在必要时必须能够自己重新安排和改建，有时甚至作根本性的改变。把重大改革的时间推迟得太久，便可能导致危机。有些苏联经济学家，例如费多连科和诺沃日洛夫曾经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只有靠经过周密细致的计划之后，立即在整个经济体系内实行大规模的深刻改革才能好转。他们也许是完全正确的；耽误时间可能使国家遭到根本性的、预料不到的突然事变和动乱，从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操之过急的改革也确实使人害怕（这当然不只是苏联单方面的顾虑），这岂不是已经招来一些警惕前布拉格意识形态的“反攻”之类的陈词烂调了吗。

虽然苏维埃制度已经在国内遇到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危机感，但是认为这个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却是错误的。这个制度及其强有力的领导显然还处在成功的极盛时期，只不过已经有了一些动荡不安的趋势，而且显得有点运转失灵和出现某些危险的裂痕罢了。党的神秘王国在过去显然是成功的，而且至今仍然抱着成功的希望，可是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却不能如愿以偿了。党的境遇现在既说不上顺心如意，也说不上一步不振，只能象 K. 多伊奇所解释的那样，由于太“滥用权力而多少犯了大错误”<sup>①</sup>，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加紧张的状态，因而迫使这个制度作出新的努力来从事改革。对情报、意识形态和至今仍是强有力的控制手段的通信网的垄断，已经妨碍了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现代化，而且对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阻滞作用，甚至象萨哈罗夫及其伙伴们指出的那样，扼杀了许多方面的创造性。事实证明，钳制思想已经给文化领域造

---

<sup>①</sup> K. 多伊奇：《政府的魄力》（纽约，1966年版），第116页。他在本书中只对情况作了一般的分类，并没有分析某一特定的制度。

成严重的危害，而党的喉舌所定的舆论一律的调子，向来是而且仍然是毛病百出的。其实，思想管制除了窒息全国的文化以外，从来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事实已无疑地证明，思想管制是阻挡不了替代性文化、反主流文化，以及各种对立的信念和思想意识的，即使在一个未开化的国家里也往往如此。大肆泛滥的流氓习气、各种“西方”的影响、民族主义、排外情绪、信奉宗教和神秘主义，这些在过去可能出现或未必出现的倾向，在苏联的现实生活培养下已经以各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切一再使陈规陋矩的捍卫者无所适从，并且暴露出了远远脱离实际而由思想垄断所强迫推行的教条的无能为力。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不感兴趣，普遍不爱读《真理报》而热衷于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现象，已成为党坚持其失败的统治方式必须偿付的一种罚金。

对干部的考核、选用和管理是实行高干花名册制度的一种体现，也是党行使权力的另一种手段，现在也收效不大了，反而成了国家的一个日益加重的负担。在干部当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即被选拔的干部得迎合选拔他的党干部的口味，得拥护党组织提出的代表性人物而排斥其他的人。除非苏联的制度学会为来自各方面更大量的有各种才干的人广开门户，否则上述干部政策可能造成的损失，仅就一种制度本应发挥的创造力和其全面的性能而论，也是不可估量的。要为创造性活动创造一个适宜的气候，就必须容得批评，并且至少要能够对独创性给予某些鼓励，对新的和不熟悉的事物要虚怀若谷，开诚相待；不幸的是，党并不是这样作的，却紧紧地依仗着一致性、纪律性、顺从性和温良性过它的日子。

对待干部的惯用政策和执行中所着重强调的方法，基本上是老一套做法，即用撤换人员、改组政府、重组机构、选择淘汰和革出教门来解决问题；这套做法陈陈相因却效果不大，如果不是十足的白费精力，也是这一制度的显著弊端。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不假思索地来一次官员的清洗和机关的更名，而不能真正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安东诺夫曾嘲笑这种态度的幼稚，这里不妨说句公道话，



今天的领导人似乎已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动辄采用这样一套做法。然而，作为干部政策的核心的高干花名册制度却至今没有取消。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党的另外两个组织上的手段，也可以清楚看到这两个巧妙得力的控制手段已开始暴露出它们的局限性了，其一是遍布于穷乡僻壤和社会各个角落的、无处不有的支部网，另一个是党对其社会成分的限制。正如先前指出的那样，党的各个支部已处于运转失灵的状态，而意志涣散则是其症状之一。

至于社会成分的限制，倒是值得略加评论的。<sup>①</sup>党为了保持其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曾按照领导规定的一定比例吸收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有代表性的人士入党。这种比例上的限制，在苏联历史过程中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其变化表现为从革命初期的明显偏重于无产阶级分子，转为倾向于吸收那些在“关键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公民，以便他们能够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起带头作用。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党在其队伍中纳入了比例很高的各种社会人士，这些人都是战略上重要的社会集团的代表，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教育工作者和艺术家。同时，为了避免使党员的身价显得过高，而造成与群众的隔阂，使党在工人和农民当中失去影响，党也尽力提高了吸收后者的比例。然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仍一度在党内只占了少数，这是因为党一心所考虑的是那些支配着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人，同时又为保持一个能顺利发挥作用的制度而操心，所以不得不更多地重视那些能起带头作用的人。

可是，党在利用这种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手段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队伍的内部变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再版，尽管在党内偏向于宠信知识分子。一方面，不同的社会集团都力图用自己的世界观和利益来影响党；而另一方面，作为党组织的支柱的党机关工作人员却力图把所有这些集团和个人结合成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体，好让他们把党的嘱咐带到仍然留在党外的他们各自的社会集团中去；

<sup>①</sup> 见 T. 里格比：《1917 至 1967 年苏联的共产党员》（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68 年版）。

这两个相反的意图在党内形成了紧张的阵势，这自然是可以预料到的事情。

凡是大的组织，通常总要施展各种技巧来激发忠心和热忱，而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可说是高明的大师。一方面按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智力加以割裂，一方面限定它们只对党组织一片赤忱而不受其他任何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只要党组织善于处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来做到这一点，这双重任务就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否则，人们的忠忱必将转向自身的利益或集团的利益，而决不会顾及这个独特组织的利益。

难处就在于党的统治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特点，已经使党在吸收党员的能力上有所削弱而不能得心应手，那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它意味着这部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机器要使其权力的集中和特权达到顶峰）和坚持宣称党必须控制一切和管理一切。正因为有上述困难，也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党也许不得不更多地屈服于各种互相背离的社会影响，容许它们有各不相同的世界观，各不相同的传统和各自的价值观念，而再也不能把它们统一控制起来了。党念念不忘为其“团结一致”而斗争，这本身就证明了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其团结和控制权已成了一桩分外艰巨的任务。

我们已经指出，党管理经济的方式对于了解党的内部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何况经济仍然是党集中投入其巨大力量的主要活动领域。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部都负有监督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任务，只要看一下它的书记处的组织系统图，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方面情况的又一个暗示。党既主持制定经济体制，则经济管理的方式也就成了党本身的一个深刻的标志。党由于主要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它本身也就变成了一部政治兼行政管理的机器，把仔细监督和直接插手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荷载加到了自己的齿轮上；这样就更加助长了党的另一个倾向，即把其他各部门也置于其最严格的监督之下，使它们既不妨碍其主要的努力方向，也不致产生离经叛道、各自为政的偏向。

因此，党对社会活动各重要领域实行监督和指示政策的胃口越来越大，这就使党把它全付最好的精力集中于控制上，而往往忽视了其他重要的职能。恰恰是这个胃口，这个如今被狂热地一再强调为党的根本而不容许受到“最轻微侵犯”的胃口，乃是把党推向其政治才能遭到削弱的过程的主要动力。俄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被一个如此庞大和如此复杂的组织所控制的各种因素和势力，较之这个组织所指望其各个机构实行控制的能力，在增长速度上要快得多。而另一方面，花在监督、检查、弹劾和约束上的力气越多，与之抗衡而力图抵制这些手段的因素便越强大。这就是说，在这个制度里已有一个与经济中的现象相似的现象在起着作用。在经济领域里，对大量的细节都要作出计划并加以控制，这种管理方法往往自身改来改去，而又自食其恶果，其原因就在于制定计划的中央既要负较全面的责任，就得照顾到更多的方面，收集更大量的情报，避免计划和控制失去效应。此外，办事迟缓也是伴随在其他因素中的一个后继因素，它是由于中央的计划机构十分臃肿而产生的。

与此类似的现象也在折磨着苏共的等级制官僚结构。这个官僚结构到处伸出它的控制和主宰的触手，可是已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影响、控制和支配的能力，特别是在讳莫如深的组织手续方面，尽管它在这方面正在竭尽全力地要作出一些初步成果。换句话说，它念念不忘把所有的牌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得这场博弈很难进行下去。顺带提一下，如果说领导也曾学过一点经济和技术的话，那么它却未曾学过如何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内岂不是没有处理这类问题的部门嘛……

在经济领域中使用的统治方法与获得的习惯已证明是不适用于文化和其他重要的社会领域的，但是只要承认社会各领域必须按照不同的原则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管理，就会威胁到管理机构的统一性。如果各个社会集团、社会团体和组织取得了主动性，遇事不一定要经党的批准，那么成堆的问题本来是能够解决得了的。因此，党

面对着越积越多的问题，也就认识到进行协调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了。许多问题不能单靠强求一律来处理，特别是当多样化的局面在所难免的时候；也不能用强调服从和纪律来解决，特别是需要有大规模自觉行动的时候。一旦领导感觉到这种自觉行动越来越频繁而大有无法控制之势时，就会愈加怀疑到有不肯就范的闹事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不平衡就不可能有效地调整，特别是由于党的社会理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那样地不得当，以致看不清问题发生的根源。对于一个打算(说得含蓄一点)强求一律的组织来说，强求一律虽是一个方便的管理形式，但要处理好冲突和事变这两个现代政体的主要特征，已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如果党真正打算采取多种形式的行动，并且改变其政策以适用于特殊的领域和环境，那么它就真是一个面貌大不相同的组织。可惜，它那一贯惧怕“自发性”的心理和热衷于控制社会的愿望，却要求党(倒不如说目前当权的保守派)否定各种自由、检查一切出版物、限制而不是解放各种势力抑或鼓励创造性活动，而后者只有在政策放宽和允许自主的气氛中才能够兴旺起来。

只要强求一律的管理模式继续下去，党内要求由党的机关来更多地主宰全党和整个制度以及集中权力于上层的自发倾向也仍会继续存在。这一管理模式势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点现在已十分明显，因此控制社会并把中央、也就是一个拥有众多普通党员的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灌输给社会，便是绝对必要的了。但是，不让普通党员和党机关本身的绝大部分人员起独立自主的作用，不让他们真正参与决策，而只是要求他们象上级所下达的指示那样“照章办理”和逐一执行政策，则归根到底必将使党员的冷漠情绪和迟钝反应越来越严重。

在普通党员的冷漠情绪和消极态度下，党控制其社会成分的办法就会很不得力而终于无效，因为党所要吸收的是一些来自社会各阶级而又能在其各自的社会环境中充当党的密使的个人，这样吸收进来的党员不会成为把党的意图带到党外的传导者，只会成为党与

社会之间的一条缓冲带，社会利用他们对党施加压力的可能性比党反其道而行之的可能性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微型社会就会变成外界在党内的代理人，而很少有可能变成党的外部代理人。

这样一来，党势必只能在其机关周围聚集防御力量，但上述倾向将对这道防线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从而使它遭到进一步的侵蚀和瓦解。

只要党不曾自愿放弃任何权威并开始交出各种职务，它就要强行延续其权力模式；而这种权力模式即使在集权化当局的权力与活动继续削弱的情况下，也将促使党员和所有公民在政治上得不到进展。社会的、党的或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的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已经成了幻影。在每次党代表大会总有大约四千之众的党员对交付表决的每一个问题一致举手表示赞成的正式场面背后，现实生活却总是继续要摆脱党的控制，而党也不得不更加难于容忍可怕的“自发性”。大量微小但却易于扩散而无法控制的意想不到的腐蚀性影响，象洪流一样越来越难以阻挡；可是大胆的政治倡议和行动纲领，以及振奋人心的新目标和自觉而合理的改革办法，却始终未见有人提出。相反地，害怕改革已成了广泛表现的情绪，这对任何制度来说，都是凶多吉少的兆头。由于难于打破的常规和习惯势力愈益顽固不化，这个制度的痼疾将始终难以消除。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可以预料，在今后的岁月里将有更多的冲突甚至大量的爆炸性事件烦扰着苏联的政治生活。

## 第十二章

# 二十年代的启示

在本书中，我们对改革派和经济评论家们在经济论战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论点，已经集中在历史情况和这些论战的意义方面，以及政治情况和论战者所持的各种看法方面加以说明。这两方面在很多情况下是互相联系起来谈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历史”这个术语有两种理解。论战之所以牵涉到历史，是因为论战者们提出了一些与过去的事情有关的问题，并且公开地或小心翼翼地对过去的争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与过去有关的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历史，就连前几十年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现在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此，论战既已涉及许多必须把近代苏联的今昔作一全面回顾的论题，那么这些论战当然就带有历史性；而讨论的题目有时沉寂下去，转入地下进行，有时又在政治环境许可下相当活跃地、甚至猛烈地冒了出来。这些历史性的论题是当前政治情况的一部分缩影，它们有号召力，并且能形成营垒，因此潜藏着爆炸性。这就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历史性的论战是当前政治的一部分了。

要把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和目前出现的各种意见和方案加以对比，就必须首先指出这两个发展阶段的不同之处，特别是能随时随地反映出国家真面目的经济领域里的差异。一个以农民为主但农业又很落后的国家，虽然有着相当新式但规模很小的城市工业部门，在二十年代就在寻求一条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途径。这件事与当时新政权能否保全关系至深，因为新政权有鉴于其国内的社会基础而缺

乏安全感，并且深信有朝一日必不可免地会与其高度发达的相邻敌国发生冲突。

大约四十年后，问题已不再是如何实现工业化，而是如何管理一个工业大国了。国家的安全感，无论在国内社会阵线上还是在国际环境中，性质上已完全改变了。长期顾虑着的敌对的包围圈如今已不复存在，俄国已经成了一个经得起严重威胁的超级大国，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始终吓不倒它的。

从国内来说，正如我们上面所确认的那样，再也谈不上有什么敌对的资产阶级，有什么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汪洋大海，或者一心要与颠覆势力联合或直接勾结外国武装干涉者的富农和耐普曼了。所有这些早已销声匿迹，至少从合理分析的观点看来是这样；尽管还有人死抱住早年形势下流行的看法，而拒绝承认这一事实。

工业设施所需的人才和干部今天已卓有盈余，或者可以造就并指派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已文明化并具有高度发达的教育设施和一支引人注目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队伍。工业领域里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干部情况却再也不象二十年代末期那样严重短缺了。

再就今天的技术水平、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和经济的规模而论，也都与新经济政策末期那种规模相当小的工业设施很少有相似之处。各种工具可以由专业人员自由处理，他们的经济数学武器十分尖端，能自动提出问题并给予解答，各种数据和数额都能很快计算出来，并能精确地得出和推断出下一步发展趋势，这些都是二十年代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办不到的。尽管我们还能够把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各种差别罗列得更多一些，但这就足以说明我们是把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地区别对待的。

但是说来也奇怪，在六十年代所争论的问题和概念与新经济政策时期所争论的竟是如此相似，甚至在用语上也简直一样。只要注意到“大运动”前的意识形态争论，注意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所必然产生的那些重大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局面，特

别是右翼领袖们(其中尤以布哈林最为反对斯大林的概念和对未来的看法)提出的纲领,就可清楚地看出当时与现在的相似性。

当前所发生的情况,不是直接从过去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那里效法来的,而是一种独立的发现,一种巧合;这也许被少数有较多经验的老人充分意识到了,但别的人却不曾注意到,而有些人既不曾也尚未考虑到同那些长期被人遗忘和看来不甚相干的来自过去的人之间可能保持的连续性。但巧合毕竟为逐步认识历史先例打开了路子,使人们注意到那些历史上的事例、典型、启示,以及二十年代那些可能至今是正确的、但却因此受迫害的人们。

在苏联,由于某些尽人皆知的原因,要对一个人作政治上的盖棺论定是十分困难的,虽然在赫鲁晓夫统治下的某一个时期,为重要人物的“平反”似乎指日可待了。在国外,首先是伊姆雷·纳吉,据说曾私下宣称他是个“布哈林派”。<sup>①</sup>六十年代初期,波兰的经济学家们破天荒第一次以坦率而同情的态度讨论了二十年代的论战,并作出了关于布哈林的积极贡献及其见解的正确性的新结论,同时明白无误地肯定了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的重要性。<sup>②</sup>在苏联,赫鲁晓夫当时也曾考虑为布哈林正式恢复名誉,而另一位重要官员彼·尼·波斯别洛夫在1962年向一次苏联历史学家会议宣称:“布哈林和李可夫当然都不是间谍或恐怖分子”,<sup>③</sup>从而暂时把他们究竟是什么人的问题的盖子揭了开来。

可是,至今并没有正式平反。不过,既然已值得注意地重新出现了在旧论战中使用过的,特别是布哈林及其同伴们(即使不曾提到他们的名姓)使用过的那些想法、概念和说法,那么任何这样的平反,甚至是公开点名的平反,虽不是无关紧要,也是不太重要的

---

① F. 费日多:《斯大林死后的人民民主的历史》(巴黎,1969年版),第507页。

② 见E. 捷姆金:《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华沙,1962年版),第277-278页;Cz. 波布罗夫斯基:《在萌芽状态中的社会主义计划》(华沙,1967年版),第118页;W. 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一般问题》(华沙,1964年版),第78-110页。

③ 引自R. 塔克与S. 科恩合编:《大清洗的审判》(纽约,1965年版),第26页。



了。

当代的许多作者，主要是经济学家，其中有些是改革方案、或者至少是苏联经济复苏方案的设计师，他们证明被斯大林指责为“这一混帐的反党纲领”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的那些论据、指示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论点，如今都已经被接受了或者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为人们所一再提到；要逐一引证这些作者的原话，必将占用很大的篇幅。

接二连三的作者严厉批判了“醉心于高速度发展”这个被布哈林提出来与斯大林争论的主要之点，他们并进一步指出这个高速度观点已经使经济付出了何等高昂的代价。还有一些作者吵吵嚷嚷地反对没有作好必要的资金准备的计划，正象当年布哈林闹着反对“没有砖头”的计划那样；后者也是赫鲁晓夫经常重提往事时总会提到的话题之一。今天，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也经常按照布哈林的说法提出来讨论了。许多人对资金未能按照这两个经济部门之间正确的比例进行分配，使经济获得健康的发展予以谴责。布哈林曾经建议不要过快地、不加考虑地动用资金，而要建立资金储备作为保证经济充分发挥效益和稳步增长的润滑剂；这个忠告如今又被反复提起，并对过去忽视这一良策给予严厉谴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于1927-1928年间反对斯大林的计划而提出来的策略，已由现代几位工业化权威毫不掩饰地承认了。叶菲莫夫和基里钦科对放弃老一套的做法表示很感兴趣和十分欣赏，并给予高度赞扬，要求学习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化问题的各项决议，他们认为那些决议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正确可靠的策略。他们赞同下列各种做法，即破除生产资料(第一部类)优先于消费品(第二部类)的迷信，主张长期连续的增长而放弃高速度发展，严正警告说除此以外的方针势必导致增长速度的减慢，并建议充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及防止从农业抽调大量资金投入工业部门。看来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遗产得到作者们更大的重视，是因为它总结了执行计划和经济政策的十年中所积累的经验，肯定了经

济政策中的一些“列宁主义原则”，如“充分利用市场和**市场范畴**”，“把真正的合作原则运用于各种形式中”。他们两位所引证的代表大会的合理决议，包括了不应当把资金冻结在拉得过长的工业基本建设战线上的告诫。<sup>①</sup> 那些决议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论点极为相似，这三个人论点后来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以及在中央政治局内和各次中央全会会议上与斯大林的多数派进行艰苦搏斗期间，都曾多次提了出来。

另一位经济学家V.S.达达扬也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找到了一个“最好办法”的例子，并在决议的如下一段原话中注出了表示强调的词语：“在考虑**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时，必须牢牢记住，决不允许把这二者同时摆在突出的地位上……〔也决不允许〕违反……单方面的**积累利益**……或者……单方面的**消费利益**……从长远的观点看来，这两种利益基本上是趋于一致的；鉴于这一事实，就没有必要硬把这两方面圆满地结合起来。”

诺沃日洛夫也对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表示过赞赏，认为它们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指出了可以正确解决问题的总方向。他们两人都强调了这些决议的合理性和切中时弊。<sup>②</sup>

但是，这些决议所体现的乃是一条当时中央政治局内的多数派所放弃而只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仍把它作为“一个右翼政纲”来加以捍卫的路线。现在，对待《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态度问题，即使不是有意地，总算提出来了；而事实上，当初不顾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那些经过审慎、妥善和权衡再三的考虑之后提出的忠告而采取的整个工业化的模式，现在也受到了怀疑；这些怀疑虽不是正式提出来的，但是表现得相当明显。

---

① 见A.叶菲莫夫编：《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莫斯科，1967年版）第4章，第112-114页。

② 瓦·诺沃日洛夫：《最佳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莫斯科，1967年版），第22-23页；V.达达扬：《社会主义经济法规和最好的决议》（莫斯科，1970年版），第20页。

附带的市场机制问题，以及计划的方法和实质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而且所使用的语言与当初受谴责的学派的语言十分相似。当初提出要重新接受市场范畴的概念，要强调价格的重要性，要向那些“对市场怀有庄稼汉恐惧心理”的人展开进攻，并对忽视货币和商品范畴使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错误进行大量的批判——所有这些想法都已得到平反，并且有的在今天已被正式采纳，而一度被斥之为危险偏向的各种意见，也得到了辩护。可是，保存市场和依赖市场关系，特别是为农民着想，则同样是当年反对派同一纲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布哈林关于按比例发展的意见，以及计划要保持平衡的主张，也成了改革派思想同官方路线之间争论的中心议题。要借用布哈林的原话当然是得不到承认的，于是涅姆钦诺夫提出了另一种不会遭到禁止的论战方法，他主张尽可能另外引用别人的话。他从列宁那里引用了一句话，并加以强调说，“计划原则意味着有意识地保持比例平衡”。这种方法避免了政治上的困难处境，并使不少经济学家和数学家能够不背上异端的罪名，而且还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是对改善经济效果和纠正大量比例失调十分重要的中心论点。

涅姆钦诺夫是1964年第一批在痛苦经验驱使下，带着事后觉悟的心情重新提到布哈林忠告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们指出布哈林曾警告说，考虑不周而任意作出的计划势必招致比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还要严重的混乱。随后便有另外一些人与他们唱起对台戏来。在平衡问题上的旧争论，如今又再度挑起了，这可以用两位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作为例子。比如他们中间的克隆罗德争论说：“在一定情况下，社会可能故意要保持一定的不平衡”，而另一位什克列多夫则断然反驳说：“一个故意要保持不平衡的计划是不能作为实际活动的真正指南的。”<sup>①</sup>

承认按比例发展和市场作用的概念，不仅肯定了布哈林，而且

---

<sup>①</sup> 二者均引自 V.什克列多夫：《经济与法律》（莫斯科，1967年版），第72-73页。

肯定了二十年代有大量著述的非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如格罗曼、巴扎罗夫、弗列罗夫斯基和尤罗夫斯基。他们曾被公认为现代思想的当之无愧的先驱。巴扎罗夫曾向计划人员提出过如下忠告：“国民经济应设想为一个协调的、有机的整体，一套不仅在完成总计划规定的重建工作中而且在过渡时期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带有最大稳定性的动态平衡的体系。”<sup>①</sup>我们大致可以肯定地说，今天那些最优秀的国家计划工作人员都理解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兼计划制定者的工作，都懂得这个对国家计划曾经有过的最好见解之一。这是人们只要注意到下列事实就会得出的结论：有一位主管计划的人士在1970年好不容易实事求是地、而不含任何恶意地引述了巴扎罗夫关于计划经济中周期性的重要问题。<sup>②</sup>也许尤罗夫斯基的名誉也会得到重新恢复；他曾经正确地坚称，必须把苏联经济看作“一个商品关系的特殊体系”，而且他还第一个提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历史上最后一种市场经济的见解。他慎重地补充说，给这种现象归类时既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经验阶段，又必须正视有“一个社会主义市场形式”存在这一事实。<sup>③</sup>

布哈林并未谈到“社会主义”市场，但是他同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关系非常密切，足以把他们的意见同他自己的意见融合在他为有节制的改革和工业化制定的纲领中。他在其内战时期的著作中就已使用平衡概念和系统方法，这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可算是真正的先锋。<sup>④</sup>他并不想“跳过一些阶段”，而只是赞成把市场范畴当作管理未来历史时期计划经济的一种方法来使用。正如我们着重指出

---

① 弗·巴扎罗夫：《论制定远景计划的方法》，载于《计划经济》，1926年第7期，第11页。

② 指V.克拉索夫斯基。见A.诺特金编：《苏联经济发展的因素》，莫斯科，1970年版，第3章，第80页。

③ L.尤罗夫斯基：《苏维埃国家制度中的计划与平衡问题》，载于《财政公报》，1926年第12期，第17页。

④ 见《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莫斯科，1921年版）第5，6，7章。布哈林也许是从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那里借来这些观念的。列宁对任何取自其过去哲学上的论敌的东

的那样，他甚至主张把计划同市场自发性的预期效果结合起来，也就是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计划与市场”或“计划与经济核算”的观点；他的这个主张使苏联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学派看到，布哈林还有另一个十分正确的认识，即计划的有限性和不可能充分完成包罗一切的、雄心过大的中央计划。这一新的认识，在经历了几十年对计划盲目崇拜之后的今天，已经成了制定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定社会主义计划的依据。<sup>①</sup>持这一观点的先行者在历史上有其血缘关系（尽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他自己的解释，而布哈林却有其十分类似于现今改革派精神的解释），这已是如此地明显，再加上“计划与市场”的观点今天又是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以致一个忧心如焚的保守派作者不得不附和这些观点，而用引证列宁和斯大林的办法来作为其依据，企图把他的读者引入歧途。现在，有人根据

---

西都表示愤怒，因此他挖苦过“社会学的”、“系统的”、“结构”（虽然不一定是“平衡”）之类的术语。所有这些术语在今天的苏联已是广泛运用的了。列宁的批评意见见《列宁文集》莫斯科1931年第2版，第11卷，第348-403页。它们都是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莫斯科，1920年版）的评注。

诸如“经济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意见，在三十年代初的审讯中被引用来证明这些意见的提出者的罪恶用心，以致使得巴扎罗夫、格罗曼、尤罗夫斯基和另外几十名专家遭到人身消灭。

① 持“计划与市场”观点的例子还见诸于A.卡采涅林鲍伊根、I.拉赫曼和Iu.奥弗西延科：《最佳性与商品-货币关系》（莫斯科，1969年版）从书名本身便可看出其立场；又见I.别尔曼：《制定最佳计划的方法》（莫斯科，1971年版）第78-79，99-103页。“社会主义市场”的提法见同上书，第99页；又见A.艾恒瓦尔德：《苏联经济学》（莫斯科，1927年版），其中有二十年代末期布哈林主义思想的一些主要轮廓，特别是第6章《苏联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第229页。在第289页上他主张，计划和市场应看作一个实体，然后在第290页加以解释说，即使在国有部分中不存在着农民小所有者，仍必须使商品货币关系占优势。他把这种关系称为“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认为这种关系在社会主义已经羽毛丰盛之时就会最终消失（由于它是一种遥远将来的事，所以它决不会对当时的纲领产生任何影响）。艾恒瓦尔德还对布哈林的“劳动力支出法则”作了解释，并在其解释中恰当地引用了马克思的论点来作为其全部的论据。他是布哈林主持“红色教授”经济学院时该院的教授之一，也是一位公认的布哈林派。布哈林曾为他的这本著作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

1920年的一篇原文，证明了布哈林是与这种歪曲恰好相反的。<sup>①</sup>不幸的是从这一点看来，正如从上面讨论到的另外一点看来，这种欺骗手法只能证明，有些人是非常清楚他们所存心掩盖的人或事的。

因此，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作为其主张之一而提出来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问题，便成了揭露或再现有关二十年代和布哈林问题的另一个论题。在其他一些论题中，重新提到有关“调节因素”讨论的，也至少有一位象诺沃日洛夫那样的权威。此人在他的有创造性的书中，对被人遗忘的论战给予重视，并且异常认真地用那次论战中所使用过的说法讨论了这个问题。诺沃日洛夫认为，在一个制度内把两个调节因素结合起来的想法是个大胆的想法，并强调指出，这个想法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可以找到，并且运用得很成功。他论证说：在斯大林统治期间，苏联思想界盛行的看法认为，这样的结合是不可能的。但是，“计划与经济核算”在苏联历史上倒是使用过，它们也结合得很成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经受了考验”。这两个“调节因素”显然不容易协调起来，而一种制度如果没有这两个调节因素的协调便无法适用。从历史上看，这两个调节因素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起过作用，在工业化年代则发生过冲突，要把它们转化为一个结合起来的协调一致的因素必然会遇到困难。但这毕竟是现代苏联经济的中心任务。<sup>②</sup>

诺沃日洛夫的简要论述重新揭示了当年的论战，并且不指名地提示了旧论战中对这个论题的两种不同意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计划与市场这两个因素势必发生冲突，而到头来计划一定压倒市场和个体生产者；布哈林却认为，这两个调节因素过去没有也决不会互相排斥，而应当视为互相补充的，但是对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定计划的人必须预先估计到。

---

<sup>①</sup> 阿·帕什科夫：《计划经济理论的一般问题》，载于M.费多连科编：《经济科学与实践问题》（莫斯科，1972年版），第25-26页。

<sup>②</sup> 诺沃日洛夫关于调节因素的讨论见他的《最佳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一书，第28-31页。参看本书第4章中关于二十年代这次论战的概述。

布哈林曾试图为这两个因素结合的可能性提供解释：在计划部分的内在要素(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的内在要素(价值规律)的背后，存在着“按比例消耗劳动的规律”，它对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一视同仁的，不过在每一阶段都需借助于一个行使着不同职能的机器来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布哈林后来遭到猛烈攻击的另一个异端，虽然它所根据的是摘自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令人信服(在布哈林看来)的长篇大论。

这一“按比例消耗劳动的规律”也一字不改或措辞稍有不同地重新出现于现今的文章中，它得到了诸如斯特鲁米林和马雷舍夫这样的作者的支持，而这些人也因此遭到不少人的更加教条式的批评。<sup>①</sup>诺沃日洛夫也用不同的措辞谈到“劳动的经济规律，〔说它已经主宰了整个〕历史”，但在每一种经济制度中有其自己的表现形式。<sup>②</sup>

科学院通信院士阿·伊·帕什科夫是个保守主义的反对派，在一次显然是向诺沃日洛夫发动的攻击中，他既否定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两个调节因素”，也驳斥了布哈林的“按比例消耗劳动的规律”，说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捏造；他特别攻击布哈林的公式是某种“永恒的价值规律”。实际上在他看来，同他指责的观念相反，苏联的经济学家都应坚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决定作用的理论”。<sup>③</sup>

于是，旧的分歧今天又重新出现了，而在多种情况下，思想战线同二十年代一样形成了敌对的营垒。先前布哈林等人主张的、因而受到斯大林反对的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又旧话重提起来，并带有批判过去和建议改革的形式。其所以如此，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

---

① 见I.马雷舍夫：《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计划》，莫斯科1966年版，第6-8页；参看亚·巴丘林和D.康德拉舍夫合编：《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莫斯科，1963年版)第27页，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论战作了概述；E.捷姆金：《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华沙，1962年版)指出斯特鲁米林重申了布哈林的“法则”。

② 诺沃日洛夫：《最佳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第21-22页。

③ 帕什科夫：《计划经济理论的一般问题》，第22-23页。

布哈林当时对斯大林所设计的工业化前景曾经作出了值得重视的预见。他的许多有先见之明的预告，都已为历史事件所证实。布哈林反对偏重计划，投资过多，储备不够而“计划偏高”，全盘舍弃轻工业、农业和消费品生产而过分扩大重工业，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同样，苏联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布哈林建议关心手工艺人和小型企业、坚持把市场关系和价格作为对计划的必要补充因素是正确的；这些论点也在许多现代作者当中展开了讨论。因此，有人说现今的许多经济改革思想的一些主要论调听起来酷似“布哈林派”，这是任何人也不会感到奇怪的了。

但是，整个情况还不仅仅是这样。还应当看到另一种现象，那就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对脑力工作和政治工作各个不同领域里的许多人都具有吸引力；从这一现象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带有普遍性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一些旧的论题或者以古喻今的新论题再度被提了出来，为什么那些先前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意见没有指明其异端者是谁而重新被接受了。

## 把新经济政策作为蓝图

现代改革派也曾不辞辛劳地力图消除一个强权而冷酷的国家所施加的无数限制，力图迫使它收缩权力，让社会和经济状况获得更自由的喘息机会。他们曾经试图找到一种途径，能够允许社会和文化的多元化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求得自身的繁荣，能够允许各个社会集团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并有能力捍卫自己。显然，为了寻找论据和先例，往往把抚今追昔的情感寄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也许会带来把这段时期的历史过分理想化甚至歪曲历史的后果。但是，人们对这一模式感情深厚的理由却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现实生活又给了这种感情以充分的支持。有文化教养的苏联读者或学问家，是理所当然地会注意到新经济政策时期文化生活的相当活跃，并拿其最后一个时期的萧瑟景象与之对比的。制定计划的人员在寻求更灵活的、



更少任意干预和专横的、能使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的、能运用数理或其他手段来制定精密计划的方法时，他们自然而且理所当然地会从这个“黄金时代”得到启发，正如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们看到二十年代各门社会科学的许多发轫（后来却被无情地扼杀了）而备加赞扬一样。研究社会思想史、文化史或政治生活史的学者能够说，由于列宁的指教因而思想上正派的这个时期，思想战线和政治上的争论甚至在党内也是相当自由的，各种文化和政治流派有存在的可能，各个社会集团可以找到独立自主地表态的方式，正常的事态发展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其发展形式受到尊重，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合理的政治决定占了上风，而庸碌无能、独断专行和野蛮镇压则被排斥于社会和政治的主流之外。观察现代苏联文化和政治的人都察觉到，各个活动领域和部门一旦正在从长期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就会立即向二十年代探索启示和先例，即使这样的启示和先例有时并不是真正可以利用的。在俄国仍然到处都是个样的现有条件下，从自己的历史上去找根据，比公开承认自己的无所作为而从国外找寻借鉴要容易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对新的蓝图的探索业已开始，那么前一历史阶段便确实具有足够的实际内容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

新经济政策曾经当作一种模式来推行，而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一个一度被称为“耐普曼”的经济学派。<sup>①</sup>利西奇金在他所写的名著《计划与市场》中，坦率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这个只涉及少数农民和商人的历史上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已成过去的问题，因而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意义。不过也有其另外的一面，它在列宁的心目中是要为国家进入共产主义道路规定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策略。利西奇金并不是在玩弄词藻，也不是用暗示和隐喻把他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的那套办法简直就是

---

<sup>①</sup> 参看 A. 沃思在俄国与一位消息灵通的苏联经济学家就其本行问题进行的谈话，载于《俄罗斯——期望与忧虑》（伦敦，1969年版），第146页。

“在共产主义完全确立以前处理经济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制度”。<sup>①</sup>

这也许是指，新经济政策的要点仍然是完全正确的，而斯大林主义时期则只不过是瞎闹一番罢了。这位作者虽然没有使用这样尖锐的字眼，但是他所说的话都充分表明了他是何等地以及为什么不赞成三十年代采取的“管理经济的那整套新方法”<sup>②</sup>，以致从心眼里讨厌它。

他在字里行间公开赞扬了新经济政策，并直接谴责了三十年代的做法，恰与诺沃日洛夫把新经济政策中那些大胆而成功的“计划与经济核算”相结合的原则说得合情合理一样。

更重要的是，摆在国家面前的某些主要任务以及用来解决这些任务的方法，现在同新经济政策时期极为相似。新经济政策是处在当时这样一种情况下推行的，即已经认识到一个高度集中的军事国家，如果不让各种社会力量恢复活力，不求助于它们“自下而上”的行动来帮助把一种新的生活带到整个制度中去，就没有能力使这个国家重新振作起来。为此目的，国家才不得不重新改变了那一整套政策，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和自我克制。

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目前情况及其中心问题与过去相似（至少苏联改革派是这样认为）之处，确实是惊人的。同时还须看到，尽管历史环境仍有所不同，但是为了使事情进展得更快，为了把俄国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给予各种社会力量以更多的机会来发挥它们的创造力，而国家对某些事情就必须放手、迁就，并改造自己。但是，也必须进一步对历史环境的重大差别给予重视。首先，不管今天国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它却得到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而且有一个面貌更新的、力量巩固的社会，这就不同于二十年代那个精疲力竭尚且泡在血泊中的社会。其次，列宁的支离破碎的政策毕竟逐渐换来了一个强大的、有效率的国家，但后来这个国家开始显露出疲疲塌塌的样子，不过一些新的集团和阶级却慢慢

---

① G. 利西奇金：《计划与市场》（莫斯科，1966年版），第45页。

② 同上，第48页。

地赢得了自信，并有能力迫使国家进行一些改革和变法。

旧论题的重新提起，甚至使用的措辞也大体一致，这在各个过渡时期，每当论战的双方为赞成或反对采用争议中的两个蓝图之一而针锋相对的时候，总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如，从1921年到1923年，新经济政策的拥护者以列宁为后盾，向官僚主义的行政管理方法发动了进攻，把那套方法轻蔑地称之为“总管理局统治”（这已正式载入1923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并为企业争取更多的自主，为这种自主权取得合法保证和授予企业以财产权而进行了斗争。他们的中心意图就是要大规模地运用市场方法和市场范畴。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必须通过市场的严格检验；于是，随着企业的自主，必然要连带地承认“市场关系”，同时也将日益迫切地要求拥有科学管理方法、科学自由和文化自由，以及政治争论权。他们的这些要求只要等到时机成熟，就会很快提出来。

反对这些做法的人，死抱住他们的老一套，攻击“市场迷”和“反国有化者”是背叛了十月革命的思想，是要破坏国家的作用，把计划性让位给市场的波动性，动摇各项基本原理。

三十年代初期，这样的论战题目又重新出现了，只是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使市场范畴、自主权、平衡、协调和其他“资本主义的”方案遭到了猛烈攻击。这次运动是在国家的优势啦，国家结构的高度集中化啦，以及把单位劳动力和单位自然资源纳入国家计划啦这样一些名义下搞起来的，而以重新恢复“总管理局统治”或与之类似的方法而告终。现在被当作最卓越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备加赞美的国家监督和国家强制，在当时便导致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性的确立。<sup>①</sup>

---

<sup>①</sup> 这个问题特别值得作一番比较性的研究。下列资料可能有所助益：谢·勃拉图斯：《经济管理权问题》，载于《苏维埃国家与法权》，1930年第11-12期，第165页，文中攻击了两名作者，这两名作者于1927年声称：各工厂都应看成是“法律的主体”，它们的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勃拉图斯则认为，这是蓄意破坏国家的一种罪恶意图。按照他的意见，计划的目的是要把市场上的商品流通转变成直接的产品交换；从而使产

1933至1934年间，当人们致力于结束压制而大规模推行一项自由化政策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未作结论的插曲，其特点是，冲突中的派别同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但其路线并无差别。这条自由化路线与“基洛夫派”的得势有关联，无怪乎这一时期布哈林和其他左右两翼前反对派的领袖又重新引人注意了。随着基洛夫的被杀害，自由化被取消了，中央集权和恐怖运动以杀气腾腾的威风重新开始了。

最后，在六十和七十年代，“行政命令”和“唯意志”办法的崇奉者同主张成本核算、市场范畴、科学的“平衡”计划以及创造与论战自由的人们发生了冲突。随着后一种倾向的出现，新经济政策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 两个十年的争吵

如果说新经济政策在那些主张“计划与市场”混合型经济的人看来是一种模式，那么他们对新经济政策以后时期的态度便成了引起他们重大争论的问题。利西奇金曾经彻底否定继“相当正常的”制度之后出现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另外一些作者，例如诺沃日洛夫，曾企图证实三十年代的某些政策是一时不可避免的。高度的集中化和相应地限制市场关系，看来是由于国际形势和野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带来的紧张局面而造成的。但是，不同立场的论战者们除了看到斯大林统治下各项政策中的更集中化而外，又能在他们纯自由的坦

---

品的生产过程更加接近于并最终归并于一个包括了“社会主义分配”的和谐一致的总过程。顺便提一下，就是这位勃拉图斯，在六十年代还继续表白他的这些观点。另外，L.金兹伯格写有两篇文章，是探索1923年和1930年两次发生的同类重大分歧和敌对营垒论战的好材料，它们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苏联企业》，载于同上刊，1930年第2期，第90-114页；《论经济核算制》，载于《法制革命》，1931年第5-6期，第110-134页。六十年代论战中再度出现的同类分歧，可参看P.克雷洛夫和M.彼得鲁辛的文章，载于叶菲莫夫编《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第2章，第57页。这两位作者赞扬1923年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宁要“市场上的经济措施”而不要从前的“总管理局统治的行政领导”。

率讨论中捍卫一些别的什么呢？

答案只能是含糊其词的，不过斯大林工业化的全部特点和在斯大林手下建立起来的制度的许多特征，差不多都逐个地遭到了攻击。批评的严厉程度取决于党领导的现行政策。但是无疑地，批评的锋芒严厉地指向了斯大林统治下干部的腐败和国内文化生活的窒息。官方的政治经济学被谴责为束缚经济的发展，“高速度”也被攻击为引起“经济生活混乱”的根源。<sup>①</sup>许多农业政策，包括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特别是以拿走农民绝大部分产品而不给以合理报酬的办法剥削农民的征购政策，都遭到坚决的反对，因为这些做法虽然不象消灭富农那样直接地消灭农民，却也是由于有了先前那种野蛮行为的创伤性后果才引起人们反对的。<sup>②</sup>

因此可以想象，只要条件更加有利于公开争论苏联的过去，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时代的看法就必然是而且必将是带有高度的批判性，甚至是完全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反对派的作用，特别是提出了迥然不同政策纲领的右翼反对派的作用，就有提出来重新评价的必要。与旧论战中一些重要论点有关的问题和答案是可以很好地预料到的。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对集体化的意见也将得到公正的检验。布哈林在1928年6月说过：“没有农业中的一定数量的积累，就没有集体化的可能，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到机器，也不可能用一千具木犁来装配哪怕是一辆拖拉机。”李可夫同时也提醒过，即使是集体农庄，国家也得与它们做生意，付给它们一定的代价，否则集体化就行不通。<sup>③</sup>

今天应当如何评价这样的意见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米高扬的态

---

① S. 佩尔武申、V. 文热尔、A. 克瓦沙等人文章，载于《生产、积累与消费》（莫斯科，1965年版）第20页。

② 这方面的材料见本书第200页注①。

③ F. 瓦冈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破产（1928—1930）》（莫斯科，1970年版）第114页，所引布哈林原话见党务档案；李可夫意见也引自档案，见《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63年版），第812页。

度吧，他在1930年5月提到布哈林的意见时说道：“曾几何时我们岂不是听到布哈林同志和他们三位异端者都（于1929年2月）说过，‘国家之所以苦于缺少口粮，并不是由于集体农庄的发展，而是根本与它无关。如果我们企图把我们的农村政策的成就仅仅归之于集体农庄运动的成就，那么缺粮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接着米高扬讥笑了缺粮问题将在近期内更加严重的预言，随即吹牛说，集体农庄已在通力合作，要在一年之内帮助解决粮食问题。<sup>①</sup>面对着这样两种相反的说法，现在的研究者们到底应当选取哪一种呢？

同样，人们也可以问一问，如果研究者们遇到政治局委员在另一个尖锐问题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又该怎样找到答案。1930年古比雪夫宣称，目标是要“逐年（成倍）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使每年的工业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十”；李可夫同他的看法相反，认为这种说法是“纯粹的算术游戏”。每年都提高增长速度是没有必要的，“可以把投资的曲线降下来，”只要有这种需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允许把速度当成偶像来崇拜。”<sup>②</sup>

甚至一个稳健的苏联历史学家，只要有人问到他对1929年苏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先后通过的下述决议有什么看法，他也一定会感到十分尴尬。该决议说：“布哈林（于1929年1月或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党内民主，党已经变得‘官僚主义化了’，我们都开始官僚化了，党的书记们不是真正地选举产生的……党内的现行统治已令人无法容忍，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是赤裸裸的捏造。”<sup>③</sup>

然而，这果真象苏共中央如此愤愤不平地一再声言的那样，是

---

① 阿·米高扬的话，见《经济生活》，1930年6月3日。

② 瓦·古比雪夫的话引自《社会主义全线进攻时期的萨拉托夫党组织》（萨拉托夫，1961年版），第155页；李可夫的话引自瓦冈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破产》，第97-98页（摘自党务档案）。

③ 《苏联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决定汇编》，第2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561页。

既“违背事实”又是“捏造”么？老实说，很难对付的是布哈林确实是讲的真话，当所谓个人崇拜盛极一时的時候，党内这种统治的结果甚至连中央委员会自身的大多数委员也感到无法容忍了。可是，一些保守派和教条主义作者至今仍继续否认布哈林说法是事实，并侈言一切事情都是按照最民主的原则进行的。<sup>①</sup>那么试问，如果说党在1929或1930年没有党内民主是“违背事实”和“捏造”，何以竟在一夜之间党就变成了政治大恐怖的牺牲品呢？

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正如要解决另一个也相当重大的问题一样，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特征和国家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两种相反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遇到的对手是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大发雷霆地指责布哈林犯了最大的、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说他在一个重要之点上对社会民主党人作了让步，“首先，承认了存在一个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其次，承认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中能起到直接指挥的作用。”

卡冈诺维奇认为，事实上不是这样；他当然也不过是重申了斯大林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中根本起不了领导作用，何况连它自己残留着的一点独立性都已经在丧失中。<sup>②</sup>

后来证明，争论中是谁正确的问题已由苏联自己的许多文章作了解答，这些文章充分认识到，西方（以及其他地方）经济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国家的作⽤，正是二十世纪政治与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苏联的经济学家们知道，而且今天甚至进一步证明，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能力“设计”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的，即使它们并没有采用“计划”这个字眼。

在这些激烈争论的问题上，以及与斯大林完全接管大权前夕党内对立派别的是非曲直有关的许多其他问题上，能够事后有所醒悟和找到机会讲出来，毕竟得到了一些与迄今为止死守教条大不相同

---

① 瓦冈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破产》，第268页。

② 拉·卡冈诺维奇：《十二年来的苏维埃国家建设》，载于《法制革命》，1930年第1期，第15页。

的答案。诚然，今天的作者们意见还很不一致(即使是小心谨慎地或通过暗示流露出来的)，而且尚未各自选择好自己应站在哪一边。但是，真正犹豫不决的只是那些赞同过斯大林手下的过去批评家的立场的人。居于统治地位的保守派，甚至更可恶的新斯大林主义派(这一派是领导集团中最教条主义的一派)，则一点儿也不犹豫。他们进行公开的攻击，公然用咒骂来推行他们对历史的解释。只有那些持批判态度的人，那些客观的历史学家，党内的民主派和非党知识分子，被禁止公开发表意见。另外那一边的人对争论的问题是心中有数的，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攻击对方，只要权力掌握在他们那一边的手里。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以来，官方发言人从未停止过他们在历史问题上发起的攻势。他们曾力图保持对正确答案的垄断权，因为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讨论反斯大林主义纲领的利弊问题，以及讨论后来的局势揭示出那次争论所持立场的苗头，都有引起政治性爆炸的可能。

在这些问题上，任何一次公开的争论都会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而东欧某些地方发生的事件就是前车之鉴，这一点是保守派深深懂得的。他们知道，斯大林统治下所建立起来的整个大厦，在被迫只能作出一种答案的成堆问题的猛烈冲击下是很容易摇撼的，而在诸如社会结构的性质、该社会结构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上的联系的现实性，以及它的社会主义特征和它的统治者的合法性等问题上，他们仍然负有很大程度的责任。如果这类问题允许知识分子来对待，那就很容易把影响面扩大到更广泛的各界公民中去，而给现领导带来难以估计的后果。

但是，尽管公开论战是困难的，这些问题的争论却在通过各种方式有代表性地继续进行着，以致几乎不可能压制这一争论。争论所采取的规模最大、最普遍也最持久的方式是赞美“二十年代”和批判三十年代；这种方式在可能的条件下总是直接进行的，否则从一个侧面进行，高度评价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工业化的决定就



是一个例子。

更狡猾一点的保守派分子充分认识到，对二十年代的向往具有反现状的潜力。他们对此十分敏感，并在全线发起了反攻。他们捍卫三十年代和整个斯大林时代，把这段时期理想化，从中找到鼓舞他们力量的主要源泉。<sup>①</sup>因此，保守派的御用笔杆子们一方面力图诋毁斯大林时代以前那些文化生活中的“恶劣”的“不正”倾向，一方面把无视和蔑视三十和四十年代文学与文化创造的态度严厉地斥之为“虚无主义”。他们甚至硬要“虚无主义者”承认臭名昭著的日丹诺夫指示是社会主义的鉴定标准和对文化的贡献。这样的攻击在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中出现特别频繁。<sup>②</sup>得到享有权力的高级权威人士支持、必要时还有相应的强制机关撑腰的党的官方历史学家，对那些“给苏联的过去抹黑”和丑化党的人发动猖狂进攻。“抹黑”主要指对1930年以后时期的批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时期恰恰是现行的党政一体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七十年代初，统治当局以斯大林死后从未有过的加倍的疯狂劲头，大肆吹嘘党在各方面的成就，以及党在三十年代实行集体化、剥夺富农和高速度发展这一伟大的政治三结合中的作用。于是，这就很自然地大大带动了对左派分子，特别是对右派分子、“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敌人”、剥夺富农的反对者<sup>③</sup>和当然是斯大林的死敌们的重新进攻。

自从苏联的保守主义受到了来自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纲领的

---

<sup>①</sup> Z. 布热津斯基于1964年指出，1928至1952年对苏联保守派来说，是他们精神力量的源泉。见D. 特雷德哥尔德编论丛：《苏联的发展》（西雅图，1964年版）第9页。还可参看R. 朱迪为G. 斯基林和F. 格里非斯的《苏联政治中的利益集团》一书所写的《经济学家》部分，（普林斯顿，新译西州，1971年版）第216-217页。朱迪描写了受到二十年代鼓舞的苏联经济学家与袒护三十年代并参与了三十年代活动的苏联经济学家之间的斗争。关于同时争取政治科学化（尚未解决）的斗争情况，见保罗·科克斯：《党的控制的合理化》，载于C. 约翰逊编：《共产主义制度的变革》（斯坦福，加利福尼亚，1970年版）第180页。

<sup>②</sup> 见尤·伊万诺夫的文章，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69年9月，第14期。

<sup>③</sup> 可参阅至今仍作为全国政治宣传教育工作网的基本文件的、中央委员会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发表的文章，载于《党的生活》，1970年第1期。

打击以后，虽然保守派已重新恢复了元气并力图治愈创伤，但斯大林统治下党的政策的防线毕竟从思想上被大大突破了，甚至在政治上也受到一些损害。从基本逻辑的标准看来，党曾有过一个时期是不可能有什么政策的，那时不需要党做什么，只要它大体上服从恐怖和暗杀行为。因此，把党说成无论如何是健康和清醒的，把党的政策说成是深受广大群众支持的，这无异于为斯大林路线的本质作一番笨拙的掩护，而根本无视所犯下的“若干暴行”。党的宣传部门把重型炮弹射向了那些认为斯大林政策甚过“暴行”的人，以及那些迫切要求揭露和详细研究斯大林执政的整个时期的人。党的领导人指责斯大林的批评者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说他们惯于“吹毛求疵”，是“诋毁光荣的过去”的诽谤者，是对用血汗养活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的英雄行为”的中伤者，是以怨报德的忘恩负义之人。

这种说法在当代许多苏联的宣传中甚嚣尘上，并由一些苏联的极端教条主义者所充分表达。他们的攻击之所以这样猛烈，也许是由于不仅要捍卫斯大林时代，而且要捍卫当前的权力结构，因为党和政府中的大多数老一代领导人都是在斯大林大清洗期间入党的，并在当时的党机关中第一次跻身于高级职务；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升迁到最高权力地位而统治着斯大林亲手缔造的这个帝国，正是当时奠定的基础和沿袭其统治方法的结果。

因此不难理解，现存政权的捍卫者们十分仇视那些对给了他们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时代和统治方法进行抨击的人。

我们至今还记得，斯大林死后苏联发生变革的程度是引人注目的。这些变革受到西方作者的深入研究，他们曾多次认定，现行制度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独裁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而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要求经济体制作一些修改和整顿，因而作为重点的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种体制上的改革已经涉及到整个制度和党本身。受过较好的教育并对过去许多重大问题保持中立的年轻一代领导干部的出现，乃是变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但是，苏维埃制度特别是党的体制的基础，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中央集权的独裁制度不管怎样进行了合理化、现代化和完善化，仍然是这个政体的主要特征。经济的计划与管理，以及等级制的行政结构，仍然遵循着三十年代制定的模式。在经济改革中曾试图改变这种模式，但各项改革本身仍处在初期阶段，因而甚至有可能就在这初期阶段被全部冻结起来。

在政治制度方面，法律及其执行机构虽然在组织上和效率上比过去有所改进，但是仍然保持着它们从属于党的意志的作用。由于审理和判决都不是独立自主的，党可以随意操纵，而对持不同政见者，甚至较温和的持批评态度的公民起诉时更是经常如此。党在过去和现在一贯是“超宪法”的，哪怕是在名义上要限制它的权力，它也决不会让步。

党对权力的垄断及其所根据的论点和行使权力的方法仍然保留了许多先前制度的做法，以致我们依旧可以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特别是以坚持社会一致性的概念来为党不允许任何其他因素在政治上自由发表意见的一党垄断作辩护。此外，如今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呼声更高而一再强调的党的团结一致、“铁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仍然是按照斯大林主义的经典式解释提出来的，即不得有未经允许的论战和政治批评，政治上的决策只能由最高领导来作。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党内的“分裂”活动一概受到禁止，并被认为是叛逆行为，这与“过去的黄金时代”没有两样。

正是在三十年代中，布尔什维克分子最终地丧失了他们作为政治人的基本权利，享受不到精神生活的乐趣，在政治、思想和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们把这些基本自由交给了党的各级机关，而从此再也得不到了。党的领导对广大党员群众也象对其他公民一样实行情报封锁，并且跟斯大林时代完全一样，剥夺了国家的政治生活的自由权，而坚持自己有权独揽一切活动，包括操纵国家的精神生活，独家解释党的思想，选拔各级干部，管理各种机构，以及控制一切“无形之物”，如作风、习惯、精神面貌、

传统和思想方式等。

研究苏联在入侵布拉格之后所发表的政治声明的人一定会感到惊异的是，苏联为了宣传一党垄断的合法性和禁止任何反对派，竟然发起了一个只是对内而不是针对国外某些修正主义者的大规模运动。但是，反对派在二十年代存在过，而且有所作为，这就使保守派分子更加敌视对新经济政策的留恋，而加强他们支持新经济政策以后时期各种做法的态度。

因此，从变革的程度和沿袭过去的、特别是三十年代的制度的坚决态度这两方面来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年代对三十年代这两个十年的斗争为什么一直或明或暗地在苏联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思想领域里始终激烈地进行着。改革派和保守派这两大营垒，都有充分的理由偏爱“他们自己的”那个时期。这次斗争乃是苏联社会史上两种模式——一体化独裁的模式对“混合型”的、自由主义和多中心的模式——交替出现这一尚未完结的现象的另一种反映。研究苏联历史的人不应当对这两种模式的重新出现有所失察，而应当详细考虑它们在苏联的过去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对苏联的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混合型”模式的支持者充其量只留下了一个少数，而一体化独裁模式的捍卫者却保持着牢固的支配地位，但是后者却显得神经过敏，仿佛他们正在受到攻击，而且攻击他们的不是个别很容易沉默下来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有威慑力量的、不可调和的流派，它们是保守派掌握不住也“约束”不了的。这些流派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而一个最可能实现的希望就是在过去那些主要问题上的改弦更张。“混合型”模式的有些东西，对各种独裁的和“中央集权”的主张仍然是有竞争性的劲敌之一。

## 拥护和反对极权国家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象各自支持“自己”那个十年的双方发生明

争暗斗的情况那样，由于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感情不同而引起的冲突，往往是表达他们对当前政治的意见的一种方式；对过去持不同的看法已经大大地影响到关于未来的论战，而在解释历史方面的意见分歧也暴露出了对今天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两种敌对的观点和情绪。

尽管二十年代与现在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都极不相同，但是今天的争论与二十年代末期的论战往往有许多相同之处，我们可以在这里举几个旁的例子来更好地证明这种巧合：二十年代末的最后一批反对派，曾设法阻止很快就要发展成为“斯大林主义”的那种趋势。后来的改革派则目睹了这种现象的发生，竭力要清除“斯大林主义”的痕迹。他们在这两件事情上，批评的目标是一致的。布哈林之所以声嘶力竭地反对用大规模高压的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因为他预见到了这种趋势会把苏维埃制度引向何处去。今天的“行政管理办法”的反对者，无论他们研究的是过去的事实还是当前的实践，都遇到他们的领导人曾被警告不得逾越的禁区，他们的批评也就往往不自觉地用了同样的措辞来谴责同样的目标。

还有一个更加令人寻味的巧合，那就是在二十年代后期也象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一样，论战的焦点都是集中在整个模式，包括管理和发展经济的方法、国家政权与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以及为文化生活提供的气候条件等一系列基本特征的改革或保持上。保留新经济政策的模式曾经是布哈林的目的，而苏联思想界的现代流派则把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作为他们所探索的一种蓝图加以重视。因此，在主张计划方法和主张整个“计划与市场”结合这两种意见之间，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立场。现在何以对二十年代有所留恋，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其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历史上的新经济政策所具有的农业落后性、庄稼汉、小本经营者、高度文盲等工业化以前时期的许多特征。

二十年代的文化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毕竟是丰富多采的，这一点自然也许多苏联公民所向往。因此布哈林，这位文化多样化的

鼓吹者，在他们心目中也就不只是作为一个“有砖头的计划”的代言人而受到爱慕与崇敬。

二十年代与现在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存在于政治领域中，或者更广义地说，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类型中。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种要靠大规模镇压和强制来维持的制度。它热中于制定出各种形式的法律上的义务和社会法制理论，以及各种感化办法和能够配合混合型经济的实际情况而排除经济生活中生硬强制办法的法律制裁程序。<sup>①</sup>当年党在法学理论方面的发言人帕舒卡尼斯和斯图契卡，就是当时公认的布哈林派。

当布哈林和他的同伴们与斯大林的抱负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保持上述那样一套方案尽管有各种困难和可能受到迫害，却是当时布哈林派信念的中心要旨，同时这也是在包括观点、目的以及理论和策略的几乎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处于敌对地位的两大学派之间的一场斗争。

布哈林认为工业化只能以比较渐进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建议按比例发展，反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注意保留小规模的小农业经营；而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信念，是由于他对俄国农民和其他“小人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的认识，比布尔什维主义其他流派当时的认识更乐观得多。持相反意见的多数派的看法，代表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国民的大多数不仅应看作改造的主要对象（这是正统的看法），而且应看作主要的敌人。只有在差不多一夜之间就迫使广大群众进入新的社会结构的情况下，超速度发展的策略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而这种对“小人物”发起的进攻，正是造成斯大林主义最反动的特征和使这个制度暴露出可怕的社会衰退的明显迹象的罪魁祸首。

---

<sup>①</sup> 关于那时的法治和法学理论方面的情况，见 E. 卡尔著：《1926-1929 年计划经济的基础》一书（伦敦，1972 年版）第 2 册，第 373-376 页的《法治》一节。还可参看 V. 班德拉：《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经济制度》，载于 1963 年 6 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265-273 页。

强行集体化是斯大林主义策略的一面镜子，也是跟布哈林主义唱的一出对台戏。在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的名义下，作为一次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而提出来的集体化和要求工业化“加紧步伐”的方针，既未能解放人民和生产力，又未能制定出符合这个大国当时国情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更高形式，却一头栽进了“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大规模压迫中，使俄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之一就是众所周知的农业至今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大大落后于工业社会和某些非工业社会。

布哈林担心，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正在丧失其人道主义的一面；他还担心，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化的超国家的国家，必然会招致比任何事变或当前危机更长久得多的意外事故。

对极权主义国家这种无法摆脱的忧虑，的确在1929年1月和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了，当时在“三个异端者”和政治局的大多数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多数派不仅否决反对派的政纲，而且拒绝了关于限制使用暴力的全部建议，并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针。当时提出供选择的建议是否现实，或者说可否避免走斯大林的道路的问题已在苏联开始讨论，而在西方则已讨论了一个时期，现还在继续讨论中。布哈林对这个“极权国家”的忧虑，他对建立一个过度集权的官僚主义庞大机构的反对立场，以及他对革命后苏维埃制度在结构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部门中使用暴力和警察手段的抗议，从其精神实质来说，自然是与现代改革派的主张相一致的，他们要求经济和文化生活民主化、设法通过调动群众积极性来扩大社会自主权，以及力求限制国家权力和滥用行政命令方法。

“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在东欧引起的“自由共产主义”整个并发症，十分类似于我们所提到的苏联经济论战中的那些思想，但毕竟不是从对布哈林思想或新经济政策时期积极活动的另一些人的思想有所认识中得到启发的。不过，一旦出现了各种新的思想，并且有了允许自由论战和探索的条件，其间的血缘关系就能够而且必将揭示出来，而其连续性也必将被世人所认识。

即使现行政治仍然阻碍着人们去认识这种连续性，或者某些作者甚至真正不知道或不感兴趣于这种与过去的连续性，历史的相似性却依然是引人注目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只要我们把现在的另一场争论与1929年的那场争论加以回忆和对比，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这就是围绕“合作社会主义”和对“社会利益”与所有制原则的新看法的争论。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文热尔和什克列多夫，就竭力主张国家原则与合作社原则相结合，而后者在文热尔看来则是“较高的”原则；同时，在什克列多夫看来，还应当承认个人、集体和国家三种所有制的合法性。什克列多夫谴责“某种观念上的所有者”（指国家）是妨害和违背社会多样化的。他在承认社会多样化和承认社会利益至上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各社会集团分享所有制和充分承认除国家所有制及国家主权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合法性，使各社会集团的利益得到合法的反映。有一段相当明显地属于这类思想的原话，提出了一个“必须把个人、集体、群众、社会 and 国家的积极性最充分地结合起来”的建议，并接着说：“我们过分地集中一切已到了反常的地步。现在是该反省自问是不是应该采取导致列宁主义的‘公社国家’的步骤的时候了。”但是，这段话却不是从诺沃日洛夫或文热尔那里摘引来的，而是引自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更意味深长的是，恰恰是卡冈诺维奇在1929年11月对党员积极分子的讲话中也引用这段话，其目的是要把这段话当作他攻击的主要目标，因为在他看来那样攻击是最合适了。他嘲笑了“个人、集体、社会和国家积极性的结合”，特别是“公社国家”这个术语，甚至连布哈林希望采取的“步骤”也不放过。他叫嚣说：“这些步骤就是走向小资产阶级的、而接下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的步骤。”随后他补充说，布哈林派和另外一些敌人“携手来反对集中管理，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强大的国家机器”。<sup>①</sup>

我们相信，这正是过去和现在论战的要害所在，正是苏联历史

---

<sup>①</sup> 拉·卡冈诺维奇语，见《苏维埃国家与法制革命》，1930年第1期，第29-30页。



上一直进行而尚未终结的一场斗争的焦点。“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论者”或斯大林主义者卡冈诺维奇所发动的对“社会主义多元论”拥护者布哈林的这次进攻，预示出后来几十年中所出现的一次论战内容和论战营垒的重新组合，并以其所用的提法完全相同为特征。

米高扬，这位卡冈诺维奇的老搭当，曾在那些狂热的日子里共同挫败了右派分子，而今却懂得了他当初坚称布哈林是代表着他一直认为是错误的“一整套概念”与“一条自觉地考虑出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时，他所说的是什么。<sup>①</sup>

不管他当初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至今总算是一个尚未解开的难题。但是米高扬也有说对的地方，即他说布哈林代表的是一条明确的政治纲领，而且毕竟是斯大林认为可能是很危险的一种倾向。斯大林的顾虑可以从检察官维辛斯基在审讯布哈林过程中力图否定和抹杀一个真理中得到证实，这个真理是米高扬和另外一些人都认识到了的，那就是无论布哈林反对派或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当时都是一种可供领导层选择的政治倾向。这一点正是维辛斯基奉命要加以否认、诋毁和掩盖的事实。“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也就是说，其领袖人物现已在押的‘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并不是一个政治党派，不是一种政治倾向，而是一伙十恶不赦的罪犯，而且不仅仅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就连一般的罪犯也会认为他们是最卑鄙、最低级、最可耻的……罪犯，是败类中的最败类。”<sup>②</sup>

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卑劣的控诉了，但是由于历史的意志，那次控诉却反过来违背了这位检察官的意愿。如今很难找到什么言辞足以充分有力地刻画维辛斯基所干过的勾当。显然，他手下的牺牲者们已经赢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因为他所指控的“罪恶”事实今天已站不住脚了。但是，牺牲者中那些从来没有屈从于斯大林主义者的

---

① 瓦冈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破产》第38页载有引自党务档案的一段话，是米高扬向1929年4月中央全会的讲话。

② 塔克和科恩编：《大清洗的审讯》，第515页(这里转载的是审讯案文件的英文副本)。所引文字重见于第517页。

人，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党派，一种政治倾向”，却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并且还在经常遭到攻击。他们的真正罪过无非是在党内组成了一个反对派罢了，而这个事实至今还引起当权派大动肝火。一个当代的作者要是承认自己与二十年代的反对派有连续性和近似性，这在苏联就等于一种政治上的自杀，所以改革派即使心有灵犀，也不敢公然提到那些人的名字。而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却没有什么禁例。昨天的“机会主义分子”，在保守派的书中已连篇累牍地直接与今天作为社会主义叛徒的修正主义者相提并论了，比方说对布拉格那些敢于提出“所谓各派政治力量自由比赛”的人就是这样。<sup>①</sup>对布拉格的“修正主义分子”指定的起诉人就是维辛斯基的化身，同时也是做给苏联国内任何敢于充当“反对派”的人看的。

目前无论是官方的或迫于舆论趋势的有可能的平反或采取其他方式恢复名誉，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sup>②</sup>为斯大林的反对派恢复名誉，就意味着承认了党内依然存在着一个反对派这个重要事实，承认了现领导的路线恰恰是要把对党内政治派别合法性的最细微的暗示扼杀在其萌芽状态中。只要这个阻力存在下去，就始终不会对一个“政治党派或倾向”的前领导人作丝毫的让步，甚至只涉及到与过去有关的事情也是如此。斯大林的敌手们至少在下一“解冻”尚未到来之前，是不会有有什么应得的权利的。

---

① 瓦冈诺夫在他的《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破产》一书中就是这样做的。

② G.卡特柯夫在他的《对布哈林的审讯》一书(纽约, 1969年版)中(第191页)正确地强调了维辛斯基(和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反对派作为政治倾向来消灭。他还有一点也许说得很中肯, 即认为布哈林毕竟在审讯中铸成了大错, 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立场, 而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把他的政治理想灌输给未来的好几代人”。我认为, 在一次自由论战中由许多研究直到1934年底这段时期的布哈林的历史学家来替他恢复名誉, 似乎是很有可能的。但是, 有没有可能把一个并未向腐败统治的暴力低头的人重新请回政治领导的万神殿中来呢? 这仍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和预料的问题。就此意义来说, 斯大林和维辛斯基在用他们粉碎敌人的办法来贬低他们手里的牺牲者的人格这一点上, 是大大地得逞了。

## 第十三章

# 结 束 语

经济学界的多次论战，以及他们当中那些对各种重大改革感到兴趣的人所发表的见解，在许多方面对研究苏联的制度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这些经济学家对他们国内的经济状况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在让他们的公众明白自己的国情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与政界人士十分接近，而且有些人的面目很难同行政官员和上层领导人区别开来。有时他们也担任了行政职务，或充当顾问和专家，参与了内部权力集团对经济状况和各种留待解决的有争议的提案的讨论。

同时，他们的作用对本国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他们不仅树立了或重新树立了一种重要的学风，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新学风在其他社会学科的出现，有助于在他们自己的同行中，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中和上层行政官员中，推广一种自由探讨的精神，一种对教条而空洞的宣传性议论的反感，以及对论战的爱好。

无疑地，他们对受到保护的、有宣传背景的陈腐教条的挑战，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有助于克服某些教条的方法，都已经起了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既可以与其他探讨领域所作的努力相媲美，又确实为别的人们开辟了道路。

现在还很难知道，在苏联被列为计划制订者和经济学家的一百多万人中，究竟有多少人向这些革新家们学习，或者赞同他们的见解。本书所提到的人当然只是极少数，但毕竟包括了苏联经济学家中一些最知名的人士。他们在论战中不得不背着引人注目的新思想

的包袱，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不总是那么特别开明，而很容易在他们后面藏着一个“修正主义”的幽灵，始终准备着向改革派人士发起进攻；但是随着论战的进行，我们所研究到的一些经济学家却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苏联知识界某些重要进展情况的新的认识。经济学家正处在转变过程中，并且不只是在经济理论上或与他们的专业直接有关的纯技术问题上，同时也在与他们的社会和政体有关的更重大的问题上，都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围绕着某些改革纲领而统一起来，并且在很多方面同较之自己那个专业圈子更大得多的圈子里的各种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流派汇合或携起手来。

爱好批评而矢志改革的经济学家是知识分子中谙于世故而具有启蒙思想的那部分人的一部分，他们的情绪和意见至少能影响一些高级经济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这种情绪上的感染在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是个比较新奇的现象，可以认为这些情绪已经在社会上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来，经济学界论战的内容就值得从他们所提供的情况和发表的意见这两方面来加以认真考查。经济论战和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意见，即使在严密的控制与检查制度目前都已钝挫其锋芒的情况下，也是苏联精神生活中一个重大的事件。只要解决不了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越积越多，用检查或其他镇压方式不许把意见摊在桌面上，而强迫它们回到桌面下，也许是个可行的好办法，但毕竟是可怜的下策。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批评意见将依旧重新出现，并对现存的意识形态提出严肃的挑战。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批评家们指出了现行的经济管理模式已失去效用，官方的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生命力(至少从同样的意义来说，其他许多官方的教条何尝不是如此)。党的领导集团一贯坚称其“社会”是一个日趋一致的结构，因而可以以党为其最好的代表，这种凭空想象的说法也被批评家们宣布为胡说八道。社会是复杂的，多面貌的，它本身就是各种集团利益经常发生冲突的一个模式。如果不充分承认这个真实情况，那末把党吹嘘为“普遍利益”的

唯一最好的体现者，就始终是毫无根据的。政府机关和党机关，即整个领导，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它们决不会有什么自觉的能力来优先或更好地为普遍利益服务。

现代学者所描述的苏联经济的状况，正符合国家与社会各阶级和集团之间以及它们各自之间关系紧张和矛盾重重的状况，这种状况有时简直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条鸿沟，而与所吹嘘的党指导下的国家集权与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紧密结合相去甚远。国家所有制，这整个社会模式的主要精神支柱，已受到怀疑。它决不象官方所宣称的那样，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而也许只是国家实行征收的依据，实际上并没有把国家财富交给社会处理。

所有这些见解引起了对整个模式及其意识形态的严重怀疑。不少人别开生面地提出或者暗示说，也应当有多种模式，而且探索经济领域中的一种新模式的时机业已成熟。作为对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实行总控制的万能代理人和管理者的国家，一向作了不少的努力，但其效果如果不是适得其反的话，也是经常令人失望的。国家、社会、社会集团和经济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就这样，一场大论战发动起来了，苏联的政治科学也从这场论战中诞生了。在论战过程中，作为这个制度的枢纽的党，虽然不是研究的对象，可是论战者们很自然地不再把它看成是神圣的化身，或者如它所宣称的一切至善至美的代表。这样的批评，对于一个把自己置于宪法、法律和学术研究之上的强权组织来说，是很难接受得了的，因而它必然要给予反击。但是它毕竟成了众矢之的，哪怕这些矢只是回敬给它的；党的这个“非神圣化”过程，在学者们和一般公众眼中，以及根据这个过程本身看来，纯粹是一个有时限性的历史现象，它在进展着，起着作用，也许最终会不够彻底，但毕竟已经开始了。

这场经济论战不得不把它的涉及面从狭隘的经济问题扩展到其他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一个由国家控制着的制度里，各种

奖励和刺激是不能仅仅从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上来理解的；其实奖励和刺激既不能靠行政命令来颁布和强制实行，也不能只是通过这个制度的各种社会化构机的活动就产生内在化作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内在化作用，是自觉的社会化要求与个人和社会集团从客观上已建立的社会制度中得到的经验总和这二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在国家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推崇的价值观念与人民群众在进行各项活动中所实际遵守的价值观念和所追求的刺激之间产生了各种分歧和矛盾，那末国家所希望其公民得到的对制度的印象，就会与公民自己心目中的实际印象大有出入。官方与非官方之间在价值观念和对生活的感受上的这种出入或矛盾，在任何一种制度中本来都是正常而又经常有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深化到足以断送这个制度的命脉(比如经济)，或者广泛到不可收拾，那末这个政治制度就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苏联，由于其国家处处伸手和处处揽权，官方所希望的行为方式与广大社会集团的实际行动和动机之间，矛盾越积越多；而这种矛盾，在国家问题上以及国家机器掌握社会发展过程问题上，引起的反响确实比别的方面强烈得多。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苏维埃制度已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这一考验是由于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以及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各不相同的“动机不一致”现象而带来的。可惜我们无法确定这种矛盾的紧张程度。但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漠不关心，却正是反映出“动机不一致”现象普遍存在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便是经济领域。

经济学家们经常谈到利益冲突的情况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本来，要把经济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就必须使“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严重脱节弥合起来，否则各工厂就会认为完成计划对自身不利，而最坏的结果是得不到物质刺激。上级行政管理机关却与实际工作场所之间总是想不到一处，而各自认为自己有理。这种彼此脱节的情况导致对同一个问题各持己见，在制定物质奖励方案时，官方的设计(他们自己也经常不协调而各顾自身)与全体工作人员或企业经理

人员考虑本身利益而提出的设想，总是不得一致而互相抵触。<sup>①</sup>

十分明显，“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部复杂的机器，需要加以修理了。同样，社会学家们也已显然注意到，劳动力(或者说工人阶级)的自由散漫，他们无休止地掉换工作岗位，“缺乏纪律性”，并且好酒贪杯，这些都与“国家”是顾主，党是“领导者”有直接关系。<sup>②</sup> 青年人的问题更为复杂。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和缺少工业组织，高等学校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得不到适当的劳动报酬，而且机械化程度不够充分，因而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对此感到失望。<sup>③</sup>

这类腐蚀性的因素和其他消极因素经常起着危害作用，给结构和体制造成严重的压力。事实上，建立在所谓“党、国家、经济、社会和思想的一元化”基础上的这一整套传统的权力结构，在其各个环节上都已受到了压力。“思想上的一致”这个概念当然已经过时了，可是强有力的体制安排仍然抱着它不放；然而，这种安排却使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长期存在下去。书报检查制度继续妨碍着科学的探讨和文化的发展；政治论战遭到禁止，以致全国缺乏一种必要的气氛来使领导富于创造性，使公民不关心政治的状况得以消除。

党在对待国家、对待社会和对待自己的党员上有着不同的关系，从而使它很难免于腐败。只要党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继续起着消极作

---

① 参看S. A. 海恩曼文章，见亚·诺特金编：《苏联经济发展的因素》(莫斯科1970年版)第2章，第70页；I. 别尔曼：《制定最佳计划的方法》(莫斯科，1971年版)，第79页。

② M. 索宁在诺特金编的同上书，第4章，第106-107页报道说，1965年苏联酒的销售量比1950年增长了一倍半，大量酗酒引起工伤事故和其他许多恶果。

③ 毕业后当工人的高等学校学生感到灰心的情况，参看V. 扎明的文章，见诺特金编的同上书，第5章，第117-119页。另一方面，只受职业教育的青年却人数太多，这意味着他们未受完高等教育因而得不到文凭。所以，他们一面工作，一面力图修完高等学校的学业，这要花许多年的工夫，因而不合理的。(引自F. S. 戈里亚切夫：《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66年版，第160页。)

用，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自己造成的副作用的侵蚀。

从我们对党进行的剖析中发现的各种倾向看来，党显然已使自己陷入日益加深的某些矛盾中。它要保持现状生存下去，就必须加强它的控制，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控制势必越来越不灵便；因此党的领导集团只好一心一意致力于重新加强控制，以便在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都要求制定一些适当的新政策、改革旧的体制和建立新的体制的时候，能够保全现存的模式。

造成党内出现反对派的第二个基本矛盾，就在于有权的和无权的党员之间差距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了彼此疏远和表现漠不关心的倾向。

只要这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就为下述各种社会基本矛盾侵入党内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些矛盾就是特权和非特权的矛盾，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保守派与民主派的矛盾，自私自利者与理想主义者的矛盾；同时，这些敌对势力对党的各级机关和领导也产生了分裂性的影响。

等级制结构和不相称的各级权力分配，更加助长了这种内部矛盾的加深和办事不力现象的严重性。普通党员和下级积极分子，甚至那些专业的官僚，既然只能按照别人决定好的政策办事，而没有任何权力和主动的余地，那么没有上级的命令便任何要紧的事情也办不了。整个组织完全听命于上面的指示和压力，而领导也就养成了习惯，总对自己的下级放心不下，处处要向它们发号施令，更不用说对其他非官员就得严密监视了。这样一来，大量的情况汇报和请示报告便从下面不断涌向中央，而许多无济于事的、被歪曲了的和不可靠的汇报材料，却使党无法了解实际需要和处理好重大的事情。

党的权力结构还产生了另一个反常现象。由于否认社会各阶级和各集团有发表政见和公开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党实际上助长了现存阶级分歧和矛盾的保持与激化。这些矛盾在经济衰退和社会机动性减弱的情况下，便具有更大的爆炸性潜力；它们渗透到党内，



使本来已在削弱着党的领导能力的各种复杂因素更加复杂化。党既然追求更全面的控制，那末任何有损其控制的事物对现行的权力结合都会构成一种威胁。因此，必要的改革和政治上的创新便被看作主要的危险，而它们可能恰恰是进步势力所要求的。

经济上已经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正在阻碍着经济改革和妨碍着改革派的各种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由于总的政治环境造成的；而国家和党的无所作为与落后状态都应该归咎于这种政治环境。苏联已在经历着一次急剧的技术革命，但它在这方面已落后于它的西方对手；这个事实和我们所说的它在“政治上的发育不全”，都可以归咎于它那些过度国家化和集权化的模式；这些模式都有一套庞大而不灵活的行政管理机构，它们虽能配合一些重要任务的完成，但要使自己很快适应新的任务和处理各种新的现象却存在着困难。因此，它们往往在现代生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束手无策，例如适应急剧的变化，接受新的思想，应付多样化的要求等。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政治环境是特别不相宜的。诚然，在党所主宰着的这个制度中，党作为一个设法使不同的官僚机构协调起来并克服它们的事务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的特殊管理机关所起的作用，在最近二十年来的重要的和成功的，但是各种迹象却表明了这个协调人也许正在丧失其权柄；这可从下述现象中得到证明，例如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正在减弱，十分勉强地放弃一些陈腐的教条，普通党员极不愿意介入政治问题，以及特权和地位的模式继续得到巩固等。初期革命传统的各种有力表现已经黯然失色了，老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个在列宁晚期作过祟的幽灵，重新任意出没而不再受到严厉的反对。

不同的社会阶层都不同程度地看到了这个顽疾的病根就在于国家的官僚机构行使国家权力过大，而社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又太小，但是这个弊端却始终起阻碍作用，使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减慢了下来。

不同类型的改革派和某些高级领导人已经感到，这个制度要重

新振作起来，也许就得在全社会和行政管理部門内部普遍推行一种现代化的自由放任的一揽子办法，因为到处伸手的国家想抓的事情实在太多，以致那么多的值得做和需要做的事情都被忽略了或耽误了。先前的实践已经证明，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就能导致产生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在文化领域中尤其如此。在远离艺术家们的画室的田野里和畜圈里，少一点干预也同样有利于庄稼的生长和牲畜的繁殖，这看来只是使某些官僚机构的代表感到十分讨厌罢了。

给予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外团体以自主活动的自由，已成了呼声频繁的要求，其目的就是要消除统得过死的不良后果，让那些没有行动自由的人能够很好关心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提倡基于这种自由放任路线的重大改革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改革的某些可行方案来说，不过是个用语问题，但对政治改革来说，却是个纲领性问题了。大多数领导人十分懂得这一点，因此竭力避免作出势必导致重大体制改革和权力再分配的任何决定。他们宁愿依靠本国的或引进的科学技术，来提高经济的成果，来改进和增强其官僚机构和管理机关的业务能力以便提高它们的办事效率，来使中央借助于现代数学、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增强工作能力。正当这样的方针带来了若干改善成果的时候，一些数理经济学家和自动化控制论者却宣称，这些方法对解决现存的各种问题是无济于事的，“按钮自动化”和“计算机乌托邦”拯救不了一个过分集中的制度。<sup>①</sup>

但是，我们不应低估现存的政权。它仍然有能力进行操纵、统治和控制，能够进行或服从改革，也能够不进行显著和重大的改革而继续坚持一个时期，来为统治集团提供自卫和保持现状的强大手段。一个大国的财富紧紧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为人力物力的调

---

<sup>①</sup> A. 卡采涅林鲍伊根、I. 拉赫曼和 Iu. 奥弗西延科在《最佳性与商品-货币关系》（莫斯科，1969年版）一书第20页嘲笑了“按钮自动化”的信徒。“计算机乌托邦”一词为 E. 纽伯格在其《自由人主义、计算机乌托邦和看得见的手：情报资料的时效问题》一文中所创用，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66年5月，第16期，第131页。

拨和重新分配创造了条件，甚至有时在这方面造成浪费。但是，各种新的要求和新的看法的出现和由此而形成的压力，却是很难控制，很难回避，也很难抗拒的。

俄国历史上特有的权威政治和一贯缺少或根本不存在民主传统和群众参与政治过程(这只是在革命动乱时期才大规模存在过)的作法，在苏维埃制度下仍继续保持下来，加上苏联社会的现代部分还相当稚弱，这就使得现政府能够腾出手来控制局势的发展。何况还有可资利用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强大的强制网，而这些东西还不曾遭到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正是由于缺少敢于大声疾呼的公开批评，统治者才至少有了逃避压力和揭露的各种掩蔽所。

还可以依仗的是从过去不可否认的成就中取得的威信，以及党善于借用民族尊严作自己的象征和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抬头。而且，群众的非政治倾向也可以为任何领导人所利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操纵各个社会集团，或者拉拢一部分来反对另一部分。

战术上的让步，个别地给予物质补偿，授给有影响的重要人士以特权，给埋头业务以更大程度的自由，这些都成了领导所使用的武器。党给予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其他科学部门的人士从事研究和学术活动的自由，甚至给予他们一种半政治性的临时特权，不让他们爱管闲事的老毛病再发作起来，给经济、国防或其他敏感的领导带来麻烦。

许多人士和社会集团，由于这种局部自由允许他们在业务和创造性活动上有必要的保证，并且能够得到物质利益和荣誉地位，因而感到心满意足。党深深懂得如何利用这一手段取得这些专业集团对党的忠诚，或者至少让他们保持没有敌意的中立态度。

至于苏联政府，也不是一筹莫展，而只是还没有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罢了。大量的证据可以说明，经济领域里仍然存在着甚至日益严重的不安定现象，首先是由于结构上有缺点和组织得欠妥当而导致机能失调和效率不高，迫使政府发动改革；可是另一方

面，实质性的经济改革却受到阻碍而代之以探索其他对策。技术革新的缓慢，经济系统中对增产和革新的物质刺激不够充分，以及经济管理上的许多体制安排不甚得当——这些对爱好批评的经济学家来说是责无旁贷地而对政府来说是必须认真地对待的根本问题，至今仍然只是摆在议事日程上罢了。政府虽已承认它所管理的经济效率甚低，却仅仅把提高效率作为他的中心口号。

但是口号、有限的调整和改革，都未能消除制度本身带来的不良后果。各主管部门仍旧按老一套办事，派出督导员和下达各种指标，尽管这是已被改革所正式废止了的；这说明政府各部对采取“经济措施”并不那么重视。为便利生产者而向他们提供物质技术的供应系统，仍象这个制度的所有缺点一样，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了。不管情况发生什么变化，制定计划总是不考虑“过去达到的水平”，硬要在头一年的基础上为来年的生产增长添加未必可能兑现的指标。

按行政等级进行管理的格局一天不改变，企业的基本面貌就一天得不到改观，而后者便只好使用同样的自卫办法，即在资金上打埋伏和争取尽可能低的生产定额，为的是不致于接受无法实现的定额而处于被动地位，不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受到处分和剥夺奖金。可见，整个物质刺激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其实，有些作者已暂时承认，各种物质刺激办法的制定旨在引起企业对增产和革新的兴趣，但终于没有取得效果。此外，还缺少适当的经济理论和切实有效的奖励办法，以及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充分造就足够的管理人才。<sup>①</sup>

也许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如同一位作者所称的、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上。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却说得更加含蓄，它只说是“增长中

---

<sup>①</sup> 关于这些问题，苏联出版物中也有简要的论述，例如 M. E. 德罗吉钦斯基文章，载于 A. 鲁缅采夫与 P. 布尼奇合编的《经济改革：它的实现与问题》（莫斯科，1969年版）第 11 章，第 282 页，以及鲁缅采夫夫人写的第 2 章，第 44-45 页；又见别尔曼：《制定最佳计划的方法》，第 86-99 页。

的困难”，这个说法不难理解为“老化中的困难”，即指经济科学、经济组织，以及计划与管理组织，都并不总是“跟得上我们经济的增长，跟得上我们需求的增长”。<sup>①</sup>

有些改革派经济学家认识到而且正确地预见到，改革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充满矛盾的过程，<sup>②</sup>其间有进步也有时倒退，因此应当明确地看到发生在这一进程中的更大的方面。经济上和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按照一位西方经济学家看来，都可归因于三个方面，即“刺激因素，组织结构和体制”，<sup>③</sup>他的分析与我们先前摘引的苏联人士的意见并没有多大出入。

这类意见已经引起了应当改革什么这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显然，刺激因素这个大问题是棘手的问题，而计划制订者在办公室里制定出来的、经过精心策划的烦琐的“奖励办法”显然消除不了各种消极现象的病根。

苏维埃制度也曾在激励众多的人们为贯彻政府的意图而效劳方面取得过相当的成就。它有时能够十分精明地看透什么是调动不同社会集团不懈努力的因素，从而给它们以必要的鼓励。可是现在，“刺激”的强度连同整个社会经济环境都改变了，而任务却比先前庞杂得多了。

“提高效率”这个简单的口号，包藏着任务十分艰巨的内容，它要求重新建立经济体系，改变其内部的比例，包括撤消许多欠发达的部门。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工业劳动力是不够熟练的，只有极低劣的技术，而且在缺少机器帮助的情况下工作。除了工业中的这一严重缺陷而外，还存在着其他部门的类似缺陷；特别是在农业中，

---

① 关于“心理障碍”，见德罗吉钦斯基文章，载于鲁缅采夫与布尼奇合编：《经济改革：它的实现与问题》，第11章，第281页；关于体制和科学落后于需求，见别尔曼：《制定最佳计划的方法》，第10页。

② A. 叶非莫夫的预见，见他所著《苏联工业》一书（莫斯科，1967年版）第325-326页。

③ G. 格罗斯曼：《苏联经济中的革新与情报》，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66年5月，第16期第2册，第127页。他的说法与上文中别尔曼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过去十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大幅度进展，但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广大农业劳动力，依然靠体力来完成其各种任务。苏联每千公顷耕地只有八台拖拉机，而美国则为三十四台，西德为一百二十九台。苏联每一名农业劳动者所拥有的机械能，只及工业劳动者所拥有的一半，而在美国农业中却为其工业的一倍。苏联的每一公顷耕地，只能得到四十公斤化肥，而英国为一百九十八公斤，西德为三百一十三公斤。产量仍然是很低的，每公顷只有十三到十四公担，即比新经济政策时期或沙俄时代翻了一番，但仍为美国的一半，为西德与英国的三分之一或不到三分之一，更无法与荷兰相比了。如果按畜产品来作比较，情况甚至还要坏得多。

简而言之，最近十年来其他工业国已经出现的农业技术革命，在苏联还未到来，或者才刚刚开始。正如有些学者所着重指出的那样，一个影响到长期“平衡”的主要缺点，就在于结构上存在着严重的毛病：在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员有六百万人，而在为农业提供服务的工业部门中工作的人数则超过七百万人；可是在苏联，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员有二千九百万人，却只有二百万人在为农业提供机器或其他服务的工业部门中工作。<sup>①</sup>

因此，尽管在七十年代农业也经历了社会革命，但农产品产量仍然是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农业再次象过去一样，被指责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绊脚石。“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就，在许多方面都取决于农业的改进。”<sup>②</sup>

“集约化”这个为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提出的口号，除了近几年来已经向农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外，必将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造成更大的耗费。苏联的农业似乎是个无底洞，投入再多的资金也根本不

---

① 所有这些数字皆引自 A. 叶麦利扬诺夫编：《农业工业化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莫斯科，1971年版），第54-56，59，67-68页。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数字，见该书第54页附表。

② 同上，第6页。

可能完全解决问题。

因此，只要农业还没有达到“集约”程度，它就会继续占用大量的劳动力，这时为工业发展、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和服务部门储备的很容易抽调的劳动力就会枯竭，包括目前急于就业而未受雇用的家庭妇女在内。同时，这种劳动力也很不充裕，而且流动性很大，纪律性也很差。要想得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大的劳动热情和干劲，就必须给工人以某种诱力，特别是要能够提高其生活水平，至于培养他们的技术和配备较好的机器就不用说了。政府还必须给它的技术专家以及行政管理机构和科研人员以同样的诱力，才能赢得他们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否则要达到“集约化”和取得高效率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政府既离不开工人和农民，也离不开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必须吸引全体人民参与任务的完成。政府能够兼顾得了吗？这能否通过完善或改组行政管理机构这种传统方法，亦即用苏联通常所说的“行政措施”那老一套官僚主义办法来完成呢？难道现行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不经过自身的根本改造就能很好胜任如此繁重的自我提高的任务么？<sup>①</sup>

---

① 根据现有的关于1971和1972年间经济成果的报告，1971年计划在几个宏观经济的主要方面都达到了指标，但在劳动生产率和预先规定的五年中的年平均数字方面却没有达到要求。1972年计划则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没有达到（尽管这些指标都是较合理而有节制的），这大概是由于农业年景非常不好的缘故。关于各项指标，见《1971—1975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莫斯科，1972年版）第75，345页。1971和1972年完成的数字，见《经济报》周报，1972年1月第5期，第3—6页和1973年1月第5期，第5—8页，标题为《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国家计划完成情况》。1973年被视为完成整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性一年，而这个五年计划只不过是加强经济的漫长道路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但是公布在同上周报1974年1月第5期第5—8页上的计划完成数字，却并未显示出较之过去两年有所突破。尽管农作物方面一直保持惊人的纪录，从而有助于国民收入的提高，但一些重要部门的指标却没有达到预先规定的五年中的年平均数字。工业生产由于消费品生产不足以及工业和基建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基建的劳动生产率远未达到预定的平均指标而受到严重的拖累。畜产品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出色的粮食收成在五年计划的头三年中也没有达到增长指标和产量。因此，五年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势必不可能达到，除非在最后两年出现某些奇迹般的进展。

这些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而本书所研究的历次论战已提出了若干解答。但是要作出定论，却只有靠今后十年或十几年的事态发展来回答了。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我们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的特点。经济问题对这个政权来说，是引起最复杂和最急需解决的各种难题的根源，但是这个政权所遇到的难题也决不只是这些：社会的总结构既使问题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社会支柱和力量来帮助克服困难或反对重大改革。如果说要对经济上的毛病所带来的后果和可能解决的办法加以预测是困难的话，那么要事先判断这整个复杂的社会和国家里事态发展的未来情况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工业、农业、商业和基本建设这样的经济活动，能够造就出一些大的社会阶级和重要的专业集团，但是从非经济领域里也在繁衍出一些重要的社会集团和大的居民阶层。国家的行政机构、教育设施、文化事业和众多的非经济服务部门，也都使社会结构变成一个复杂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问题与其他社会需要发生相互的影响。文化上的种种道德标准、心理上的不同需要，以及政治上的各种抱负，使经济领域的情况大大复杂化，并且对最初出现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警告。虽然各种问题的产生往往大体上可归因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分配方式，但是要预先提出解决办法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还要取决于敌对社会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而这些敌对势力之间的冲突总是在一个超出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青年、政府官员、党和军队都经常起着重大的作用。最终采纳的纲领和在相互制约下产生的制度，都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

因此，这样的社会改革纲领、计划和蓝图，终究不是根据某些文章和言论的逻辑或学术上的道理来决定的。各派势力的聚合与互相让步，以及为新的解决办法而斗争的带头人的素质，才是决定最后结果的重要因素。

所以，在苏联也象在其他国家一样，为弥补日益增多的缺陷和消除紧张状态而采取的对策，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观察一下别的共



产主义国家，就可以看到例如铁托、盖莱克、毛泽东或卡达尔所采取的一系列对策。苏联共产党既是如此强烈地爱好专家和官僚治国型的改革，而不愿采取社会政治型的改革，那么它要通过加强中央控制能力和采取较好的管理方法而在改进经济状况方面取得某些成功，就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既然这条改革路线看来已为统治集团确保其优势提供了最好的效果，而没有引起社会的动乱，因此目前所执行的正是这一条路线。

用专家和官僚治国的办法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并不只限于苏联，而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也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的，甚至包括上层人物在内。在苏联等国，对于许多有头脑的人来说，通过改进技术，包括训练技术和操作技术来提高效率，完全是不值得提倡的。

幸而，要在这样的路线上取得进步，较之通过民主化取得进步，至少同样是值得怀疑的，不用说更带空想性了。只要现行的各种政策不象他们所吹嘘那样行之有效，那么经济停滞和紧张加剧的现象就将继续导致各个营垒和各种纲领之间发生新的斗争和冲突。目前还不太为人们所知悉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潜力届时必将显现出来，并将受到考验。

也许我们从经济论战中，或者从地下出版物中所了解到的，只是一些对未来的倾向和政治分歧的预告而已。实际上许多情况正在社会的深处发生，正在蕴酿和成熟，以致现有的政治上团结一致和表面上单纯的局面，已不再同“苏维埃政治”相吻合了。

“解冻”和“封冻”的交替出现一直是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治的特点，这个特点如今使进一步加深的紧张状态更加明朗化了。如果说这一制度就其现在的表现来看确实是“过分扩张”了，并且随着各种问题的日趋严重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复杂化而困难重重，那么人们就可以预见到更多的政策上的修改和转变，即更多的“解冻”与“封冻”。在这样一些客观条件下，讽刺和禁止公开的反对意见充其量只能取得暂时的成功。每一次“解冻”都重新证明，一些较深的潜流正在接近地面，就要冒出来了。因此，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单从苏联政

治中来认真考虑一下民主潮流的前景，这个潮流正在计划经济的格局内力图为苏维埃制度的根本变革打开一条出路。

本书中所研究到的意见，以及提出这类意见的个人和集团，虽然只不过是一种苗头，可是这个苗头可以看作一种倾向的预兆，这种倾向在党内外的学者、行政管理人員和政治家中日益发展，终有一天会把领导权交给一个新的力量的联合。他们很可能组成各种政党，或组成党内的一些派别。他们有智慧能力，有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专长，并且在其他的知识学科中有足够的同盟军，能够为改革和现代化制定出各种理论和纲领。他们也能够对苏联过去的一些重大的、合理的事例和倾向作出身临其境的描述，并提出与党内的某些传统十分一致的解答。他们在思想上，特别是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新布哈林派”味道，暂时还没有被人们所重视或认识到。但是，我们在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以及牺牲者和“叛徒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英雄这件事情上，已经预先体会到也许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苏联的有政治头脑的人们需要这样的英雄，也需要从本国未被歪曲的历史中得到能够得到的一切支持，如果这个国家决心摆脱沉重的包袱而迈向一个新的阶段的话。

只要留恋三十年代的人们仍然稳稳地掌握着权柄，这个希望就不可能实现。只有当历史的研究摆脱了它所受到的束缚的时候，才有可能对党内反斯大林主义各派别和其他非党的倾向作出公正的评判。

实现这种“摆脱束缚”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类倾向要能互相结合起来，并增强他们各自的力量。现在，这类倾向已十分明显地形成一个态度鲜明的学派，它有能力不仅为经济管理，而且为整个政治制度提供可资选择的模式。如果他们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最明显不过的就是现行路线各种缺陷的增多及其生命力的受到侵蚀。因而，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期待，斗争必将进一步加剧，使党不得不放弃它那老一套不中用的做法，而把自己的机

体连同它与国家、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加以彻底改革。

这种深刻的改革难免遇到困难和斗争，但是改革派必将有机会提出他们的要求，使政治制度能适应日益复杂和现代化的社会。按照改革派的一条思想路线看来，要达到上述要求，就必须把死板的“行政管理的计划”经济纳入一个以市场机制为依据而实行灵活有效的“最佳计划”的最佳体系，以保证各生产单位有充分的余地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放弃把社会硬说成具有日益增长的一致性的不切实际而带强制性的观点，而允许各个社会集团和各种集体利益有表达意见和参与更自由的实力较量的权利，这样才能使政治制度更加合理，使社会生活更好地协调起来并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就必须解放全体公民，并为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创造条件；最后，还必须克制党对权力的欲望，使党变成一个无论在多党制或一党制中都有内部政治较量的自由的政治组织。

这最后一个想法早在1926年就由另一位对党提出批评的布尔什维克预先提出来了，此人就是不太知名的奥索夫斯基，他曾由于他的异端邪说而受到严厉的处分。在新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想法也许会象其他许多异端邪说一样，证明是正确的，并被许多人当作纲领来采纳。奥索夫斯基宣称，党要达到内部团结，就必须允许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存在，让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在这些政党中找到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如果党不愿意或不可能容纳其他政党，就应当允许自己党内有不同的政治派别，否则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sup>①</sup>

奥索夫斯基在世时，保障非党人士的自由显然就等于保障敌人或敌对社会阶级的自由，那是会破坏新的社会秩序的。这种反对政治自由的立场，在阶级情绪偏激和互相敌视的情况下一度得到发展

---

<sup>①</sup> 尤·奥索夫斯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党》，载于《布尔什维克》，1926年第7-8期。该刊编者发表这篇反对派成员的文章旨在揭发反对派所持的叛逆思想。奥索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在正式发表前，曾以当时地下出版物的形式被人传抄。目前，罗伊·麦德维杰夫显然是唯一发出同样呼吁的人，见他论述社会主义民主的专著《论社会主义民主》（阿姆斯特丹，1972年版）。

和保持，而在今天仍继续坚持下来。如今既已不存在剥夺了公民权的耐普曼和富农分子，以及旧统治阶级的残余和前沙皇时代的遗老与宪兵，那么“现在谁是敌人？”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而且由于提得尖锐而带有挑战性。

过去为过火的专政所付出的代价的确是太大了，如果说当时有不少人会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今天就很难这样认为了。一些集团和利益保持着地下暗流的形式，为了表达和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进行暗中摸索。在缺乏民主化的情况下，只有那些严守秘密的力量才能得到最多的好处。相反地，有了民主化才能弄清苏联社会的真正政治潜在势力，才能活跃政治生活，让它们彻底认识自己过去的渊源，并继续保持它们的传统，或者至少让全国知道它们的真面目：是不同色彩的社会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

奥索夫斯基的设想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本书所探讨的苏联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新倾向，给这个国家指明了应当如何克服“内战模式”所带来的恶果，抛弃不真实的社会一致性的铸模，把政权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从而使苏联社会得以进入一个政治上合理的时代，而千万不要再象命中注定似的，在两种模式之间摆来摆去。